

意大利共產黨總書記陶里亞蒂答記者問：

社会主义民主的問題和 社会主义民主的發展

（原載1956年6月17日意大利“團結報”，

小標題都是“團結報”編者加的）

蘇維埃制度比資本主義制度優越——對社會主義法制的嚴重破壞是怎樣能產生的——探究原因以及防止重犯斯大林所犯錯誤的保證——糾正錯誤將給予社會主義社會以新的推動力量——當前局勢下蘇聯同國際工人運動的關係

“新議論”雜誌就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所提出的問題向政界和文化界一些著名人士提出了九個問題。下面是陶里亞蒂同志對“新議論”所提問題的答复：

- 一 在你看來，蘇聯對個人崇拜的譴責意味着什麼？
內政上的動機是什麼？外交、政治、社會、經濟、
心理、歷史方面的動機是什麼？

蘇聯共產黨人對個人崇拜的譴責和對斯大林工作的批評，在我看來，不意味着其他，只意味着蘇聯共產黨領袖們所說過的以及人們不斷重述的一切，不多也不少。必須提防兩種錯誤的解釋。第一，即使不說是最可笑的，至少也是最粗魯的解釋，就是，認為或者假裝認為：蘇聯共產黨人由於宣布這種譴責和這些批評，因而就轉到——假如不說是反共的立場，至少也是從來就

既不贊同也不理解共產黨人行動的那些人的立場上去了。我的意思是說：據說他們已經把他們的一切原則立場以及實際立場，整個的過去，他們以往在那麼多年的行動中所肯定、支持、維護、實現的一切都扔到海里去了，或者說，準備扔到海里去。反共旗手們會這樣來解釋第二十次代表大會，我完全可以理解；但是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我們今天應當比過去重視他們。何況這些人由於趨於極端就暴露出了自己的計謀，而且証明了自己懷有惡意。但是我要公開說：我並不排除有一些人可能充分出於善意而落到採取這樣的立場以至開始懷疑：考慮到對斯大林提出的批評，考慮到在整整一個時期斯大林曾經是共產主義政策的主要代表，今天是不是有理由來懷疑這個政策的所有主要時期的正確性，例如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時期反對帝國主義陰謀的堅決態度開始，經歷雅爾塔和德黑蘭而追溯到1939年同德國簽訂的互不侵犯條約，以至於追溯到西班牙戰爭，等等；在另一方面，追溯到關於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指示和對反對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人們的鬥爭，而且反正我們這樣追溯既往——為什麼又不追溯到十月革命中決定性行動本身，即工農兵蘇維埃的奪得政權、制憲議會的解散和社會的新政治結構的建立。對充分出於善意而似乎這樣來解釋事物的那些人，我們應當說他們錯了。自然，對於蘇聯共產黨人用來奪得政權和奠定他們的現有社會秩序的一切行動，是始終可以進行討論的，而且人們無疑還將長期就此進行討論，以便明確其性質、內容和後果，以便從歷史觀點儘可能準確地加以估計。蘇聯同志們今天正在從他們的歷史中把為了過分頌揚斯大林個人而寫進去的那些錯誤和誇大詞句刪除，這樣將可以作出越來越準確的歷史評價。這並不排除這種可能（甚至很容易預見到）：很多評價將被修正，對於一定時期中行動上的某些缺點、錯誤和消極方面的批評將明確起來。但是如果認為：把一切人和事件放在恰如其分的位置上的這種特殊修正，是蘇聯共產黨人方面對他們半個多世紀以來發

展起來的行動的根本否定或根本的毀滅性批判，那將是嚴重的錯誤。上述行動經歷了人所共知的一切連續階段的發展過程，仍然是工人階級取得社會領導權和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影響重大的革命活動的第一個偉大歷史范例。

第二種錯誤是把對斯大林的批評和對他個人的崇拜的揭露看成是在共產黨和蘇聯國家領導人中間發生的一種個人之間或者集團之間的鬥爭的片段，好像在實質上只是為了爭奪權力的一種鬥爭。資本主義國家的大報刊特別熱中於把蘇聯發生的一切都作這樣的解釋。它為了搞這一套而擁有它的專家，這些專家在某某部或某某組織的負責人被更換的時候，能夠準確地估計某某領導人失掉了多少公分政治勢力，某一批人又向獨享的權力前進了多少公尺等等。當這些微妙的猜測性估計用來談論文職人員和軍人之間、技術人員和黨的人員之間的鬥爭和對立的時候，我們就聽到了無與倫比的謬論。

情況是：在蘇聯，技術人員和黨的人員往往就是同一個人。至於軍人，大家知道，自從革命以來所進行的一切黨內鬥爭中，從來就沒有過軍隊作為軍隊表明態度的事。因此，這種事情還是讓愛好政治花絮和流言的人去操心吧。我們不能、也不願排除這種可能：在蘇聯領袖們制定最近的政治決定和判斷的過程中，在他們之間或許出現過辯論中的衝突，甚至出現過激烈的爭論。一個生氣勃勃的、內部活動沒有由於對一個人的崇拜而窒息的政治有機體，正應該這樣行動。但是，沒有任何事實、跡象能夠以任何方式証實以批評斯大林和批評對他個人的崇拜為掩護而暗中進行爭奪權力的鬥爭這種說法。即使在這方面，我們還是可以進一步探討。要了解斯大林逝世以後情況是多麼困難，只要知道——那怕是膚淺地知道——斯大林不僅在黨的幹部和黨員心目中、而且在廣大人民羣眾心目中所以佔據的地位就夠了，只要理解糾正他所犯的錯誤、揭發這些錯誤、在許多方面走上新道路這一任務是多麼艱巨而障礙重重就夠了。這種顯而

易見的困難說明公開揭發以往所犯的錯誤為什麼不能在斯大林逝世以後立刻就做。那樣做，不僅不會被理解，而且還有可能引起消極的、危險的、不可控制的反作用。相反，立即開始的顯然是：首先在領導方法方面，然後在其他各方面，從事實上糾正這些錯誤。而且，顯然，要是在領導集團內部發生了個人或集團之間暗中爭奪權力的鬥爭，那就不能完成這種糾正。要對在斯大林領導下所犯最嚴重錯誤的血腥後果負主要責任的人之一的貝利亞被清除，這件事情本身就清楚地證明了這一點。這次清除是在既沒有引起領導集團內部的動搖，也沒有引起公共行政各部門之間的沖突的情況下迅速進行的。

因此，為了在這一點上作出結論，應該習慣於這種想法：對蘇聯同志們來說，對斯大林和對崇拜他個人提出的批評的意義，正是他們到目前為止一直在說的。那末，他們究竟說了些什麼呢？他們說：由於斯大林的錯誤和對他個人崇拜的結果，積累起一些消極因素，形成了不利的局勢，甚至在蘇維埃社會各部門中、在黨和國家各部分的活動中形成了顯然惡劣的局面。但是，要用一個總的名目把所有這些消極的方面概括起來並不是簡單的事。因為，這樣做有產生過份的、武斷的和虛假的概括的危險，也就是有認為蘇聯的整個經濟、社會和文化現實不好而加以否定、批判的危險，這就會同歷來的反動無稽之談不謀而合。比較不武斷的概括是：從斯大林的錯誤中看出，由於個人權力逐漸凌駕於在根源上和性質上都是民主的集體機構之上，官僚主義、法制的破壞、停滯狀態和社會有機體各種崗位上的部分退化等現象就積累起來了。但是，應該馬上補充說一句：這種凌駕一切之上的情況只是部分的，它的最嚴重的表現大概是在國家和黨的最高領導機構方面。隨着就產生了這樣的一種傾向：限制民主生活，許多方面（技術和經濟、文化活動、文學、藝術等）抑制思想和行動的主動和活躍。但是人們絕對不能從此得出結論說：這就摧毀了民主和社會主義性質所由產生的、使蘇維埃社會在

本質上比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優越的蘇維埃社會的基本性質。蘇維埃社會不可能對這樣的錯誤感到滿意，而資產階級資本主義政權恰恰相反，即使在更嚴重的錯誤和形勢中也是感到滿意的。這些錯誤不可能成為當時公民生活、經濟和政治生活中普遍的持久的因素。這些錯誤如果長久繼續下去，它們也許就會造成決裂，儘管這樣的假設是應該慎重地提出的，因為決裂對於人民群眾和整個社會主義運動必定是利少害多的。這樣的事情，不僅那些本來也許想造成決裂的人，而且相當廣泛的社會階層都是認識到的。

我這樣說，並不是說斯大林所犯錯誤的後果不是十分嚴重的。這些錯誤是極為嚴重的，它們擴及很多領域，而且我不認為糾正它們是容易的，我也不認為能夠迅速地糾正這些錯誤。實質上，可以說蘇聯社會的領導幹部中一大部分（黨、國家機關、經濟、文化等領導幹部）在對斯大林的崇拜之下變得麻木了，他們在思想中和行動中的批評和創造能力失掉了或者減少了，因此，要宣布對於斯大林錯誤的批判，就絕對必需採用可以震動人心、並且使複雜的社會主義制度所賴以建立的各种機構重新充滿活力的方式。這樣才可能使這個社會獲得新的民主進展，而這對於各國人民之間更好的了解、對於緩和國際局勢、對於社會主義和和平的進展將是有力的貢獻。

二 你相信蘇聯所進行的反對個人崇拜的批評應當引起一些制度上的變化嗎？

三 政權的合法性是公法的重大問題，現代政治思想傾向於把人民意志看作合法性的基礎。西方式的議會民主主張，要有不止一個政黨，人民意志才能表達出來。你是否認為這一點是正當的：一黨制度的政權，而且在選舉中無從在政府和反對派中加以選擇。

也許我的看法不对，不过我認为，今天不能够预料苏联会有制度上的改变，不能够预料这种改变会从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公开发表的批評中產生。这并不是說，相当重要的改变就不能实现，何况，某些改变已經开始了。

首先，制度上的改变是指什么來說呢？我認为，采取这种說法的人指的是政治机构的改变，就是說，使苏維埃社会退回去接受所謂“西方”制度所特有的至少某些形式，再不然，就是使这些制度所特有的某些組織机构具有新的重要性。假如是这样提出問題，我的答复是否定的。

假如人們当真想研究研究政权的合法性和它的根源，我們就来談談吧，不过讓我們努力擺脫在处理这个問題的时候“西方文明”的辯护者所不肯放弃的虛伪形式主义。我們讀过“國家与革命”，我們沒有忘記它所教導的对我們極其有益的内容。对斯大林錯誤的批評不会使我們忘記它。实际上，在这种“西方文明”中，政权合法性的根源根本不是人民意志，充其量，人民意志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因素，它通过定期选举的媒介來对决定一部分政府方針起作用。但是，在选举中（意大利的例子就証明这一点）人們采取了層出不窮的压力、恫嚇、煽动、作弊、合法与非法的干預，結果形成相当嚴重的限制和对人民意志的歪曲。这种种手段不僅为当时恰巧掌握着政府的人的利益服务，而且为社会中由于财富、占有生產手段和交換手段以及由此而來的其他等等而掌握着实权的人的利益服务，他們的实权开始于对政治生活的事实上的領導，接着資本主义社会中的宗教当局和其他一切权势机构就必定会給他們的实权以保护。

我們肯定地認为：今天，鑒于民主和社会主义运动的發展和运动的現有力量，有可能把这种防止自由表达人民意志的制度打开相当寬闊的缺口，有可能为表达这种願望而开辟日益寬闊的道路。因此，我們的行动依据民主范圍，而且不超越民主范圍，我們認为日益前進是可能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們無視

现实，也不意味着必須把西方世界中民主發展的方式当作偶像，当作絕對和普遍的范例（只需要在这个西方世界里深入一步看看，就可以看到西班牙、土耳其、南美洲和葡萄牙的例子，更不用提美國通行的歧視性选举制度等等事情了）。因此，我們繼續認為西方式的民主是有限的、不完善的，在很多方面是虛假的民主，必須通过种种經濟、政治改革來予以發展和改善。因此，即使我們承認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了苏維埃民主發展的新進程，我們也远不能想像：这种發展会以回复到“西方”形式的制度來表現，我們坚决認為这样想是錯誤的。

为了糾正所犯的錯誤而必須進行的修改

苏联政权合法性的根源首先是革命。革命使工人階級取得了政权，工人階級当时还是少数，但是它在解决当时所提出的民族和社会各項重大問題中却能够同所有的人民群众逐漸結合起來，改变國家經濟結構，遵照社会主义的原則來創造一个新社会，并且使它运行而向前發展。忘掉革命，不考慮新的社会結構，忘掉苏联所具有的一切特征，然后把它去同資本主义各國政治生活方式作表面的比較，这完全是欺人的行为，僅此而已。

但是这样粗淺地回顧一下实际情况还是不够的。苏維埃社会一开始就有它特有的政治結構，这种政治結構正是建筑在苏維埃（工、農、兵委员会）的存在和运行上的。苏維埃制度比任何傳統的各式民主制度都民主得多，也先進得多，这有兩個原因。第一，这个制度使民主生活通过劳动人民的基層組織，逐級地通过城市和州的議會，而后通过全國性議會，深入到構成社会的一切部分。第二，有了这个制度，生產單位和民主生活的基層小組就能密切結合，这同傳統民主組織的消極方面——生產和政治脫節，从而自由只是表面上、形式上的——比較起來，就优越得多了。苏維埃制度运行中是否可能發生停滯和受到障礙？苏維埃民主制是否会因而受到限制呢？这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第

二十次代表大会已經公开承認的事實。由于專斷的官僚主义領導方法和对政权法制的破坏,苏联民主生活就受到了限制,部分地受到窒息。从理論上說,这是可能的,因为社会主义制度并不必然就可以避免錯誤和危險。硬說能够避免的人只是証明其幼稚。社会主义社会不僅是由人組成的,而且它还是一個正在發展中的社会,在这个社会內部不断表現出主觀和客觀的矛盾,这个社会也随歷史演变而演变。事實上,應該研究一下苏联民主生活的这种限制为什么和怎样能出現的,但是,不管对这个問題的回答如何,我們毫不怀疑这样一点:不可能得出必須恢复資本主义社会組織形式的結論。

多党制或者一党制本身不能被認為是区分資產階級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因素,同样,它也不構成民主社会和非民主社会之間的分界綫。在苏联,革命以后,在苏維埃制度和無產階級專政之下,有个时期曾經是由兩党执政的。在今天的中國,几个政党共同执政,而政权并不因而就不是民主專政。在某些人民民主國家中,也有同共产党不同的各种政党,虽然并不是所有人民民主國家都是这样。在工人运动和人民运动非常强大而且先進的、今天仍然是資本主义的各國,不能排除在多党存在的情况下由于其中某些政党的主动而發生深刻的社会主义变革的可能性。在今天的苏联,不可能設想多党制度的存在。那么,多党制从何產生呢?

由上面作決定嗎?應該說这样做是一种奇怪的民主程序!應該承認,苏联社会是由于消滅了資本家階級而造成社会成分一致的社会,不僅存在着体现为工農聯盟的政治一致,而且在那个國家里还存在着“西方”世界的人們所不知道的、也許更不了解的公民生活和政治領導的統一。在苏联,甚至党这个概念本身也同我們的概念不同。党为实现和發展社会主义而工作、斗争,但是,它的工作主要是積極的和建設的性質,而不是以假定的內部反对派为目标的紛爭性質。党对之進行斗争的“反对派”,是

應該加以克服的客觀障礙，是應該在工作中加以解決的矛盾，是應該加以控制的現實，是為了使新東西向前發展而應該予以消滅的舊東西的殘余，等等。對於社會發展具有根本意義的對立物的辯證發展，已經不再體現為不同的政府黨派或反對黨派之間的競爭，因為，那個國家里沒有進行這種競爭的客觀的（即在事物中的）根據和主觀的（即在人們思想中的）根據。這種辯證發展體現在包括彼此配合的一系列組織（黨、蘇維埃、工會等等）的單一體制內部。對斯大林的批評，就是批評他阻止了體制內部的這種表現。糾正就表現為恢復這種正常性質，而不是表現為否定制度，或者推翻制度。但是，雖然我認為為了后退就要破壞制度這種假設是荒謬的，但是我仍然深信：依據最近取得的經驗，依據在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依據必須具備防止像斯大林所犯那樣的錯誤的更有效的保證的必要性，有可能和必要來進行甚至是深刻的修改。必須把注意力集中於這一點，必須密切注視和研究蘇聯的黨和政府正在逐漸採取的各種新措施。在今天，最令人感興趣的、最有廣泛意義的措施，就是使經濟領導越來越顯著地傾向於地方分權的措施。當初必須迅速實行極其深刻的改變，鏟除資本主義基礎和奠定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同時又必須面對經濟、政治、軍事的迫切需要，在這樣的時期，最高度的中央集權曾經是必要的。對於社會主義經濟領導說來，中央集權本身——特別是這種極端的中央集權並不是非採取不可的一種形式。是否應採取或多或少的高度集中，從而從上面實行領導，是由於複雜的客觀情況所迫，但是，高度集中的程度是同地方民主生活發展的程度、群眾活動和創造精神發揮的程度成反比例的；在我們看來，群眾的活動，他們事實上的參加批評和監督，從而參加任何經濟和社會機構的領導，是民主的真正表現。在我們這裡，在多黨制度之下，在政府和反對派辯證的相互關係等等制度之下，這種群眾活動卻沒有以任何形式、以任何方式表現出來，甚至沒有以十分有限的和間接的形式和方式

表現出來。因此，我們有理由說：這種制度不是真正民主的制度，我們不能理解；為了糾正斯大林的錯誤，蘇聯人民為什麼就必須後退。

我還要談談關於防止重犯斯大林所犯的那些錯誤的有效保證。我知道，關於這一點，有人提出“司法獨立”（即分權）的主張，以為這是可以防止任何破壞法制行為的可靠靈藥。老實說，我是不相信這種靈藥的。法官應當享有獨立地位，蘇聯憲法，正如其他許多憲法一樣，已經保證了這一點。而對這種準則的違犯只是發生在事實上的，不是發生在法律上的。何況，法官不是，也不可能是生活在社會之外、在社會矛盾、社會上主導和優勢潮流之外的公民。一個英勇的游擊隊隊長，假如在戰爭環境下有人指責他消滅了一個被指控為間諜的人，在十年以前，任何法官是不會想到把他判處徒刑的——我說的是徒刑。而今天，人們就這樣做了。法官是“獨立的”麼？也許，從形式上看，是不直接受各屆政府的命令約束的，但是，法官們並不是不受加斯貝利之流十年來為了貶毀游擊運動、控告游擊隊和判處游擊隊的領袖們而進行的宣傳的影響的。法官們是統治階級的構成部分，這個階級內部產生的無論正確與否的思想潮流，他們是逃避不開的。現在，據說蘇聯在斯大林時代有過一些審訊，宣布過不合法的、不正確的判罪。宣布這些罪刑的法官們十分可能並不是出賣了良心的公民。

他們是這樣的公民，他們相信，斯大林所主張的、當時在全國人民中間傳播的關於必須予以消滅的“人民公敵”到處存在的這種錯誤的學說，是有根據的。因此他們雖然形式上是“獨立”的，他們卻仍然以這種方式進行審判。黨和政府政治領導路線的正確，才是真正的保證，而要使路線正確就只有在公眾生活的各个方面永久而密切地聯繫人民群眾，從而加強黨和國家內部的民主生活。法官同人民的接觸越密切，他就越公正。

四 已經有人說：在东西方之間沒有共同的政治語言。在西方，人們把个人崇拜，把引起清洗、審訊、判处、違法行为的这些錯誤，称为暴政。而在东方却把反对同叛國，把爭論同偏差等等看作一回事。不同的語言从來就表示本質上的分歧。这种語言上用詞的不同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談到东西方之間政治語言不同的这种說法，我要說的是：在我看來，它純粹是一种反动的謬論。这种說法曾經是而且仍是“神聖信念派”（指最反动的教会人士——譯者）的論点之一。关于这个問題，我願意提到一本奇怪的書——1799年威尼斯出版的“凡是希望了解革命新語言的人必备的民主哲学新詞彙”。自由、愛國主义、平等、权利等等，一切表达出由于資產階級革命而深入人心的、新近得到肯定的偉大思想的当代政治術語，都在“神聖信念派”这本二百頁的小書里得到了分析，这本小書明确地說，这些偉大的語言表达了过去專制政府时代偉大的东西，而且仍然被那些始終相信旧秩序的人用來表示意見。而在革命家嘴里，在革命勝利了的那个令人厭惡的法國，这些思想意味着完全不同的事情，甚至完全相反的事，照這本書說，自由对革命者來說意味着整个國家的“罪犯、騙子和下流人的絕對权力”，意味着劫掠和屠殺人民中間拥有一些东西的那些勤劳、誠实的人的絕對权力。平等，現在已經成为一个毫無意义的字眼，成了“毫無真正的意义的荒謬透頂的胡說”。民主，意味着“政府中無神論者、殺人犯和强盜橫行無忌”。現在我且不談这些。这里我所談到的是，經過了过去几个世紀的“神聖信念派”的爭論，人們可以看出，这种爭論就是以自己的方式运用了政治語言各异的这一學說——这可以帮助我們了解問題的本質。这并不是說，在目前世界的兩個部分，人們各說各的語言，而是說，不僅無能力贊同、而且無能力了解他們所敵視的社会和政治上深刻变化的那些社

会集团，希望在世界不同部分之間制造互不了解的深淵，从而不利于那些向前迈进的人。但是他们并没有做到。

一种共同的語言

东方和西方的政治語言对双方來說是絕對共同的。暴政，这里和那里都意味着同样的东西。在斯大林創立的制度下，在某些特定的时期，人們注意到有暴政的因素，人們看出权力做出了一些道德上可惡的違法行为。誰也沒有否認这一点。民主这个字眼，無論在这一方或者那一方，都意味着同样的东西，这就是，屬于人民的、为了人民的政府，公民們的平等，等等。俄國共產党人在他們最初的宪法里規定工人和農民选举代表所需票数兩者有所不同，当时他們是完全知道这种規定是不民主的。俄國共產党人这样做，是因为他們要在法律上保証工人階級在革命中所取得的領導作用，工人階級把國家从外國侵略和灾难中拯救出來，从而为社会主义的來臨創造了最基本的必要条件。在这方面取得了初步的巨大成就之后，这种規定就撤消了。事实就是这样很清楚地昭示我們：歧視办法取消以后，民主就恢复了它的完整性。在这里，在我們这个所謂“西方”这里，我倒希望有人給我解釋一下，天主教民主党—社会民主党政府在意大利对公民所采取的政治歧視和民主之間能有什么相同之处呢？我們这个政府是以政治歧視作为它一切活动的基礎的，而且，这种做法永远是政府当局多数派、資本家、救济机构、劳动机关等等的普遍的行动准则。

既在东方，反对就等于叛國、爭論就等于偏差，这是絕對荒謬的說法。在爭論中，往往可能出現同原來的政治路綫不能調和的相反的意見，它可能被認為是偏差，因为它是一个偏差。而在我們这里，表达同执政党見解不同的政治見解則被指为“思想上的恐怖行动”。至于反对立場，我已經說过，不是也不能同叛國并論。毫無疑問，在某些情況下、某些条件下，反对立場采取了

这种形式以致可以認為是叛國或是煽动叛國。通过革命而取得政权的工人階級和領導工人階級的党在長时期之內面臨着如此嚴重的局勢、如此嚴重的困难，而且面臨着必須不惜任何代价击退的如此众多的國內外敌人，以致不得不采用特殊手段以保持政治領導和行动的統一，它們做到了这一点。如果不这样，那我們又会处于怎样的境地呢？斯大林所犯的重大錯誤，就是在新的环境中，已經沒有必要的时候，还非法地發展了这种制度，甚至使这种制度更为嚴峻。列寧一开始就不断指出必須尊重革命法制，虽然这种法制曾經不得不受到相当大的限制。斯大林当时那种作法，只能便利于建立一种个人权力。而他的同事們的錯誤則在于沒有及时了解到这一点，而且听其發展，以至于再也不可能糾正他的錯誤而不給大家造成嚴重的損害。

五 你認為斯大林的个人独裁的發展是同俄國歷史政治傳統相反的而且是同俄國歷史政治傳統無关的，还是相反，認為是这种傳統的一种發展？

六 斯大林为了加强和維持自己的个人独裁而采取了自从法國大革命以來在西方被称为“恐怖”的一套强迫性的措施。你認為这种“恐怖”是必要的嗎？

我把這兩個問題合并起來答复，因为這兩個問題的具体提法会使我們的探討局限于一些特定的問題上。而如果超出这种局限，我們就可以研究在討論到达这一階段的时候我們的思想里必然会發生的一个問題，那就是，在苏維埃社会里怎么能够允許犯下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揭露的那些錯誤，怎么能够允許經常嚴重地和廣泛地違犯民主生活和社会主义法制的情况相当長时期地存在下去？顯而易見，可以把這個問題或者同整个政治領導集团对于这些錯誤的共同責任問題（其中也包括今天采取主动揭發和糾正已經做出的坏事情的同志們的共同責任）联系起來，或者同这种坏事情的后果問題联系起來。

关于共同責任，已經提出兩種解釋：一種在我們看來是顯而易見的，那就是我們在黨內進行討論的時候所提出的解釋。古達德同志在“人道報”上發表的幾篇文章中也採取了這種解釋；還有，假如記者們的報道可信，赫魯曉夫同志在一次招待宴會上回答一個問題的時候也提出過。當斯大林所犯錯誤已經顯得嚴重的时候剝奪斯大林的權力，這在“法律上”是可能的，但是在實踐上是不可能的，因為假如提出這個問題，就會造成衝突而斷送革命和蘇維埃國家的前途，而在當時，全世界各地的武力都指向着蘇聯。只需稍稍——那怕是膚淺地——知道在斯大林領導國家的年代里蘇聯的輿論，只需要在當時密切注視國際局勢的演變，就能夠認為上述說法是極為正確的。今天，蘇聯領導人揭發了一些具體錯誤，例如，斯大林在戰爭初期一度喪失信心。然而，當時在蘇聯，不用說是剝奪斯大林的權力，那怕只是限制他的權力，又有誰會理解呢？當時要是發生這樣的事情，即使只是迹象隱約可見，一切就會瓦解。在其他的時候結果也會是一樣的。赫魯曉夫的看法，事實上說明那些本來想糾正這種局面的人所處的不得已情況；但是，同時，這種看法也使情況複雜化，並且從根本上使情況惡化了。我們因此不能不承認：斯大林所犯的錯誤或者是黨的大部分領導幹部、因而是人民群眾所不知道的，這在當時是很少可能的；或者是不被大部分幹部、因而不被受幹部指導和領導的輿論認為確是那樣的。大家可以看出，我排除這種解釋，就是認為僅僅由於存在着軍事、警察恐怖機器，它使用自己的辦法控制着當時的局勢，因而使改變成為不可能。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那末，那些領導黨的機構的人們就決不可能對於像納粹進犯那樣的危機引起如此勇敢的反應。我覺得正確得多的是承認斯大林儘管犯了錯誤，他還是享有全國很大一部分人——首先是領導幹部，還有群眾——的支持。所以這樣，是不是因為斯大林不是只犯錯誤，也做了有益的事情，“他為蘇聯作出了巨大貢獻”，“並且是最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堅持不

渝地信任人民”？赫魯曉夫同志自己在我們過去提到過的發言中承認過這一點，從而糾正了第二十次代表大會所犯的那種奇特的、然而照我看來是可以理解的遺忘的錯誤，就是說，絲毫不提斯大林的功績。但是，這解釋不了一切，不能明確說明今天所揭發的錯誤的嚴重性。只有深入研究怎樣導致像斯大林體制那樣以錯誤為特點的體制的，才能作出解釋。只有這樣做，才能理解他的錯誤怎樣不純粹是個人的，而是同蘇聯生活實際密切關聯的。

判斷的因素

對於不可能較早實現必要的糾正的原因，另一個解釋也是赫魯曉夫自己提供的。他曾經肯定說：如果說這些糾正當時沒有做到，那是因為黨和國家的領導人對待斯大林所犯錯誤的態度並不是在任何時期都始終一致的。在過去的某些時期中，其他領導人充分團結在斯大林周圍，這種團結正是我們在前面談到過的意見一致的表現。

談到這裡，應該毫不猶豫地公開承認：如果說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在分析和解決民主和社會主義運動的許多重要的新問題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如果說第二十次代表大會是蘇維埃社會發展中的一個十分重要的階段，我們却不能認為今天由蘇聯報刊重申和發揮的代表大會對於斯大林的錯誤以及使這種錯誤能夠發生的原因和條件所採取的態度是令人滿意的。一切的根源就好像是“個人崇拜”，對一個人的崇拜，而這個人却有某些嚴重的缺點，他不謙虛，力求獨攬大權，同時由於不勝任而犯了一些錯誤，他在同其他領導人的關係中不忠誠，有當偉人的癖好，過分愛己，對人則極端猜疑，結果由於行使個人權力而終於脫離人民、懈怠職守，最終竟落到具有一種顯而易見的迫害狂。蘇聯現在的各個領導人對斯大林比我們了解得清楚（我也許會有機會在其他情況下來談談我過去同他的個人接觸），因此他們今天這

样叙述他，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他們。可是我們私下不免要这样想：且不談我們已經講过的不可能及时有所改变的情况，但既然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們在像我們所熟知的那样公开鄭重地頌揚他的时候，原是可以審慎一些的。不錯，今天他們提出了批評，這是他們的很大的功績，但是这种批評對他們的威望也有一些影响。但是，除此之外，只要是在實質上僅僅揭露斯大林个人缺点來作为一切病根，就擺脫不掉“个人崇拜”的干系。起初，一切优点归功于一个人的超人的積極品質；而現在，所有的坏处相反地都歸結到他的异乎尋常的駭人听闻的缺点。不管是兩種做法中的哪一种，我們都脫離了馬克思主义固有的判断准則。真正的问题被避开了：苏維埃社会为什么和怎样能走上而且竟然走上了脫離它自己当作目标的民主生活和法制的道路；为什么和怎样甚至發生某种退化的？要加以研究，就应当密切考察这个社会發展的連續階段，而首先应当这样作的就是苏联同志們，因為他們了解情况比我們清楚，我們可能因为对事实了解片面和脫離实际而犯錯誤。我們首先記起列寧在他最后的一些演說和著作中曾經強調从新社会產生官僚主义化的危險。看來很明顯，斯大林的錯誤同苏联的經濟和政治生活中、也許首先是整个党的生活中各个官僚機構的分量过分增長有关。要在这里說明哪些是原因、哪些是結果，是十分困难的。事物逐漸轉化而互为表現形式。能不能把官僚主义的这种分量过重也歸因于从古老俄羅斯的組織形式和風俗繼承下來的一種傳統呢？我們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而且我相信列寧曾經講过这样的话。然而，事实仍然是：革命以后領導人物完全或差不多完全更換了。我們关心的倒不是估計旧人剩下了多少，而是了解当新的領導階級担負起全新任务的时候在它的內部產生了一种新型的官僚主义領導这一事实。

革命以后的最初几年是艰苦、可怕的时代，必須克服超乎人力所能及的客观困难；那是外國干涉、战争和內战的年代。这种

局势绝对需要最大限度地集中权力，它也促成扑滅反革命的激烈的镇压措施。当时無可避免要像战争时期那样行动：沒有完成任务，就要对負責人施行“即决惩处”！根据現在已經公布的列寧給捷尔任斯基的一封信件，列寧本人預見到反革命和外國干涉一旦最后消滅，就应当立即不再采用这些做法，而反革命和外國干涉在他死前几年是最后消滅了。必須看看是否实行了这种改变，还是几乎由于一种惰性，原來应当改变或抛掉的一部分反而巩固起來。而正是在这个时期爆發了对否認社会主义經濟建設的可能性的集团的斗争，这不能不对整个苏維埃生活產生深刻的影响。这个斗争是一場真正的战斗，其結果將决定政权的命运，因此必須不惜代价來贏得勝利。斯大林就是在这个时期內起了積極的作用，而党的健康力量則团结在他的周圍。現在可以看出，这种以斯大林为中心的重新集結就是这样形成的，人們在他的領導下同意对党 and 它的領導機構的职能進行这样的改变，同意讓从此以后由上面領導的領導機構具有这样的新的职能，以致当人們开始發現不良現象的时候已經無法反对，要不然就是人們最初沒有很好地認出这些坏現象。这样肯定也許不是不正确的；对民主制度的有害限制和逐渐代以官僚主义的組織形式，都是在党本身內部產生的。

但是在我看來，更重要的是仔細研究在第一个五年計劃完成以后和着手農業集体化以后所發生的事情，事实上这里触及一些真正的原則問題。取得的成績是巨大的，甚至是偉大的。在沒有外國援助和貸款的情況下，依靠新社会內部力量的飛躍發展，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巨大工業。農村的社会結構改变了，尽管由于巨大的困难而改变得不那么巩固，而且由于过于急切不免犯了一些錯誤。所取得的結果是世界上聞所未聞的，在苏联以外当时極少有人相信有可能做到。这些成績輝煌地証明了十月革命勝利和在反对各式各样反对者和敌人的斗争中保衛住的政治路綫的正确，但是这些成績也是后來引起有害后果的某些

錯誤方向的根源。特別是在流行的宣傳中——但是也在一般分析中——贊揚已經取得的成就的時候，人們往往有一種誇大的趨勢，認為一切問題從此都已經解決，社會主義社會建設所固有的客觀矛盾、困難和對立都已經克服。而在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過程中，這些客觀矛盾、這些困難和這些對立往往是非常嚴重的，假如不公開承認它們，假如不號召工人和勞動人民羣眾在工作中、在創造性事業中面對它們、解決它們，那末它們就不可能克服。在蘇聯，人們在這段時期中却相反地有這樣一種印象：領導人儘管了解現實，卻從來不把上述那些情況正確地告訴黨和人民，這可能是由於害怕這樣會縮小已經取得的輝煌勝利。在某個我們派有學生去留學的黨校里，人們竟花了几個月的時間來同那些贊揚俄國工人為了保證五年計劃的勝利而作出“犧牲”的人進行尖銳辯論。他們說：不應該提犧牲，因為，這麼提，西方的工人會怎樣想呢？但是，確實是有過犧牲的，因為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生活條件非常艱苦，假如向工人階級好好解釋，為了建設社會主義，努力和犧牲是必要的，那麼工人階級是絕不會讓自己被吓倒的，甚至這種解釋會激發和鼓舞起工人階級先鋒隊的階級精神。這是一段小小的插話，但是它如我們所說的，是表明一種原則性的錯誤方針，因為，認為社會主義建設在取得初步巨大勝利之後，就能毫無困難地前進，就能不要求羣眾和領導羣眾的黨在新社會範圍內以行動來解決各種新型矛盾而前進，這是一個原則性的錯誤。

我認為這種錯誤有兩個重要後果，第一個後果就是羣眾在地方上和組織中（黨、工會、蘇維埃企業）的活動貧乏化，而它們本來是應當處理地方上和組織內的真正的新困難的。可是恰恰相反，人們發表的文章和演說中却開始充滿了堂皇的言論和現成的漂亮詞句，實際上這些言論和詞句既冷淡也無效用，因為都是同生活脫節的。創造性的辯論逐漸消失了，同樣，羣眾活動也越來越少，而且這種活動的舉行與其說是由於自身的要求，不如

說是由于上面的推动。第二个后果在下面这种意义上來說更加有害：当现实已經占了上風，当困难作为仍然在事物中存在的
不平衡和对立情况的后果出現的时候，就逐漸出現一种趋向，認為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实施計劃的缺点和停滯，供应上的困难和原料的困难，發展工業或農業各部門的困难，都是由于階級敌人或暗中活动的反革命集团等等進行破坏和干預的結果。这不是說沒有过这种情况，这些因素在当时是起了作用的。苏联曾經受到敌人的包圍，他們毫不留情地不惜一切手段要使苏联的發展遭受損害和阻碍；但是，在对客观局势作判断中，这种錯誤的方針使人失去了節制，失去了在善惡之間、敌友之間、無能和軟弱同有意識的仇視和叛变之間、反对立場和从事物本身所出現的困难同陰謀破坏的敌对行动之間的界限观念。

斯大林以他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設越發展、敌人就必然越增多、階級斗争越尖銳化的錯誤理論，对这种可怕的紊乱給予了一种假科学的解釋，这就使得这种紊乱經常化和嚴重化。这就是今天被公开揭露的对于社会主义法制加以聞所未聞的違反的根源。但是要了解这些主張怎么能为人民所同意和接受，那就必須進一步研究。而如果想全面了解，途徑之一就是我們所指出过的探討途徑。斯大林在某一时期曾經是当时情况的体现者和創造者，他所以这样，是因为他在官僚主义式的机构压倒民主生活方式的时候，表现出他自己是这种类型机构的最內行的組織者和領導者；是因为他为实际上錯誤的方向作了学說性的辯解，而他的个人权力就是以此为据，甚至一直达到退化地步。这一切就說明了他在他的親信中所享受的支持，而且这种支持一直繼續到他死，也許现在还保持着若干效力。

不应当忘記，即使在他的权力日益巩固的时候，苏联社会也不是沒有很多成就的。这些成就表现在經濟方面、政治方面、文化方面、軍事方面，也表现在國際关系上。沒有人能够否認苏联在1953年比起例如第一个五年計劃时期更为强大，在各个方面

都更为發达，内部組織更巩固而且在國外享受的威信更大。这么多的錯誤怎么沒有阻碍住这么多的成就呢？苏联的領導人有責任回答這個問題，他們应当了解這個問題是國際工人运动忠誠战士思想中最关心的。斯大林的錯誤危害党的政治路綫达到什么地步，从什么时候开始，达到什么程度？这些錯誤是否引起了附帶的困难而其危害程度如何？既然有这些錯誤，如何还能够前進呢？我們只能根据我們所知道的作出一般性的論断。如果有必要，准备再來分析这些問題。似乎應該承認社会主义建設路綫当时依然保持了它的正确性，即使現在揭露的錯誤达到那样的地步，也沒有嚴重限制住实行这条路綫的成就。这一点是需要予以極充分的解釋的，因为对民主生活的限制——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民主生活的消失——是根本上涉及政治路綫的效能的。似乎無可爭論，党、國家机构、工会，特别是最重要的地方組織的官僚主义化，阻碍、限制和压制了党內的創造性思想以及群众的積極性，也阻碍、限制和压制了國家的民主机能和全社会建設热忱的發揮，并且不是沒有造成很顯著的实际損失。另一方面，在和平时期所取得的成就，战争时期和战后取得的成就，証明人民群众在任何情况下的驚人工作能力、劳动热情和牺牲精神，証明他們始終拥护党向全國提出的政策目标，而由于他們的努力，这些目标是达到了的。很难指出有什么人民能够在莫斯科近郊和在伏尔加河岸在战争时期可怕的限制下抵抗、回击和战胜希特勒的人民相比。因此人們可以得出这样的結論：社会主义制度的實質沒有丧失，因为过去獲得的任何成就都沒有丧失，特别是構成苏維埃社会的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廣大群众始終不渝的拥护沒有丧失。这种拥护証明：不管怎样，这个社会保持着它的民主的根本性質。我們曾經几次重复說：苏联同志們有責任答复我們提出的某些問題并且提供一个全面答复的因素。一直到現在，苏联同志們發揮了对“个人崇拜”的批評、主要糾正了对于事物和人的錯誤的歷史和政治判断，打破了目

的在于頌揚一个人的神話和傳說。这一切都是很好的，但是我們對他們有更多的期待。今天最重要的是根据馬克思主义准則正确地答复這個問題：被揭發的錯誤如何能够滲入社会主义社会的發展中去，以及是否因而在这个社会的發展中，在一定时期內發生了整个社会主义陣營——我这样說指的是所有正在按照他們自己的道路建設社会主义的人和还在尋找他們自己道路的人——都应当提防的普遍性的不安因素和錯誤？人們可以不談其他而同意这一点：問題在于保障社会主义社会的民主性質，但是必須深入研究和加以明确的是：政治民主和經濟民主問題、內部民主和党的領導作用問題，是如何同國家的民主运用發生联系的，某一部門發生的錯誤如何能对整个制度發生影响的。

七 怎么解釋全世界的共產党人曾經相信 斯大林关于審訊案和陰謀的正式說明？

全世界的共產党人曾經一直無限信任苏联共產党和它的領導人。这种信任的根源是顯而易見的。在歷史上的一些决定性时期，在工人运动和國際政策的一些决定性問題上，苏联共產党采取的立場是正确的。苏联共產党夺得政权的1917年革命使大家感到振奋。事实証明在革命之后他們提出、維護和奉行的政策是正确的。大家知道他們所曾經遭遇的困难，看到他們克服了这些困难。过去大家都反对他們，用尽一切手段攻击他們，侮辱他們。所有國家的統治階級都糾合起來反对他們。在反对派各党，甚至在工人运动中，表示他們了解（且不要說贊許了）在苏联實現的巨大事業的人也是極少的。今天除了最頑固的反动派以外，誰都承認苏联創造的業績是当代歷史上最偉大的事件。而过去，却只有共產党人，或者几乎只有他們才無時無刻不关注着这种創造，解釋、衛护这种創造和从事这种創造的人們。在这种情况下，全世界工人階級先鋒隊对这个真正站在整个政治和社会运动最前列的共產党給予信任，表示深刻而完全的團結，

是自然和正确的。还必须考虑到这个事实：几乎所有开始批评苏联共产党政策某某方面的那些人不久就终于投入了对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官方诽谤者的行列，终于成为最反动的政治势力的公开的或者隐蔽的代理人。所有各国共产党在不同的程度上都在它们自己行列里体验过这种经验。因此，除了上述的同苏联共产党的信任和完全团结关系之外，还建立了这样的信念：这种团结是真正革命的无产阶级运动特有的性质。并且从本质上说，这是正确的。我们当中没有人对这种信任和团结关系感到有什么可以后悔的。就是这种关系使得每一个在它本国具体条件下工作和斗争的党，能为十月革命在工人阶级中所引起的这种革命的新高涨，表现和提供明确的政治形式和组织形式，而苏联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进步又使这种革命的新高涨得以滋长和壮大。就是这种关系使得每个党更加认识到自己的力量。然而，为了获得这些成就而遵循的形式、方式、途径并没有在我们队伍里成为讨论的题目，除了到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农业集体化实现的那些年中的某一段时期为止。前此，在十年或十五年中，俄国共产党人中间就革命发展的途径、社会主义变革的可能性以及变革的形式进行过辩论，这个辩论曾经转移到整个工人运动中去进行，首先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进行，而这种辩论促成了反对派各集团（托洛茨基分子和右派）的失败。我并不否认在某些时候、在某些国家和在某些条件下，这种斗争和这种参与曾经在我們的运动中产生了消极影响。我想到一些人为地掀起的派别斗争，想到若干被夸大的政治判断等等。谁要是能够再看看例如我在1928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发表的演说，就可以找到对这类事情中某些事情的批评；再不然，就把季米特洛夫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再读一读。但是，总的说来，我們是通过涉及我們思想和我們政策的最重要论点的辩论来进行运动的政治教育的。正是通过这些辩论，我們的运动才日趋成熟。

今天，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政治結構已經改變

後來，我們各國黨內越來越少談論蘇聯同志們在建設社會主義社會方面所遭遇的問題。所以如此，也是因為蘇聯同志不再像最初那樣向我們提出作為問題的問題，而是把這些問題說成仿佛是已經開始的進展中的階段，而這種進展的後果是不至形成新的根本論點的。我們已經到了這樣的地步：蘇聯以外的共產主義運動已加強到這種程度，以至它已經能夠超過單純鼓動宣傳階段，糾正在希特勒上台之前運動中所犯的許多錯誤，並在反對法西斯主義、反對備戰、拯救西班牙共和國、爭取建立工人和民主運動的團結等鬥爭中展開大規模的積極政治行動。導致在戰爭期間解散共產國際的那些條件就是在當時形成的。

我相信問題所涉及的審訊就是在这个時期（下面我要談到這種限制的意義）發生的，而當時法國人正在為爭取人民陣綫而鬥爭，西班牙內戰火焰正旺，蘇聯的國際政策在保衛民主和和平方面正非常有效地展開。當時，沒有任何因素可以使得各國共產黨領導人懷疑判決是否合法，因為他們知道：原來的反對派（托洛茨基和右派）的領導人既然已經在政治上失敗而且在群眾中又陷於孤立，就要毫不猶豫地使用恐怖手段來進行鬥爭。這種情況不僅發生於蘇聯。（1934年在巴黎，我們的最優秀的活動家之一、勒佐尼爾艾米利亞的卡米洛·蒙坦納利被一個托洛茨基分子刺殺了。這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

所有的被告都供出他們的罪過，這一事實無疑引起了我們的驚訝，我們中間進行了討論，但是僅限於此。此外，今天透露出來的對法制的破壞行為和採用道德上可惡的非法訊問辦法，究竟是整個審判時期的情況，還是僅僅是我上面所談到的時期以後的某個時期的情況，我們現在還不了解。況且，蘇聯共產黨的一次全國大會曾經對過度使用非常鎮壓方法提出指責，還提到了糾正這種做法的決定，全體代表都表示了同意。壞是壞在

沒有遵守这个决定，到后来，在某些情况下事情甚至更糟了，这是斯大林所犯的不可原谅的一个错误。

我要再说一遍，我们现在谈的是最初的一些审讯，因为后来的审讯大多不公开进行了。我今天的意见是这些审讯，整个说来，表现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反对派试图阴谋反对政权并进行恐怖行动；另一方面是采取了道义上应受谴责的非法讯问办法。当然，反对派的试图一点也不减轻后者的严重性。

八 对于个人崇拜的批评是来自上层有权势方面，事先没有征求民意。你是不是认为这可以证明斯大林主义并不像很多人所说的那样已经死去？

我所持有的意见，我实质上说明了的见解，使我认为对于斯大林的错误的纠正和批评不可避免地要来自上面。党和国家民主生活中的限制，所犯错误的内容和后果，以及斯大林用以围绕自己的歌颂，使得来自下面的批评只能够紊乱地、缓慢地开展，而且不是不可能造成危险的决裂的。这一点可能令人不愉快，不过有其因必有其果。深信应当消除病害和改变路线的领导集团，其任务在于展开自上层而来的强有力批评，同时还用事实来纠正最严重的歪曲，从而为新路线开辟道路。按照列宁在革命最初几年所提供的榜样恢复正常的民主生活，在思想和实践领域内恢复开创精神，振兴研究工作，鼓励生气勃勃的争论，鼓励宽容错误，只要这种错误是由于追求真理而不可避免的，是为了发展判断力和性格而不可避免的，用这种种办法来重新教育几十万名男女干部，同时通过他们来重新教育全党，又通过全党来重新教育一个领土极为辽阔的国家——在这个国家，公民生活条件仍然是每个地区都极为不同的。这一切是多么巨大的工作，在三年之内或者在一次代表大会开会期间是不能完成这种工作的。但是，我相信：如果说这一切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

拟定一个新方针和实现它的时间问题，那就太夸大了。我觉得：不进行许多次新的、重要的讨论以明确所犯错误的范围并对其所涉及的原则、政策和实践提供一个精确的估价，要发展苏维埃生活中的新方针是不可能的。总之，我认为纠正斯大林的错误应当通过这种广泛的发展用绝对不同于斯大林在世的时候所采取的办法来进行（当时斯大林所采取办法的特点是抛弃了国家和党施行职权中的法律准则）。

愈是这样做，好处就愈大。我们希望毫不迟疑、勇敢地进行纠正，并且希望从而产生——像应当产生的那样——一个健康、充满新的生命力、建立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社会在各方面一次新的前进热潮。

九 你认为对个人崇拜的批评将引起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之间、俄国共产党和其他国家共产党之间关系的变化么？一般说来，苏联和国际工人运动之间的关系将发生变化吗？

说各共产党随时都从莫斯科接受训令、指令和命令的这种愚蠢的无稽之谈，我希望至少在意大利用已经不再有人相信了。假如有这种人，写给他看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他的头脑显然太不管用了，以至于即使仅仅接近于理解工人运动的实际问题，他也绝对没有能力做到。因此，我写答复是为了别的人写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紧跟着的年代里，共产国际刚刚建立，没有疑问，各国工人运动以及共产主义运动的政策方针上的主要问题那时是在莫斯科、在中央机构、在给予具体指示的代表大会和其他国际会议上进行充分讨论的。可以说，当时存在着共产主义运动的集中领导，而主要的领导责任是由俄国同志们承担的，而从各国去的同志们则予以协助。然而，不久，运动开始迅速自动向前发展，特别是在有良好领导人的国家。例如，1924年，我们党关于退出反对党派阿文汀集团会议和重新参加

議会的决定是同“國際”給予我們的建議相反的。在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时期(1935年),力量已經加强、已經統一而且已經有良好領導的各党,已經認為一个國際中央除了就局势和我們的运动的任务作出一般性判断之外,是不能作什么的。要靠各党自己作出决定和执行决定,完全要由它們主动來作和負責來作。在1934年到1939年大斗争的时期,在法國和西班牙就是这样做的;在战争期間和战后,也是这样做的。假如說共产党人遵循苏联國際政策的偉大道路前進,那是因為他們深信这种政策是好政策,实际上正是好政策。

1947年成立的情报局,任务与“國際”大不相同;它主要做了兩樁事情:第一樁是好事,第二樁是坏事。第一樁就是正确指導整个工人运动抵抗和打击帝國主义战争計劃。第二樁是对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的失策的干涉。此外沒有做什么,除了出版过一个公开的公报,它只是提供消息的工具。例如,我們意大利人,除了在情报局成立會議上,就從來沒有在國際會議上討論过我們的政策。战后我們采取的一切主动都純粹是我們自己做的。其他國家的共产党領導同志們也許并不总是充分理解这些主动的,因为这些主动依据的是我們在意大利工作的条件,完全独特的条件。今天,情报局已經取消了,其原因是已經充分說明过的。

斯大林在領導苏联共产党方面所犯的錯誤,由于限制苏联共产党最上層的討論和民主生活,就必然促使苏联共产党人和其他國家的共产党人之間的关系相当流于表面和形式,造成某种程度的脫節,虽然并不因而减少互相信任,因為我們过去一点也不知道而且無法知道今天暴露的这些事实。这里講的至少是涉及我們的事。而在其他國家的党内,特别是在人民民主國家,战后机械地重复了斯大林所犯的某些錯誤,这些國家甚至也許有这种傾向:机械地輸入和实施苏联的一切經驗和实践,絲毫不考慮每个國家的特殊条件,这些特殊条件本來需要而且也确

实需要把苏联的经验作特定的改变、修改和使之适应环境的。

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期间所提出的对斯大林的批评使大多数人感到意外，肯定地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干部大吃一惊，在较小的程度上也使这个运动的群众吃了一惊。敌人死抓住这些批评，用来作为反对我们的斗争工具，结果却使我们的党员更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了。除此之外，应该说这些批评不仅引起了驚訝，并且到处引起了悲痛，甚至引起了混乱，产生了对过去的怀疑等等。由于被揭露的事实严重性和揭露的方式，这种事情是不可避免的；苏联同志们到现在为止只限于揭露事实和进行正确的纠正，但他们直到现在还是忽视了他们无可推诿的职责：即担当起对整个事件作出周密的政治和历史判断的困难任务。

我认为这一切不会削弱共产主义运动各党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团结。但是，由于上述的一切，不仅有必要，而且也应该希望具有愈来愈大的独立判断能力，这对我们的运动只能是有利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内部政治结构今天已有了改变。苏联共产党所做的一切，如我说过，依然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第一个最好的榜样，这条道路是从一个决定性的、深刻的革命高涨开辟出来的。今天在共产党成为领导政党的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阵线已经扩大到这样一种程度（占人类的三分之一），以致对这些国家说来，苏联的模式已经不能并且也不应当被认为是独一无二的了。在共产党统治的每一个国家，必须使客观和主观的条件和传统，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运动的组织形式中发生它们的影响。在世界其他地区，有一些国家，在那里，有人想不用共产党成为领导的党也要走向社会主义。还有一些国家，走向社会主义是若干不同的党派共同的目标，尽管这些党派到现在还没有达成协议或是彼此有什么谅解。由于制度的复杂产生了不止一个中心，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再也不能谈论唯一的方向，而应该谈论根据不同道路而实现的进展。对斯大林的批评暴露出一个对整个运动说来是共同的普遍问题，这就是官僚主义退化

的危險所呈現的問題，民主生活的窒息，建設性革命力量与革命法治的破坏之間的混乱状态，政治和經濟的領導机构脱离群众的創造性活动和批評。我們欢迎取得政权的各國共产党之間展开一种競賽，謀求最好的办法來永远防止这种危險的發生。至于我們，我們有責任规划工作方式和我們的道路，使我們也不至遭受停滯不前和官僚主义的危害，使我們善于共同解决劳动群众的自由問題和社会正义問題，这样來使我們在群众中贏得更大的威信和更多的支持。

美國共產黨全國委員會總書記丹尼斯： 美國和赫魯曉夫的特別報告

(原載1956年6月18日美國“工人日報”)

也許，在以前，從來沒有任何地方的一个政党的會議能够像苏联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这样引起全世界范围这么大的兴趣，使公众輿論紛紛議論。

在过去四个月里面，对于这次代表大会的反应，和这次代表大会以后的事态的發展是各式各样的。在許多人士当中——包括某些左派人士——有这样一些人，对于他們來說，关于斯大林的揭露掩盖了一切，他們似乎暂时完全看不到整个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但是，也有愈來愈多的非共產黨团体和个人認為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和关于斯大林的揭露提供了全新的可能性來重新估計他們自己对于同共產黨人的关系的看法。在过去若干星期里面，共產黨人和非共產黨自由主义領袖和工人領袖举行了越來越多重要的、令人鼓舞的非正式討論(不但是在紐約)。

杜勒斯和國務院認識到，國內外的政治氣氛正在改變，急劇地从冷战的气氛轉變過來。他們很清楚地知道，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推動了这整个趨勢。例如，貝爾格萊德和莫斯科之間的修好，苏联裁減武裝部隊，苏联对特文寧將軍的邀請，最近蓋洛普民意測驗結果表明多數美國人贊成邀請赫魯曉夫和布尔加寧到这里來進行訪問——对于这一切國務院都感到不安。國務院希望把它手中的赫魯曉夫的特別報告的本子公开发表和加以利用以后，它就能够破坏在美國人当中和“中立人士”当中存在的

和平共处的趋势，使左派人士迷失方向，在國內外共產党人中間散播不和。

但是，尽管國務院作了种种努力，連一些保守的發言人和許多自由主义者都認為，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揭开了美國資本主义的工業和技術优势必須在同等的水平上应付苏联社会主义的具有歷史意义的和平競賽的时期。許多非共產党人和共產党人士都認為，赫魯曉夫的特別报告是有力量和信心的証明，这种力量和信心使得苏联今天能够擺脫过去的一些十分有害的特点，并且为大大地發揚國內生活的民主鋪平道路。

这种前景和这些变化必然要使一切有远見的团体、工会工作者、自由主义者、社会党人和共產党人一样改变他們的態度。正是由于認識到这种巨大的变化，才使得若干城市的一些非共產党的民主团体在过去几个星期來提出越來越多的交換意見和進行深入的討論的要求。

赫魯曉夫关于斯大林的报告叙述了一个悲慘的故事。但是，虽然这个故事驚人和痛心，这是歷史的一部分。共產党人必須有勇气來正視它，分析它，并且从中吸取教訓。

在过去四十年中，帝國主义使敢于向絕頂進攻并建設社会主义的苏联人民和他們的領袖遭受了極大的牺牲。这一点我們是知道的。現在虽然为时已晚，我們終于知道了，有一个时期，由于驚人的罪行和嚴重違反社会主义法律和道德的行为，通向人类歷史上最不朽和最進步的發展的英雄道路曾經变得更加艰难。由于我們是共產党人，我們特別了解和同情苏联人民所遭受的極大的不幸和打击。玷污了斯大林領導的后期的罪行和暴行是不可寬恕的。这种罪行和暴行也沒有任何歷史的和政治的“必要性”。什么也不能証明这样的做法是正当的：使用酷刑和進行布置好的審訊；大規模的流放，在南斯拉夫事件上采取挑衅性的和沙文主义的行动；迫害犹太籍医生和消滅了二十多个犹太籍文化界人物的生命。

社会主义不能繼續允許这样可怕的罪惡繼續不加公开或者不加改正。这就是在过去三年中間所采取的道义上和政治上大胆的改正措施的意义。我們可以期望看到这些措施的進一步擴大，因为苏联的千百万公民正在批判地討論赫魯曉夫的極其坦率的报告。

有許多問題我們大家正在深刻地思考。許多是朋友們的正當的問題，也有許多是同我們非常不一致的人的正當的問題。有些問題是國務院和它的各种电台和報紙“喉舌”所提出的別有用心的問題。

为什么会發生这些事情呢？这些事情是不可避免的嗎？这些东西是社会主义中和共產主义哲学中所固有的嗎？

國務院的一个偏爱的論調是，赫魯曉夫的特別报告“僅僅”駁斥了那种对“受冤枉的人”的不公正行动。他們声称，在駁斥斯大林的方法之后，必須進而駁斥列寧和列寧主义以及駁斥整个社会主义。

但是，甚至原子“战争邊緣”政策的厚顏無耻的鼓吹者也無法掩盖过去四十年的歷史。列寧的解放人类學說已經在地球上三分之一的地方取得了勝利。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已經出現而且已經無法改变地确立起來了。它希望和需要和平。它認為，战争不再像在列寧时期那样不可避免了，一次热核子战争会是一场大灾难，但是它認為这种战争是能够防止的。它正满怀信心地在和平的基礎上同資本主义在人类願望与努力的每个方面進行競賽。它更加成熟地認識到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很多的，在今天的世界上，將有越來越多的人民和國家能够根据他們自己的民族傳統和經驗开辟一条通往社会主义的議會和民主的道路。

关于列寧的“方法”，只須追述兩件事實就行了。在他的領導下，1917年新成立的苏維埃共和國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宣布和平，結束俄國人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遭受的浩大的

餓血災殃。在1921年，當外國干涉軍仍然在試圖打倒蘇聯的時候，列寧就主張廢除死刑，廢除任何大規模的鎮壓措施。

關於這一點，最好考慮一下現在有些人希望掩飾的這樣一個問題：

誰是對蘇聯實行恐怖政策的真正策劃者呢？是那些試圖竭盡全力來粉碎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用丘吉爾的話說，“在搖籃中扼死它”的那些人。

這個在最落後的國家之一建立起來的新社會是怎樣被迫受到各式各樣的攻擊和痛苦的呢？內戰和歐洲、美洲和亞洲最強大的政府所進行的軍事干涉，無情的封鎖和強行造成的飢荒，經濟和政治方面的抵制，希特勒匪徒的破壞，隨後，創傷尚未平復，就又來了十年的激烈的冷戰——這些都是反動的資本主義強使那些敢於建設新世界的人們遭受的犧牲和痛苦！

由於這種嚴酷的背景，在這個年輕的社會主義國家中為政策而進行的鬥爭，才有了生死存亡的性質。要末工業化，要末就滅亡；要末在經濟上趕上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要末就被它們粉碎——這種情況都有助於說明——雖然不是辯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氣氛，在這種氣氛下，在斯大林進行領導的一個時期內，在社會主義的基礎已經建立起來以後，正像赫魯曉夫勇敢地透露的，這種令人驚駭的違背社會主義的事件得有可能發生。

由於蘇聯人民、蘇聯國家和蘇聯共產黨在這些艱苦而動亂的年代里取得了幾乎可以說是奇蹟的進展，斯大林的崇高的威信就增長了起來。蘇聯變成了第一流的工業國家。它消滅了文盲。它發展了一種社會擁有生產資料、充分就業、人民享受免費醫療、教育和社会保險的史無前例的制度。工人和農民取得了政治、經濟和文化地位，享受到了尊嚴，這種地位和尊嚴，在沙皇的統治之下是夢想不到的，而且，在許多方面，也是在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內無可比擬的。壓迫和沙皇的種族主義消除了，各民族人民享受到了民族獨立、社會發展和表達自己意見的權利，而

对于这些民族來說，古老的俄罗斯帝國曾經是一个大監牢。

在1930年代初期，在社会主义不顧一切外界的压力和攻击建立起來的时候，斯大林頒布了一种破坏新的社会主义宪法、促進現在才在糾正的嚴重的違法行为的理論和行动方針。这种理論就是：随着社会主义的勝利，作垂死掙扎的階級敌人將变得更加危險，將在內部加强抵抗，并將滲入苏維埃國家的各方面，滲入國家的經濟、甚至党和党的領導。

如果認為苏联沒有貝內迪克特·阿諾德之流人物，那就太天真了。但是搜查“人民敌人”的工作达到歇斯底里的程度，使得实际上所有反对的和重大的不同意見的人都受到了怀疑。

同时國家权力有了進一步集中，并且对斯大林的英雄崇拜——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和以后——得到了培育，党和苏維埃集体制度遭到破坏，創造性的知識和文化生活受到限制。就在这个时期，苏联的保安机关獲得了并且使用了不正常的、危險的权力，罪惡地違反了苏联宪法。

“西方”这样多的共產党人和这样多的非共產党政治家和政治領袖相信了在苏联的叛國和陰謀案达到了1930年代和以后進行的一系列的清洗和審判所宣布的那樣异想天开的程度，这是怎么可能的呢？

首先，这是希特勒和他的公开在“反共產國際”旗帜下集合起來的臭名昭著的第五縱隊上台的时期。

其次，特別是我們在这个最強大的帝國主义國家的人，一向知道美國大企業發起和供給經費的惡毒的反苏陰謀和間諜活动。此外，我們知道我們自己的劳工运动的歷史，知道过去几十年的偉大的經濟斗爭和爭取言論自由的斗爭充滿了由工賊、告密者和挑撥分子所造成的对罢工的破坏和破坏行动的悲慘例子。

假造“口供”和捏造“証据”等可怕的现象——为叶若夫、貝利亞以及帝國主义的其他代理人所利用的瘋狂猜疑和歇斯底里

气氛的邪惡產品——到現在才由于打开了許多年來保密的档案而得到証实。

就像我們自己國內有独断独行的权力、藐視憲法、甚至不对國會負責的联邦調查局和中央情报局之类秘密情报机构一样，貝利亞和他的同謀顯然能够在“國家安全”的掩护下对人民犯罪。

这一切并不是“社会主义的成果”，而是社会主义社会不能接納或容忍的、同社会主义不相容的矛盾和弊病的惨痛渣物。当然，尤其是我們共產党人，决不能忽視或輕視这些事实。

但是，对于一个划时代的社会进步，历史不能主要憑这种进步所生長和發展的动乱时期中可能發生的弊病、錯誤、脱离本身原則的現象來判断。我們本國偉大的革命理論家之一托馬斯·杰斐遜所說的关于法國革命的一些英明的、令人感動的話是值得我們今天銘記在心的。他这样說：

“在必要的斗争中，有許多犯罪的人沒有經過審判的形式而倒了下來，跟着他們一起倒下的还有一些無辜的人。对于这，我同任何人一样的感到遺憾，并且对于其中有一些人將至死感到遺憾。……但是，時間和真相將保留他們的名声，并且使之永不湮滅，而他們的后裔將享受他們毫不猶豫地为之献出自己的生命的自由。”（1793年1月3日致威廉·肖特信）

恰好同國務院的宣傳相反，今天世界上固有弊病是資本主义的弊病而不是社会主义的弊病。社会主义固有的东西是人剝削人的現象的結束，战争原因、蕭条和种族主义的消滅。社会主义的固有的精神是人类、民族和社会的自由。社会主义在苏联以及接着在中國和其他人民民主國家內所取得的勝利，已經打断了殖民主义的脊骨，并且在最近十年間鼓舞了十億以上有色人种的人民的爭取民族解放和社会进步的勝利斗争。

經濟保皇派憎恨社会主义——并不是为了它的弱点，而是为了它的力量，为了它所固有的社会进步和解放精神。

他們把苏联的消滅違反社会主义正义和民主的弊端的果斷行動故意加以聳人聽聞的宣傳和利用的手段是多么偽善！我們只要提一下：佛朗哥對人民的罪惡行為并不妨礙國務院稱頌法西斯西班牙的“功績”，蔣介石傀儡政權的無法形容的貪污腐化也沒有使國務院感到煩惱，而且它也不反對有麥卡錫、華爾特、真納和尼克松這些人協助和慫恿的伊斯特蘭、戴梅治和謝沃斯的用武力和暴行進行的違憲種族主義統治——這種統治已經被核准為我們美國很大一部分地區的“公認生活方式”。

因此，這是一個綫索，可以知道在今天的世界上究竟是哪一種世界性的社會制度包藏着“固有的弊病”。

在最近圍繞着赫魯曉夫特別報告而進行的關於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討論中，經常引起關於苏联現在的領導的問題。他們中間有沒有人曾經在最近的三年以前設法進行過改變？是不是能在更早的時候就制止這種過去的弊病？目前在進行中的改變的規模和重要性如何？

許多問題尚未得到答案。赫魯曉夫的報告主要是對他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的主要政治報告的補充，僅僅反映了一部分已經進行了的調查，這種調查可能將在今後幾年內在苏联共產黨和苏联人民中間繼續進行。

今天在起作用的歷史進程是不容懷疑的。例如，許多年來，在華盛頓時行的就是把苏联人民的一切和平言論和他們的領袖所提出的具體的和平建議說成是掩飾好戰的“或者侵略性的”意圖的幌子。但是當許多美國旅客在過去三年中開始訪問苏联的時候，他們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任何一個國家都不能夠在把和平思想這樣完全地灌輸給它的全體公民的情況下發動起戰爭。西方的許多保守的政治家和數以百萬計的普通人民也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沒有一個“侵略者”能夠像苏联在過去幾年中所做的那樣自動放棄它在國外的全部軍事基地和片面地裁減它的武裝部隊。

同样，随着嚴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律和倫理現象和有害的英雄崇拜的消除，向群众廣泛宣傳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的歷史性決議的工作似乎正在深入展开，使得批判性的調查和發表意見以及文化和科学方面的意見交換正在得到它們应有的位置，同时政府和党还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來保證苏联憲法的徹底执行和保證苏联國內民主的擴大。

甚至怀疑派也必須承認苏联目前的領導自从1953年以來是抱着堅定、正直、信心和合作精神來采取行动，造成目前的國際事務的解冻，擴大社会主义民主，顯著地提高生活和文化水平。苏联國內今天正在实行着最高形式的和唯一有效形式的自我批評，这就是实际地自我糾正。同样的，也在采取步驟來恢复苏联共产党內的真正集体領導，而且苏联人正在为克服和消除所有背弃和違反社会主义法制和原則的行为提供先决条件。

但是这不僅僅是領導人物的事情。关键問題在于这种过程的群众性，它遍及了苏联全体人民。正如报纸每天报道的，在作家和科学家們中間和在各工厂和集体農庄里進行的激烈討論都表明了这一点。最近宣布的分散司法部和經濟計劃部的权力的步驟似乎尤其具有重大意义。这将是擺脫高度中央集权國家及其某种官僚主义弊病的具有歷史意义的轉变，这种官僚主义弊病必然是妨碍苏維埃民主的進一步發展的。

在苏联，社会主义民主有着進一步發展的廣泛堅强的經濟和政治基礎。在那里，沒有能够憑自己巨大的財富和大公司的力量在經濟和輿論以及政治生活方面取得決定性的、統治地位的剝削階級。民主的蓬勃發展并不受到物質障礙，因为为求生存而進行斗争的不正常的情况消失了，社会主义憲法是不可侵犯的。

当然，人的思想和他們的公共机关始終不僅受过去和目前的具有歷史意义的成就的影响，而且也受过去遺留下來的弊端和錯誤的影响。沒有一个人能够說，社会主义國家有可能不重新犯新的錯誤，虽然毫無疑問，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类型的錯誤。

期望任何一批領導人物不犯錯誤就是加重過去的基本錯誤，沒有從把斯大林抬到神人的地位的慘痛的錯誤中吸取任何經驗教訓。衡量政治健全和社會主義力量的主要考驗之一是坦白承認錯誤，而且最重要的是自我糾正。從過去三年的紀錄和蘇共目前公開的揭露、討論和糾正錯誤的情況看來，他們似乎的確正在接受這個考驗。

在這次全世界關於赫魯曉夫的特別報告的討論中，我們美國共產黨人有不少東西可以考慮一下，我們面前擺着許許多多我們全都有責任考慮並且尋求答復的問題，而這些答復只有通過認真地重新估計事實和充分交換意見才能得出來。

現在我們看到，我們犯了一些嚴重錯誤。在像同南斯拉夫決裂或蘇聯以前的農業狀況這樣一些問題上，我們根據錯誤的材料，不加批判地衛護了並接受了不能衛護、不能接受的東西。我們過去輕易地——或者唯心地——認為建設社會主義的偉大任務不犯重大錯誤就可以完成。我們不肯相信任何說在社會主義國家有嚴重的不正義的行為的消息，並且認為這是誣蔑。

我們雖然正確地駁斥並反對大公司利益集團和它們的代理人的惡毒誹謗和反蘇的敵對態度，但是我們常常不能容忍許多勞工的發言人和自由主義發言人的批評性意見和看法。我們經常把誠懇的工會工作者和自由主義者的批評當作是職業的反共反蘇誹謗者的批評。

對於這一切，我們毫無保留、毫不含糊地感到深深的遺憾。

但是，我們也仍然絲毫不減地對於許多年來我們美國共產黨人堅決地維護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和美蘇友好的事業這樣一個事實感到深深的自豪。我們目前仍然在積極而自豪地這樣做。因為這在過去和現在都是符合美國和世界和平的最高利益的。

例如，弗蘭克林·羅斯福在逝世以前不久曾經說，同蘇聯建立友好和善鄰關係，是他的政府所取得的“最大的成就”。蘇聯目

前所進行的糾正工作，消除一切不符合社会主义的东西的那种行动，有助于达到这种友好与和平共处的目标。这种过程繼續進行下去，千百万美國人就会开始以新的眼光看社会主义，并且了解，社会主义社会是一种在改变的、進化的和不断改善的制度。

在这一方面，許多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美國人就会开始了解：苏联的社会主义开路者所進行的艰巨的、牺牲重大的斗争（尽管他們有各种錯誤、坏事和缺点），已經使得建立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制度成为可能，而且也大大地促進了其他國家走向社会主义的过程。在我們自己國家的这种道路，將要由美國人民根据我們自己的情况和傳統拟訂出來。

的确，我們美國共产党人主張而且爭取一种民主的、根据憲法的、和平的社会轉变路綫，使得大多数美國人民終于会順着这种路綫迈步向前，根据美國的需要和經驗，根据傳統和劳工民主政治关系，建立起新的社会制度來。

在对于和平以及社会主义在一切國家的進步和進展共同关心的範圍內，我們美國共产党人，一方面要經常保持我們作为一个对一切党派和社会現象采取真正科学态度的独立的政党的地位，另一方面要繼續把我們对于社会主义國家的态度建立在國際工人階級團結一致的原則上——这种團結，正像林肯所指出的，是真正的愛國主义的標記。

过去，我們的眼光往往只集中在社会主义排除万难而取得的具有歷史意义的成就上面；如果說，現在回想起來，在某些方面，我們过去的眼界似乎失于片面，那末，假如今天我們僅僅看到在斯大林進行領導的末期所發生的荒謬的偏差而看不到社会主义的具有歷史意义的成就和擺在我們面前的輝煌的新世界远景，那又將是怎樣的近視，怎樣的近乎盲目啊！

我們許多人对于產生了这样大的影响的这些問題有着各种不同的反应，这是不足驚奇的。“工人日报”为民主討論和激烈的意見爭論开辟了道路。在这个过程中，作出了許多無法估价

的貢獻。提出了一些意見和表示了一些態度。指望我們所有的人都同意所有這些意見和態度將是不現實的。

就我个人而言，“工人日报”刊載的有些來信、文章和社論中的某些意見我是不能同意的。我不同意盡量縮小現在所揭露的錯誤的態度。另一方面，我也不能同意不考慮歷史事實和前途和——不問動機如何——煽動對社會主義國家的仇視的那種完全反蘇的指責。我同意向我們曾經錯誤地斥責過的正直的人們坦率地和誠懇地自我批評以表示道歉的態度。但是我不能接受那種抹煞和破壞人們對社會主義國家感到的自豪和信任的意見。而且我也不同意那種盡量縮小或抹煞我們美國共產黨人對工人階級和對我們的國家的歷史貢獻——過去和現在的貢獻，更不要說將來的貢獻了——的否定一切的態度。

。我相信，我們的黨——在加強它同勞動人民和黑人人民運動以及所有其他民主力量的聯繫的過程中並且通過運用最偉大的獨立的馬克思主義判斷——將證明不僅完全能夠幫助解決將來的社會問題而且也完全能夠幫助解決美國人民現在所面臨的切身問題，附帶讓我說一句，衡量我們的“政治獨立”的將不是我們對其他先鋒黨派提出多少“批評”或施加多大“壓力”，而主要的是我們能夠多么勇敢地和創造性地按照美國的情況和需要運用科學的社會主義原則來幫助解決我們自己——美國人民——的迫切的基本問題。

這篇文章不打算討論有關美國的左翼力量包括共產黨在內如何能夠前進以及從過去取得必要的教訓、如何在它們的綱領主張、組織結構和工作方法的某些方面實行某些基本的和早就應該實行的改革、以及如何對政治和社會事件的進程施以更大的政治影響的一些最大的問題。

這些問題現在不僅正由我們共產黨人，而且也正由許多工人的、自由主義的、左翼的和具有社會主義思想的人和人群在更為廣泛地加以考慮，意見不需要，而且也不應當過早地取得一

致。有可能來在我們隊伍的內部和外部進行很多思考和探討——進行在我國的政治現實中生根的集體思考和行動。

現在，即使當目前的討論還在繼續進行的時候，首先需要的是規模更大的群眾政治和經濟活動，例如環繞 1956 年選舉的主要問題。這比任何別的東西都更能夠提供新的成就的基礎，提供廣泛的人民的力量的集結以及最後出現一個新的群眾性的社會主義政党的前途。

在有關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一切討論和行動都結束以後（而這個題目在一個相當的時間裏是不會完的），有一件事將依然不變，這就是：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加強了世界和平和社會進步。它標誌着社會主義前進中和爭取和平共處的鬥爭中的一個新的階段，這個爭取和平共處的鬥爭開始於列寧的年代，在後來的年代裏繼續進行，而現在是越來越有效和成功了。

這個政策吸引住了全人類的想像力，而且從 1946 年以來，即使在面臨大規模的熱戰和冷戰的威脅、挑釁以及對蘇聯實行原子基地的包圍的情況下也仍然堅持着。

社會主義作為一個世界體系的出現以及殖民帝國的瓦解豐富了許多基本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並且給了它們新的含義。現在有了新的社會意義的一個這樣的列寧主義理論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可以在同一個世界上相處和進行和平競賽——由於新的世界關係和各國人民在更大程度上的干預和團結，文明現在正處在持久和平的前夜。

美國和蘇聯的人民和政府可以成為朋友，可以作為好鄰居生存和讓別人生存。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在國務院的“獨得大消息”發表以後，這個事實就更清楚了，這種“獨得大消息”就像卡紐特王命令海洋的浪濤停下來一樣不能阻止世界範圍的走向和平共處和社會進步的趨勢。

法國共產黨政治局聲明

(原載1956年6月19日法國“人道報”)

資產階級報紙發表了據說是赫魯曉夫同志的報告。這個報告在斯大林所犯的已為人們所知道的錯誤之外，又補充說明了斯大林所犯的一些十分嚴重的錯誤。這個報告在法國共產黨黨員中引起了正當的激動情緒。

法國共產黨人同所有國家的共產黨人一樣，譴責斯大林因而受到指責的那些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的專橫行為。

蘇聯共產黨領導人的功績在於着手糾正同個人崇拜有關的錯誤和缺點，這突出表明了偉大列寧黨的力量和團結、它在蘇聯各族人民中得到的信任以及它在國際工人運動中享有的威望。

然而，政治局遺憾的是，由於赫魯曉夫同志的報告提出的和被透露的情況，資產階級報紙因而得以發表法國共產黨人所不知道的事實。這樣一種情況不利於在黨內就這些問題進行正常討論。相反地，它便利於共產主義的敵人進行投機和從事陰謀活動。

關於斯大林的錯誤、它們的淵源以及它們產生的條件直到現在所作的解釋都是不能令人滿意的。進行深入的馬克思主義分析來確定斯大林個人權力之所以能夠施行的整個環境，是十分必要的。

斯大林在世的時候對他予以過甚其詞的贊揚和把由於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奉行正確總路綫而在蘇聯獲得的一切成就完全歸功於他個人，這是錯誤的。這種態度助長了個人崇拜並且在國際工人運動里起了壞作用。今天把蘇聯共產黨活動中一切消極的東西都歸罪於斯大林一個人是不正確的。

斯大林在整整一個歷史時期里起過積極的作用。同黨的其

他領導人一起，斯大林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然后在反对外國干涉和反对反革命势力的勝利斗争中起了積極作用。列寧逝世以后，他抗击了馬克思列寧主义的敌人并且为实行关于建立社会主义的列寧計劃進行了斗争。他对組成各國共產党有很大的貢獻。

斯大林得到了应得的威望，他却讓这种威望轉变为对他个人的崇拜。長时期单独处在全世界敌人襲击之下的苏联的局势助長了这种崇拜的發展；苏联当时的局势要求人民力量極为緊張地戒备，要求施行铁的紀律和無產階級國家权力的高度集中。这些情况有助于大家了解苏联当时不得不面臨的巨大困难，但是这并不能証明斯大林的行为是正确的。斯大林曾多次違反苏維埃法制；他对于共產党員采取專橫的鎮压；他破坏了党的原則，而且由于采取应受譴責的作風，而給苏联和國際共產主义运动造成重大的損害。

对斯大林的錯誤予以正确譴責的苏联共產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是令人兴奋地总结苏联成績的大会；苏联已經完成社会主义建設，已經走上建設共產主义社会的道路。它是社会主义陣营各國偉大勝利的大会。它着重指出在我們时代避免战争和遵循新途徑走向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它指明了走向工人階級团結的远景。

为了使得全体党員在法國共產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筹备的时候能够有益地討論赫魯曉夫同志报告中着重指出的問題，（法共）政治局已經要求苏联共產党中央委员会給予已为某些共產党和工人党党員所知道的那个报告的全文。

法國共產党忠于馬克思列寧主义原則，意識到社会主义先驅苏联人民的卓絕作用；同苏联共產党緊密团結；它将竭尽努力來使得工人階級的团結行动成为生动的现实，向着新的人民陣綫、向着社会主义的法國西前進。

法國共產党政治局 1956年6月18日

挪威“自由报”： 关于陶里亚蒂谈话的评论

(1956年6月19日)

今天在世界上某些国家所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斗争中的一些问题，要求在國際工人运动中進行一个認真和深入的討論，要求对今天發生的情况和实现社会主义所必要采取的道路作一个公开的权威性的和沒有偏見的評定。

意共第一流的領袖陶里亚蒂發表的文章，对这种以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为背景的討論作了重要的貢獻。

今天社会主义已是以一个活生生的现实出现在世界的大部分地区，資本主义的生產資料所有制將被永远廢除，一个保証生產的計劃經濟將被拟定出來滿足需要。在那种社会里，利潤的考慮已不再是动力了，人剝削人的情况將被消除。今天社会主义的國家有繁榮的經濟，这种繁榮恰恰証實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这也就是人們能批判弱点和缺点的力量，也是批判侵犯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基本原則的錯誤的力量。陶里亚蒂的文章，提出了人人想到的問題：違反基本原則的行为，怎么能繼續那么久，以及怎样來解釋許多錯誤發展到这样的嚴重。該文首先提出了這個問題：并不是社会主义建設时期因集中于經濟的發展而導致人們对有生气的民主的政治方面沒有給予足够的注意。

如果人們依照美國發表的譯文來看，赫魯曉夫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閉幕會議上的講話只是一般的描述。斯大林所起的積極作用顯然不能被忽視过去，这一概念应当是正确的，并且苏

共的領導同志必須自我批評地對使社會主義發展的歷史中形成黑暗的一頁加以澄清，這是達到解決主要目的——保證社會主義制度不再出現這些現象——所必需的。

挪共中央在4月9日的一個聲明中，發表了自己的意見，其中說到：“對已被揭露的嚴重錯誤，必須在世界各國共產黨內作一個公開的自我批評，特別是那些在不正確的个人崇拜和破壞共產黨基本原則的事件中有共同責任的領導同志”。

今天社會主義的遠景比某些人的頭腦要明亮些，前途是光明的，首先因為作為思想意識和政治經濟制度的社會主義遠遠超過資本主義。前途是光明的，因為作為思想意識和制度的社會主義是能夠清除現在所發生的與這種思想意識和制度不相符合的事情的。

現在所進行的這個討論，不但是共產黨的事情，而且也是每一個願為社會主義在各國勝利而作積極貢獻的具有社會主義意志的工人的事。

瑞典“新日報”社論： 關於陶里亞蒂的辯論

(1956年6月20日)

我們意大利兄弟黨的主席陶里亞蒂由於他就赫魯曉夫關於斯大林的報告對記者發表的談話而在資本主義世界的政治中引起了巨大的迷惑和混亂。由於我們還沒有能夠得到“團結報”上所刊載的對記者談話的詳細內容，而只是通過資產階級通訊社和記者的巧妙報道所轉達的關於談話內容的各種各樣消息得到我們的情報的，因此要確切地對談話的內容作什麼估價現在還太早。不過，對於我們的反對者們的評論（這些評論所根據的只是上面所說的那些東西）還是可以作一定的估價的。

據這些報道說，陶里亞蒂鑒於所謂選舉中的失利，並且在社會黨領袖南尼的催促下，現在第一次採取了他對這個問題的態度。可以補充說一下：陶里亞蒂在三月里已經發表過一篇長文章，所有瑞典共產黨的報紙都轉載過，他在这篇文章中分析了斯大林的錯誤和違法行為，也分析了其中的原因。奇怪的事情是：南尼同陶里亞蒂進行了辯論，並且表示反對關於斯大林的錯誤的陳述。那末，只要讓我們補充說明一點就可以了：內政部上星期所公布的意大利選舉的結果表明意大利共產黨根本就沒有遭到失敗；相反，它却勝利地保障了自己強有力的地位，並且它的追隨者比同它進行着友好和成功的合作的社会黨人多一倍。

評論家們從陶里亞蒂的對記者談話中所得出的另一個結論是：他要求意大利應當循着與蘇聯不同的另一條道路走向社會主義，而在這樣做的時候必須考慮到這個國家的特殊條件。當

然，陶里亞蒂說這些話並不是什麼新事情，他在很早以前就要求過同樣的事情。我們瑞典的黨在1944年的代表大會上已經談到這件事情，在1946年的代表大會上則更加明確地說明了這一點，在1953年的黨綱里又作了規定；今年2月我們蘇聯兄弟黨的第二十次代表大會證明這種主張是正確的。陶里亞蒂在當時也發表了同樣的意見。我們應該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已經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某些國家就已經考慮到了這些國家里所存在的特定條件而遵循着它們自己的道路。

但是，若不是蘇聯人民按照他們自己的方式建成了他們的社會主義秩序，這些原是不可能的。

但是最惡意的是企圖把陶里亞蒂的談話說成是承認我們的意大利兄弟黨是按照“莫斯科的命令”來執行它的政策的——“新聞晨報”特別想要這樣認為。為了同這種惡劣的說法一致，有人便說陶里亞蒂現在終於選擇了鐵托的道路，因而拒絕“接受克里姆林宮的命令”。這是適合反動派和戰爭挑撥者的胃口的一種說法，但是它同現實情況毫無關係。意大利共產黨和所有其他的共產黨都根據他們國家的特殊情況來自己決定他們的政策，以使自己受它們自己的勞動人民的真正利益以及工人階級的歷史命運的指導。現在並沒有國際共產主義聯盟，但是另一方面，社會民主黨、自由黨和保守黨却有國際聯盟，協調各個黨的政策使之適應其他國家的兄弟黨，這一點已不是什麼秘密了。

我們認為，如果赫魯曉夫的演說發表了的話，那會是有利的，因為這樣一來就可以制止今年春天在各國首都出現而且被吹噓為原本的各种各样的文本了。即使這個演說的确只提供了斯大林的行動的片面情況，即它主要是敘述斯大林的缺點和過去的錯誤而沒有說明這些缺點在其中表現了它們的後果的整個情勢；即使這是令人痛心的，也比保持沉默好，因為沉默就使得有可能進行各种各样的解釋、形容和誣蔑了。但是，我們無法判斷，蘇共為什麼決定全世界仍然不能得到赫魯曉夫的演說的權

威文本。

另一方面，苏联領袖向全世界表明，他們已經解决了过去違法行为和錯誤，在一切方面，社会主义民主都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和加强。國內的改組和外交方面爭取和平共处和緩和緊張局勢的攻勢將有效地促進國際工人运动并且为協調所有的進步力量的斗争鋪平道路。

“瑞典日报”担心，这种情况以及对集体領導原則繼續進行的辯論甚至会進一步加强共產主义运动。我們确信一定会这样的。

英國共產黨政治委員會聲明

(原載1956年6月22日英國“工人日報”)

共產黨政治委員會研究了赫魯曉夫同志在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秘密會議上的報告的非正式發表的稿本，以及在我們黨內進行討論的情況。

在我黨第二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4月1日的秘密會議上通過了一項決議，並且把這個決議轉致給了蘇聯共產黨，這個決議對於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沒有就這個問題發表公開聲明表示遺憾，發表公開聲明本可以使所有各國共產黨人和蘇聯的忠實朋友充分了解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和幫助他們更好地了解所牽涉到的一切。我黨沒有收到關於赫魯曉夫同志報告的任何正式稿本。

由於一直沒有正式報告，通過逐漸的洩漏，經同社會主義敵對的人之手，才有非正式稿本的發表。這使得蘇聯以外的許多共產黨人依靠這種敵人的來源了解關於這些重要問題的情況，因此增加了對於事實的估計和討論的不必要的困難。

根據現在發表的非正式稿本——在沒有正式否認的情況下可以認為它多少是可靠的——我們重申我們的執行委員會在5月13日宣布的總方針。

我們認為，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譴責個人崇拜、贊成恢復列寧主義的集體領導和黨內民主原則是正確的。

我們認為，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坦率地揭發由於脫離列寧主義的原則而產生的所有弊病以結束這些弊病是正確的。

所有共產黨人，同所有民主和進步的人民一樣，對於在這個時期內破壞了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的根本原則，玷污了共產主

义的崇高事业的非法行为和罪行感到深为震驚。我們再重說一遍，这种邪惡的做法是同社会主义和共產主义完全不相容的。

同时我們認識到，这些弊病并不是像社会主义敌人所說的那樣是伴随着工人階級执政和苏維埃民主而來的必然產物，而是在1934到1953年这个出現不正常的緊張状态的时期違反社会主义原則的結果。这是法西斯主义在外國兴起、备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时期。

苏联領袖們揭露了这个时期的弊病和濫用权力的行为，是为了要糾正这种弊病和濫用权力的行为，并且果断地向着实现列寧主义原則、集体領導和社会主义民主以及在科学、文学和藝術各方面進行創造性的馬克思主义的工作方面作一果断的轉變。

我們認識到，尽管这种濫用权力的行为造成了嚴重的損害，苏联人民獲得了非常偉大的歷史性的成就。他們面对着可怕的困难，建成了社会主义，阻擋了并且击败了納粹的猛烈攻击，在受到战争的空前的破坏以后重建了他們的國家。

这个成就是值得人人欽佩的，并且表明了社会主义制度对資本主义的优越性和它为人民展开的發揮創造性的可能性。

苏联共產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本身記錄下了这样一个具有歷史意义的事实：現在，社会主义已經变成了一个世界体系。它对馬克思主义理論作出了重大的貢獻，并且以它关于防止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和發展工人階級因結的新机会的言論帮助了各國工人階級运动。

因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和对在1934—53年时期的苏联情况的揭露而引起的討論正在共產主义工作和实践的各方面激起新穎有益的努力。

顯然，在苏联共產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秘密會議上所作的報告中所展示的問題是需要進一步的研究和討論的。

我們同意陶里亞蒂同志和法國共產党的意見：有必要对在

蘇維埃民主和黨的民主的實施方面發生退化的原因進行深刻的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把造成這些事態發展的原因完全歸之于個人的性格是不夠的；有必要對斯大林的作用的積極方面和消極方面都進行更恰當的估計。

顯然，為了加強社會主義法制的實施和保障公民權利而採取的措施將導致對關於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的實施的一切問題進行進一步的研究。

應當對過去的違反社會主義民主的行為和對人民的罪行負責的人正在受到懲罰，這是公正的和必要的。同時，人們對於最近在蘇聯進行的一次審訊中施用死刑表示關懷也是可以理解的。

我們認為，鑒于目前的世界局勢和社會主義陣營的地位的加強，在和平時期在一切國家廢除死刑在現在應該是可能的，並且我們認為，我們有特殊的責任為在英國和在英國統治之下的殖民地國家實現這個目標而努力。

在我們黨的內部，我們將需要像已經開始的那樣推進和鼓勵最廣泛、最徹底地討論我們的政治方法和組織方法、黨內民主的實施情況、如何解決我們當前的問題、我們同勞工運動的其他部分的关系和執行委員會的決議中所表明的團結的目標。

我們還將推進改訂“英國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的工作，在這本小冊子當中，在許多需要加以研究的問題中，我們將需要擴大這樣一個部分，這部分表明人民爭取到的民主自由怎樣可以維持和擴大，社會主義法制怎樣加以保證。

我們黨的敵人希望這種討論會削弱我們的黨，使有人能夠把反馬克思主義、反共產主義的資產階級思想偷運到黨內來，從根本上打擊共產主義的原則和組織。

相反地，我們的黨員和黨組織將懂得怎樣進行討論以加強我們黨的工作和活動的各个方面。

我們黨的民主是比任何一個英國黨派的民主都要廣泛的。

討論的自由和民主的工作作風在我們黨內是可能的，並且是其他黨派領袖不敢讓他們黨內有的，我們黨內所以有此可能，是由于我們黨的馬克思主義觀點的基本的一致性和我們根據馬克思主義就符合英國工人階級的最高利益的政策取得一致意見的決心。

在這一一次的討論的整個過程中，我們永遠不要忘記，共產主義、民族獨立、自由和和平事業正在全世界大踏步向前邁進。

在英國這裡具備了一切使勞工運動大踏步前進的條件。只要有正確的政策和領導，英國人民將會擊敗保守主義，向社會主義前進。

我們共產黨的任务是幫助人民達到這些目標。我們正是本着這種精神在討論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所引起的迫切的和重要的問題的同時，也努力為我們黨的第二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所提出的政策展開規模最大的團結一致的人民運動。

法國共產党中央委員會決議

(原載1956年6月23日法國“人道報”)

法國共產党中央委員會批准政治局就由于資產階級報紙發表據說是赫魯曉夫同志关于个人崇拜和斯大林的錯誤的报告而引起的問題所發表的声明。

中央委員會強調指出：政治局的声明再次重申忠实于馬克思列寧主义原則，闡明社会主义先驅苏联人民的卓越作用，并且宣布它同苏联共產党緊密团結；这样的声明在党内和工人階級内部引起了深刻的响应和普遍的贊同，同时，資產階級却顯得煩惱、憤怒和混乱。我們党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会正依据着提付討論的文件(提綱草案，关于市工作的決議草案，关于青年的決議草案)進行准备。在准备这次代表大会中，中央委員會要求所有党员同时繼續研究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工作，以便更好地了解它的巨大國際意义。

中央委員會在听取关于重建我們党和南斯拉夫共產主义者联盟之間的友好信任关系的情况报告以后，批准了政治局在这方面采取的主动。

在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國政府和南斯拉夫共產主义者联盟代表团赴苏联訪問以及在这两个國家之間的关系方面、苏共同南斯拉夫共產主义者联盟之間的接触方面达成協議的次日，中央委員會对这些可喜的結果表示慶幸，这些結果將大大有助于國際局势緩和与和平，有助于加强國際工人运动。

中央委員會注意到：目前党内進行的有关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討論具有高度的水平；注意到这些討論所表达出來的对于馬克思列寧主义这一勝利的学說的信心，对党的政策、它的中央

委员会和它的总书记多列士同志的信任。

为代表大会作准备的讨论充满着使党日益强大的决心，充满着竭尽全力来使工人阶级的团结行动成为生动的现实以便向着新的人民阵线、向着社会主义的法国迈进的决心。

美國共產黨关于苏联批評斯大林的声明

(1956年6月25日)

國務院公布了赫魯曉夫在苏联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次秘密會議上發表的演說稿，这就對我們國內已經在廣泛進行的关于苏联發生的变化的討論給予了新的刺激。

國務院希望美國人相信苏联沒有發生任何变化。它希望消除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積極影响，尽管这次代表大会的作用之一是标明了世界力量的一种新的关系，在歷史上第一次展开了持久和平的真正的前景。它希望这样來保持正在分崩离析的冷战殘余。

但是，希望和平共处的我國人民不能不欢迎苏联政府自从斯大林逝世后所采取的行动，不能不欢迎赫魯曉夫在演說中所表示的要根除在一个时期內破坏了苏維埃生活的暴行和不公正措施的决心。

國務院想使美國人民相信，在斯大林时代發生的悲劇、罪行和不公正措施都是社会主义所固有的弊病。

但是，在斯大林的領導下对無辜的人所犯的罪行事实上是同社会主义不相容的。这种罪行是阻碍社会主义前進的一种不能容許的障碍。社会主义的目标是把人类从社会不公正現象中解放出來，为人类的繁荣發揮全部能力。它需要越來越擴大的民主，需要發展人类自由和个人自由，并且需要發展最后將徹底根除在人与人之間的关系中使用武力的条件。

我們一直是并且將繼續是世界各地的社会主义的光荣的支持者。我們一直并且將繼續为反对大企業誹謗和中伤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國家的努力而斗争。

我們共產黨人知道，社会主义必須根除資本主义社会的不人道現象。这就是我們首先对赫魯曉夫演說中所揭發的情况大为震驚的原因。

我們認為，苏联共產黨自己原是應該發表这篇演說的。我們不能同意这样的看法：所談到的問題，不管多么令人痛心和可惡，完全是苏联共產黨内部的事情。苏联在过去四十年里在世界事务中所起的作用以及美國和其他國家的工人保衛它的社会主义成就的斗争，使得这些問題成为全世界各地的公共問題了。

苏联共產黨的領導仍然必須作一个基本的分析，說明这种破坏社会主义民主、正义和國際主义的行为是如何被容許發展而且在二十年里面一直沒有受到制止的。全世界各地的馬克思主义者也必須作这种分析。赫魯曉夫对揭發錯誤以及对現在正在進行的糾正錯誤所作的貢獻僅僅是这一方面的一个开端。

我們不能同意对这样嚴重的錯誤作这样一种分析，就是把錯誤完全归因于一个人的任意犯的过失，不管錯誤地允許他篡夺的專橫权力是多么大。把所有的錯誤和違反社会主义原則的行为都归于一个人是同把苏联社会主义進展中的一切成就和偉大成績归于一个人一样錯誤的。

我們認為，所犯的錯誤主要是一些錯誤政策和錯誤概念的結果，產生这些錯誤政策和錯誤概念的部分原因是：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國家而且几十年來一直被敌对的資本主义世界包圍着。这些政策和概念有一些已經遭到弃絕。但是同这些錯誤有关的歷史的客觀因素还需要更充分地加以估計。同样需要做的是進一步和更深刻地研究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國家的社会主义民主的結構和实施問題以及当其他國家的工人向社会主义前進的时候所產生的新問題和前景。这將闡明过去的錯誤的根源并且有助于避免將來的錯誤。

我們对于來自波蘭的情报所透露的关于犹太文化的机构和媒介断然遭到解散和它們的一些領袖遭到处决的事实深感不

安。这是違背苏联在犹太問題上的歷史性貢獻的。赫魯曉夫沒有談論这些暴行，并且苏联領袖們繼續保持緘默，这是需要加以解釋的。

美國共產党应当从这一切当中得出某些嚴肅的結論，因为我們是对我們自己的國內的工人階級和人民負責的。我們向他們坦白承認，我們曾經不加批判地認為苏联的許多外交和內政政策是正确的，而現在事实證明这些政策是錯誤的。

我們已經开始重新研究我們以前对于各國、包括社会主义國家在內的馬克思主义者之間应有的关系所持的过分簡單化的和錯誤的看法。这种关系必須根据为每个國家的人民的最大的民族利益和一切進步人类的共同利益服务的原則；各党之間平等的原則；一切國家的馬克思主义者有权利和义务在他們認為必要的时候对任何國家馬克思主义者的理論或實踐進行友好批評的原則。这样不但决不会削弱反而会加强國際工人階級的團結。“工人日报”早在今年3月以及全國委員會4月底采取的态度都反映出这种新态度。

我們的态度的根源在于我們首先关怀美國人民目前和未來的幸福。作为一个献身于社会主义的美國工人的独立的馬克思主义的党，我們要設法以我們的影响來帮助保證各國人民的友誼和世界和平。我們將繼續努力，爭取加强我們自己國內的經濟安全、民主和公民权利，并且爭取同一切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团体團結一致以符合憲法的、和平的方法實現社会主义，表明大多数美國人民的自由選擇。

意大利共產黨總書記陶里亞蒂
在意大利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上的報告：
**為爭取在意大利境內和世界上已經
開始的轉變中走向社會主義的
意大利道路而鬥爭**

(原載1956年6月26日意大利“團結報”)

在代表大會之前應該怎樣組織討論——“多中心體系”的意義——赫魯曉夫的報告和斯大林的錯誤——意大利共產黨近幾年來遵循的政治路線——意大利共產黨和工人階級面臨的新問題

羅馬 25 日訊：意大利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星期日下午听取了陶里亞蒂同志就第二項議程（代表大會的籌備工作）所作的報告。報告以後，辯論暫時停止，以便今天下午在波特吉奧斯庫爾街（意大利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所在地——譯者）復會時再繼續進行。就陶里亞蒂報告進行的辯論明天將繼續進行。由於版面有限的明顯理由，我們不得不延至星期三（即 27 日）發表若干發言。

下面是陶里亞蒂的報告全文：

同志們！

我們黨自從成立以來舉行過七次代表大會：在法西斯獨裁政府上台以前舉行過兩次，在國外秘密舉行過兩次，自從它恢復合法以來和自從解放戰爭勝利以來舉行過三次。因此，在這七次代表大會中，毫無疑問，最重要的是第一次、第三次和第五次。

第一次代表大会——我們党的成立大会表现了工人階級先鋒隊在國際关系發生危机和風波、意大利社会發生尖銳危机和工人运动处在轉折点的时候所作的偉大的原則性抉擇，意識形态、政策和行动方針的抉擇。这个抉擇到現在仍然是完全有效的。在党的生命过程中，我們不断地遵照这个抉擇行事，而且我們还将繼續遵照它行事。第三次代表大会是1926年在已經非法的状态下在外國召开的。这次代表大会使党向前迈進了一大步，它对于后來的一切發展具有質量上的决定性作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次代表大会所确定的所有立場都是正确的。根据我們今天對我們學說的更深入了解，根据我們对事实的更深入認識，以及根据我們运动的更为灵活的發展，某些立場在今天看來似乎是應該受到批評的了。但是，那次代表大会依据馬克思列寧主义原則确定了关于党本身、关于它的性質、职能、战略和策略的概念，从而使整个党向前迈進了决定性的一步。我再說一遍，这是党在工作方法上的决定性勝利。这种勝利之后就有了一系列的廣泛發展，它后來始終是我們不得不和能够賴以建党的基礎。1946年的第五次代表大会是在我們民族生活新时期破曉之际举行的。它總結了过去的成就，總結了以往的斗争和取得的偉大勝利；它為我們党、工人階級和意大利一切人民力量奠定了新的廣泛行动的基礎，后來就在由于击潰了法西斯主义而實現的民主勝利的巩固地盤上展开了这种行动。

七次全國性大会

在这种新形势下，从1946年到1956年，就是說在大約十一年中，党的全國性大会举行了七次，更确切些說，三次代表大会、兩次全國會議和兩次全國委员会會議。顯然，全國委员会的任务与代表大会的任务不同，而代表大会的任务也不同于全國會議。这些會議的性質各不相同，其不同之处每个人都很清楚。然而，我認為，在这段时期中除掉特殊情况而外，对于像我們这

样的党员众多的、龐大的和已經發展的党來說，要做得更多是有困难的。

然而，有人批評第八次党代表大会召开迟了。这个批評有一部分的道理，因此我認为應該接受这个批評。但是，我不認为應該在我們的敌人賦予这种批評的意义上來接受它，据敌人說，1955年召开的全國會議不是一次代表大会，他們这样說为的是指責我們党不是一个民主政党，說我們党不認識、也沒有遵循一个龐大的現代政治組織內部發展的正常道路等等。我觉得这样的譴責是毫無价值的，因为1955年的會議是一次會議而不是代表大会，所以在会前自下而上从小組到省組織進行了非常廣泛的征詢意見，我相信这种做法是意大利其他政党所从來沒有过的。

但是，毫無疑問，我們当时犯了一个錯誤。从最小的地方組織开始而展开的这一巨大工作的实际組織事務纏住了我們，因此我們对政治目标反倒部分地看不清楚了，以至于—时期未能把这次會議当作代表大会，就是說未能讓实际上是最廣泛的民主方式筹备的會議具有表达民主的称号。此外，那次代表會議的筹备工作時間太長，又沒有能够同这样的兩三个根本政治問題联系起來；这些問題原本是可能使党的这种征詢意見具有永远必須具有的突出地位和充分內容的。

苏联共產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

我們現在准备召开的代表大会的重要意义何在呢？它在于这一事实：無論在國際局势方面还是在我國國內和党的局势方面，我們都面臨着新事实和新因素的复雜情况。應該正确地估計这些新事实和新因素，以便从中得出必要的結論來使我們党今后得以發展、進行我們必須進行的斗争、定出工人階級和意大利人民革命运动的方針。

我們應該在这次中央委员会會議期間开始工作，以便达到

这一必要的目的。这项工作是不会在这次会议上结束的。它将仅仅是个开始，我提醒这一点是为了使全体同志都明了我的报告的性质以及报告以后进行的讨论在我看来所应该具有的性质。今天要做的是提出问题，表达出这些问题的充分意义，找出这些问题的限度和指出其内容，指出应该在党内进行的讨论的一般范围是什么，然而并不是要解决这些问题。问题在于要作出努力，以便一开始就能够对我们必须研究的问题的重要性以及我们应该提出的解决办法的价值作出正确估计。问题在于要首先强调指出这种重要性，并且指出总的方向，但是，并不是在今天就提出最后的解决办法。

最后的解决办法应该由全党通过它应当进行的辩论来提出，然后代表大会将从这个辩论中得出结论。

实际上，代表大会之前的辩论已经开始。许多同志谈论过选举斗争前后就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决定的某些方面所进行的讨论。这个讨论已经开始了，虽然它是在党中央机关没有预先布置的情况下开始的，但是我们大家都认为它是一个积极的事实。在我们所处的环境下，进行这样一件事情是困难的，但是辩论毕竟展开了这一事实证明党的生气勃勃和活跃，证明党内已经有一些同志在推理、在思考，他们在道义上和政治上是敏感的，他们表现出批判精神并且毫无拘束地表达出这种精神。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在过去的某些时期，当我们作出了极其重要的政治决定来阐明不易了解的我们党的路线和活动的時候，却没有出现这样的现象，我们没有看到党更深入地投入这种讨论，虽然我们曾一再敦促进行讨论，但是没有结果。

这一次情况像这样发展，那是因为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针对斯大林同志提出的批评含有不但引起政治上的反应、而且引起情感上的反应的因素。但是情况像这样发展也是一个有积极意义的事实。这一切正是表明我们党成熟的标志，丝毫不是表明内部发生危机的迹象，尽管由于对事物的提法，由于所讨论的事

实的嚴重性本身，在討論過程中可以看出我們的活動分子所感覺的某種程度的混亂。

已經開始的辯論以選舉為分界綫而分成兩個階段。

問題不在於把這個問題提出來討論，即某些組織在選舉之前進行了討論這一事實，是否對選舉結果起了一種積極的影響。

一般說來，每逢在黨內由於對任何一個問題的討論而引起緊張活動，我們就可以看出在黨的活動的整個陣綫上有了進展。

另一方面，應該認識到這一點：我們不能避免事物這樣發展。

我知道：例如，我在黨領導機構同意下曾經使全國委員會會議以我們正要進行的選舉鬥爭的各項問題為中心而不以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批評斯大林而引起的問題為中心來進行討論，對於我這種做法，有人表示有所保留。了解動員我們黨的任務是多麼巨大以及我們黨的處境、知道我們所擁有的時間多麼短促的人們，應該認識到這樣來進行討論的方式是好的。既然這樣——同志們，我十分坦率地說，——因此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之後立刻向中央委員會提出的報告中，我有意沒有深入處理和探討一切可以和應該處理和探討的問題，因為我深深体会到，一旦處理這些問題，就應該深入加以探討，而這是只能在黨代表大會上和籌備代表大會的辯論中來作的。而在那時，還不能召集代表大會。

正在進行的討論

對於到現在為止在省委員會進行了的討論，也可以指出一些缺點。但是我要說清楚：我們不把有人批評黨的領導人——即使是負起最大責任和有經驗的領導人——這一事實看作缺點或錯誤。黨的一切領導同志都需要政治領導和實際領導活動受到監督和激勵，因此來自全黨的監督和激勵是極好的事情。

自然，这并不是說所有提出的批評全都是正确的，但是一切批評必然会提出应当加以研究、討論和解决的問題。

我們并不認為人們在已經展开的辯論中涉及原則論点是缺点或錯誤，尽管在閱讀一些會議紀錄以及小組和支部會議通过的一些決議的時候，有时我們發現在某些原則問題上所說的話和在結論中使用的提法是不能令人接受的，或者只是部分地能令人接受而其他的一些方面則是有缺陷的。

一些原則問題已經在討論中，我們对此感到欣慰，因为这將有助于使我們永远擺脫某种兩面作法的气氛。今天，党的領導人被敦促絲毫不用半吞半吐的語气說清楚他們的想法以及党應該作些什么。实际上，他們一直是这样作的，而且說得極其明确。誰要是覺得字里行間还藏着什么奧妙，他在事实上就是感覺到不能同意十分明确地作出和提出的判断与任务。

由于对情况缺乏了解，由于对党的生活片段、國際共產主义运动和近几年來我們所处的局勢判断錯誤而產生的許多錯誤立場这一事实，我們并不認為它是已經展开的辯論中的一种缺点或錯誤。我們只要更好地提供情况，作明确的說明，那么問題就会一清二楚。

怎样進行討論

相反，在今天已經展开的討論中的这一事实却應該当作一种缺点：人們往往不是通过应当導致一定結論的交流意見來進行辯論的，而是在含糊不清地誇誇其談。每个人都說出他心里的話，却不得出任何种类的結論，而且無論在批評中还是在对新問題采取的态度中，他都不联系党的活动的具体因素，不联系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以便認真地加以研究，从而得出原則性的或实际的結論。

隨時表現的毫無任何明确內容的批評性創議这种本質上的改良主义，不能導致任何实际結論，而且人們在討論过程中看到

的辯論本身缺乏良好領導。這些都是消極的現象。

我們的黨是一個偉大的民主有機體。但是，我們關於黨內生活的概念是以民主集中制的準則為依據的，就是說它是一種強烈而活躍的民主生活，但是這種生活必須在我們的學說和我們的實踐的偉大道路上發展，它不能降低為沒有任何價值的誹謗和謾罵，因為民主生活的目的在於明確黨的行動所應當遵循的方向。

那末，大家應該怎樣來進行討論呢？首先必須遵照我們的學說，遵照馬克思列寧主義學說，遵照我們的經典著作所教導的以及黨本身自從創立以來在這方面所制定的一切。我認為，我們這方面能向工人階級和意大利人民提出的總結，是一個有積極的實質內容的總結。只需想一想我們退出社會黨時社會黨的所謂理論是什麼，只需提醒一下葛蘭西曾經義正辭嚴指責過的這種言之無物以及對我們的學說茫無所知、完全沒有能力遵循我們的原則的情況，就可以對客觀局勢作正確分析、從而為政策得出確切指示，就可以衡量我們已經有了多大的進展。也只需提醒一下意大利文化界人士在我們剛剛出現時以及在以後幾十年中對馬克思主義所採取的態度就夠了。他們當時認為，馬克思主義是一個腐爛的屍體，它只宜受到憐憫，甚至只宜受到嘲笑。

所應遵循的準則

那完全是無稽之談。今天，由於我們的工作，由於我們黨、它的活動分子、它的領導人、它的知識分子和它的朋友的工作，馬克思主義學說已經成為組織、發展和領導民族文化的主要因素之一。人們不得不作出把馬克思主義包括在內的重新估計，所以能得到這個結果，是由於我們馬克思主義者用事實證明了我們不僅善於聯繫政治現實，而且善於聯繫意大利的傳統思潮。

我們知道，这方面也有應該加以弥补的空隙和缺点，但是如果說总结是否定的，那就不符事实了。我們的党幸运地是由思想家安东尼奥·葛蘭西創立的。我認为，在西欧，葛蘭西在过去五十年中曾經在对整个西方文化發展的淵博知識和对我國國情的深刻了解的基礎上，在深入研究和發揮馬克思主义学說方面作了最偉大的貢獻。應該联想到葛蘭西和依靠我們的全部学說。應該記住，这一学說是帮助了解經濟、政治和社会情况、帮助正确估計歷史上的思想和行动潮流、帮助处理和解决國內和國際生活中一切問題的学說中最先進和最有效的学說。我們應該善于在这个学說中汲取教訓。一个馬克思主义者不能像一只驢子，背上馱着裝滿酒的革囊，喝的却是水。馬克思主义者應該始終喝他所擁有的革囊中的酒。他既不能喝由令人疲乏地一再重复的現成詞句所構成的淡而無味的飲料，也不能喝由于其他什么学說的令人作嘔的东西而弄髒了的水，更不能喝敌人送到他鼻子下面的毒藥水。因此，只有我們的学說才是應該在我們討論中首先遵循的准則。

深刻的变化

我們應該遵循的第二个准則，就是國際和國內生活的政治、經濟、社会和各方面的现实，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某些問題不可避免地至少要在討論开始的时候占据首要地位。实际上，这些問題現在是、將來也是最啓發人的，大家就这些問題進行辯論，有一天就会使我們的运动的基本問題明确起來，但是我还認为，在辯論中，我們的問題——这就是我們的政策、我們党的發展、对我國局势的分析和等待着我們的任务的确定等等——不可避免地將逐漸占优势。

因此，我們即將举行的代表大会的重要性何在呢？

重要性就在于我們党在意大利局势中的政治影响，这种影响，已經由最近选举的結果所証实。不过，我們即將举行的代表

大会的重要性首先还在于國際局势和各國——因此也在我們國內——存在的一部分已經成熟、一部分正在成熟的新因素。

可以說在今天的世界中，我們正处在一个轉折点上，或者比較審慎些說，無論在國際局势方面还是在工人运动和走向社会主义的人民运动的發展方面，我們正处在轉折点的开端。我們正是應該首先善于了解这种轉折点或轉折的开端的意义，才能规划我們能从中推演出來的結論和看法。毫無疑問，到目前為止，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已經对决定这一轉折点的意义作出了重要的貢獻，这个代表大会是从若干实际情况出發的，实际上也必須这样作。首先是从世界上已經出現一个社会主义國家体系这一認識出發。現在存在的，不僅是一个國家工人階級掌握了政权而且成功地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而是社会主义國家的一个廣大体系。只要看看这些國家的幅員和人口，就可以得到人人知道的無限遼闊的景象。同时，应当看到作为極少数帝国主义國家統治世界的制度的殖民主义的崩潰。

由于這兩個事实，全世界客觀結構就改变了，而由于客觀結構的这种改变，我們就看到人們思想方向和实际方向上的深刻变化，其中有些已經完成，有些正趋于完成。例如已經擺脫帝国主义統治的民族和新國家在它們的經濟、政治和社会發展中不再走資本主义道路的傾向就是这种变化的表現。如果我們舉出印度尼西亞、印度、埃及或印度支那，在所有这些國家中都听不到必須建立“美國生活方式”的聲音。相反，主張必須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权威呼声是越來越多了，它們要求向着社会主义所指出的偉大方向來改变經濟、政治和社会关系。由此產生了这些國家和已經成为社会主义國家的那些國家之間互相接近的傾向，因此，社会主义國家——首先是苏联——不僅物質力量、經濟和政治力量增長了，它們的威望也增長了。几年以來國際生活主要領域中的主动权归于社会主义國家而不再屬於老牌資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國家，这一事实并不是沒有意义的，在各國人民

的思想中也不是沒有深刻影响的。資本主义國家所采取的最后主动是冷战、冷战之中时而發作的熱战、战争集团、原子威脅和軍备競賽。足以改善國際关系，結束熱战和消除冷战，为持久和平和各國人民之間互相了解、積極共處和合作的新关系創設条件而采取的新主动，都是社会主义國家或者从殖民体系崩潰中產生出來的新國家采取的。

从这种世界新形势中应当作出怎樣的推論呢？我們能不能推斷說資本主义已經死亡？不能，这样說就是一个嚴重的錯誤。資本主义还存在着，在某些國家里，在有限的时期內資本主义甚至还可以發展。在世界一部分地区，巩固的資本家政权还在維持着。我們能不能推斷說帝國主义已經死亡？不能，我們不能这样說。这样說，也是一个嚴重的錯誤。帝國主义还存在着。在世界上至少三分之一土地上，帝國主义还保持着它的統治。在許多高度發達的大國，資本主义經濟保持着你們清楚知道的帝國主义的經濟特征。因此，資本主义世界的內部矛盾仍然存在，甚至正在發展，正像帝國主义互相冲突的傾向仍然存在一样。但是，已經完成的深刻的結構变化有着日益廣泛的顯著后果，無論是在國際关系上还是有組織的群众运动之間的关系上，無論是在群众覺悟和思想的發展方面，从而在全人类沿着進步的道路前進方面，后果都是日益顯著的。

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特別強調了这些后果中的一个：它肯定指出战争在今天并不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們可以而且應該推論出对于生活在資本主义世界里并且为和平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我們有直接影响的其他后果。社会主义向人們顯示出它是一种勢不可当的、正在前進的、日益廣泛地擴大自己領域的在發展中的实际力量，这是重大的新鮮事物。在資本主义世界像在社会主义各國一样，生產力正在發展。但是，在社会主义各國，生產力的發展不是同經濟生活的組織形式相矛盾、而是相協調的。事实上，因此就產生了，至少开始在世界各个地区產生了一

种經濟發展統一協調的过程。今天，是社会主义國家在主張有必要——我說的还不是有必要統一世界，而是至少有必要在各國人民之間建立一种較高程度的合作以解决人类所面臨的重大問題。这样，向社会主义的發展就包含着更廣泛的形式而且提出了新的問題，这种發展卷入了种种不同的民族和國家，从而就更可靠了。

不同的道路

1917年先進的劳动者和人民群众看見終于有一个國家的工人階級做到了夺取政权并且利用政权來建設新經濟和新社会，他們就第一次感到了信心；今天，这种信心不僅增長了，而且有了質的变化，因为無論是在高度發达的國家还是在还不發达的國家，在每个國家都出現了真实的新的可能：團結日益廣大的各种力量，从而推动这些國家走上社会主义發展道路的可能。因而可以肯定：在爭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在走向社会主义的進程中，民主方式今天具有以往时期所不常有的重要性，就是說，不必放弃这种民主方式，避免过去勢所必然的决裂和駭峻做法，遵循不同于以往几乎不得不遵循的道路來在走向社会主义的進程中獲得巩固的重大成就。將產生这样重大后果的新形势，是巩固的么，能够保持得下去么，还是必須看作是一时的？我們不是預言家，但是我們看出：这种形势表明有了一些变化，而其中有些还是确定不移的变化；况且，我們正在努力，我們在号召各國人民爭取使今天的新鮮而良好的事物成为永久長存的事物而不致再消失。

由于这种形势，关于走向社会主义以及建設社会主义經濟和社会的种种不同途徑的問題就比較明确了，提問題的方式也不同了；这倒不是說过去就忽視了這個問題。过去，馬克思主义經典大师提过、研究过這個問題。列寧在革命初期就考慮过、研究过這個問題。后來，強調可能經由政治發展的不同途徑走向

社会主义的論断被遺忘了，至少是部分地被遺忘了。所以这样，也許是因为苏联的榜样对于整个劳动世界，特别是对于工人階級先鋒隊具有那样强烈的吸引力，以至这个榜样促使人們忘了上述論断。

必須从研究生產力的發展出發

我要着重指出：从來沒有放弃尋求与苏联所遵循的道路不同的發展道路，無論如何，这一点是應該向人們現在常說的、歷史經驗当然比較有限的“青年”同志們提醒的。当資本主义世界在1929年可怕危机之后想出公开反动独裁的法西斯新形式的时候，当欧洲到处發生深刻危机的时候，人們曾經不無独创性和勇气地研究过工人階級和人民力量取得政权、政权的組織、从而使用新方法走向社会主义的各种新途徑。当时取得的成就不是巩固的，也不是持久的，然而作了嘗試。最顯著的嘗試是在奉行人民陣綫政策时代進行的，当时我們抛弃了許許多多陈旧态度，从而得以肯定：共產党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而且应当参加政府。特别是在西班牙，我們做到了确定一个新型民主國家的性質，在这个國家里劳动階級及其政党参加了政权，但是这个國家完全不同于1917年工人階級夺得政权后組織起來的國家。

然而，遵循不同途徑走向社会主义这一理論，今天需要更深入地予以闡述，必須密切联系到社会客觀結構上和促使社会变化的运动的方向上的改变。这里，也必須从研究產生向社会主义前進的客觀趨勢的生產力發展出發。这种客觀趨勢在經濟高度發達的國家表現为一种形式，而在經濟不充分發達的國家又表現为另一种形式。馬克思主張过只有資本主义已經發展到最高点的那些國家才能向社会主义進展，列寧已經糾正了这一論点。今天已經明顯，列寧所給予的糾正應該明确起來，因为今天我們看見：若干民族和新國家在擺脫殖民重軛之后，肯定宣布走向社会主义的計劃并且尋求已經成为社会主义國家的那些國家

的援助，來至少做到朝着与資本主义傳統方向不同的方向邁進几步。这一点是列寧至少已經部分地預見到的。列寧当时肯定：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依靠社会主义社会已經存在的國家的帮助，通过独特演变形式，有可能跨越資本主义發展的某些特定的階段。列寧的这一預見今天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具体内容。这样就出現了一些必須以新的方式來处理的重大的新問題。例如，从世界上消滅飢饉地区、絕望地区、地方病地区、連滿足人类生活最低需要和給予人类以必需程度幸福的基本形式文明發展也不具备的地区的问题。

主觀的發展

我認為：在政治方面，人們可以肯定說：主觀的發展還沒有而且完全沒有符合客觀的發展。工人階級先鋒隊政党的自覺行動，一般說來，过去和現在都不符合于已經產生的結構改变和群众中出現的新的覺悟。作为有組織的工人階級先鋒隊的全世界各國共產党，一般說來，發展是不一致和不普遍的。

結構的不同

所產生的一些政治因素阻止了一致的發展：这些因素就是統治階級使用武力，而且往往使用強暴手段。在密切联系民族歷史進程、了解各个國家歷史傳統以及利用这些傳統，爭取偉大人民运动領導权从而使得共產主义先鋒隊飛速進展这些方面，共產主义先鋒隊和它們的領導有过一些錯誤，表現过顯然無能。所有这些因素都曾經到处推迟甚至阻止了各國共產党的發展。何况在社会主义陣营內部也表現出各不相同的情况，这是人們所不能不估計到的。假如有人認為可以把在中國組織社会主义經濟和社会时可能產生的問題同苏維埃政权建立以來所產生的問題等同起來，这至少是奇特的見解。对人民民主制度國家來說，情况也是一样。这些國家在經濟結構、政治傳統和組織形式

方面都各自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人們也看見到目前為止在建設社會主義經濟和社會方面所獲得的進展各不相同。要是人們在制定任務、確立目標和規定行動速度的時候不顧這種不同情況，那將是一個嚴重錯誤。

如果現在我們轉過頭來看看社會主義陣營以外的一些國家，我們就可以看到情況不同的程度更大。事實上我們可以發現即使在共產黨不僅沒有參加政權，而且有時也不代表巨大力量的國家里也存在着走向社會主義的前進動力和或多或少明顯地朝向社會主義式的經濟改革和變革的趨勢。在這些情況下落在共產黨身上的職責問題是一個必須加以研究的問題，不過這不是應該首先由我們來研究的問題。這個問題要由這些國家積極活動的工人先鋒隊和共產黨人來研究。但是肯定的是：人們面對着各國共產黨和政權之間的關係、各國共產黨和工人羣眾之間的關係以及各國共產黨的任務和整個國家走向社會主義進程之間的關係上的新形勢。這是今天存在的一種形勢，這種形勢在從殖民主義中解放出來還不久的世界各地具有特殊的的重要性。也有可能，在非常先進的一些資本主義制度國家里，工人階級中的大多數追隨着一個非共產主義的政黨。我們不能排除這樣的可能：在這些國家里以工人階級隊伍為基礎的一些非共產主義政黨也可能表達從工人階級中產生的走向社會主義的前進推動力。此外，在有強大共產黨存在的地方，也可能并存着以工人階級為基礎的擁有社會主義綱領的其他黨派。最後，還可能從并不自稱為社會主義的組織和運動中產生要實現朝着屬於社會主義方向的根本經濟變革前進的趨勢。

各種力量之間的團結

自然，這裡就產生了在各個不同組織——有些是顯然趨向於社會主義建設的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組織，而另外一些則是非共產主義和非社會主義的、但是趨向於社會主義式社會改革

的組織——之間獲致正常關係的方式問題，就是要從互相了解出發以便獲致即使不說是諒解、也要獲致可能的合作。因此，在新條件下產生了實現不同的組織力量之間的團結問題，這些力量今天在各種不同形式下趨向於社會主義。

你們可以看出，這樣就出現了一個複雜的、多種形式的運動。一種迥然不同於幾十年來我們所見的情景現在呈現在我們眼前，因此，走向社會主義運動、共產主義運動和各國共產黨本身的領導問題的提法也就應當與過去不同。在我們看來，毫無疑問，蘇聯現在仍然是工人階級奪得政權和利用政權的第一個歷史性偉大榜樣，它極其有力和有效地利用着政權，在消滅了資產階級和其他反動階級的抵抗、粉碎了外國干涉的嘗試之後，成功地致力於建設社會主義經濟和社會的任務，並且完成了這個任務。這樣取得的經驗是一種確定的經驗，它包含着大大超過消極方面的偉大的積極方面。研究這種經驗不僅對於始終應該參照它行事的共產黨來說現在是、將來仍然是寶貴的教訓，對於一切想了解目前的實際情況、渴望發生根本性的經濟和社會變革以及願意向着變革的方向努力的政黨來說也是這樣。然而，這個經驗既不包含解決那些已經由工人階級和共產黨領導的國家今天面臨着的一切問題的現成的完善辦法，更談不到包含解決共產黨或者走向社會主義的政黨相反地還在充當反對派的國家所面臨的問題的現成的完善辦法，這些政黨所處的條件是同俄國工人階級先鋒隊在奪取政權的時候、以及在奪得政權之後所處的條件有深刻不同之處的。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社會所取得的經驗，不能包含解決我們今天面臨的和其他國家不管執政與否的共產黨人以及工人階級和人民的一切先鋒隊政黨今天面臨的一切問題的方針。

這樣就形成了引導方向和指導發展的不同據點或者不同中心。這樣形成的就是我在你們讀過的答記者問中所稱的多中心體系，這種體系是符合新局勢、符合世界結構的改變和工人運動

的結構改變本身的，這種體系也符合各國共產黨本身之間關係的新形式。

今天也許最符合新情況的解決辦法，就是各國的運動和各國共產黨各自充分自主，就是它們之間建立多個雙邊關係，以便建立充分的互相了解和完全的互相信任，這種了解和信任是進行合作的條件，也是使共產主義運動本身和工人階級整個進步運動團結一致的條件。這樣的體系也許是一種可能使共產主義運動和非共產主義的社會主義方向運動（社會黨運動，社會民主黨運動，全國解放運動等等）之間的關係得以很好地擴大的體系，可能使我們得以用新方式來處理和解決工人運動各部分之間的接近問題、一切努力爭取在世界上發生社會主義變革的政黨之間諒解、互相信任、協調和今後達成協議的問題的體系。我們在意大利同社會黨實現的團結行動，正如其他國家中在過去實現的團結行動一樣，是使這種協議問題獲得解決的形式之一，但是它並不是唯一可能的方法，雖然它是最先進的方法之一。

無產階級國際主義

很明顯，在這種新形勢下，在我們以一種新方式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其他政黨和走向社會主義的工人和人民運動的其他部分努力建立接觸的同時，我們有力地重申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精神，而且我們必須努力加強我們自己隊伍中、工人階級和人民中的這種國際主義精神；只要我們能夠妥善地使我們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具有一種具體的明確內容，使得這種國際主義既符合於形勢，又保持住先鋒作用，不滿足於復誦過去的公式，而是以新的勇氣和主動來處理各國工人階級先鋒隊政黨今天可能面臨的一切問題，我們就可以比較容易地達到這個目的。

忠實於這個方針，我們作過努力以求解決、而且已經解決我們同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的關係問題。大家記得過去的情況以及犯過的錯誤和我們是怎樣改正這些錯誤的，大家記得我

們最近为了恢复同南斯拉夫共產主义者的正常关系而作出的努力。我到貝尔格萊德去，去得有点倉促，那是因為我們兩党双方都必須考慮到过去同其他方面約定的会晤。这次旅行之前，我們党的其他領導人同南斯拉夫共產主义者联盟的領導人之間進行了接触，因此我的会晤得到了非常良好的結果。我們已經同南斯拉夫共產主义者联盟建立了团结信任的相互关系，我們將不断加以發展，从而使我們得以日益更好地了解我們的南斯拉夫同志在做些什么，也使他們日益更好地了解我們在做些什么，这样來在这方面促使解决我們面臨着的在遵循自己的道路向社会主义前進的工人运动各部分之間建立新关系这个大問題。

我們特別欢迎鉄托最近在莫斯科訪問的时候苏联共產党和南斯拉夫共產主义者联盟之間达成的協議。請同志們讀一讀協議的条文并且加以研究，因为在我看來，它似乎可以成为共產主义运动不同部分之間正在建立中的新关系的范例。

在这种形势下，同苏联共產党和苏联共產党人偉大运动的关系就有了新的意义。赫魯曉夫同志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次秘密會議上所作的报告中所透露的事情使这个問題部分地复雜化了。他所透露的事情使人吃驚，使人激动，造成了你們所知道的不安，而在我們党内，我相信在其它共產主义政党也是一样，則触發了直到現在还在進行的十分廣泛的辯論。撇开这一点不談，其它國家共產主义运动和苏联共產党之間的关系这一問題也照样存在着。这个問題在客观上已經到达成熟的地步，因为形势本身要求在新的基礎上來明确研究和肯定这些关系。已經發生的事情毫無疑問加速了这个过程；这些事情把这种过程導向更妥善的解决，并使它为共產党员群众和具有先進思想的廣大劳动群众所了解。这是一个具有積極意义的事实。

十月革命

你們知道敌人和它的奴僕們是怎样用最下流和愚蠢的态度

对待这个问题的，他们硬说全世界的共产党人一向是而且将来永远是莫斯科的奴才，只听来自苏联共产党和这个党所领导的国家的命令。我们可以不去理睬提问题的这种方式，它暴露出他们完全没有能力理解现实，完全没有能力理解共产主义运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然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的发展对于欧洲和世界历史有什么意义。

当俄国工人阶级在1917年夺取了政权，把它牢牢地掌握着，胜利地击退了形形色色的敌人的进攻，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而且在世界上第一次作出在伟大共产党领导之下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实在的、明显的榜样的时候，当这些事发生的时候，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先锋队不能不按照这个伟大榜样而确定方向，不能不把它看作在一个极端敌视社会主义的世界上，在一个受帝国主义严密统治的世界上向社会主义前进中的一个引导方向和指导斗争的中心。由于这种引导，共产主义运动才得以掀起、发展、加强和向前迈进，而且为欧洲最近几十年来历史上屡见不鲜的伟大民主和社会斗争的发展提供了自己的有决定性的贡献。自然，随着共产主义运动以我所说的榜样和指导为方向，根据历史条件和各个国家的传统而更好地保持、加强和发展共产主义运动在工人阶级和人民内部的基础，从而成为政治斗争和社会发展中的经常因素，这种贡献就更大了，更有效了，也更完善了。

用不着多说，从十月革命之后直到世界大战爆发、甚至再以后的那段历史时期中，苏联共产党所决定的、从各种敌人的攻击中所维护的政治立场，曾经把欧洲和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的关键问题上引向正确方向。在这段历史时期中，我们没有从另外任何方面得到过能够像首先是列宁那样、然后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成就那样正确地指导工人阶级先锋队和民主先锋队的任何教益或引导。列宁和俄国革命给予了同改良主义思想和实践断然决裂所必需的推动力量；而这种决裂是为工人运动发

展和向社会主义進展奠定巩固基礎所必不可少的。

建立这些革命的工人政党——沒有它們，工人階級就不可能日益肯定自己作为領導廣大人民群眾和民族生活的因素的作用——的必要啓示也是來自列寧和俄國革命。后來几十年，歐洲和全世界經歷着十分深刻的危机，領導苏联共產党的同志們那时采取的立場不但正确地引導了工人階級各先鋒隊，而且引導了歐洲和全世界的整个民主進步运动。

1939年的条約

讓我們举 1930 年到 1940 年的时期为例。当时的欧洲悲惨地分裂着，甚至即將解体。这段时期的結果后來就表现为：一方面，在歐洲大陸的大部分——苏联除外——民主自由橫遭蹂躪，另一方面，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發。从 1922 年起，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掌握了政权，实行了統治；然后它在德國掌握了政权；它又統治了所有巴尔干國家。波蘭有过一个法西斯式的政权。法西斯主义曾經在西班牙發動內战和一个真正的战争，从而摧毀了西班牙民主共和政权。它曾經利用威脅和使用武力征服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在“西方民主”國家統治階級內部当时占优势的趋势是設法同法西斯主义妥协，同希特勒分子和法西斯分子友好，用种种方式来消滅人民所爭得的一切民主成就，从而建立最反动階級的公开独裁政权。苏联和領導苏联的党就是針對这种情况采取了正确而有效的行动，不僅鼓舞和引導工人階級，而且鼓舞和引導一切民主力量和歐洲各國人民來大力保衛民主，團結起來战胜法西斯主义，从而消除爆發新世界大战的危險。苏联領導人曾經在長时期中作了頑強的、耐心的斗争來使得民主力量合作这一路綫占据优势，这种路綫如果貫徹，本可以使全世界免受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禍。

今天，人們很容易忘掉这些事情，把事实想像成仿佛在苏联只有一些殺人犯，而在其他地方則是一些始終崇拜民主理想的

羔羊。这种想像同现实毫無共同之处。在欧洲歷史上这个可怕的十年当中，苏联是最坚强的堡壘、是民主、自由和和平原則的最有力的保衛者。这样，再加上政策是正确的，它就受到了整个西方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今天要否認这点是很容易的，因为要撒謊始終是很容易的。我們知道，而且人人都很清楚：“民主的”西欧，法國和英國的領導階級当时的意圖是什么。在它們的隊伍中，那些准备在法西斯主义的帮助下扼殺民主政权和縱容野蛮的法西斯主义進攻社会主义國家的人占着上風。假如在1939年沒有締結苏德互不侵犯条約，那末，当时唯一可能的前景，就是西方大國同法西斯德國达成新妥协來——無疑——騎在波蘭人民背上。不过，这种妥协的主要目的还是引誘希特勒進攻社会主义國家，并且摧毀工人階級的一切革命成就。假如說能从这个条約中看出某些可能在当时看來是消極的因素，这些因素只是年复一年地拒絕苏联所主張的和不顧一切抗拒而加以維護的民主團結和保衛和平的政策的人們造成的，是西方民主國家的領導人的詭計和誹謗造成的——更不用說法西斯主义領導人的陰謀和誹謗了。

我們当时执行着什么政策呢？我們受到苏联共產党的啓發，执行着民主、社会主义与和平的廣泛政策。这一点过去是、現在仍然是我們主要的歷史功績，并不是像人們今天想使人相信的那樣——我們黨員在抵抗中和戰爭中表現英勇行为才是功績。我們改正了在前段时期中所犯的錯誤，就是說，特別是在法西斯主义在德國执政前夕，我們在估計、战略和策略方面所犯的錯誤。我們把全歐洲男女工人群众的行动作为我們阻止法西斯主义向前發展和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爆發的工作和斗争的中心环节。人民陣綫——今天流行的是对它加以誹謗——是过去若干年中为了使欧洲民主政治取得新進展而作出的最偉大的嘗試，也是昨天在全世界为了避免以新战争的恐怖为代价來消滅法西斯主义而作的最偉大的嘗試。这个嘗試的失敗成了民主崩

潰的前提，成了法西斯分子得以憑恃他們的武器和野蛮行為來為了統治全世界而孤注一擲的前提。

我今天提起這些事情，並不是為了誇耀我們黨或它的領導人在制訂和運用這個政策中的特殊功勞。恰恰相反，我提起這些事情，是為了使大家回憶蘇聯和它的共產黨在啓發全歐洲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階級採取這種偉大的民主政策方面所起的作用。不錯，這些事情發生的當時，正像人們今天告訴我們的，在蘇聯出現了不法行為、暴力、破壞革命法制的浪潮，黨領導人自己因而遭到摧毀。當時我們既不知道這一點，也不能想像這一點。我們對蘇聯共產黨積極信賴，我們同它積極團結，正是由於這一事實；在蘇聯共產黨的鼓舞和指導下，我們發揚了這個偉大的政策。正是由於這一點，我們不能對蘇聯民主的發展形式及其實現抱着任何懷疑。難道不正是在當時通過了蘇聯憲法——取消了蘇聯以往憲法上的民主限制的蘇聯憲法嗎？

自主發展

也正是在當時，共產主義運動開始在雖不說是所有國家中、至少也是在好些國家中有了某種自主發展，而後來使得共產國際必須解散的條件也正是在那時形成的。硬說在共產國際中只有一個發號施令的集團和若干唯命是聽的非俄國共產黨人，這是撒謊。我們應該也向那些由於沒有經歷過因而不了解這些事情的同志們提醒這些事情。在共產國際內部曾經一年又一年地廣泛進行辯論，不錯，同時也採取了重大的紀律行動。在舉行一場大辯論的同時，消滅了否認有可能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托洛茨基集團和右派集團。1928年到1931年，出現了我們認為是錯誤的極端論斷和方針，當時進行過認真的辯論。在一場大辯論之後舉行了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可是也有錯誤。也有互相不了解之處。例如，我可以追述一下，在向布爾什維克黨第十八次代表大會提出的關於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形勢的報告中對我們

党作出的判断，是一个有深刻錯誤的、甚至是有害的判断。人們說到我們党的时候就仿佛它是不存在的，尽管我們党存在着、战斗着，而从各方面看来都同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和从来沒有努力發展的党所处的情况完全不同。但是，这种判断被擯弃了，战争开始时人們就不再談它了，并且我們党有目共睹地顯示出它是怎样的一个党，表明有能力領導工人和人民。

随后在大战期間和在大战以后，特别是在凡是共產党在它們國家里根深蒂固成为大党的地方，它們的自主就变得較大，即使——我們应当說明：我們决不能容許人們忘記这一点——在这段时期还是苏联决定性地鼓舞了大家为反对美帝國主義者在大战結束后兩年为了試圖統治全世界而執行的政策進行抵抗和斗争。

但是最重要的事情是在剛过去不久的这段时期共產主义运动在廣泛自主的情况下有了發展，那些善于自己工作而又工作得很好的党已經在它們自己的道路上有了進展。

1951年1月間最嚴重的矛盾

我曾經讀到有一位同志在一次党小組会上說：他讀到自从1947年以來我們从来沒有在國際會議上討論过我們的政治問題和我們的工作，他因而感到驚訝。确实确实是这样的。但是另一方面肯定的是：凡是敏銳地注意了我們的政策和我們的行动在一切方面的發展的同志們，就可以發覺确是这样，也应当这样，因为我們的政策的發展同我國的形势有着这样密切的联系，以致簡直不能設想这种政策决定于外來的命令，或者外部對我們施行任何种类的控制。作为意大利共產党人，我們壯大了，我們加强了，因为意大利共產党人的政治行动路綫取决于我們國家的条件和我國人民切身有关的需要，不取决于任何其他东西。

我不否認：当情报局成立的时候，我們曾經感到某些怀疑，因为感觉到这个行动同共產國際解散时所通过的共產主义运动

發展路綫在本質上是相反的。但是，我們感覺到在当时的局势下，共產主义运动的各个部門之間需要恢复接触，而这正是由于那时有人对共產主义的力量、对社会主义、对民主、对和平發動了巨大的冷战攻势。

我毫不犹豫地要讓同志們回憶一下，在某些情況下，苏联共產党人对某些問題所說的同我們所主張的之間曾經有过一些分歧，但是这从來沒有造成我們的團結和我們互相了解的破裂。

赫魯曉夫的報告

最顯著的分歧——或許是最嚴重分歧（我提到这一点，因为对今天討論的問題來說它是有一定的重要性的）僅是在1951年1月才發生的。那时我由于遭到嚴重意外，随后不得不动手術因而在莫斯科休养了一段时期。当时斯大林建議我必須放弃意大利共產党書記的工作來担任共產党情报局的总書記。我立即表示反对，这是由于很多原因。我指出这样一种行动在輿論看來不能不意味着重新回到共產國際組織，这只能在局势已經極端嚴重的当时对國際局势發展產生嚴重和消極影响。其次我指出这样的事实：國際共產主义运动組織采取这样的方向將是不正确的。最后我提出个人方面的許多表示反对的理由。这样就引起了一些激烈的辯論，但是問題終于獲得了解决，因为斯大林同志收回了他的建議。

今天对斯大林同志的活动所作的批評以及对他所犯的可怕錯誤進行的揭發，已經并且正在促使人們重新考查一整系列的問題，因此也包括苏联共產党人和其他各國共產主义运动之間的相互关系問題。我不知道这里是否將提出曾經在党小組或是支部的一些討論中所提出的問題，就是說我們党是通过怎样的途徑獲悉这些批評、特別是獲悉赫魯曉夫同志所作報告的明确內容的。我們承認这个途徑是不好的，但是另一方面我們要求人們承認我們是不負任何責任的。顯然为了对苏联同志的礼貌，

我們只能像我們所做的那樣做。在黨內我們也聽到對報告的某些方面以及形式表示某種不滿的批評。然而我要提醒同志們：不要把这个報告孤立起來看。必須把这个報告同作为这个報告的範圍的這次代表大會上的全部發言聯繫起來看。把这个報告作为同其他文件不相聯繫的文件來看，它的某些方面可能被認為不大妥當，除此之外，在某些問題上我們還是应当予以同意，甚至我們不能不同意。第一點是这个文件介紹了一些事實，我們不能否認這些事實。我們不能不相信說明這些事實的人們，即使我們在過去不知道、也無法知道這些事實，更不能想像這些事實。對於這些事實的揭露是不能不在黨的面前進行的，至於揭露的方式，無需我們來加以判斷，因為每個黨有它自己的準則和內部生活的習慣。我們可以對資本主義國家共產主義運動通過怎樣的途徑才獲悉這個報告感到不滿，但是這是另外一個問題。我們應當承認揭露錯誤和為糾正這些錯誤而採取的、大力進行的行動是有極大積極意義的。糾正錯誤是應該的，對這種作法應該表示歡迎。這種糾正是一次重新肯定，結果將加強社會主義社會的民主性質。這種糾正在蘇聯共產黨內部生活中民主性質曾經衰退的方面恢復了民主原則和實踐。這是應該作的事，這對於蘇聯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對於共產黨人已經掌握政權的國家內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對於資本主義國家內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和全世界整個工人和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只能產生有利的結果。

顯然，對斯大林本人進行了嚴重的批評和揭露之後，斯大林其人對我們看來和以前完全不同了。儘管這樣，他的形象並不因而就已經完全泯滅。他的形象勢將具有一個新的輪廓。他表現為無論是在本性方面還是在本性的演變方面都有着深刻矛盾的人。在有極多的好事的同時有極多的壞事。但是這個問題從此已經成了歷史上的問題，蘇聯同志們知道我們所無法知道的事情，他們應該幫助我們了解這個問題，以便更好地來解決這

個問題。

講到我們的“共同責任”——我們的敵人在今天談得那么多，而且在選舉鬥爭中成了他們的戰馬之一，——這個共同責任是具有一種政治內容的。這種共同責任是有的，因為我們不加批判地接受了關於階級鬥爭隨着社會主義社會的進展而不可避免地尖銳化這個根本錯誤的觀點，斯大林所提出的這一理論後來引起了違反社會主義法制的可怕行為。我們曾經在我們的宣傳中接受而且採用對斯大林個人的崇拜，儘管應當承認我們當時是竭力避免在我們黨內採用這種做法的，然而在這方面，我們還是要負責的。我們在一切問題上和黨內生活上努力進行黨的組織工作、給黨指出方向、加以領導時的做法，也可以認為是在事實上克復對斯大林的批評所明白顯示出來的若干缺點的嘗試。

仍然存在的問題

既然承認了這一切，那麼，很多問題就仍然存在着。對研究這個報告的人來說，報告本身並沒有為一切問題提供深入和令人滿意的答復。在這一點上辯論和批評應當從政治方面進行，馬克思主義者要分析一定的形勢從而得出一定的結論的時候就要這樣作。問題在於怎么可能產生這樣嚴重的錯誤，特別是怎麼會圍繞着這些錯誤形成涉及今天揭發這些錯誤的那些人的共同責任的同意和默許。從這裡產生的問題不僅是要作出必要的糾正，還要保證同樣的錯誤不致重犯。

我答復了人們向我提出的一些問題，這樣做就是初步嘗試處理從上述問題中產生的若干問題。你們所知道的那篇文章（指收在本書的第一篇文章，陶里亞蒂答記者問——編者）在發表以前是由黨書記處的同志們看過的。但是這篇文章是我署名的，因此主要由我負責，因為我認識到所涉及的問題範圍極廣，單單一個同志是不能認為他的觀點能夠立刻正確而且完全正確的。

今天，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和整個社會主義和民主運動中，辯論已經展開。我們黨在準備它的即將舉行的代表大會的過程中，也將對這個辯論作出自己的貢獻。

你們已經讀到我是怎樣談到所謂制度改革這個問題的，根據某些人士的意見，應該在蘇聯實行這種改革，在他們看來，這種改革是防止像赫魯曉夫同志的報告中所揭露的那樣嚴重事件的重演所不可缺少的。我所作的答復強調了在我看來仍然具有根本意義的事實，即十月革命創立了一種新型的、根本不同於資本主義西方民主社會的政治社會。必須作出一些糾正，必須採取一些措施，必須提供一些保證，但是我不相信：從革命和新的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和政治建設事業中產生的這種社會的首創性質能夠不繼續存在下去。這種首創性質就存在於蘇維埃制度和共產黨政治領導中。

人們聯繫這個問題而提出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在這方面，人們問道：像赫魯曉夫報告中所揭發的、首先應當由斯大林和他的某些下屬負責的那樣應受指責的行為，是不是無產階級專政這種社會組織形式造成的。這個問題也應當予以處理，我們不應當害怕處理這個問題，只要我們注意不把事情簡單化，不要像社會民主黨那樣淺薄和庸俗。

無產階級專政

有時候，在處理類似這個問題的一些理論問題的時候，可以看到一種錯誤的傾向：只考慮我們學說、我們的觀點的一個方面，例如列寧所主張的、馬克思主義經典大師們和蘇聯領導人所發揮的關於無產階級專政這個觀念本身及其形式的觀點。必須始終善於考慮這個觀點的複雜性。在制定馬克思學說的一個基本觀念——無產階級專政觀念——的時候，曾經闡明過好些問題。

首先是肯定國家（任何國家，不管是資產階級領導的國家還

是工人階級領導的國家)的階級性,這一論斷是無產階級專政學說的一部分。葛蘭西說過:“任何國家都是一種專政”。這個論斷是真實的,而且仍然有效。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是打倒資本主義的革命和社會主義勝利、過渡到共產主義之間的過渡時期。在這個過渡時期,社會領導權屬於工人階級和它的同盟者。無產階級專政的民主性質在於這一事實:這種領導是為了占壓倒多数的人民的利益,反對舊有剝削階級殘余而實現的。人們可以就這種過渡時期應該而且可以存在多久這個問題進行討論。而且,很明顯,在這段時期中能有種種不同階段前後相繼,從而表現出民主發展的不同形式。在蘇聯曾經有過不同的階段。1924年的憲法是一回事,1936年的憲法又是另一回事。根據這個例子,我們就不能排除這種可能性——相反,我們甚至認為極其可能:在蘇聯,雖然政權掌握在工人階級及其同盟者手中,可是民主制得以而且必須以新方式發展,同時却保存着它原有的特點。

但是,這一點遠不能說明無產階級專政這一學說的全部內容。先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然後列寧,在闡述這個學說的時候肯定說: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不能用來建設一個社會主義社會。必須由工人階級來打碎和摧毀這個機器,必須用無產階級的國家機器——也就是工人階級自己領導的國家機器來代替它。這並不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最初採取的觀點,而是他們在巴黎公社的經驗之後所主張的觀點;這個觀點特別被列寧發展了。這種觀點今天是不是還保持着它的全部效力呢?這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事實上,當我們肯定說不僅可能在民主的基礎上、而且也可能利用議會形式向社會主義前進的時候,我們考慮的是目前世界上已經發生和正在發生的變革,因而顯然對這種觀點作了一些修改。

大家可以集中注意的第三個問題,就是關於在無產階級專政制度下行使政權的形式問題。列寧最初就明白說過:無產階

級專政在俄國采取的組織形式，所有其他國家并不一定非采取不可。我們自己今天尤其可以依据这种論断來給予它以一定的擴充，以便得出这样的結論：关于行使政权的問題，列寧在蘇維埃共和國成立的头几年中所下的論断，是符合特定的局勢的，是符合革命决裂形勢和內战形勢的，是符合應該用一切办法和不惜一切代價來在各方面攻击中加以保衛的政权的發展形勢的，但是，这些論断可能不適合于其他形勢。在我看來明顯的是：在不同的情況下，这些論断便不適用了。因此，在這方面出現了在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不同黨派的問題，以及不同黨派可能在向社会主义前進中作出貢獻的問題。說是我們頌揚十月革命的勝利和我們在几十年中同苏联共產黨團結一致，意味着我們認為在全世界和在任何情況下都必須遵照俄國曾經做過的事情去做，这种說法是無益的，假如不說是愚蠢的。在苏联做過的事情，特別是在這方面，并不就是其他國家依照其特有的条件而能够和應該做的事情的榜樣。我們可以毫無困難地承認：在一个正在建設社会主义的社会里，不同政黨可以并存，其中有些是參加这个建設的政黨。我們承認：向社会主义深刻变革前進的推進力可以从为了能够实现这些变革而达成協議的不同政黨中產生。这种看法所展示的前景毫無疑問是多种多样的。人們甚至可以認為：各政黨可能在單一的社会主义社会巩固之后消滅，是一个同样涉及共產黨和同它合作的其他政黨的演進過程的結果（假如我不錯的話，今天有一个由共產黨人領導的大國的領導者們已經提出這個問題）。因此，人們可以經歷一個新性質的演進過程來建立一個新型社会，这个社会將具有向前推進而終於符合社会主义最后勝利的適當的政治結構。

政治路綫

提出這些問題，我們就逐漸接近了無疑將是我們在代表大會之前進行的辯論的中心問題，接近了我們黨的政治路綫和執

行这条路綫的問題，接近了为了建設社会主义社会而改变經濟結構在意大利將怎样出現的問題。

我不認為在代表大会之前辯論开始展开的时候，中央委员会的任务僅僅是肯定党过去遵循的路綫是不是正确。这是我們應該向党提出的問題，党應該对这个問題的討論作出它的貢獻。我們所关心的就是討論要尽可能自由地進行，但是，我們的任务就是要清楚交代我們所曾經遵循的政治路綫的要素是些什么，使大家对这个路綫的正确性作出的判断是很有根据的，使大家認真研究應該处理的問題。

那末，我們的政治路綫的根本要素是什么呢？我們是从分析意大利社会的經濟結構和它的政治結構出發的。由于这种分析，我們得以分別估計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在工人階級和農民群众——在反对資本主义旧統治階級的斗争中是应当同農民群众建立階級联盟和政治联盟的——之中所產生的各种推动力量。我用“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个字，是因为这两个因素是我們运动所具有的特征。我們曾經特別注意分析墨索吉奧諾（指羅馬以南的意大利地区，包括西西里和撒丁在內——譯者）的落后情况，由于我國歷史發展而形成的这种客观情况使得这种階級联盟具有特殊的内容，并且擴大了这种联盟以至于在最落后地区里包括了廣大数目的城市中小資產階級。对于这种分析的最出色的貢獻是葛蘭西同志提供的，这你們是知道的。

在抗战結束以后，在战争結束和法西斯崩潰以后，出現了新的情况，完成了一个偉大的新試驗，采取了一些新行动，階級力量有了变化，这一切形势造成了一些具体結果。因此，我們当时就联系着事实發展來設法丰富我們的分析，丰富对于我國社会結構以及对于工人階級任务的分析。我們从法西斯統治下和战争期間所發生的一切事件中得出的首要的和主要的結論，是再次肯定了在資本主义領導階級一旦放弃領導地位而由于它們所執行的政策使國家卷入灾难的时候工人階級和同它最接近的劳

动群众对于民族的作用。

我們整个政策在一切方面的主導思想，一向是希望实现工人階級这种对國家的作用，使它顯著起來，使党在各方面的政治行动獲得全國的支持。

法西斯主义失敗以后出現了一个問題，就是建立一个新社会，而在当时，由于工人階級和民主力量在法西斯主义崩潰中所起的作用，我們取得了某些有根本意义的陣地——这些陣地是一度中断的巨大改革过程的目标，也是我們因而必然要采取的行动的起点。这些陣地主要是我國的民主共和宪法以及宪法所肯定的原則和根据这些原則而建立一种民主，这种民主如果真正符合宪法的規定，就会成为一种新型的民主，不僅僅不同于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取得統治以前的一切制度，而且不同于傳統形式的資本主义民主。我們就是根据这一切來决定我們政治斗争的总方向的，而我們的政治斗争就是爭取实施共和宪法的政治原則和經濟原則，爭取实现宪法中或多或少明顯地指出的那些改革的民主斗争。这条政治路綫所要求的民主發展和实现結構改革从而朝着社会主义方向發展，是宪法本身所規定的。自然，采取民主發展的路綫，对于我們來說，并不意味着而且永远不意味着空洞地肯定需要進行某些改革；而是意味着群众斗争，爭取滿足群众眼前的要求，爭取实现巨大的社会改革。它意味着爭取劳动群众——首先是整个工人階級——团结；意味着工人階級政党不断作出巨大努力來同那些可以而且必然对日益深刻地改变社会結構感到兴趣的劳动人民各个階層建立日益廣泛的联盟。

組織工作

我們政策的積極性質、建設性質就是从这里產生的。我們党在行动中嘗試提出一些应当利用我們的一切民主制度發動群众民主运动和民主斗争來爭取达到的眼前的和長远的目标，这

一事实也是从这里產生的。我們嘗試这样做，是为了实现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某些階層中等資產階級的利益、要求和任务。即使党不是每次都对它必須理解的一切理解得透徹，我們在嘗試这样做的时候还是設法用新方式來提出某些問題的，例如妇女群众解放問題——妇女群众是使意大利社会最后民主变革的重要力量。青年問題，文化問題等等也是这样。如果我們深入研究党的組織工作这个專門問題，我們能不能够說在我們过去的活动中有新东西呢？我相信是有的，無論如何，在党的領導機構的計劃中是有的。首先有过这样的一个計劃，即建設这样的一个党：由于它的成員情况、参加的人数、特有的結構和工作方式，它足以發揮積極的、建設性的作用，不僅僅能够進行宣傳、鼓动和傳播偉大的原則，而且能够每日領導工人階級、劳动群众和人民的大多数，使他們理解而且維護自己的利益，特別是維護和巩固民主制度并且使这个制度沿着深刻社会改革的方向發展。

这里，我不多談党組織內的这些創举，但是今后可能会有許多事实証明这些創举的。不僅应当有这些創举，还应当輔以具有特別的、極高度民主性質的内部制度；因为一个閉关自守的官僚主义化的政党，内部占优势的趨勢不是思考、而是僅僅下命令和服从的政党，这样的党是不能廣泛联系群众的，然而这种联系却是我們党一向希望建立的，这种联系應該是我們党的根本特征。这样就產生了爭取我們党内民主、爭取使党的活动强而有力、爭取使我們組織内部生活生动活潑的不断斗争。这一点既不能是、也不應該是同政治紀律、劳动紀律以及民主集中方式矛盾的。

然而，談到这个問題，我們應該說作为政策开端的、指導政策的建設性因素，还不是党的政策。还应该看看是怎样進行这些事的，它們是怎样實現的，党是怎样被引導去实现它們的。我已經解釋了其要点的、在党的全國性會議上曾經多次予以确定和肯定的路綫，人們以往是否像應該的那樣对它有所理解和認

識呢？党是不是充分地、正确地、及时地領会了它呢？我相信党对这条路綫領会得不深，只是局部地領会的。在很長时期內，从我們的活动中表现出深刻的不了解，表现出保留和無知。在执行指示中表现出有些抵触。在这些不理解和保留中，最嚴重的就是——我不知道現在是不是还是这样——把我們肯定改变意大利社会的斗争的民主性質一事看作一种計謀，一种为了欺騙敌人或者克服困难、避免遭受某些打击而創造出來的东西，而不是看作这样一种政策的真正表现；这种政策產生于工人階級已經獲得的勝利，依靠的也是这种勝利，这种政策希望而且要把整个社会向前推進。

这样，我們党的發展——我們党自然是在遭受敌人的抵抗和攻击的同时，在事物本身發展的同时發展的——就遇到了好些困难。必須說明，我們党由于進行了巨大的組織工作因而有了極大的能力來战胜这些困难。不應該縮小或者低估这种实际的組織工作。它是一个共產主义大党所必須具备的要素。讓我們回想一下列寧告訴我們的話：組織，就是工人階級用以击败敌人的唯一武器。但是，不能够用实际組織工作來代替政策。如果只是脫离丰富的和新的集体創造去進行組織工作，工作就会有缺点，就会失敗，就不可能像客觀条件所允許的那樣向前發展。

貝拉和謝尔巴

关于議程第一点的辯論，大家的注意力特別集中在1953年大選之后的一段时期党的政策和活动方面所表现的缺点。說是缺点，是部分正确的。毫無疑問，在貝拉政府时期我們起初的政策是有些搖擺不定的。当时有兩種不同的态度：一方面，有人認為处于領導地位的那个政党当时是在大肆活动來尋找一条新道路；另一方面，有人說並沒有任何新东西，除掉这个事实：我們的敌人是在布置想用來吊死我們的繩索。但是，沒有把這兩种态

度公开加以比較，这倒是令人感到遺憾的。不过，我們沒有忘記：在这段短短的时期以后，謝尔巴政府統治了一年半，它是解放以后意大利最反动的政府。这个政府对我們發动了一場無情的攻势，最后是公开奉行麥卡錫主义、按照是否屬於工人階級先進运动而对公民加以歧視的做法列入了內閣會議的公報來作为政府一切活动的原則路綫。我們当时不得不面对這場攻势并且予以抵抗。我們的組織能力和实际工作能力对这个抵抗以及它的成功提供了决定性的貢獻。如果沒有这次的抵抗，就談不上向左开展！今天成为一切事物方向的新政治發展的条件就不可能出现，那怕是在今天这种發展方向还是有限的。我承認有过胆怯和軟弱的表現。必須研究研究这种表現在怎样的程度上是从上述一切事实中產生的，就是說，產生于我們党由抵抗而轉向肯定自己地位时所感到的困难。我們党所以能够肯定自己的地位是因为我們進行了組織工作而且立即展开了斗争，是因为我們展开了具有建設性的活动，提出了具有比較廣泛的新內容的建議，从人民群眾出發經常不断地前進，因而一个勝利接着一个勝利，整个运动就向前發展了。在这方面，我們党現在还不具备与形势相適應的能力。在1953年獲得巨大勝利——它大大促成了加斯貝利前此采取的政治路綫的破產——以后，在勝利地抗击謝尔巴的麥卡錫式政府之后，这些缺点就更为明顯了；而且我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它們对于党的領導機構的活动也發生了影响。

內部民主

关于內部制度，我們現在接到我們各个組織的很好的決議，这些決議批評了基層組織中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缺点和缺乏民主生活等等。不过，今天在党的領導機構的文件中对于這個問題——对党的批評、指示党的任务——有着最清楚的論断。只要讀一讀上一次代表大会和去年全國會議的报告和文件，你

們就會發現對於這些事情的說明是比你們大家一定知道的杜蘭特同志給“再生”周刊的信件中所說的要清楚一些。在這方面，我們也看到籠統的論斷、指示、建議、命令和黨的現實生活之間的距離。我們看到這樣的一個嚴重缺點：發揚內部民主，也就是增加黨的活力的要求，並不是始終同為了達到一定政治目標、為了使黨体会到必須按照能夠達到這些目標的工作方式來工作而進行的鬥爭結合起來的。爭取正確的內部制度的鬥爭沒有同當前迫切的政治問題的辯論結合起來。因此，這種鬥爭缺乏效力，黨內民主有了一定的限度，發生了限制這種民主的傾向和命令主義，最後使我們的政治行動未能發展。

現在全黨應當對這些事情，對我們政治路線的重大階段和
政治路線被理解和實行的方式作出判斷，從而得出必要的結論，指出需要作的糾正，使全黨向這個方向前進。

意大利道路

我們此後應該怎樣發展我們黨的路線？我們應該繼續探求和實現我們自己的道路，向社會主義發展的意大利道路。但是我要糾正這樣的一些同志：他們肯定地說——好像這是不言而喻的——向社會主義發展的意大利道路意味着通過議會的
道路，僅此而已。這不是真實的。是誰肯定說過“意大利道路”意味着通過議會的
道路呢？意大利道路是把已經實現的條件和已經取得的勝利估計在內的向社會主義發展的道路。這些勝利既然已經創造民主發展的廣泛基礎，意大利道路就是預見到在民主範圍內求發展以加強民主和產生真正走向某些深刻社會改革的演變的一種道路。如果不根據上述條件來對待這個問題，如果把“意大利道路”和“通過議會的
道路”草率地表面地等同起來，就可能一方面造成危險的幻想，另一方面則可能感到大為失望。在工廠里工作、知道資本家權勢的分量的同志，知道現在社會中資本主義統治階級的權勢的性質和分量、而另一方面又看

到我們現在的議會是怎么一回事的市民們，因此可能得到這樣的結論：通過這條道路是永遠也不會達到根本改變的。因此必須正確地提出這個問題。我們直到現在遵循的是始終民主的道路。不過，我們在這條道路上進行工作和展開鬥爭的過程中遭到了激烈的抵抗，我們曾經不得不進行不斷鬥爭來維護勞動者的利益、他們的自由和生命，來爭取得到某些改善和若干小小的改革。在某些時期，甚至出現過為了挽救我們偉大運動的合法地位——有一些人竟然認為可以危害它——而鬥爭的問題。我們知道可以予以危害的想法是反動派徒勞的幻想。然而，這些幻想所以是徒勞的，那是因為我們的強大，因為我們進行了抵抗，而且以我們為核心、廣大勞動群眾參加了鬥爭，甚至作出了犧牲。利用議會是一種目的在於爭取深刻結構改革的民主行動發展的可能途徑之一。但是要使這種可能性得以實現，就必須有一定的條件。必須有一個真正反映全國情況的議會，必須有一個起作用的議會而且必須有一個如下所述的巨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它提出人民的要求，然後使這些要求能夠在人民力量得到充分強大的代表權的議會中來予以滿足。要使議會反映全國情況，僅僅在議會中按比例分配席位是不夠的。必須把使用武力、威脅、恐嚇、精神恐怖的整個一套制度連根拔除——這種制度在意大利被日益露骨地運用來使議會選舉不符合投票的勞動群眾的覺悟和需要。我們應該記住列寧說過的關於資產階級民主的虛幻性質的話。我們今天能夠部分地、甚至大部分地消除這種虛幻性質，我們能夠創造一種真正的民主基礎，從而甚至可以按照馬克思主義經典大師們所預見的那樣來勝利地展開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但是要創造這種基礎，要使它存在並且廣泛存在，還必須進行激烈的群眾鬥爭，在全國展開廣泛的行動。我們也應該認識到意大利議會的運行特別是最近幾年以來是有缺陷的、有限制的，以致議會不能盡到它的職責。今天的議會幾乎完全沒有盡到監督行政權力的行動的職責。這意味着我們也應該

辯論議會的職責問題，應該在國內向這個方向採取行動和進行鬥爭。建立同勞動群眾有聯系的強有力的議會集團來掀起廣大人民群眾運動，這對於有效地利用議會制度的一切可能性以求達到民主和社會主義革新來說是必要的。

已經發生的變化

我還願意提醒一下，當接觸到意大利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問題的時候，不應該認為這是可以坐在辦公室里解決的問題，是可以通过依靠某某領導人的智慧或奇才制訂或多或少新的方案來解決的問題。我們到目前為止所打開的一點點“意大利道路”，首先要歸功於人民群眾的鬥爭，而我們今後還要取得的成就將是其他的鬥爭和我們在領導鬥爭過程中所取得的經驗的結果。黨的民主鬥爭是一個開始，同樣，它永遠應該同國家的和我們工人運動的條件和傳統密切地聯繫起來。但是今天什麼事情對於確定我們的政治路線特別重要呢？最重要的就是研究新事物，研究已經起變化的東西、變化的方式以及這些變化所造成的形勢。

研究新事物

我們歡迎對新事物進行任何研究，但是，要注意在這方面有時會產生教條主義和抽象的危險。例如，有人對一些同志說：在工廠選舉中所以失敗，是因為不了解目前正在進行第二次工業革命。這樣說是不夠的。這樣的籠統談法，不能幫助同志們更好地了解事物。同志們听了這樣的說法是會消沉起來的，他們甚至會無法了解人們所說的是什麼，特別是會不會了解自己應該怎麼辦。

研究新事物，隨時都應該同對各階級的動態、工人運動和我們的工作的具體的實際現象的考察聯繫起來。我承認，在過去幾年中，黨中央和全黨對經濟問題的研究都重視得不够。過去

的損失今后應該彌補過來。過去，例如在深入分析法西斯政權的客觀經濟基礎、分析經濟發展對法西斯政治轉變的影響的時候，我們曾經成功地作出非常重要的貢獻。今天，我們應該更好地來研究我國的經濟結構。我國經濟結構仍然是資本主義經濟結構，但是它是一種特殊類型的。一方面，我國有些區域，有着高度的發展而且是在充分發展，這些區域不能永遠不受國家給予的幫助，就是說保護關稅制的幫助，而這種保護關稅是沉重地壓在全國身上的。除去這些區域之外，我國還有不夠發達和處于下降中的地區，對失業和貧困的大規模調查就表明了這一點。無論在城市里還是在鄉村中，經濟發展的方向都是使壟斷資本結構居優越地位，因此造成了若干新型的矛盾，造成了越來越大的不平衡，它沒有使國家得以協調發展它的能力和可能性，沒有促使國家向着解決各主要問題的道路邁進。這些主要問題中有勞動問題、公民福利問題和北方同南方之間的長期不平衡問題等等。因此，我們固然不應該閉上眼睛不看已經取得的進展，但是，閉上眼睛不看整個整個地區的落后狀態也是很危險的，這種落后狀態仍然是我國最嚴重的特點。

關於政治結構方面，我們不能說這些結構是符合憲法規定的，原因有兩個。首先是由于沒有一貫地實施憲法，因此，憲法的政治原則還在遭受廣泛的破壞。憲法規定的結構改革——例如劃分區域和肯定地方自治——也沒有實現。公民之間的歧視待遇表明了民主政權的腐朽情況，這種歧視依然是領導階級、因而是政府當局的行動準則。

此外，應該公開地指出：我國民主制度的腐朽的新的表現，特別是在國家和教會之間所建立的新關係方面。我們由于贊成（憲法）第七條受到過批評，但是像第七條所規定的國家和教會之間的关系，比現存的关系還是進步得多，現存关系是過去五年多加斯貝利政府執政時期和以後歷屆天主教政府執政的几年中所建立的。在這方面，由于所建立的关系，人們已經不能分得清

楚相互的責任和權力範圍。教會組織違反法律明文，大規模地進行干預來使天主教黨在選舉運動中占優勢。由於這種干預而得以執政的天主教黨，自然要用一部分本來屬於國家的特權來報答教會當局。在社會救濟方面，例如學校津貼方面、工人就業組織援助等方面，就是說對建立民主社會關係重大的各方面就發生了這樣的情況。假如我們不把這些事情說出來，假如我們不向工人階級和意大利全體民主人士指出：必須為爭取遏制從而制止這種腐朽情況、爭取恢復真正而鞏固的民主制度、使國家和教會之間的關係重新合乎憲法規定而進行鬥爭，那末我們就會犯嚴重的錯誤。

目標何在？

我們今天應當確定什麼目標呢？我們準備在民主範圍內發展工人和勞動群眾的行動和鬥爭來深刻地改變意大利社會的經濟結構。我們打算使意大利社會具有能夠保證工人最大福利、消滅失業和貧困、消除歷史性的區域不平衡等等的經濟結構。要獲得這些成績，技術和整個國民經濟必須實現巨大的進步。我們要求實現這種進步，我們反對壟斷資本主義制度，因為壟斷資本不能保證全民族的普遍進步，即使在某些地方保證了個別零星的進步，這些進步也只是使它得以從中獲取巨大利益；無論在技術、經濟或者社會方面它都不能保證普遍的進步。爭取滿足經濟要求的問題、爭取工會權利問題以及過去我們稱之為過渡時期要求而現在統稱為機構改革的這些切身要求，是同爭取國民經濟走向新方向的鬥爭結合在一起的。

至於農村方面，我認為沒有什麼可以爭論的問題；我們承認根據憲法規定的原則進行普遍土地改革是必要的。這就是說，對土地所有權普遍加以限制，以便做到耕者有其田。

在工業方面，就是說在資本主義經濟的主要方面，則有一些問題存在，而且是應當加以討論的。這就是國有化問題，國家干

預經濟生活的問題，消滅壟斷資本的問題。有一種趨勢，說只有有了政權才能決定一切，從而拒絕並且批評共產黨在這方面所能做到的、採取的一切積極態度，說只有在社會主義的工人政權下，才能有效地實現國有化，而國家干涉經濟生活，通過立法措施制止壟斷資本等等，也只有在社會主義的工人政權下才能有效地實現。這些說法也有道理，但是僅僅是有抽象的道理，因為在具體的關係中，在今日世界的條件下——這些條件也存在于我們國家里——具體的政權是這樣的一個東西：它是能夠改變的，能夠在工人階級和勞動群眾的運動和有效的鬥爭推動下改變的。因此國有化的問題、國家干預經濟生活的問題，應當同一切運動，特別是群眾在這方面的鬥爭的發展一起提出和予以解決。

如果我們這樣來提出這些問題，我們就不能不得出這樣的結論：如果事先就否定工人階級先鋒隊有可能把這方面的要求和積極步驟作為自己的要求和步驟並且支持這些要求和步驟，將是錯誤的。今天，在意大利提出了萬諾尼計劃的大問題，毫無疑問，過去是、現在還是一個花招，用來迷惑大多數人，使他們以為這是一個新的經濟政策。儘管這樣，它也可以作為爭取意大利經濟結構真正開始轉變而進行有效鬥爭的一個參考和基礎。

另外一些對我們非常重要的問題，是實施一個全面的社會保險制度，以克服社會的落后狀態；克服我國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比較起來的較為落后的狀態以及勞動者在生產場所的地位方面的落后狀態等。

人們今天愈來愈經常地談到工廠應該建立人的關係。人們以為並且說：這是針對我們的一種鬥爭形式。這對某些人來說也許是真實的；然而，至於我們，我們應當公開地說在工廠里建立人的關係是我們的口號，是我們鬥爭的目標之一。我們希望在工廠和在所有工作場所都建立人的關係，但是我們說這種人的關係應該從尊重勞動者的民主權利和他們的工會權利開始，

因此就要消除一切歧視措施和承認勞動者有同廠主或者廠方組織討論他們自身的報酬的權利，而不能相反地只是聽從廠長個人高興賞賜價錢。在這方面，我們也面臨着資本家——尤其是大企業主——和工人之間關係惡化的危險。造成這種惡化情況的原因，就是資本家擴大這種個人任意專橫地依據歧視性標準來規定工資的制度。

我們也可以了解：依照整個勞動效率來規定一部分的酬金是很有用的，不過這裡又出現了憲法所規定的另一個問題，就是工廠管理會議的問題，由廠內委員會和工會來規定勞動強度和剝削程度的權力問題，還有一切有關工資、紅利、獎金的問題也同樣出現了。

繼續不斷的行動

我們成功地領導着的有關這些要求和改革的運動，無疑是一個通向社會主義的運動。我們今天能不能使我們國家朝着這個方向成功地發展呢？我們相信是能夠的，因為客觀上和主觀上都存在着一些有利條件，促成這些條件的是全世界以至我國國內目前正在發生的一切事件，是意大利的工人和勞動群眾的覺悟提高的程度。但是，僅僅看出這些客觀上和主觀上的有利條件，從而隨便得出結論說：我們在這裡通過一個小小法案，然後又在那裡通過一個，簽訂一項小小協定，然後再簽訂另外一項，就可以確保安全地向前邁進，終至我們社會的結構實現改變，這種看法是不行的。這種對事物的看法是把對障礙和困難的估計撇在一邊了。這是對歷史和政治採取片面看法的結果。這種看法，對於維護和鞏固我們的民主、對於意大利勞動群眾中存在的民主覺悟，以及對於意大利群眾信奉社會主義思想來說，都是危險的和不真實的。還有一些限制是必須越過的。我們還沒有把大多數意大利人民爭取到社會主義這一邊來。其次，我們應該記住，階級敵人仍然存在，今天掌握着政權、利用政權——而且

利用得很好——的資本家、大地主和工業大壟斷資本家們，一直還存在。法西斯主義是產生在意大利社會中的，它的產生決不是由於一個人發瘋和其他的人無知，而是意大利社會經濟發展的結果，是以我國經濟為根源的矛盾和鬥爭的結果。今天，人們看到右翼各政黨在最近的選舉中遭到了失敗。這很好。不過讓我們不要忘記謝爾巴的麥卡錫主義仍然余焰未滅。防止重新採用這些反動形式——或者其他的反動形式——的問題還沒有解決。要明白這一點，只需看看資產階級直接影響的那些大報就夠了。

只有保持警惕、不斷採取行動和進行鬥爭，不斷加強民主力量 and 社會主義力量 and 它們的團結，從而做到抑止、約束、限制和制止階級敵人的活動，民主發展才能實現，民主鬥爭的基礎才能得到保證。向社會主義前進採取怎樣的形態，不僅僅取決於我們：它取決於我們，也取決於敵人的所作所為。直到現在，在意大利只有統治階級墮落到使用暴力來阻止人民群眾所要求的政治和經濟變革。它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馬上就這樣干了，在其他時期中它也試圖過這樣干。這是由於這些階級力量 and 意大利資本主義的性質本身所致，它們甚至不願意作在其他一些國家已經實現了的一些改良主義式的讓步。壟斷大資本緊緊掌握着經濟地位 and 政治地位的益網，由於有了這些地位，它才得以行使它的權力並且在局勢中起支配作用。在社會黨中央委員會最近的一次會議中，理卡多·龍巴迪同志提出了民主行動採取怎樣的形態才能打破壟斷大資本的權勢的問題。這是當前實際存在的一個問題，我們應當說明白——因為我們要是不說明白，我們就欺騙了男女工人群眾，——我們應當說明白：要想前進，要想得到必需的朝向社會主義方向的結構改革，我們就必須在民主範圍內進行巨大的鬥爭。必須擴大男女工人力量組成的陣綫，組織起來，自己的隊伍團結一致，強大起來，而且清楚地知道自己所要達到的目標。

社会改良主义

今天，社会改良主义是以两种不同的形式在广泛地传播着。一种是传统的社会民主改良主义，另一种是天主教社会改良主义。它们有着相同之点，也有不同之点。传统的社会民主改良主义力求倚靠工人贵族，使他们脱离工人阶级的其他群众；力求利用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然而不是为了要改革社会结构，而是为了使自己和群众的分裂永久化从而协助那些领导阶级。经由这条道路，它就同最反动的势力勾结起来了。在意大利，它先是同加斯贝利勾结，随后又同谢尔巴勾结，共同奉行一种使资本主义再度嚣张和公开反动的政策。

天主教改良主义具有一些不同的特征。它不拒绝工人中的某些贵族的支持，但是同时它力求在生活境况最艰苦的群众中打下基础，一方面利用家长制，另一方面利用教会势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就是说，利用思想的压力和精神方面的威胁来始终束缚劳动群众和他们的组织并且阻止劳动人民运动的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当清楚地看到：并不是宣称我们依据民主范围来行动就可以走向社会主义，而是要正确了解为了胜利走向社会主义我们所应当作的事情。必需的是：我们所要求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变革，必须始终以在群众看来很清楚、简单、明确的事实表达出来。我们必须明白说出：我们要求实现那些对于开辟通往经济结构变革的道路来说必不可少的改革。仅仅说向左开展是不够的。必须使这个口号有具体的内容。我们应当使人们了解：向左开展并不是说对某一个部长表示拥护和把这件事当作一件大事而欢欣鼓舞起来。向左开展应当意味着一个今天占据统治地位的政策，至少应当意味着国家经济领导方向改变的开始。这就使我们能够展开团结性质的群众斗争；而我们应当努力的是使这种群众斗争具有团结的性质；无论在工会方面还是在其他方面都要这样。

除掉这个首要的根本要求而外，我認为工人階級和領導工人階級的各政党必須善于接近新的劳动者群众。因此，我們應該討論我們对意大利工人階級盟友的觀念是否要有一些改变的問題，我們是否應該把盟友的觀念不僅擴大到南方和意大利其余地区的農民群众、而且也擴大到城市中从事劳动和生產的中產階級群众的問題。在这方面，不能講空話，而是要進行仔細的研究，提出綱領性解决办法；这种解决办法要能够打破这些群众在同主張社会主义的政党結成联盟时可能感到的疑懼，以便使他們了解：在我國，鑒于國家的結構，城市劳动中產階級能够而且應該促進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使他們了解他們不致成为他們將参与領導的社会主义社会建設的受害者。

社会主义觉悟

在群众斗争的同时，應該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提高來配合，而这种觉悟不会是自發的，不会是自己形成的。列寧这样教導我們，这个教訓仍然保存着它的全部价值。社会主义觉悟是通过先鋒隊政党所領導的斗争經驗和通过先鋒隊政党進行的活动而在群众中發展的。党應該善于在群众中激發社会主义觉悟并且善于進行教育。它應該有能力从一切斗争中、从取得的一切成就中和从一切失敗中得出必要的結論，从而使所有劳动者都能得到一种新的能力，來了解事物、因而采取相应的行动、團結起來前進。

最后，要完成工人階級本身的任務，工人階級必須有一个革命的政党、一个受革命学說指導的党來領導，这个党必須了解要完成的任務的充分意义，了解怎样去完成这些任务。由于运动發展的歷史条件，可能存在若干同我們党不同的政党，这些政党也像我們一样表示自己是工人階級的政党，它們也像我們一样肯定社会主义理想，而且同我們一样願意充当革命的政党。社会民主党在工人階級中也有一些基礎，而且也表示拥护社会主

义理想。因此，出現了團結問題。正如我已經說过的那樣，應該從互相了解出發，以達到互相信任、諒解和獲致具體協議來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已經同社會黨取得協議從而同它達到了高度的團結，這種團結行動仍然是意大利工人階級和勞動群眾的一個根本成就。我們認為這一成就具有原則性的價值。我同意南尼同志所說的，即這種價值並不在於那些寫下的文件，而在於行動、總方向以及為了實現某些特定目標進行有效合作。然而，假如這種團結行動遭到削弱或者受到限制，更不用說喪失，那末走向社會主義的運動便會受到非常深重的損害。我們將努力使這種情況不致發生。黨怎樣才能實施像我努力扼要說明了內容的政策呢？

在展開的討論中，凡是1946年以來為了確定我黨的性質、組織形式和工作方法而談過的一切問題，都需要深入一步明確起來，如有必要，還要加以修正。組織形式應該達到的目的，是使黨具有最高的能力來同各階層勞動人民建立最密切的聯繫。為此，黨組織形式應該是這樣的：它使黨員有活動的可能並且推動全體黨員活動，以便同各種不同的人民集團建立起更多的聯繫。但是，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重新研究黨的結構，必須更妥善地確定黨內制度是一個民主制度並且按照民主制度來更妥善地運用黨內制度，必須使所有黨員經常地積極地參與解決一切問題。

至於黨的組織結構，我認為在代表大會準備期間，必須認真考察我們同工廠中工人階級接觸問題以及保持這些聯繫的問題；這方面也沒有必要拘泥於舊的組織形式；考慮到工人在工廠內外現在的生活組織方式，如果有必要，組織結構是可以加以改變的。重要的是：應該不斷吸收工人階級日益壯大的新的力量來擴大黨的隊伍，而我們是可以給工人階級指出他們所需要的理想的政治方針和方向的。

关于党内制度，我要再说一遍，在目前的辩论中有许多东西是正确的，但是我也要再说一遍，对于过去的事情，有些判断根本是夸大的。我们来着重指出哪些是正确的，这是尤其有意义的，因为无论是党的领导人，还是全体党员同志，总愿意听到要求党内实行更进一步的民主，愿意看见批评和讨论中有更多的自由。更多的自由和民主意味着，并且应该意味着党员们的活动是日益扩大了，不是仅仅为了服从和为了讨论，而是为了积极地创造性地尽力执行党在各方面的政策。

我读过在罗马举行的那个知识分子会议（指在赫鲁晓夫“秘密报告”透露以前，意大利党和非党知识分子举行的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座谈会。——译者）的记录，而且在我們这个会议上已经有人提到那次的会议。我从记录中没有发现任何可怕的东西、任何骇人听闻的东西。这些记录中，到处都可以看到一片混乱，而不是有秩序的讨论。但是，尽管如此，我们党的生活的这段插曲应该被认为是积极的和值得欢迎的，这特别是因为我希望大家从这当中看出这样的迹象：这一批同志今后将促使党展开更广泛的活动，他们将进一步参加组织生活，因为这是有助于促进党内民主生活、打击官僚主义、专横政治和停滞现象的唯一方法。

在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中，大家也应该讨论组织地方和中央的领导机关问题，以及它们各自的机构问题；假如这些机构的数目很多，假如它们将仅仅由愿意专干党的工作的同志组成，假如要它们很好发挥作用，那末，怎样才能把专门从事党的活动的同志的作用同仍然从事生产的同志的作用配合起来呢？在这方面也许应该重新研究和改变许多东西，从而使党能够顺利前进。大家应该讨论中央机关的工作应该怎样进行。大家还应该考虑是否应该修改中央机关、中央委员会、领导机构、书记处的组成情况和职权。

实际可行的建議

所有这些問題都在認真地負責地加以討論，这是有助于党予以妥善解决的。

我提出下面的实际可行的建議：

在地方党組織中立即开始就这次中央委員會上提出的提綱以及还可能提出的提綱進行辯論；这些組織的領導人要采取必要步驟，使尽量多的同志參加討論。党的日报和刊物要騰出一部分篇幅來报道辯論的進展情况。

由本次中央委員會决定任命兩個委員會（假如今天的會議上或者明天的會議上來不及选举，那末我們可以責成領導機構挑选委員會的委員，把名單通知中央委員會全体委員，并請他們提出反对意見和建議，以便加以考慮）。

第一委員會的任务是研究党的活动、展开这种活动的方式以及活动中發生的問題，以便确定擺在我們面前的新任务。为此目的，这个委員會應該准备出提交代表大会的討論提綱草案。

第二个委員會應該拟訂一个党的綱領性的宣言。

這兩個委員會應該在7月初建立起來，在9月中旬向中央委員會提出它們的結論和它們的文件；中央委員會屆時將对这些文件作出適當修改，然后把它們提交給党，以便全党提出可能提出的修改建議。中央委員會假如認為可行，它也可以把这些文件直接提交党，而不由它自己來整理。因为由它來整理可能造成过于具体的結果，并可能使得党只好批准提交給它的文件。

走向代表大会

應該極其迅速地通过党小組、党支部和省委員會的會議進行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我們不應該重犯同1955年举行的代表大会有关的那种錯誤，我們直到現在还遭受着这种錯誤的后果。

如果从現在起就展开普遍的討論，如果兩個根本文件在9

月中旬左右提出來，我們在兩個月以內就可以舉行各級代表大會以便召開全國代表大會。各級的代表大會上并不需要每次都有領導機構或者書記處的成員參加，黨的地方領導人在各級的代表大會上也不需要每次都深入分析地方情況來列舉出當地行動的地方性問題。

各級代表大會必須討論向它們提出的文件，必須討論將進行公開辯論的那些問題以及將發表的討論提綱和綱領性宣言草案。

同志們，我說完了。我在報告中提出了一系列問題。我並不認為我已經研究了可能在籌備代表大會的辯論中被提出來的全部論點。不過，這总算是一個開端。現在要全黨向前邁進了。我們有能力向前邁進嗎？我是深深相信的。在這次中央委員會會議上就第一項議程進行的辯論本身，就証明了這一點。這次辯論是認真的、生動的、深刻的而且始終具有應有的水平；大家放棄了只是到這里來就地方事件作一些彙報情況的敘述的作法，相反地為深入探討今天出現的一切問題提供了有效的幫助。顯然，在籌備代表大會的普遍辯論中必須列入選舉結果的問題並且就這種結果進行辯論，因為實質上這是黨的工作和鬥爭的一個偉大經驗。我深信我們黨有能力規劃出適應於我們所面臨的形勢的一些態度，規定出一些正確和明確的目標，並且利用共產主義運動的國際經驗和我們自己的經驗來認真、有效地進行自我批評。但是我們不要忘記：單單目標明確是不夠的，要達到這些目標並且向前邁進就必須善於工作、鬥爭和戰鬥。

因此，我們必須討論怎樣作出貢獻來增加黨的這種能力，使我們的頭腦更加清醒，決心更加堅決，使黨的團結一致比以前更加鞏固。如果我們依照這種精神來進行討論和工作，可以確信不久即將舉行的代表大會將使黨向前邁出新的、巨大的一步。（中央委員會委員們起立，對陶里亞蒂的報告予以長時間的鼓掌）

比利时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议

(原载1956年6月26日比利时“红旗报”)

比利时共产党中央委员会6月23日和24日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虽然没有获得赫鲁晓夫同志关于对斯大林批评的演说的正式文本，但是认为：它所掌握的材料促使它发表声明如下：

一、中央委员会认为：现在在社会主义各国以及全世界共产主义人士和进步人士中间进行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所开始的讨论，虽然有着令人痛苦的方面，却具有对于一切争取和平胜利、社会主义胜利的人们极为密切有关的因素。

依据这种看法，中央委员会认为：若干兄弟党最近表示态度，特别是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同志最近表示的态度，对于已经在进行的讨论是重要的贡献。

中央委员会希望：正在全文刊载美国国务院所发表的文件的工作和民主报纸，以客观立场把关于所讨论问题的一切其他文件同样让它们的读者知道。

二、中央委员会认为：在苏联所犯的破坏革命法制和社会主义民主准则的一切行为是不可容忍的。

苏联共产党是第一个引导苏联人民走向对资本主义取得最后胜利的党。资本主义世界对苏联共产党抱着不可调和的仇恨态度，这就说明使得那些严重错误成为可能的夸大不信任的气氛形成的原因，虽然并不因而就可以证明这种气氛的形成是正确的。

三、中央委员会承认：比利时共产党在热忱地为维护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正确斗争的时候，对产生今天已经揭发的可以避免的过分行为的可能性没有予以足够的注意，是错误的。

苏联共产党人和各人民民主國家共产党人坦率承認錯誤，比利时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此感到欣慰。

它深信：对于錯誤根源加以認真探討，將加強已經采取的使錯誤不致重犯的措施。

中央委员会認識到：在勇敢揭發錯誤的同时，社会主义各國在比利时社会党劳动者和党员中間的威望也提高了。今天，越來越多的比利时社会党劳动者和党员承認社会主义生產制度的优越和勝利，并且承認它所意味着的对人类幸福的巨大貢獻。

中央委员会認為：社会主义世界目前的事态發展中含有足以增進比利时劳动者反对資本主义、維護和平、爭取社会進步發展的斗争所不可或缺的團結行动的重要因素。

四、中央委员会認為：社会主义國家在經濟、社会和政治方面所獲得的輝煌成就——現在差不多大家都已經承認这些成就——以及特別是挫敗反和平陰謀的和平共处思想的勝利，是人类向社会主义勝利前進中的令人振奋的因素。

苏联共产党万歲！

比利时劳动者依据勝利的馬克思主义——迅速而不可抵擋地走向社会主义的保證——而團結万歲！

奥地利“奥地利人民之声报”社論： 在我們党內的討論經過

(1956年6月26日)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會議和結果，在全世界共產主義运动中喚起了廣泛的討論。共產黨人在這几个月內，不僅在討論大會揭露出來的关于个人崇拜所造成的影响的事实，而且也在討論一些新的观点。这些新观点是这次代表大会上关于阻止战争的可能性和走向社会主义的新途徑的可能性、关于工人統一和工人运动的許多其他的基本問題而制定出來的。各國共产党都在進行廣泛而有益的創造性的討論。

我們奧地利的共產黨人也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對這些問題立即开始了討論。但是不久以后展开的緊張的競选运动，迫使我們中斷了討論，而須要將党的全力集中在競选上。5月13日以后的短短数日內，奥地利共产党中央委員會举行了全体會議。在會議中研究了选举結果，審查了党在競选中的态度，并对今后党的工作和斗争的結論進行了討論。自然这种根据我党主席科普列尼希同志的报告而進行的討論，已成為嚴格審查我們党过去政策的开始。而中央委員會在討論今后党的任务中，也力圖从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結果对奥地利工人階級的斗争的影响作出相应的結論。中央委員會決定將中央委員會全体會議所开始的討論，立即推廣到各級党組織中去。全党干部和黨員討論的結果，將在下一次中央委員會會議上加以總結。

除此以外，中央委員會還決定在我們党內和在全体工人階級中准备討論关于在奥地利通过和平——議會的道路進入社会主义的可能性。

決定作出以來，全奧地利的共產黨人正在黨員集會、幹部會議和積極分子會議上討論所有黨的工作和政策問題。有數千共產黨人作了發言。他們熱烈地討論了黨的全部政策。我們過去政策中的許多問題得到了批判性的審核，缺點和錯誤被人不留情面地指出來了，對今後黨的鬥爭提出了許多寶貴的建議。在討論中，表現了對黨的熱愛，表現了制定我們今後政策的努力。有時候也出現了嚴厲的言詞，不是所有的話都是完全正確的，但是這也不可能有別樣的做法而且是沒有損害的，如果這種批評是為了幫助黨而使它向前發展的話。討論的實質就是要在爭論中使積極正確的一面獲得勝利，從而導致全部工作的改善。

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問題，自然也在奧地利共產黨人的討論中起着決定性的作用。共產黨人以熱烈而極其嚴肅的心情來討論個人崇拜的影響和後果，他們尋找何以能在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中發生這樣重大錯誤的原因，因為這些問題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中尚未獲得完全澄清。我們奧地利共產黨人認為，必須繼續執行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以前就已進行的並在代表大會上所決定的措施，從而為將來造成牢固的保證，以阻止這種極度違反社會主義本質的現象永遠不再發生。敵人報紙發表了赫魯曉夫同志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所做的關於個人崇拜的後果報告的不可考查的細節，由於這一事實，奧地利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已經在不久前就這一問題致函蘇共中央委員會，並請它將這一文件提供我們黨參考。我們奧地利共產黨人認為在處理這樣具有巨大國際意義的問題時，所採用的形式和方法也應該照顧到資本主義國家共產黨的鬥爭條件。

工人運動的敵人妄想在今天各地共產黨人所進行的嚴肅的討論中獲得好處，這是徒然的妄想。我們共產黨人將借助討論來克服我們工作中的錯誤和弱點，我們將在新方式下同社會黨人建立更好的關係，更有成效地為實現工人統一從而為社會主義的勝利進行鬥爭。

荷蘭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會議公報

(原載1956年6月27日荷蘭“真理報”)

荷蘭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6月23、24、25三天舉行了會議，估價大選的結果。

荷蘭共產黨總書記格魯特同志在會議上發表了開幕講話。中央委員會決定公布他的講話。同時，中央委員會還決定提前召開黨代表大會，議程如下：

一、同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有關的蘇聯國內的變化；

二、討論共產黨的工作方法；

三、選舉中央委員會。

格魯特同志在開幕講話中指出，這次選舉構成了天主教黨和其他右翼黨派的失敗，因此，可以認為，在目前階段，成立右翼黨派執政聯盟的問題就根本不存在了。已經發生了向左轉的趨勢，這是違背以德里斯為中心的勞工黨領導集團的願望的。勞工黨領導集團從來沒有期望這種勝利，甚至害怕這種勝利。

不但如此，關於組織內閣的初步消息，看來反而表明，勞工黨又在忙着把他們在選舉中的勝利出賣給反動分子。

德里斯打算成立一個五黨內閣，他這種打算不會使荷蘭目前所面臨的任何一個問題獲得解決。

荷蘭共產黨應該進行努力，進一步促進這種向左轉的趨勢，以期準備成立左翼政府的條件。一旦德里斯的半吊子的解決辦法證明無效以後，那末這種政府是勢必要成立的。

格魯特同志在講話中提到了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所提出的問題，特別是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領導的批評所提出

的問題。

他提到了廣泛談論的陶里亞蒂談話和法國共產黨政治局的聲明，並且表示意見說：

“它們沒有觸及問題的核心。我認為，我們也必須了解蘇聯共產黨所處的地位。”

他指出，在擊敗了希特勒以後，蘇聯立即面臨了美國發動原子侵略的危險，必須進行巨大的努力去對付這種危險。

“當我們不僅讀到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大戰期間和大戰以後的極其緊張的時期內的濫用權力情事所發出的埋怨，而且也讀到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所提出的關於蘇聯人民生活水平的報告的時候，我們就會了解，因此而付出的代價是什麼了……”

他又說：“但是，西歐的工人階級，更不用說美國工人，究竟為反對原子戰爭的威脅作了什麼事呢？

我國的工人階級作了什麼事呢？

在1920年，西歐的社會民主黨倒仍然是出力制止對蘇聯進行干涉的。可是，現在它們在作什麼呢？

它們曾經盡力支持杜勒斯等人準備原子戰爭，目前仍然在這樣作。

要防止原子戰爭，進行宣傳和舉行和平大會是不夠的。

要作到這一點，必須對各國政府發揮影響。假如某些具有決定作用的國家（例如法國和意大利）的共產黨人組成了民主政府，並且使工人階級和他們的國家脫離美國原子戰爭煽動者的控制而獲得自由，那末，蘇聯國內的情況不是就會完全另有一番面貌了嗎？

因此，我認為，資本主義國家的共產黨人在這一方面應該溫和一些。

讓蘇聯關起門來洗髒布吧。赫魯曉夫所提到的濫用權力的事件，已經秘密了幾十年，因此，我們目前無法對它們進行判

断。”

格魯特指出，應該根据苏联的政策和結果來判断苏联，并且指出，共產党人对任何地方（包括荷蘭）所發生的濫用权力情事都是譴責的。接着，他又說：

“我們必須这样教育我們的党和一般群众，以便使我國不可能發生任何这种濫用权力的事。

在荷蘭，能够而且必須在完全不同于俄國当年情况的一种情况下進行爭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僅僅从这一点看來也就可以看出我國不会發生这种事情了。”

格魯特最后指出，荷蘭共產党人还没有从这种不同情况中得出充分的結論來，处理这个問題是提前举行的代表大会的任务。

荷蘭共產黨總書記格魯特
在荷蘭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會議上的講話：

向左轉的趨勢在繼續發展中

(原載1956年6月30日荷蘭“真理報”)

必須修改黨的結構和工作。對於
蘇聯國內發生的變化的態度

荷蘭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6月23、24和25日舉行了會議，討論選舉的結果和蘇聯國內所發生的變化。

在這次會議上，黨的總書記保羅·格魯特致了開會詞。黨委員會經過詳細的討論，決定主張成立左翼的政府。同時，也決定在今年9月召開荷蘭共產黨第十八次代表大會。這次代表大會將要討論蘇聯國內所發生的變化，討論荷蘭共產黨的工作，並且選舉黨委員會。

保羅·格魯特在開會詞中首先指出，在這次選舉中，我們的黨的目的仍然是制止公開的反動派的攻勢，並且制止羅麥所指揮的政府里面的最囂張的一部分反動派。

這種目的是必要的嗎？對於這個問題，保羅·格魯特回答說：是的。關於以羅麥為首相的右翼內閣對於勞動人民具有着什麼意義，我不必多說。這種危險已經被扭轉過來了。天主教人民黨並沒有像它的獨裁領導人物們起初所預料的那樣成為第一大黨，同時它的盟友基督教歷史同盟和反革命黨也遭受了失敗。因此，右翼的聯盟就組不成了。

這次選舉清楚地表明了群眾反對右翼而向左轉。這是我們

党多年來不斷地向群众提出的联合一致反对罗麥的政策的成绩。这个政策对劳工党的支持者產生了很大的影响。它使劳工党同罗麥進行斗争，違反了以德里斯为首的領導集团的意志。德里斯并不想進行这样的斗争。他事先就說，天主教人民党不可避免地將成为最大的党，如果劳工党能够保持他們的 1952 年的地位，他們就應該感到滿足。

在和反动派進行的斗争中有一种典型的失敗主义表現于若干劳工党領袖在“弗里斯郵报”上所作的預測中。預言估計最低是二十九席，最高是三十二席。德里斯和他的同党對他們自己勝過罗麥感到恐懼。

虽然如此，向左轉終於發生。劳工党現在對於組織內閣和制定政府將來政策負着主要責任。

选举的結果已大大改变了我們國家的地位。工人為他們切身利益和为和平外交政策而斗争的条件已經較為有利了。第二院中新的力量的对比使得它能够缓和緊張局势的外交政策和進步的內政政策基礎上拟定政府的綱領。劳工党現在有机会做到这一点。

出賣选举的勝利

可是，在組織內閣时，德里斯的初次表現有理由使人憂慮。左翼政府，即使是最温和形式的排斥極右的罗麥和齐尔斯特拉集团的綱領—政府，也應該抵抗大資本家的要求和美國的增加軍事負擔的要求。

这一点德里斯顯然是想避免的。他願意幫助执行反动派的政策。但是他不想由劳工党在制定政策中負最大的責任。他想掩護自己不受人民大众和他自己党的攻击，借口說劳工党現在在政府中還沒有足够的勢力實現左派选民的願望。他又願意給罗麥在决定政府政策方面以巨大的影响。但是他竭力不是直接地这样做，而在廣泛基礎上包括自由民主人民党在內。

由此看來，德里斯又在把勞工黨的選舉勝利賣給反動派。

當然組織政府的事還處在初步階段。可是已經可以充分明顯地看出，德里斯想要組織一個五黨內閣的嘗試將不能解決我們國家所碰到的任何問題。這樣的一個不倫不類的內閣將不能阻止群眾向左轉。相反地它將加劇勞資雙方之間的緊張狀態，特別是在勞工黨本身內部的緊張狀態。格魯特說，我認為，我們有必要繼續倡議組織一個把極端反革命的黨派的羅麥和齊爾斯特拉排斥在外的政府。我們願意支持勞工黨組織這樣的一個政府。如果在今天不能做到這一點，我們將必須繼續追求和繼續為這個問題而努力以便在德里斯的中間解決辦法擱淺（這種情況將一定會發生的）之後為組織一個左翼政府進行準備和使它成為必然要發生的事。

爭取建立一個左翼政府

在羅麥的那本宣布反動派發動攻勢的臭名遠揚的書出版以後，我們提出了“聯合起來反對羅麥”的口號。我們在選舉之後更加強烈地強調了這一點，並且不顧天主教人民黨在選舉期間的恐怖行動。

在這種新的情況下，我們應該用“爭取建立一個左翼政府”的口號來代替“聯合起來反對羅麥”的口號。

對於這一點，我們提出如下的一些要求：裁減軍備、緩和國內和外交方面的緊張局勢、由於物價和房租上漲和扣養老金，應該提高工資以為補償、積極提倡建立住宅和給予荷蘭共產黨以全部的民主權利、解除官員們的禁令，取消在陸軍和海軍、在市政機構、在電台方面的歧視和取消公安役。

在這裡，必須和加強對勞工黨右翼領袖的積極批評聯繫起來，我們必須經常提請這些領袖注意他們必須執行他們的選舉諾言這一事實。

荷蘭共產黨喪失選票的原因

這次選舉使羅麥倒台，群眾向左轉。格魯特說，但是我並不認為這次結果是我們所期望的，是本來可以得到的那種結果。如果我們在議會中的地位同時有所提高的話，就會使左派的勝利更有決定意義，更肯定。情況並不是這樣，在1954年我們得到283,486票，在1956年得到272,167票。因此我們的選民比1954年減少了11,329人。我們也沒有得到新增加的選民的票，雖然我們保持了那部分和我們合作的人。我們的敵人和以往一樣，顯示了他們的恫嚇政策，他們說我們失去了兩個席位。實際上，我們失去第二個席位是由于調整剩餘席位的制度，這種制度對於小黨派是不利的。

占有這四個席位將只是一兩次會議中的事。在9月間我們將一下子達到七個席位，因為在擴大院的時候要從新分配席位。如果我們現在已經有五個而不是四個席位的話，我們就不會有七個以上的席位。但是對我們來說最重要的不是席位的數目而是影響。因此我們在這裡必須分析我們在選舉中後退的原因。格魯特在這裡提出了三個問題：

一、總的原因是什麼？

二、我們在十八個選區中的七個選區中取得進展，而在其他的選區沒有進展，特別是阿姆斯特丹和荷蘭北部的選區中喪失了許多選票，這一方面的特殊原因是什麼？

他繼續說道，此外，我認為我們已經達到我們必須確定問題的核心並且提出這個問題的地步：我們的黨仍舊停滯不前的原因是什麼。現在共產黨的政策總的來說，在威信方面來說，是勝利的；并把勞工黨的黨員群眾爭取過來，我想，這種情況是和平政策和反對羅麥的行動所造成的。

景气时刻和冷战

这一次我们必须在对我們党特别不利的情况下进行选举行动。选举是在经济景气空前高涨的时候进行的。这种景气已经持续相当时候了。事实上剥削是空前的大，但工人們的購買力是恢复了。大量需要工人給人一种虛假的印象，認為生活有保障了，特别是对从沒有經歷过嚴重危机的年輕一代的工人。老板們不得不放弃若干收益(3%到6%)給工人。在自由工資制度下，这种增加到工人階級手里的只是一部分。但是許多人剛在选举前还是得到了一星期半的工資。具有决定性的工人群，例如在重工業中的工人，則增加了6%，并獲得休假日的延長等。謝洛夫体貼地保証其他工人也可得到6%的增加，并且还有养老金法律，这是一个改善。景气时刻容許作这样的讓步，劳工党認為这种讓步是它的功劳。但是老板并不是白白地送人家东西的。賬單是后來的，是采取了提高物价的形式，齐尔斯特拉曾用各种詭計压住物价一直到了选举以后才讓它上漲。賬單又采取了提高房租和扣养老金的形式。这个选举又証实我們所說的真理：只要資產階級掌握經濟权力，并使用經濟权力的影响，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总是虛假的。另一个因素是我們國家中正進行着冷战。一切緩和緊張状态的征象在选举日子之前都被小心地放在一边了。

肆無忌憚的宣傳

在另一方面，對我們党進行了肆無忌憚的仇恨宣傳，自從在1939年和里賓特洛甫的條約上的臭名昭彰的自由、勞工、面包的宣傳以來，這是最肆無忌憚的宣傳。

我們現在回過來談談赫魯曉夫的報告，赫魯曉夫的報告是這種宣傳運動中所談論的題目。我們現在要來分析一下，且不顧對我們所進行的宣傳，是根據着最無恥、最驚人和最邪惡的欺

騙的。

举例來說。波恩的报刊上說，斯大林謀殺了自己的妻子，赫魯曉夫說斯大林是專制暴君。荷蘭“自由人民報”也有一條標題說：斯大林是劊子手、謀殺犯和專制暴君。就在選舉以前，華盛頓的國務院公布了一份稿本，我們在法國和英國的同志們承認它看來很可能就是真本。

在那上面寫的恰好同這種說法相反。

所謂什麼謀殺、什麼妻子，原來是斯大林的一次爭吵，而且不是同自己的妻子，而是同列寧的妻子克魯普斯卡婭在電話中的爭吵。根據這份稿本，赫魯曉夫曾經強調地說，斯大林不是一個專制暴君，斯大林認為，他為了革命的利益而不得不這樣做。在其他許多問題上也有類似這樣的情況。

我們的敵人打算通過這種宣傳運動破壞我們整個的黨，我們的主義，我們的全部鬥爭。他們無耻地利用他們對於廣播電台的壟斷，利用他們的報紙的强大力量。

從德國國會縱火案和剝削階級所採取的其他這樣一些挑釁事件，我們知道，利用這種方法是可以毒化整國整國的人民的。但是這使我們，正直的政治鬥士們，更加有責任去毫不留情地揭露和譴責這種罪惡的作法。我們也有權利號召其他的人，那些自稱為進步分子的人擔負起責任來。

說起來是有閱讀能力，而且事實上是由人民付出代價而得到機會來掌握這種藝術的知識分子，通過比較一下——举例說——美國發表的本子和佛斯克爾的文章以及“自由人民報”和“口號報”的新聞稿，一定已經看出，公眾受到了可耻的欺騙，在這種可耻的欺騙方式下，甚至最起碼的誠實和道德標準都被拋棄了。甚至路透社在選舉前夕所報道的這篇演說的一些片斷也是絕對不真實的。但是到現在為止沒有一個勞工黨的道學家，沒有一個所謂民主人士曾經表現這麼大的勇氣來同這種可怕的強盜政策決裂。

正相反，他們對於用這種卑鄙的辦法使得我們的黨失去了選票從而使羅麥得到利益的情況非常高兴。讓他們因此高兴吧。

這更使我們相信，一個必須求助於這種背信行為的階級在道德上是破產了，當被欺騙的群眾的眼睛睜開了的時候，這種行為將加速他們的復亡。

宣傳中的弱點

當然，我們失去選票不應該完全歸咎於就赫魯曉夫的演說而在進行着的誹謗運動，雖然無疑這對於我們的許多選民是有影響的，尤其是對於我們的黨不再能夠通過我們的報紙進行日常聯系的選民。

原來一般預料，勞工黨會受到損失，因此，一個由羅麥組成的內閣是一個直接的威脅，我們從許多方面這樣聽說，由於害怕這一點，許多選民才投了最大的左翼政黨勞工黨的票。

我們在我們關於選舉宣傳的討論中曾經提到這種可能性。我們曾說：為了阻止羅麥當政，你們必須支持共產黨，我們曾指出有必要加強我們自己的黨。

但是我們沒有能說服所有支持我們的人。那些選擇了勞工黨的人，在讀了關於德里斯組閣嘗試的消息以後一定已經注意到他們是犯了多大的錯誤。

在另一方面，機會主義傾向在我們黨內也有它的影響。在我們以前的歷史上曾經發生過這樣的事。在1937年，當穆塞爾特的NSB黨一躍而為選舉中的一個大黨時，我們曾把我們的主要鬥爭針對穆塞爾特。那時也曾有黨員們對群眾們說：只要你們反對法西斯，投誰的票都沒有關係；結果穆塞爾特沒有被選入議會，但是我們也失去了一個席位。

後來，看來政治上的收穫對於我們進一步的鬥爭是有決定性的。但是選票的損失在那時並不是不可避免的，正如現在不是不可避免一樣。

因此，我們宣傳中的一个弱點也是，我們沒有把我們的黨放在第一位。

在反對羅麥的群眾運動的前列

在好些地區已經舉行的情況報告會議上，提出了下列的問題。首先是有人認為，我們的主要攻擊對象不應當是羅麥，而應當是勞工黨，因為勞工黨不是左傾的，而是右傾的。他們說，自由民主人民黨也是一個右翼政黨。

這種缺乏政治了解和宗派情緒，仍舊始終是我們腿上的沉重負擔。可是儘管有這種言論，我們却得到了社會黨工人——其他的人中還有教師——對我們的政策表示歡迎的情況的充滿希望的報告。有些同志說，他們同社會黨人談了話，社會黨人說，如果他們在事先知道羅麥不會勝利的話，他們是會投荷蘭共產黨的票的。

在一個工廠里，我們黨的一個重要黨員原先預料社會黨工人會對他發出笑聲。但是恰恰相反，他們表示贊同我們黨的鬥爭，這個鬥爭曾經促使羅麥下台。

這些事情表明，現在群眾間存在一種反對羅麥的趨勢，群眾希望不惜冒一切危險來擊敗羅麥。宗派主義者說，我們的黨應當反對這個群眾趨勢，應當使大家看出德里斯和羅麥是一幫人。

但是，我們仍舊認為，共產黨的責任是站在反對最危險的反動集團的群眾運動的前列。並且作出一切努力來達到這個共同目標。

此外，我們還聽到有人說，我們的一致行動消除了社會黨工人對我們黨很多的敵意，並且他們開始認識到，我們彼此同根相連，我們黨是在為全體勞動人民的福利而鬥爭。

不需要強調這一點的意義，雖然是不但在一致行動的發展方面，而且在更好地了解我們為反對我們的受美國指使的勞工黨領袖的政策而提出的論據方面，這還只是一個開端。

因此，我們反對那些利用我們喪失選票的情況製造武器來在黨內反對這樣的政策的人。

現在，發言人談第二個問題。他提到一個地區取得的進展和另一個地區受到的損失。他談到黨的地方組織的工作。

与苏联的关系

現在，他談到第三個問題：過去幾年停滯的一般趨勢。他談到同蘇聯的關係並且說，不論列寧或斯大林都從來沒打算過輸出蘇維埃革命。他們激烈地反對這樣一種主張。

奪取國家權力和實現社會主義只能是，而且絕對只能是社會主義戰士在他們自己國家進行鬥爭的結果，這是內政問題。

有人責罵資本主義國家里的共產黨是莫斯科的分店，必得服務於蘇聯的利益和領受莫斯科的命令，這種話並不是初次聽到的。

甚至在1921年干涉戰爭在進行的時候，英國的反動派就製造了這種論調。列寧這樣地作了回答：

紳士們，你們錯了。即令你們把蘇聯消滅掉，你們國家里的革命也是阻擋不住的。它從你們自己的制度中生長出來，甚至是在我們俄國布爾什維克一指不染的時候。

我願意先提醒你們這一點，然後再來開始談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意義，特別是赫魯曉夫的批評斯大林的演說。

你們都知道，我們現在並沒有這篇演說的正式稿本。陶里亞蒂發表的談話中和法國共產黨政治局向俄國共產黨發表的一篇聲明中，都要求發表一份準確的稿本。

陶里亞蒂提出了進一步的問題，俄國共產黨人怎樣解釋儘管有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領導提出的種種責難，蘇聯仍然取得了這樣巨大的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成就。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批評斯大林的方式，的確對我們有害。反共走狗正開始像瘋狗般的狂吠，這自然不能怪蘇聯共產黨。

但是，這個問題處理的方式使得我們完全不可能像我們本來願意的那樣去答复他們——至少是不能夠根據赫魯曉夫演說的正式稿本來給以正式的答复，但是主要是那篇批評的內容。我們已經就這個問題召開了一次黨的委員會會議。格魯特接着說，我認為，我們在我們的4月10日的決議中所說的話，看來是公正的。我只希望補充這一點：如果我們承認在華盛頓發表的那份稿本多少近似于真本的話，那麼，這篇批評就不具有我們本來對這樣一個最負責的蘇聯共產黨領袖所期望的那樣高的水平。

特別是過多的強調了消極的方面，——不管演說中所說的事實是多麼令人憤慨和令人遺憾，——對斯大林的功績談得太少。

陶里亞蒂還說，赫魯曉夫對蘇聯共產黨目前的主要領袖給予斯大林的合作沒有提供說得通的解釋，他也沒有解釋他們為什麼這樣歌頌他。

因此，在這個問題上已經開始了一次公開辯論。

共處還是原子戰爭

我們在這個問題上的態度是什麼呢？自然，意大利共產黨和法國共產黨提出的問題是能夠理解的，我們在討論中也提出了同樣的問題。

但是，這些問題不會觸及這個問題的核心。在我看來，我們也必須很好設想一下蘇聯共產黨所處的地位。對蘇聯共產黨二十次代表大會的全部討論，特別是對引起普遍討論的赫魯曉夫講話的討論，正環繞着這樣一點來進行：

只有兩條道路，或者是和平共處，或者是有史以來的最具有破壞性的戰爭。沒有第三條道路！

這是他們有責任必須解決的重大問題。這個問題在1945年以來就已經存在了。在反對希特勒的戰爭中他們不得不作出最

大的和非凡的努力，就在这以后，苏联又必須考慮以美國为首的西方資本主义國家的原子武器進攻的可能性。

苏联已經对付了这种可能性。至少可以这样說，苏联在外交和軍事上已經能够达到这样的地位，因而战争的威脅已經大大地給推迟了。

如果我們不僅僅只听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战争期間和战争以后这些非常緊張的时期濫用职权的不滿，也讀一讀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对于苏联人民生活水准的自我批評的話，那么，我們就能够明白，这一切是以什么作为代价的。

不錯，人民民主陣营的億万人民已經加强了社会主义陣营。

中國也在力量对比上增加了很大的力量。但是西欧工人階級，且不談美國工人，在反对原子战争威脅方面做了些甚么事呢？我國的工人階級做了些甚么事呢？

在1920年，西欧的社会民主党倒仍然出力制止对苏联進行干涉的。但是它們現在在做甚么呢？

它們曾經竭力支持杜勒斯和其他人准备原子战争，而且現在仍然在繼續这样做。

共產党做了甚么呢？为了防止原子战争，光是進行宣傳和举行和平會議是不够的，我們必須对各國政府發揮影响。

如果当初共產党人在像法國和意大利这样一些有决定意义的國家中使得工人階級擺脫了战争販子的支配，建立了政权的話，苏联的情况不是就会有很大的不同嗎？

因此，我認为資本主义國家的共產党人不要太过份。讓苏联自己來洗自己的髒布。赫魯曉夫所提到的濫用职权事件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瞞着不讓公众知道。甚至到現在，我們还是不能判断具体的事实。

在列寧領導苏联的时候，我們对苏联的判断是根据苏联取得的成績和苏联的政策。在斯大林当总書記的时候我們也是这样做的。在今后，我們也还是只能这样做。

我們極堅決地譴責在國內和在黨內濫用職權。在任何情況下，我們都譴責在荷蘭國家內濫用職權，和荷蘭殖民主義資本家在印度尼西亞和任何其他地方的行動中濫用職權。

我們必須教育我們黨和人民群眾，使得濫用職權的情況——在將來也是一樣——決不會在我們國家發生。這肯定是會發生的，即令僅僅是因為在荷蘭是能夠並且必須在完全不同於俄國的情況下進行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

鬥爭的方法和形式不可能是一樣的

這是討論中最重要的一點。馬克思列寧主義是以這樣的理論為基礎的：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有某些因素在以前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所有國家中是一樣的。

但是鬥爭的方法和形式不可能是一樣的。列寧早在1921年就對俄國之外的各國共產黨人着重指出了這一點。

中國共產黨之所以取得勝利是因為它沒有仿效蘇聯的榜樣。在很久的年代中，中國共產黨受到了把俄國革命的方式搬到中國的傾向的阻礙。結果只是失敗和損失。最後，中國共產黨在付出重大代價之後找到了它自己的道路。

關於走向社會主義的荷蘭式道路的思想已經在1952年正確地採納到我黨的新的綱領中，但是我們並沒有把這種思想運用到黨本身方面去。

關於黨的列寧主義理論的基礎就是必需建立一個能夠適應帝國主義時期鬥爭的條件的新型的工人階級的政黨。這是同社會民主類型的黨相對立的，後者是資產階級類型的政黨，資本主義的壟斷資本可以通過它打入到工人的政黨中去。

無論如何，我們不可能拋棄這一系列主義的原則。但是，這是不是說工人階級的黨必須在一切國家中絲毫不苟地應用同樣的方式和方法而不顧黨和工人運動的環境和發展階段呢？

我們的情況就是後者（即應照顧到黨和工人運動的環境和

發展階段——譯者)。苏联共产党成立起来以后首先是对沙皇专制进行非法的斗争，后来进行内战，之后强力建立社会主义基础，以后又进行反对希特勒的战争；在这次战争之后，还要保卫国家免受美国的原子弹侵略。

在占领期间，我们也从共产党反对沙皇专制的斗争的经验中得到好处。但是在近年以来，我们的目标同苏联共产党的目标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的目的是——而且在一个很长的期间内将仍然是：保卫、扩大和更新民主，从美国支配下解放出来重新获得民族独立，同社会主义国家共处，保卫工人的生活条件以及为反对大垄断资本家的权力而斗争。

这是在荷兰争取实现社会主义的斗争的第一个阶段，而这一阶段是不能跳过去的。党必须记住这一点。这也就是在占领期间在我们之中已经成熟的思想，这种思想曾经产生了使共产党在1945年不恢复它的战前的老形式而是进一步建立在战争期间集结起来的力量上面的首创精神。

在创办“真理报”运动那些期间曾经犯过了错误，虽然只是因为做事太性急而犯的。

现在我们必须了解到这一事实，党的更新的基本思想是健康的。

然而，像现在这样工作着和生活着的我党，是受到一种组织计划的启发的，而这种组织计划是从前斯大林的著作中为苏联党规定的。但是我们的任务和工人运动的发展是与俄国不同的。

我们党的发展和工人运动甚至于和法国、意大利或其他国家也是不同的。因此是不能划一的。

同样，一种组织上的联系也只能是有妨碍的，而且实际上，自从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以来已不再存在这种联系了。

然而，这并不是意味着在我党、苏联党和其他國家的党之間不应该存在团结。国际团结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的主要力量。这种团结是建立在共同理想、共同思想和维护和平的共同任务的基础上的。

我们的影响越是增长，这种团结也就越有真正的意义。

我们的敌人說我們的党是“克里姆林宮的一个附属机构”，这只是一种誣蔑。

但是另外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他們能够使許多人相信这种誣蔑呢？这是我們應該考慮的一个問題。因此，对所有这些問題有必要根据荷蘭的情况檢查一下我們党的整个工作作風和全部活动。

在这方面，我們的指導原則只能是馬克思列寧主义，因为这是所有公式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敌人。我們必須研究这些問題，以便根据荷蘭工人运动的政治發展和上述下一时期的任务檢查我們党的結構和活动方式。

在这方面，还应该重新考慮我們党和工会之間的关系。这些就是我們下一次代表大会的任务。

挪威共產党中央委員會書記李皮： 关于赫魯曉夫報告的討論

(原載1956年6月27日挪威“自由報”)

赫魯曉夫在蘇聯共產黨代表大會秘密會議上所作的報告在資本主義國家公布，已經在很大程度上使得討論赫魯曉夫報告中所提出的問題成為困難的事了。

美國國務院所公布的這篇報告的稿本，是在代表大會結束以後兩個多月才被人們知道的。這使得許多人認為它是一個同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的其他任何東西都毫無關連的文件。

假如人們從這種觀點上來看這份文件，那麼它就必然會發生片面的影響。

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意義是大大超過這一次秘密會議的。代表大會向整個社會主義世界提出了一個總結，一個表明了巨大的成就的總結。社會主義改革的勝利，經濟、社會和文化方面的重大進展，社會主義擴展到擁有幾億人口的許多國家，社會主義世界所進行的爭取和平和緩和緊張局勢的鬥爭——這一切都對於提供蘇聯的發展全部面貌具有決定性意義，具有完全的決定性意義，因此，當然是不能漠視不理的。

不但如此，事實上，代表大會的討論和決議都部分地表明了，部分地決定了許多各種各樣的措施，以改進缺點，糾正錯誤，並且在很大程度上提供了防止重犯的保證。

必須把這一切看作一個整體。假如一個人對秘密會議報告不考慮到這一點，假如一個人僅僅考慮這份報告，那末他對蘇聯發展的了解就會是十分歪曲的。

同样，对于怎样会发生这些错误、缺点和侵犯权利的事以及为什么长期容忍这些东西的问题也就不可能找到正确和全面的答案了。

代表大会没有而且也无法通过确切的决议来确定为了完全消除赫鲁晓夫报告中所提出的那种情况而必须采取的一切措施。但是，在代表大会以后，我们已经看到党和政府作出了一些决定，贯彻代表大会奠定下基础的那条路綫。

同样，代表大会也无法一下子断然处理在批判性地估计过去的时候所提出的全部问题。尤其是在打破教条主义，打破理论和根本方面问题的错误提法这个问题上，代表大会就只能是一个起头，讨论和处理这种问题的过程要继续下去。而这种讨论和处理方法是不能仅仅限于苏联共产党的。这种讨论直接关系到各国共产党，关系整个社会主义世界运动，因为其中包括对于各国劳动人民都具有根本意义的问题。

赫鲁晓夫在秘密会议上的报告，主要是牵涉到了三个根本性的问题。它谈到了苏联共产党集体领导原则遭到破坏、苏维埃民主制度的基本原则的遭到破坏和个人崇拜问题。

对于上述最后一个问题，必须立即附加上一点：如果不使“个人崇拜”仅仅成为一种提法，那末就必须更加确切地加以说明。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对于个人作用的解释，社会主义运动领导者和支持这些个人而以他们为领导者的群众之间的关系的问题。

赫鲁晓夫报告的主要内容是谈论斯大林这个人的。它详细地讨论了斯大林的缺点、弱点、错误和侵犯权利行为。这篇报告叙述了这一切，并且描绘了这一切。但是，它更多地是一份控诉的文件，而不是评价的文件，它是一种感情激动的抨击，不是一篇冷静的分析。

在不小的程度上，正是由于这种缘故，讨论就停滞在尚未获得解答的这样一些问题上了：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呢？发生这种

事情的原因是什么呢？

現在，有些人認為，解答這些問題完全是蘇聯共產黨和它的領導人的任務。提出這種看法的原因是：赫魯曉夫報告中所敘述的情況，資本主義國家的共產黨和領導人是完全不知情的。

這種說法並不是絕對正確的。誰也不能夠認為，資本主義國家的共產黨沒有看見、沒有觀察到譬如說崇拜斯大林這樣的事，或者說我們也沒有感覺到處理我們的運動中的根本性和理論性問題的時候的缺點。事實上，早在1950年，正是以英國共產黨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共產黨以新的、正確的方式提出了沿着不同的道路走向社會主義的問題，甚至也在它們的政綱和根本性的宣言中提到了這種看法。

但是，雖然資本主義國家里的共產黨人早些時候的確已經發現和覺察到現在才被弄清楚的一部分錯誤，他們採取了同蘇聯共產黨人所採取的同樣的態度。蘇聯的敵人的不斷攻擊的目的在於打倒社會主義思想、煽動反對社會主義、支持那些希望攻擊和進攻蘇聯的力量，這些不斷的攻击使共產黨人沒有從他們一邊提出批評。他們專心衛護蘇聯，結果也就是衛護那裡的錯誤和缺點。

的確，不僅是共產黨人在這件事上面犯了錯誤。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年代里，當蘇聯和一些西方國家結成軍事同盟同法西斯主義作戰的時候，遠在共產黨以外的力量領導了同樣的衛護蘇聯的工作，這種力量中有一部分在戰後國際政治結合情況有了改變的時候，再度成為首先開始進行反對蘇聯的新宣傳和新煽動的力量。

資產階級分子和社會民主黨分子這樣做並不能為我們的、為共產黨的態度辯護。但是它說明和解釋了這種態度。

但是現在對共產主義運動說來最重要的事情是找出赫魯曉夫報告里所說的那些情況能夠產生的真正原因。這不是“俄國的問題”。這是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問題，在共產主義運動

中，所有共產黨有責任根據它們的能力作出它們的貢獻。

我們大家知道，在整個蘇聯歷史里曾經存在過一些客觀因素，促成了和助長了赫魯曉夫所說的那些情況的產生。這些客觀因素有一部分可以在唯一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和在軍事上和經濟上強大得多的其餘的資本主義世界之間的关系中找到。但是客觀因素還可能在蘇聯本身找到，這些因素的根源可能在很早很早以前的俄國封建社會里找到。

如果要追究這個問題的根源，就必須把所有這些因素都考慮在內。

而這仍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

自從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建立以來，不久就要滿四十年了。它是通過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產生的。就是在馬克思主義者隊伍以外的好些人也一致同意列寧說的話是對的，列寧說，對俄國來說，當時要走任何別的道路都是不可能的。

這是在1917年的事。在這以後，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已經完全改觀了。新的國家參加了社會主義陣營。世界上的資本主義地區也有了一定的發展，雖然這種發展還沒有改變資本主義的性質。

因此，問題就是：共產黨人已經從這一總的發展中汲取了必要的經驗了嗎？在某些方面我們這樣汲取了經驗。但是，這大部分是有關經濟方面的。

整個說來，看來共產黨好像也必須通過事態發展來學習這一點：我們也片面地集中精力於改造的經濟過程並且低估了關於走向社會主義道路的社會的全部政治上層建築的問題。

因此，我們面臨了這種任務：開始進行一次理論的拓荒工作，並且發展我們對各種形式的民主和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的民主的看法。

在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已經間接地提出了這個問題，因為在那里提出了關於走向社會主義的一些不同道路問

題以及还有关于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問題。这种提問題的方法可能影响我們对改造的經濟过程的看法。或許甚至在更高的程度上还必然影响我們对政治方面、对关于民主和独裁的問題的看法。

一个人要对怎样才能避免重犯那些在社会主义國家現在已經被揭露的錯誤的問題作出答复，就必須徹底弄清楚民主問題本身。我們的运动在这方面比在任何其他方面更有必要把自己从教条主义和机械作風中解放出來。在这方面我們需要一次生气勃勃的更新。

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總書記艾地：
在雅加達群眾大會上的發言
(關於反對個人崇拜問題部分)

(1956年6月27日)

反對個人崇拜問題成為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主要討論事項。大家非常深刻地討論了這個問題，因為這問題曾經在工作中導致許多錯誤而且曾經長期地對蘇聯的社會生活帶來惡劣影響。對於這問題蘇聯共產黨作了勇敢的自我批評。我們謹此向蘇聯共產黨致敬！（鼓掌）

其實，要是資產階級的報紙沒有“加油添醬”（笑聲），這個問題絕對不會使人民感到紛亂。問題是在於：斯大林同志在長時期中並沒有發揮集體領導，以致犯了重大的錯誤。斯大林同志的這種錯誤被貝利亞這叛徒利用以在蘇聯國家內和在蘇聯共產黨內部製造騷亂，殺害黨和國家的幹部，同時破壞蘇聯和各人民民主國家對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和南斯拉夫共產黨人的關係。最為明顯的是反動報紙故意不提及貝利亞盜用黨和斯大林的名義所犯下的罪行。

從蘇聯共產黨就個人崇拜問題而進行的自我批評中，全世界所有的共產黨和工人黨吸取了寶貴的經驗和教訓。每個共產黨都以民主集中制，個人負責和集體領導相結合的制度，和人民群众的智慧當作自己的基礎。為了使黨和人民運動獲得良好的領導，集中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沒有民主的集中制就等於幾個人或者一個人任意採取行動。民主也是為了使黨員和人民積極地討論自己的問題，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沒有集中制，沒有

中心領導的民主，會產生自由主義，會引起黨內和人民運動中的混亂現象。所以，忽視任何一個，都意味着是災難。拋棄民主就等於不依靠人民的智慧而工作，拋棄集中制就是等於聽從人民，在他們的鬥爭中沒有領導。

在共產黨內最高級的領導形式就是集體領導。放棄這種制度就是等於脫離群眾、脫離實際，而其結果就是產生主觀的思想和行動。不實行集體領導就等於違反民主集中制。

作為蘇聯共產黨和蘇聯首要領導者的斯大林由於在領導黨和國家當中拋棄集體領導，不依靠民主集中制而犯了重大的錯誤。斯大林的錯誤會造成極大的後果，不僅由於他所處的地位非常重要，同時也因為被貝利亞利用了。

我認為，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批評斯大林的錯誤的確是應當的。指責一種錯誤並不是異乎尋常的。雖然犯了錯誤的人已經死去，但指責他的錯誤，乃是必要的，使得不重犯錯誤。

同時，我也認為，正確的加以肯定，是正確的。如果沒有加以肯定，那是錯誤的，因為人們可能把對的認為錯的。因此我同意蘇聯共產黨代表大會仍然承認斯大林的功勞，承認他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和指出他對蘇聯人民和全世界無產階級所作某些的偉大行動。然而資產階級的報紙上只是積極地提出斯大林同志的錯誤，不僅如此，他們還任意地增添斯大林所犯錯誤的次數和性質。（笑聲）。因此我認為，蘇聯共產黨發表明確的聲明，在指出斯大林的錯誤之後，同時也說明斯大林在他的一生中所做的好事，乃是應當的。在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中沒有多提斯大林所做的好事，這是因為這個代表大會原來不是旨在提出他所做的好事，而是為了指出他的錯誤，使共產黨人不該再犯那些錯誤。但是在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閉幕以後，資產階級的報紙對有關斯大林的許多問題，加以歪曲，加以增減，因此，蘇聯共產黨發表關於斯大林所做的好事和他的錯誤

的声明，是非常必要的。如果这工作苏联共产党不去做，那么各国共产党，包括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有责任在党所具有的可能范围内进行这种解释工作。

我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就是：“斯大林的著作仍然和过去一样是必须认真研究的，凡是他的著作中有益的东西，特别是关于他保卫列宁主义和正确地总结苏联建设经验的许多著作，我们都需要当做一项重要的历史遗产接受过来。不这样做，就是错误的。”

当然我们不是以教条方式而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研究斯大林的著作。斯大林的著作也和其他的著作一样，我们必须批判地研究它。

意大利共產党中央委員會決議： 意大利共產党为爭取政治和 社会改革綱領而斗争（摘錄）

（原載1956年6月28日意大利“團結報”）

中央委員會批准并且同意党的領導对于5月27日和28日选举結果所作出的判断。共產党在6月7日的大斗争中取得了六百多万張选票，从而巩固地保持了前此所獲得的地位。选民已經向左轉了，在这种趋势下，全國所要求的政治方向上的根本改变取得了新的進展。最近几年來，人民力量为爭取这种改变進行了斗争，击退了資產階級的大举進攻，挫敗了謝尔巴政府的攻勢。日益廣泛的公民和劳动者階層，了解了“向左开展”这一口号，甚至在政府內部人們也認為它是正确而現實的。选举結果揭露了四党联盟（四个执政党的联盟——編者）的深刻危机，在全國粉碎了“三边協約”（在选举前大工業家、大商人和地主的協約——編者）的大部分活动，这样，天主教民主党的領導集团为重新獲得有利于教会勢力的政治壟断而創造前提的企圖就遭受到了嚴重的失敗。

党中央委員會依据对选举結果的考察，深入批判和檢查了党的工作和政策，中央委員會着重指出必須弄清楚某些地点共產党选票減少的原因，以便作出糾正和采取必要的主动來使党的行动適合目前的需要和可能，使党壯大起來，牢固地保持作为認識到必須以向左轉來使國家向前進步的劳动者和公民的运动的先鋒隊地位。

这种檢查——中央委員會的討論为它提供了有益的重要的

貢獻——目前已經在黨的一切組織內部全面展開了；應該繼續下去普遍檢查政策問題和組織問題，考察黨的總路綫以及依據對國家經濟和社會形勢所作的深刻馬克思主義分析而執行總路綫的方式。這種考察、這種檢查是即將舉行的全國代表大會準備工作中的根本主題。

今年的“共產黨報刊月”應該成為廣泛的運動，從而在黨內、在勞動者和公民中間廣泛提出關於實行能夠符合選舉所表現出來的趨勢的一個新政策的各個問題，並且進行有效的社會主義宣傳，使大家認識革新社會結構和全面實施共和憲法的必要性。

工人民主團結的敵人們今天試圖用一切辦法阻止、無論如何也要限制一切形式的合作和一切團結創議。為了實現人民通過投票所作的指示，為了回擊反動派的攻擊和抗拒，共產黨人應當同社會黨的同志們兄弟般地團結起來採取行動，從而在一個民主的社會主義的變革綱領的基礎上加強同社會民主黨人以及天主教勞動者的團結。

意大利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一致強調指出：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各項決議的價值巨大，並且一致贊同就蘇聯黨內和國內所犯錯誤和對社會主義法制和民主的罪惡違反行為所進行的譴責和揭露。即使這些揭露和批評今後還需要再深入下去，但是，這些揭露和批評不僅對蘇聯說來意味着取得進展的新的可能，而且對工人和社會主義運動說來也是極為重要的貢獻；工人和社會主義運動在國際團結方面必然會以新的批判和創議能力愈來愈自主地在每個國家里得到發展。

保障人類個人的基本自由和發展是社會主義社會根本要素。蘇聯在充分恢復這些自由而且給予新的發展的時候將獲得新的力量並且取得日益增長的威望，同時，各國共產黨人和勞動者的解放鬥爭也將獲得新的推動力量。

中央委員會認為在黨的隊伍內已經開始的關於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各個問題的廣泛而深入的討論（陶里亞蒂

同志通过答記者問和在中央委員會上的發言对这场討論提供了極为重大的貢獻) 應該在党的各个機構里繼續進行。党感到十分振奋, 因为这种討論使我們党也可以吸收到有价值的教訓來糾正錯誤和改善我們的工作, 因为这种討論以新的政治和經濟內容有效地充实了我們的組織生活并且表現出全体同志是更積極地更坚决地参加了党的生活和斗争。

这种討論証明党的成熟和生气勃勃; 它將有助于使全体同志和各級組織更善于、更主动地处理新形势所引起的各个重大問題, 明确地深入地了解关于我們政策和关于意大利走向社会主义的各种問題。这种热烈的檢查、批判、研究和思想建設應該在意大利共產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之前举行的各級代表大会和會議上充分表現出來。

人民力量向前進展, 人民需要向左开展, 現在已經很明顯了; 在这同时, 巨大的革新运动和爭取自由的运动已經在全世界發展起來。各國人民的和平事業、和平共处与和平競賽出現了新的远景。意大利共產党又一次要負起領導隊伍的責任, 使意大利能够參加这一高潮。为了使社会主义和共產主义运动的經驗成为一个有效的貢獻, 为了使社会主义的國際主义联系不致于削弱, 世界各地的先鋒政党應該在彼此独立的基礎上以公开和民主方式在世界輿論注視之下建立和保持彼此之間的关系, 这样來使一切为了爭取使人类擺脫剝削和压迫、爭取建立沒有階級的社会这个共同事業而斗争的人們能够真誠地親密地團結起來。

因此, 中央委員會欢迎同南斯拉夫共產主义者联盟重新建立兄弟般的友好合作关系, 并且希望同所有的共產党和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一切政党以及各國解放运动, 發展相互接触, 从而使得它們之間日益擴大的團結能够促進全世界爭取社会主义和爭取自由的事業。

芬蘭共產黨總書記培西答記者問：
**芬蘭共產黨對個人崇拜和集體
領導的問題所持的態度**

(原載1956年6月28日芬蘭“自由新聞報”)

總書記維利·培西在這篇答問中強調指出了加強組織上的民主的重要性。

——芬蘭共產黨總書記維利·培西在接見民主通訊社記者時說：在蘇聯共產黨代表大會上所提出的批評可以成為一個很好的起點來在以下這几方面審查各國共產黨（包括芬蘭共產黨在內）的行動：怎樣實行黨內民主，集體領導的方法怎樣應用於組織的各個機構，怎樣使學習和群眾工作更密切地結合起來來改進這兩項工作，尤其是工人運動的合作怎樣能夠得到加強。下面是問與答：

——芬蘭共產黨是否處理了這些問題，尤其是個人崇拜的問題？

——大家知道，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對國際局勢作了廣泛的和根本的分析，若干理論問題闡明得更加清楚了，第六個五年計劃的指示得到了批准。此外，在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所處理的問題中，個人崇拜的問題不僅對蘇聯共產黨，而且對各國共產黨以及對整個國際工人階級運動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芬蘭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處理了這些問題，地方和基層組織也考慮了這些問題。黨受到了啓發，考慮了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關於黨的教育工作的意見和指示。我黨的報紙已經刊登了關於這些問題的文章，黨組織在繼續處理這

些問題。

我們認為，主要的注意力必須放在，芬蘭共產黨從已經進行了的批評可以得到什麼教訓。

至於個人崇拜，尤其是關於斯大林的批評，也關係到芬蘭共產黨。我們的行動受到了對斯大林的過份推崇和形式主義的阻礙。雖然我們自己黨內沒有發生把個人提高到其他的人之上來單獨決定問題的類似情況，但是我們在實際執行集體領導原則和組織上的民主方面還是有改進的余地的。

——你對於針對斯大林的批評有什麼想法？

——我絲毫不懷疑，蘇聯共產黨對斯大林的批評是有可靠的根據的。現在已經公布了的事實證明，斯大林的一生事業必須要分為兩個部分。

斯大林曾經一度是最傑出的馬克思主義領袖之一。他在維護蘇聯共產黨的正確政策的鬥爭中有着巨大的功勞。斯大林在社會主義建設和闡釋馬克思主義理論方面是有顯著的功績的。但是他有若干個人方面的弱點。由於他所擔任的極其負責的職位，這些弱點在他一生的末期的大約十五年中變得非常嚴重，而且這些弱點甚至同斯大林自己所主張的馬克思主義原則也是大相逕背的。混入蘇聯國家機構的階級敵人利用這些弱點逮捕和消滅了數以千計的無辜的人。

現在，正在對這些事件進行補救，濫用職權的行為也全面得到了糾正。我們必須知道，屬於芬蘭工人階級運動的許多人，例如愛德華·居林、庫斯塔·羅維奧、尤卡·萊托薩里、杰·克·萊蒂寧和其他的人都已證明是無罪的。無疑地，某些報紙上公布了名單的所有那些芬蘭人並未受到懷疑，也未投入監獄。

——上面所談到的濫用職權的行為怎麼可能發生呢？

——那個時期之所以可能發生這些嚴重的錯誤和濫用職權的行為，是由於斯大林在世的時候，蘇聯違反了集體領導的原則。

如果問題都按照黨章和黨及蘇維埃國家的原則得到了共同處理，那麼，斯大林個人消極的特點就不會產生這樣大的影響。過錯不在於蘇維埃制度，也不在於共產黨的原則。

現在談論的個人崇拜同共產黨的原則是很不一致的，總的說來，同馬克思主義也是很不一致的。

恰恰相反，個人崇拜、否認群眾的貢獻以及破壞民主的罪行在資本主義國家中是普遍的。它們都是資本主義制度所特有的。只有建立在科學社會主義的基礎上的政黨和社會主義制度才能消除這種現象。

蘇聯的歷史已經證明，社會主義先鋒戰士的命運是艱難困苦的。但是，蘇聯各族人民在他們的共產黨的領導下克服了許多困難，取得了巨大的勝利，並且在經濟和社會生活的各个方面實現了人類歷史上空前未有的迅速的發展。

十分肯定的是，如果在蘇聯共產黨的領導中和在蘇聯政府的行動中，像斯大林逝世後的那種大規模集體領導在以前就已經實行了，那麼，蘇聯建設工作的成就就會更大。

過去幾年來已經無可爭辯地證明了這一點，雖然肯定的，還沒有足夠的時間來足夠廣泛地和足夠深入地擴大集體領導的實施並且發展民主方法和消除官僚主義。正如你們所看到的，在這方面正在不斷地實行改進工作的改革。

——有些報紙說，最近對犯過的錯誤進行的激烈批評和糾正這些錯誤的措施表明蘇聯的削弱，甚至表明資本主義的恢復。你對這種說法有什麼意見？

——在我看來，很明顯，這種說法是沒有現實根據的。一切消息都表明，蘇聯共產黨的七百多萬黨員和全體蘇聯人民在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之後比以前更加積極地支持黨中央委員會和蘇聯政府的政策，廣大人民群眾激起了新的熱情。無可懷疑的是，蘇聯正在穩步地向着共產主義社會邁進，而絕不是向着資本主義邁進。

——在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上所提出的批評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起点來在以下这几方面審查各國共产党，包括芬蘭共产党在內的行动：怎样实行党内民主，集体領導的方法怎样应用于党的各个机构，怎样使学习和群众工作更密切地結合起來來改進这两項工作，特别是工人运动的合作怎样能够得到加强。

——資產階級的宣傳企圖使人民相信：各國共产党之間將發生冲突，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將陷于瓦解的状态。在各國共产党内部和它們之間在有关的問題上進行的批評和自我批評有助于改進各國共产党的工作，有助于加强整个國際工人階級运动。

美國共產黨全國委員會主席福斯特：

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

(原載1956年7月2日美國“工人日報”)

有必要按照共產黨全國委員會关于斯大林問題的声明，以我們手头的材料，对于像对斯大林个人崇拜这样的政治上怪現象如何能够在一個社会主义國家里發展起來的情形，尽我們能力作一番進一步的馬克思主义的分析。沒有疑問，苏联的馬克思主义者終于会發表更加权威的声明。然而到現在为止，赫魯曉夫和其他苏联領袖在这个重要的方面还不是很有帮助的。所有这一切大大地妨害了共產黨去向群众解釋这种不幸的情况。

为了了解令人遺憾的个人崇拜的發展，我們腦筋中要弄明白的第一件事是正确地确定斯大林的不可饒恕的行動屬於哪一类。这就是說，我們必須把它們归在革命的过分行動的名目下。所有的資產階級革命——英國的、美國的、法國的、拉丁美洲的等等——都產生过这种过分行動，特别是恐怖性質的过分行動，而(使我們感到沮喪的是)俄國的社会主义革命在这一方面沒有例外。

赫魯曉夫意味深長地說：所有这一切的悲劇在于，斯大林后期的年月中的不可饒恕的行動是他为了革命而采取的。但是，尽管这些行動目标是为了革命，也并不能因此使斯大林的殘忍行為不具有嚴重不公正、甚至驚人的罪行的性質。

要弄清楚在苏联怎样和为什么会發生这种殘暴行為和对民主的鎮压，我們必須考慮的头一个因素乃是傳統因素，那就是在俄國歷史上过去沒有民主。

旧俄是一个落后國家，許多世紀來生活在沙皇的暴政統治下。它對於民主傳統的方式知道得很少；這就使共產黨和人民更加容易淪為斯大林得以形成的專制政權的犧牲品。在俄國革命的早期，農民在概括說明沙皇時代的情況的時候，普遍地總是說列寧是他們的“再生父母”，但是列寧並沒有讓這種奉承沖昏他的頭腦。

但是，不能認為民主背景不強這個傳統方面的因素是逐漸形成斯大林個人崇拜的唯一因素，甚至最重要的因素。（美國）共產黨在白勞德這件事上的經驗就說明了這一點。儘管美國有兩個世紀的強有力的民主傳統，白勞德仍然能夠相當不費力氣在黨內建立了他的非常不民主的專制小王朝。同時有些美國工會在培育最反動、最頑固、有時候甚至拿着手槍進行統治的專制領袖方面，是特別有名的。

造成對斯大林個人崇拜的第二個基本因素是政治性的。那就是蘇聯從1917年11月誕生的那一天起，就遭到敵對的資本主義的包圍，它的生命本身從來沒有脫離過險境。在這個總的情況下，由於它在一個在工業上非常落后的國家着手，它必須作出最艱苦、甚至是拚命的努力來使自己工業化到足以抵抗資本主義敵人的攻擊的程度，因此，它的困難進一步增加了。

這種非常急迫和困難的情況的一般後果是蘇聯人民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必須幾乎毫無喘息地進行一個接着一個的運動來動員他們的力量到最大限度。

這些偉大的鬥爭有1918年到1921年的內戰；1924年到1937年間對托洛茨基派和其他反對派分子的長期的激烈鬥爭；1930年代為反對富農和為實現土地集體化而進行的巨大而持久的運動；從1928年到現在為了實現好幾個五年計劃而進行的持久而全面的運動；從1941年起把艱苦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堅持到底；1945年後的長期而消耗精力的冷戰鬥爭，等等。

這許多運動一個接着一個幾乎沒有休止，是在黨內和人民

中执行極高度的紀律的情況下無情地進行到底的。外國共產黨，由于一种强有力的國際團結感，一般是不加批判地支持这些运动的。实际上，苏联人民，尤其是党，在实际上沒有軍事战争的时候也是在很大程度上生活在半軍事的条件之下的。所有这一切就造成了这样的情势：命令成为法則，專制就可以而且的确發展起來了。列寧所教導的，党的反对官僚主义的傳統斗争，实际上是被丢弃了。斯大林充分利用了这种情势中加强紀律的方面，他建立了他的極端官僚主义的机器，而最后帶來了悲剧性的結果。尤其是他利用了資本主义包圍，國內还有間諜，和担心反革命等情况作为建立和利用由不堪一提的貝利亞所領導的巨大的秘密警察網的理由。

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第三个基本因素是屬於意識形态性質的，这一点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斯大林在他的全盛时代为他自己建立了作为馬克思列寧主义的領袖的巨大声望，特别是由于他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期在一國內建設社会主义的問題上同托洛茨基斗争的結果。因此，斯大林由于有了極大的声望，由于他的無情的精神，而且又由于巨大的权力集中在他一人手中，于是便能够使共產党和苏联大多数人民相信他的方針大体上是正确的而加以遵循。这也是他在全世界的共產党人中間具有的深刻影响的决定性基礎。

当然，正像其他國家的共產党人的情形一样，共產党人和一般的苏联人民根本沒有看到斯大林的过火行动究竟达到什么程度了。在美國，我們至少也从白勞德的事件中略微看出这种意識形态的因素的力量，白勞德虽然沒有什么組織力量，但是他却能够利用他的油嘴滑舌在党内建立他的冷酷無情的独裁。

那些也許把苏联共產党人描繪成好像处在或多或少一个被压制下的反斯大林叛乱之中——只等待信号动手——的人們，对于总的情势，作了一个十分歪曲的圖画。絕大多数的苏联人民（而且我敢說包括苏联共產党和在苏联的大多数党的領導机

关在内)，感到斯大林的政策是一般地正确的。对于其他國家的共產党人，情况也是如此。例如，在南斯拉夫案件——一个典型的个人崇拜的运用——上，毫無疑义，在整个世界共產党人中，实际上一致的情緒是，斯大林是对的，铁托是錯的。

上述三个基本因素——俄國一向缺乏民主、資本主义包圍的政治形势、苏联國內沒有完的运动和半軍事性紀律，以及斯大林在理論上的巨大威望——所有这一切加起來，提供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發展基礎。这就是發展到了極点的官僚主义。

顯然，斯大林本人的个性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列寧在逝世之前曾指出了斯大林的粗暴和官僚主义傾向。在最初几十年中，斯大林本人曾警告“不要被勝利冲昏了头腦”，但是，顯然，他自己正犯了他警告过不要去犯的弊病。

無疑，像列寧这样一个穩健的領袖一定能够度过苏联在过去一代中的非常緊張的时期以及这个时期的高度紀律和运动，而不会造成有害的官僚主义，但是当初要防止官僚主义也一定要有真正的了解，和進行真正的斗争。而且，在斯大林方面，像赫魯曉夫所表明的那样，还有一种病理因素的可能性需要考慮。現在非常清楚，在斯大林活着的时候，苏联几乎沒有作什么有組織的努力來防止个人崇拜的發展，或者甚至減輕一些对斯大林進行令人作嘔的甜言蜜語的奉承。党本身的純潔無瑕遭到了破坏，它的領袖对所發生的事情都普遍負有責任。由于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已經牢牢生根，要把它根除的可能性越來越困难了。

在这种情况下后期，随着斯大林的机器的逐漸建立，要發展一种有效的反对力量顯然面臨了十分嚴重的障碍。一方面，如同赫魯曉夫所說，这样做一旦不成功会招來死亡，而如果这种行动具备了一定的規模，那末我認为，在斯大林的巨大威望和組織的面前，其可能的后果会是党的分裂，这种分裂如果在1917年以后的任何时候，在長期的危險的政治情况下發生，对苏联会有为害極大的影响。

在一旦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变得根深蒂固的时候要同斯大林進行成功的斗争是極其困难的，铁托事件就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这个事件基本上是一个个人崇拜的問題。現在已經証明，铁托反对斯大林的專政态度的立場是正确的；但是后者却能够輕易地使他在政治上名譽扫地，不僅是在苏联，而且是在整个社会主义世界。

事实上，铁托只有在苏联和欧洲人民民主國家之間造成害处極大的分裂，他才能坚持下來。全世界的資產階級对这一点知道得很清楚，他們希望铁托主义成为破坏社会主义世界的手段。当然，在最后階段同对斯大林的崇拜進行斗争的嚴重困难不能作为容忍这种崇拜的借口。尽管如此，事情的結果表露，自然的進程規定了基本問題，个人崇拜的其他方面也是如此。

在進一步分析斯大林問題的时候，至少應該特別強調下面这些起碼的措施：充分地解釋在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情况下究竟發生了什么，并且为共產党和工人运动从中吸取一切民主的教訓，以使这种事情不可能再發生，特別要說明对斯大林的崇拜在社会主义之下絕不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在資本主义对苏联長期包圍的特殊情况下滋長起來的，而这个时期現在已經肯定地过去了；同时在討論斯大林問題的时候要弄得十分明确，我們必須有效地推动苏联社会主义的巨大進展，以及全世界社会主义事業的普遍迅速前進，以便抵制老板們所煽动的反苏情緒。

德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書記處：
對公開問題的答復

(原載1956年7月2日西德“自由人民報”)

資產階級報紙刊載了美國國務院發表的一個文件，據說是赫魯曉夫同志在蘇共第二十次黨代表大會上所作的報告，這是一個非官方的文稿。

許多我黨的黨員和幹部以及一般人就這件事向黨的領導機構提出了各種各樣的問題。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現在除了大家所已經知道的斯大林的錯誤和缺點之外，人們又知道了斯大林的嚴重錯誤和專橫行為的詳細情況。

提出這些問題的人是出于一種好心和關懷，我們將盡力對這些問題作毫無保留的公開答復。

蘇共領導機關早在第二十次黨代表大會以前就着手糾正在斯大林領導下發生的缺點，取消了過去的專橫措施，徹底地恢復社會主義法制。

第二十次黨代表大會上的公開批評（這同時也就是最嚴格的自我批評）以及已經發生的變化，乃是使類似的缺點今後不可能再犯的保證。這表現了蘇共的內部力量，它的統一和團結。

蘇共除了像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那樣揭露和糾正這些缺點之外，還有任務進行深刻的分析，以查明所以能夠發生這種缺點的原因。

蘇共黨內和蘇聯公眾對這個問題的廣泛討論、由此而激發的群眾創造積極性以及科學從與個人崇拜有密切關係的教條主義和書呆子習氣中解放出來，為在理論上和實踐上解決這個巨

大的任务創造了前提和保証。

弄清楚苏联所發生的缺点的原因，对于正在建設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前進的國家是有好处的。这样，它們就可以在它們自己的建設中避免苏联曾經發生过的缺点。

对于德國共產党和西德的工人階級來說，按照西德的具体情况來运用馬克思列寧主义也会得出重大的新結論，而能幫助他們勝利地進行爭取和平、民主和社会進步的偉大而正义的斗争。

信任不可动摇

在最近几年來以及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由于恢复了集体領導，苏联爭取巩固和平、維護共处的原則以及爭取緩和緊張局势和裁減軍备的外交政策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些成就是苏共和苏联政府集体制訂的政策成就。侵略集团公布那些材料，是要想动摇人們对苏共的集体領導、对苏联、而主要是对社会主义事業的信任，他們希望这样一來就能阻擋國際緊張局势的繼續緩和以及工人运动力量的增長。

因此，在最近几个月以來，正当阿登納企圖違反人民的意志趕緊实行普遍兵役制和使西德進一步軍國主义化的时候，联邦共和國內的反苏鼓动又加緊了起來，那絕不是偶然的。阿登納关于苏联是“死敌”的言論，关于苏联对德政策的歪曲說法，以及美國國務院公布所謂赫魯曉夫的報告这三件事情，彼此之間是有緊密联系的。

西德人民認識到，为了德國人民本身的利益，为了和平和安全的利益，有必要恢复同苏联的友好联系，發展同苏联的貿易。侵略势力就恰恰相反，他們認為重新武裝是一樁新的事業，而把这种关系的發展看作一种對他們的危險，因為他們在人民面前一向以“來自东方的威脅”作为他們加緊武裝計劃的根据。正是因为这样，他們才攻击那已經由事实無可辯駁地証明了的苏联

要求進一步緩和緊張局勢、要求裁軍和安全的願望，並且違反常理地硬說，即使斯大林的錯誤已經得到糾正，國際局勢也沒有任何改變。

可是，事實上，蘇聯現在不僅在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而且在根除同社會主義根本不相容的違法 and 腐朽的現象。在這件事情上，社會主義再一次證明了它對資本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社會主義正在剷除那些同它不相容的偏差和違法現象，而在帝國主義統治中，人們可以看到內部的專橫和壓迫以及對外的侵略。

德國壟斷資本家和軍國主義者違反西德廣大公眾的要求，頑固地堅持他們敵視人民的政策，這種政策違法地違反本國公民的意志表現了出來，最後並以新的侵略戰爭的威脅而危及我們整個民族的生存和歐洲的和平。

在這種局勢下，對於聯邦共和國的共產黨員來說，對於一切認為和平、民主和諒解的政策就是德國重新統一的基礎、就是德國的獨立政策的人來說，起來反對這種反蘇煽動是必要的，這種煽動的目的是要為帝國主義者掩蓋他們反民主的、敵視和平的陰謀。

我們共產黨人驕傲地承認，德國共產黨過去是、現在是、將來也仍然是社會主義的旗手，是打着對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表示友好和忠於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旗幟。為了德國工人階級的利益、為了我們人民和歐洲和平的利益，我們將繼續加緊進行這一鬥爭。

單槍匹馬面臨整個世界的敵人

固然，蘇共當前的一个任务是要查明过去的缺点为什么可能發生，而且也只有它才能够解决这个任务。然而我們相信，在對這些缺点作判斷的時候，不能不考慮到蘇聯發展的特点以及它在它頭三十年的歷史中作為唯一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地位。

蘇聯是在受到整個世界的敵人的包圍下作為唯一的社會主

义國家而發展的，而帝國主義者令人毫不懷疑他們要想用尽一切手段來扼殺这第一个工農國家，甚至不惜采用軍事干涉的办法。

俄國的工人和農民剛剛在國內取得勝利，帝國主義國家馬上就開始進行武裝干涉。德國帝國主義者和軍國主義者、英國、法國、美國和日本的帝國主義者派出他們的軍隊進攻年輕的蘇維埃國家。就是在这一企圖遭到失敗之后，帝國主義者還無時無刻不在打算對蘇聯發動新的干涉戰爭。

在帝國主義對蘇維埃國家進行干涉的戰綫上，德國帝國主義者自始至終起着特別富于侵略性的作用。在1917年，當新成立的蘇維埃國家采取第一个外交行動，提出了列寧的和平建議的時候，他們的答复是加緊軍事進攻。就是在布勒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約簽訂以后，他們仍然繼續侵入波羅的海沿岸地区和烏克蘭。在拉柏羅條約締結之后，蘇聯取消了德國的賠償，使德國脫離完全孤立的狀態，而德國帝國主義者此后却使當時的外交部長拉吞璠遭到殺害，並且通過洛加諾公約使魏瑪共和國參加西方帝國主義國家的反蘇政策。最后，他們利用希特勒使那些公開宣布以發動對蘇戰爭和消滅社會主義作為自己政策的核心政治力量当了權。因此，德國帝國主義者向來就是反蘇包圍和侵略政策的先鋒，這種政策給德國人民和蘇聯人民帶來了無限的災難。

蘇聯的工人和農民在一個工業薄弱、農業落后的經濟落后國家里取得了勝利。在資本主義包圍的形勢下，這個國家轉變為先進的工農業國家的問題，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社會主義國家的生死存亡問題。蘇聯不得不在虎視眈眈的整個世界的包圍之中以自己的力量在最短期間內解決克服工農業落后狀態的任務。要實現這一點，就必須克服巨大的困難，並且有必要建立一個强有力的中央集權機構。然而，强有力的中央集權機構的建立，却引起了官僚主義和下層積極性減弱的巨大危險。無可否認，這

一事实使得斯大林这样一个曾经在苏共的历史中、尤其是在实现列宁所拟定的关于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方面有过巨大功绩的人，很容易扩大他的个人权力，而同时他还相信，这种导致对他个人的歌颂和扩大他的个人权力的做法，是符合苏维埃国家和苏联人民的利益的。

有些同志和社会民主党人问，为什么苏共领导机构的其他成员没有及早纠正斯大林的缺点。

仅仅是工人运动自己的事情

斯大林在过去、特别是在列宁逝世以后，在反对托洛茨基分子和布哈林分子、执行列宁制订的总路线的斗争中有过很大的功绩。斯大林无疑是最强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要是苏共走了托洛茨基分子和右翼分子所主张的道路，结果必将是苏联的工农政权陷于灭亡，资本主义得以复辟。今天我们不难想像得到，苏联如果不是按照党的总路线建成了强大而有效能的重工业，实行了农业的集体化，而是按照右派分子的计划来首先发展消费品工业，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希特勒法西斯主义者对苏联的进攻将会造成怎样的结局。如果是那样的话，苏联就会没有它赖以抗击法西斯侵略而终于把它打垮的那种防御力量。

根据苏共领导同志的报告，是在苏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以后缺点才开始变得严重起来的。然而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时候呢？在这个时候，国际局势极度尖锐化，德国法西斯主义者和日本帝国主义者公开宣传要进攻苏联，英国和法国帝国主义者极力把德、意、日帝国主义者要求重新分割世界的锋芒引导到苏联身上，企图牺牲苏联来消除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的矛盾。没有疑问，在斯大林享有巨大威信的情况下，要想当时纠正斯大林的缺点和错误，就会引起严重的分裂，使苏联的力量和威信严重地削弱，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和大战当中会严重地危及苏联的生存。这也就说明了苏共其他领导者从当时一直到斯大林逝世

的时候为止，是处于多么为难的地位。

苏共領導机构在斯大林逝世以后立刻就 开始纠正他的缺点，譴責个人崇拜，取消斯大林的專橫措施。

苏共領導机关最后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上公开地批評了斯大林的缺点，而毫不顧慮这种批評可能被資本主义社会的維護者利用來攻击苏联。这就保證了他們能徹底地清除过去一切錯誤，同时也証明了他們决心不讓这种錯誤將來得以重犯。

我們認為，一切資本主义社会秩序的代表，那些使劳动大众的血泪流成大海的人，那些輕率地投下一顆原子彈就把整个市鎮毀滅掉的人，那些輕率地准备新的原子战争的人，那些为了維持非洲和亞洲的殖民主义制度就進行駭人听闻的殘殺的人，一切应对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罪行負有責任并且参加了这些罪行的人，沒有权利假惺惺地对斯大林的專橫措施表示憤怒。

研究这些缺点產生的原因，專橫措施为什么可能，以及这些缺点和錯誤对前途有什么障碍，这完全是工人运动自己的事。

有人會問，为什么居于領導地位的德國共產党人早先不知道斯大林要負責的嚴重缺点？对于这点我們須要肯定地指出，我們沒有理由怀疑对帝國主义代理人采取最嚴厉措施的必要性，尤其是因為我們自己就曾親身体会过反动派对德國工人运动及其政党实行的瘋狂的罪惡打击。我們沒有理由怀疑，謀殺罗莎·盧森堡、卡尔·李卜克內西、恩斯特·台尔曼、魯道夫·布莱特夏德以及成千成万其他德國反法西斯人士的凶手，是否会尽一切力量也在苏联組織党的敌人、間諜和凶手的工作。过去事实上是这样的，而今天在德國的土地上情形也还是这样。为了这个目的，間諜組織在联邦共和國和西柏林建立了起來，策划暗殺社会民主党人和共產党人的行动（請看德國青年联盟的暗殺黑名單），派遣特务、間諜和破坏者潛入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以暗害行动、縱火、放毒和1953年6月17日的法西斯暴动一类的武力暴行來破坏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和平建設。

采取措施來对付这种种行动，过去以至現在一向是社会主义國家的职责。假如除了为防止帝国主义对苏維埃國家的罪行而進行正当的必要的防衛以外，苏联保安机关方面發生違法行为，陷害了無辜的人，那么我們也像其他共产党人一样，要对这种事提出譴責。然而，無論如何，那些曾經用尽一切手段企圖破坏苏联和其他國家的和平社会主义建設而且今后仍然繼續干这种事的人，是沒有权利对此發出怨言的。

誰只要追究一下今日世界一切惡事的根底，就一定会看到，资本主义是我們現代一切不健康現象和一切罪惡的根源。而社会主义是人类希望的源泉。社会主义給人类指出解脫那可詛咒的剝削、民族压迫和战争的道路。工人和農民过去在苏联以及今天在从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到人民中國的一切人民民主國家中所取得的勝利，其世界歷史意义就在这里。

萊因和魯尔的軍火大王之所以憎恨社会主义，并不是由于这个制度可能發生的錯誤，而是由于这个制度勇往直前的力量，由于社会主义的理論和實踐也愈來愈昂揚地在西德工人的心中燃起爱好自由和進步的精神。帝国主义这些工人階級和人类的死敌正是要扑滅这种精神。因此，他們現在大叫大喊地說，要有“真正的变化”，光是消除斯大林的缺点还是不够，而要人們根本抛弃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然而，在这种解放的理想已經在地球三分之一的地方取得勝利的今天，要工人群众放弃这种理想又怎么可能呢？当人类真正美好的前途已被易北河到太平洋之間的十億人在生活現實中實現了的今天，要想人类放弃这种理想又怎么可能呢？

新的形式和道路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为所有各國人民展开了新的宏偉的远景。帝国主义沒有能力掩盖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設和第六个五年計劃規定的經濟和文化方面的進一步發展的偉大事实。苏

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向各國人民表明，战争再也不是不可避免的命运，他們有力量防止新战争的發生。代表大会以馬克思列寧主义的精神解决了新的重大問題。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的问题，大会指出，由于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以及世界社会主义陣营的形成，资本主义國家有了可能通过和平的議會途徑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苏联工人農民的胜利以及社会主义建設的范例，就形式方面來說，今天已經不再是社会主义在其他國家取得胜利的独一无二样本。在南斯拉夫共產主义者联盟和苏联共產党之間的关系的宣言中关于这方面說：“双方相信：在不同的國度和不同的条件下，社会主义的發展道路是不同的，社会主义的多样形式有助于社会主义的加强，并且認為任何一方都不得有强迫对方接受它的关于社会主义發展道路和形式的見解的任何傾向。双方本着这种看法同意，上述的合作应当以完全自願和平等、友好的批評以及就兩党的爭执問題進行同志式的交換意見为基础。”

世界局势的变化，亦即苏联已經不再是唯一的社会主义國家、社会主义已越出了一國的范围并且在一系列的國家中取得胜利这一事实，对德國共產党也是有影响的。

我們國家的情况同其他國家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德國是分裂的，兩個德國同时并存。只要西方占領國家和联邦共和國的統治集团仍然坚持統一的德國必須参加美國的軍事集团体系——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只要他們仍然拒絕承認德國的重新统一是德國人自己的事情，拒絕承認为此必須兩個國家的政府和議會進行談判，德國的统一就一天不能实现。可是，这就意味着，兩個德國將繼續朝着不同的方向發展，兩個德國內部情况的差別也將越來越大。

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正在建設社会主义。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建設成就將向全体德國人民証明社会主义經濟制度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是符合整个德國工人階級的利益的。德意

志联邦共和國的情况就恰恰相反，它是一个壟斷資本主义的國家，在这里德國軍國主义者極力要想通过西德的軍國主义化來巩固和加强他們的地位。

沒有疑問，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社会主义建設并不是沒有困难和缺点的。而事情怎么会不如此呢，因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工人和農民不得不在德國分裂的特別困难条件下掌握經濟管理和國家管理。然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过去所發生的一切困难和缺点以及今后还可能發生的一切困难和缺点，都是成長中的困难，是可以在完成經濟計劃的过程中以及充分地展开民主生活的过程中得到克服的。因此，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發展是有前途的。

德國共產党和德國統一社会党早在1949年1月就完成了組織上的分离。在有关整个德國的問題上，德國共產党同它的兄弟党德國統一社会党是意見一致的，例如兩党都一致地認為，德國必須在民主和和平的基礎上恢复統一，只有通过兩個德國的政府和議会的談判，重新統一才有可能实现，而且必須保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成就。然而，由于兩個德國根本不同的發展，兩党的工作条件的差別越來越大，兩党在它們的政策中的許多問題上越來越強烈地顯示出它們的區別。

德國共產党的政策是完全適應联邦共和國的特殊情况的。德國共產党努力爭取在联邦共和國的情况中实行民主的改变，爭取工人階級的一致行动，为了欧洲的和平和安全，为了和平解决德國問題，而爭取一切反軍國主义力量的合作。因此，它在党中央委員會的二十三次和二十四次會議上向工人階級和全体人民提出了一項建議，願意同人民中的一切优秀力量通力合作進一步加以發展和实行。

党的干部可能指責說，党的領導方面为什么事先沒有充分地把斯大林的嚴重錯誤和过去的專橫措施告訴他們，而讓敌人比党先一着把材料公布了呢？党中央委員會書記处和第一書記

曾經詳細地獲悉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的全部經過。關於斯大林的錯誤和嚴重缺點的原則性問題，曾經向廣大的黨的幹部詳細傳達，並且進行了詳細的討論。

然而，黨中央委員會書記處和領導幹部應當抱着自我批評的精神承認，他們沒有作充分的努力，使黨內的討論全面展開，使我們的黨員和幹部充分明了二十次黨代表大會的一切問題，其中包括有關個人崇拜以及斯大林濫用權力的問題。

黨將更緊密地團結起來

工人階級的敵人企圖重新煽起反共狂潮，乘斯大林的缺點和錯誤得到必要的糾正的機會來誣蔑共產黨，然而這只有使我們的黨更加緊密地團結。一切要在我們黨內造成混亂的企圖，都像過去一樣，遭到了譴責，而完全破滅。

共產黨人將在全黨保持團結的情況下公開地討論一切問題，並且通過自由的表示意見而消除一切意見分歧和糊塗看法。我們所需要的是黨內的公開討論，公開的意見爭論，這樣來求得問題的澄清，保證行動的一致。這樣，那些早已遭到破產的黨內異己分子要想取得新的勢力的企圖，也將無情地被粉碎。

為了加強我們在群眾中的解釋工作，為了恢復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的一致行動，為了發動廣泛的反對軍國主義化、爭取和平、統一和民主的群眾運動，對我黨政策的基本問題的清楚認識以及我黨的保持團結和決心，是一個必不可少的前提。

根據聯邦共和國的形勢和我們的任務，我們必須確定我們黨的工作的新形式，喚醒下層的積極性，克服官僚主義停滯的危險，加強我們黨在群眾中的影響，這樣來為勞動人民解決自由和社會正義的問題。

加拿大劳工进步党执行委员会声明： 要求苏联领袖们解释

(原载1956年7月2日加拿大“加拿大論壇报”)

劳工进步党上周宣布，它不能“同意目前对于为什么不能在斯大林逝世以前老早就制止危害苏联人民的罪行的问题所作的解释是令人满意的”。

劳工进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在6月26日通过的并且向报界发表的一篇特别声明中说，这种破坏苏维埃民主的行为并不是“一个社会主义社会所固有的”。

劳工进步党的声明全文如下：劳工进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认识到现在正在采取的纠正措施，然而并不认为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就1934年到1953年之间破坏苏维埃民主的行为所作的解释是充分的。

新时代的精神要求坦率地和批判地重新估计和研究政治思想和经验，劳工进步党本着这种精神欢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上向代表们揭露了有关在斯大林担任领袖的后半期所犯的错误、过分行为和罪行的事实这种勇敢的行动。

劳工进步党虽然重视这篇关于事实的坦率声明，然而还必须强调指出，苏联共产党的领袖们应当向全世界的劳工和社会主义运动详尽地解释在实际上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怎样和为什么竟能出现现在所谓的斯大林的一人统治这种显然破坏工人阶级政府的社会主义民主原则的事情。

这种破坏民主原则的行为不是一个社会主义社会所固有

的。为了保証苏联國內不再發生这种行为，为了在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人民間加强这种信念，应当說明这些情况最初为什么会發生和为什么会流行这么許多年的原因。

我們沒有理由怀疑对斯大林的譴責，我們欢迎民主实践的恢复。我們認識到，正如二十次党代表大会所强調的，立即需要做的是恢复社会主义法治和民主，但是苏联共產党的纠正行动必須更進一步。它必須解釋由于中央委员会的其他委員們有了什么样的錯誤理論和看法或放弃职责的行为，才使得斯大林能够独攬这种非常的权力和使得个人崇拜得以建立。要說，僅僅斯大林个人的弱点和缺点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如赫魯曉夫报告中所說的——那不是馬克思主义的解釋，因为这是用斯大林來解釋斯大林。

我們不能認為目前这种对在斯大林逝世以前很久的时期內不能制止对苏联人民所犯的罪行的解釋是令人滿意的。实际上，据說，这些罪行是貝利亞和他的前几任的手下的保安部隊在崇拜斯大林的时期中强加在人民身上的，他們的势力是这样廣泛，他們本身就是法律，凡是反对非法行为的人都將走向死亡或者是被監禁。

共產党是劳动人民权利的保衛者。在斯大林逝世以前很久的时期中，这种保衛作用沒有能够發揮，犯罪得不到制止的情况是如何發生的呢？顯然，發生这种情况的責任要落在苏联共產党整个領導人的肩上。他們贊成斯大林的錯誤理論：社会主义建成以后，階級斗争必定会更加激烈。

我們認為，这种情况的根源是在于某种歷史条件和政治上的錯誤，其中包括：从1917年起，苏联孤立地被包圍在敌对的資本主义國家中間，內战和帝国主义的干涉，1930年代和1940年代遭受法西斯進攻的越來越大的危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苦难，和冷战以及随之而來的有系統的、有高度組織的破坏，政治暗殺以及美國國務院粗暴地企圖組織武裝暴动。所有这一切外來的

敌对行动都加深了國內的困难，而苏联人民为了建立他們的和平和丰足的新生活曾經同这些困难作过英勇的斗争，并且正在克服这些困难。苏联共产党的領袖們有責任說明在这种情况下对斯大林的崇拜是如何發生的。

違反不論大小民族一律平等的社会主义民族政策侵犯民族的权利的作法是不能只归罪于斯大林的疑心的。这不是馬克思主义分析問題的方法。在这方面，我們对至今所得到的赫魯曉夫的报告文中絲毫沒有提到在苏联压制犹太文化的作法不能不表示遺憾，而一直到現在，苏联还没有發表任何正式的或者是报纸的报道談到这个問題。特别是自从对希特勒法西斯主义作战以來，犹太民族的权利已經变成了全世界所关心的一个問題。我們認為，苏联共产党應該公布事实，对于已經發生了的事情作出解釋，并且說明現在正在爭取什么行动來恢复苏联犹太民族的文化表現的充分权利。

我們認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所犯的一个嚴重的錯誤就是認為：赫魯曉夫所列举的斯大林的这一系列罪行將要或者是能够長期地成为苏联共产党的私事。其結果就是使資產階級的报纸和政府机构有可能首先报道这篇报告，以便迷惑輿論和把人們的注意力引离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所取得的成就和第六个五年計劃。如果原先打算公开这篇报告，那么就应当讓各國共产党的兄弟般的客人和在莫斯科的一切記者到場，或者得到这篇报告的稿本。如果原先的考慮是要使其成为苏联共产党的私事，那么，我們認為，資產階級的报纸和美国國務院公布了这个报告的事实就是表明已經鑄成了大錯。

一切進步人士都欽佩苏联人民在建設社会主义方面的成就、他們为击败法西斯主义的軸心所作出的貢獻以及他們为和平共处而進行的一貫的斗争。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國家，是世界上消滅人剝削人的現象的第一个國家，是表明一旦資本主义壟斷的統治被粉碎，人民对于取得社会進展有無限的能

力的國家。

我們之所以就赫魯曉夫的演說發表這些評論，是因為如果蘇聯共產黨領袖們對於自從1934年以來發生的事件作出更加深刻和更加令人滿意的馬克思主義的科學解釋，這將對各地的具有社會主義思想的人們有極大的幫助。這種解釋將有助於各國的工人運動，使它們能夠從蘇聯的經驗中得出更加深刻的教訓。只有掌握事實的蘇聯共產黨領袖們才能最好地作出這種解釋。

全國執行委員會以及我黨黨員都一直在經歷一個了解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意義的艱苦過程。

在這個過程中，全國執行委員會在仔細推敲和研究有關的新問題方面以及在对蘇聯共產黨的行動進行友好的、批判的和獨立的研究方面，表現了猶豫不決和缺乏大膽的精神，並且沒有以足夠的力量來貫徹這一行動。這篇聲明是克服這個缺點的一個步驟。全國執行委員會表示希望：這篇聲明將有助於目前的討論，使得我黨和一切具有社會主義思想的加拿大人能夠自己弄清楚由於社會主義越出蘇聯的範圍而像現在這樣遍及人類三分之一而引起的問題。

世界上的社會主義運動和工人運動之間正在形成一種新的兄弟關係，因為各國人民制訂他們自己的走向社會主義的民族道路。在正在破曉的新時代中，當戰爭並不是不可避免，並且消除工人運動中的分歧的前景和和平走向社會主義的前景是更加光明的時候，這種關係對於各國勞動人民將越來越有幫助。

1954年勞工進步黨的綱領說明了我們對於加拿大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的看法。這個綱領對於正在就加拿大的前途進行的辯論是一個貢獻。

勞工進步黨將同一切具有社會主義思想的加拿大人一起進行這個全國性辯論，自由和友好地交換對我們的一切問題的意見。我們確信，通過這次討論，將產生一個更加團結一致的工人運動。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

(原载1956年7月2日苏联“真理报”)

一

苏共中央委员会满意地指出，有历史意义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得到了我们全党、全体苏联人民、各兄弟共产党和工人党、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的劳动人民、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的千百万人的完全拥护和热烈支持。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标志着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阶段的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对当前的国际和国内形势作了深刻的分析，用继续为建成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宏伟计划武装了共产党和全体苏联人民，并为一切工人阶级政党共同努力防止新战争威脅、维护劳动人民的利益开辟了新的远景。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苏联人民在执行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在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各方面取得了新的卓越成就。苏联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并且在为完成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所提出的任务的斗争中表现了高度的创造性积极性。

代表大会以后的这一段时期也表明了代表大会的决议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对一切进步力量为巩固世界和平的斗争具有伟大生命力。代表大会所提出的关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关于现代防止战争的可能性、关于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的多样性这些重要原则性的理论，对国际局势有良好的影响，促进了紧张局势的缓和，加强了一切为和平和民

主而斗争的力量的行动一致，進一步巩固了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障地。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有历史意义的决议，在苏联人民中，在各人民民主国家和全世界劳动人民中，引起了蓬勃的热情、新的旺盛的创造性主动性和革命毅力，而在工人阶级的敌人的营垒里，则引起了惊慌和忿恨。美国和其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反动集团对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所制定的为巩固和平而斗争的伟大纲领，显然感到不安。他们的不安随着这个纲领的积极地逐一地实现而不断增加。

为什么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敌人要集中火力来攻击我们党中央委员会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說的缺点呢？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转移工人阶级和工人阶级政党的视线，使它们不去注意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主要问题，这些主要问题为和平、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团结的事业取得新成就扫清了道路。

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苏联政府的对外和对内政策，使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帝国主义集团惊慌失措。

苏联在保障和平和各国（不问它们的社会制度如何）之间的合作方面所执行的大胆的和一贯的外交政策，得到世界各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支持，扩大了爱好和平国家的阵线，引起了“冷战”政策、拼凑军事集团和扩充军备政策的深刻危机。美国的帝国主义集团围绕着苏联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而大肆叫嚣，这不是偶然的。与个人崇拜有关的不良现象的存在，对他们是有利的，因为他们可以利用这些事实来反对社会主义。现在，当我们党勇敢地克服个人崇拜的后果的时候，帝国主义分子看出这是加速我国向共产主义的前进并削弱资本主义障地的一个因素。

资本主义的思想家力图削弱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决议的伟大的吸引力和它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影响，因而采用种种阴谋诡计来转移劳动人民的视线，使他们看不到社会主义世界向全

人类提出的進步的和令人鼓舞的思想。

最近資產階級报刊廣泛進行污蔑性的反苏宣傳，反动派企圖利用有关苏联共產党指責对約·維·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一些事实來作为進行这种污蔑的理由。这次反苏宣傳的策划人竭力“把水攪混”，力圖掩飾这一点，即現在揭發的事实是屬於苏維埃國家生活中过去的階段的；他們也想迴避和歪曲下列一点：苏联共產党和苏联政府在斯大林逝世后的几年中，以异常的果断和决心來消除个人崇拜的后果，成功地實現着有益于巩固和平和建設共產主义、有益于廣大人民群众的新任务。

資產階級思想家展开污蔑宣傳，再一次妄費心机地中伤馬克思列寧主义的偉大思想，破坏劳动人民对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國家——苏联的信任，在國際共產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隊伍中制造混乱。

歷史經驗說明，無產階級國際團結的敌人过去不只一次企圖利用他們所認為的良机，來破坏共產党和工人党的國際主义團結，分裂國際工人运动，削弱社会主义陣营的力量。但是，共產党和工人党每次都識破了社会主义的敌人的詭計，更緊密地團結了自己的隊伍，顯示了自己的牢不可破的政治團結和对馬克思列寧主义思想的不可動搖的忠誠。

各兄弟共產党和工人党这次也及时識破了社会主义的敌人的詭計，并且給以应有的回击。然而，閉眼不看下一事实也是不对的：我們的某些外國朋友沒有徹底弄清楚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問題，有时候对有关个人崇拜的某些情况作了不正确的解釋。

党批判个人崇拜是从馬克思列寧主义原則出發的。三年多以來，我們党坚持不渝地反对对約·維·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坚决克服个人崇拜的有害后果。這個問題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工作和決議中占着重要的地位，这是很自然的。代表大会指出，中央委員會反对个人崇拜是完全正确的，適时的；个人崇拜的流行縮小了党和人民群众的作用，降低了党的集体領導的

作用，并且常常給工作帶來嚴重的損失，使社会主义法制遭到粗暴的破坏。代表大会責成中央委员会始終不渝地实行各种措施，以保証完全克服同馬克思列寧主义不相容的个人崇拜，肅清个人崇拜在党的工作、國家工作和思想工作各方面的影响，并嚴格实行偉大的列寧所制定的党内生活准則和党的集体領導原則。

在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中，党遵循着馬克思列寧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党和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以及不論政治領導者的功績多大絕不容許对他个人崇拜的有名的論点。科学的共產主义奠基人卡·馬克思曾着重指出自己“对任何个人崇拜”的反感，他說，他和恩格斯参加共產主义者团体的“条件就是：章程中一切促成盲目崇拜权威的东西都應該刪去”。（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二十六卷第四八七——四八八頁）

弗·伊·列寧在締造我們共產党的时候，曾經同所謂“英雄”和“群氓”的反馬克思主义观点進行了不調和的斗争，坚决譴責把个人英雄同人民群众对立起來。列寧說，“千百万創造者的智慧所創造的东西，比一个最偉大的天才的預見要高超得無比。”（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四三一頁）

苏共中央提出反对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問題是基于这样一点：个人崇拜違反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質，阻碍苏維埃民主的發展，阻碍苏維埃社会向共產主义前進。

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根据中央委员会的創議，認為必須大胆和公开地說明个人崇拜的嚴重后果和斯大林生平的后期所犯的嚴重錯誤，号召全党共同努力剷除个人崇拜所引起的一切后果。中央委员会知道，坦白承認所犯的錯誤將使敌人可能鑽空子。在个人崇拜問題上的大胆無情的自我批評，再一次表明我們党和苏維埃社会主义制度的力量和巩固性。可以肯定地說，資本主义國家的任何一个执政党决不敢这样做。相反地，它們將竭力不講这样的不愉快的事实，向人民隱瞞这种事实。但是

以馬克思列寧主義革命原則培養出來的蘇聯共產黨說出了全部真實情況，不管它多么令人痛心。黨完全是根據原則性的考慮主動採取這一步驟的。黨認為，反對崇拜斯大林的行動如果引起某些暫時的困難，那麼，從工人階級的根本利益和最終目標來看，將來會有巨大的良好的結果。因為這樣做就能可靠地保證今後在我們黨和國家內絕不會產生類似個人崇拜的現象，保證今後在實行馬克思列寧主義政策的基礎上，在開展黨內民主的條件下，在千百萬勞動者的積極參加下，在大力發展蘇維埃民主的情況下，對黨和國家實行集體領導。

黨堅決反對個人崇拜及其後果，公開批評個人崇拜所產生的錯誤，這樣就再次表明自己忠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不朽原則，忠於人民的利益，關心創造最有利的條件來發展黨內民主和蘇維埃民主，以利于在我國順利建設共產主義。

蘇共中央確認，在各級黨組織中和勞動人民的大會上討論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問題時，黨員和非黨員都積極地參加了，蘇共中央的路綫在黨和人民當中得到了完全的贊同和支持。

黨所公布的破壞社會主義法制的事實以及與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有關的其他錯誤，當然令人痛心和深感遺憾。但是蘇聯人了解，為了他們所積極參加的共產主義建設的利益，譴責個人崇拜是必需的。蘇聯人民看到，黨在近幾年中堅定地採取了實際措施來消除個人崇拜在黨、國家、經濟和文化建設各方面所引起的後果。由於這一工作，黨內力量現在再不受什麼東西束縛了，黨更加靠近了人民，黨內的創造性積極性空前提高了。

二

在蘇維埃社會主義制度條件下，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居然發生並且得到了流行，造成了各種不良後果，這種情況如何能夠產生呢？

在考察這一問題的時候，應該既考慮到蘇聯的社會主義建

設所处的具体的客觀歷史条件，也考慮到同斯大林的个人品質有关的某些主觀因素。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作为在工人階級的領導下完成对資本主义社会的革命改造的典范而載入史册的。其他國家的共產党、一切進步和民主势力都以布尔什維克党的英勇斗争、以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國家——苏联为范例，來學習解决現代社会发展所提出的根本社会問題的經驗。在將近四十年的社会主义社会建設中，我國劳动人民積累了大量的經驗，其他社会主义國家的劳动人民都在研究这些經驗，并且結合本國的具体条件創造性地加以运用。

这是歷史上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第一个經驗。这个社会是在探求和用實踐檢驗許多真理的过程中形成的，在这以前，社会主义者只在理論上知道这些真理的一个大概輪廓。在二十五年多的时期內，苏維埃國家是为人类开辟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唯一的一的國家。它像一个在資本主义包圍中被圍困的堡壘。苏維埃國家的西方和东方的敌人；在1918到1920年十四國武裝干涉失敗之后，繼續准备向苏联進行新的“十字軍討伐”。敌人向苏联派遣大批間諜和破坏分子，千方百計地力圖破坏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國家。法西斯主义于1933年在德國掌握了政权，宣布自己的目标是要消滅共產主义、消滅苏联——世界上第一个劳动人民的國家，在这以后，帝国主义对苏联發動新侵略的威脅特別加强了。得到整个國際反动势力的積極支持的所謂“反共產國際公約”，“柏林—羅馬—东京軸心”的形成，是大家都記得的。在新战争威脅迫近、西方國家拒絕苏联不止一次建議的关于制止法西斯主义和組織集体安全的措施的情况下，苏維埃國家不得不竭盡全力來加强國防，同敌对的資本主义包圍的陰謀進行斗争。党必須教育全体人民始終一貫地保持警惕性，并且动员起來，准备对付外部敌人。

当时，由于在國內長期地進行着殘酷的階級斗争和解决着

“誰戰勝誰”的問題，國際反動勢力的陰謀就更具有危險性。列寧逝世以後，敵對派別托洛茨基分子、右傾機會主義者、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在黨內活躍起來了，他們採取了拋棄列寧提出的關於社會主義能夠在一國取得勝利的理論的立場，這樣實際上會導致資本主義在蘇聯的復辟。黨對列寧主義的這些敵人展開了無情的鬥爭。

共產黨遵守列寧的遺訓，採取了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農業集體化和實現文化革命的方針。蘇聯人民和共產黨在解決這些在單獨一個國家內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極其巨大的任務的道路上，需要克服許多難以想像的困難和阻礙。我國要在極短的歷史時期內，在沒有任何外來經濟援助的情況下，消滅歷來的落後狀態，按新的社會主義的原則改造整個國民經濟。

在這種複雜的國際國內環境里，需要有铁的紀律，需要不懈地提高警惕性，需要有極其嚴格的集中領導，這不能不對一些民主形式的發展起不好的影響。在同整個帝國主義世界進行殘酷鬥爭的過程中，我國不得不对民主作一些限制，從我國人民在帝國主義包圍形勢下為社會主義奮鬥的邏輯上來說，這是正確的。但是，這些限制還在當時就已經被黨和人民看成是暫時的，是應當隨着蘇維埃國家的鞏固以及全世界民主和社會主義力量的發展而予以取消的。人民看到蘇維埃社會制度一天天取得新的成就，自覺地承受了這種暫時的犧牲。

在共產黨及其貫徹列寧的總路綫的中央委員會的領導下，蘇聯人民克服了建設社會主義道路上的這一切困難。

我國在敵人包圍和不斷有外來侵略的威脅的情況下取得社會主義勝利，這是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功績，這一功績是蘇聯人民作出的。由於人民和黨的緊張的勞動和英勇的努力，一個經濟落後的國家在最初幾個五年計劃中，在它的經濟和文化發展上有了巨大的飛躍。在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的基礎上，勞動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失業現象永遠消除了。國內發生了極深刻

的文化革命。在短短的时期內，从苏联人民当中成長起許許多多的技術干部，他們达到了世界技術發展的水平，使苏联的科学和技術居于世界的前列。偉大的共產党是这些勝利的鼓舞者和組織者。全世界的劳动人民通过苏联的例子，看到工人和農民在取得政权之后，可以不要資本家和地主而勝利地建設和發展自己的、反映和保护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社会主义國家。这一切对擴大世界各國共產党和工人党的影响起着極大的鼓舞作用。

約·維·斯大林在長时期担任党中央委员会总書記，他同其他領導者們一起，为实现列寧遺訓而積極斗争。他忠于馬克思列寧主义，作为一个理論家和大組織家，他領導了党反对托洛茨基分子、右傾机会主义者、資產階級民族主义者的斗争，以及反对資本主义包圍的陰謀的斗争。在这个政治和思想斗争中，斯大林獲得了巨大的威信和声望。但是，我們一切的偉大勝利从此被不正确地都同他的名字联系起來。共產党和苏維埃國家所取得的成績，以及对斯大林的頌揚，使他冲昏了頭腦。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始逐渐形成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

約·維·斯大林的一些个人品質在很大程度上助長了个人崇拜的發展，弗·伊·列寧就曾經指出过斯大林的不好的性格。1922年年底，列寧在他給那届党代表大会的信中說：

“斯大林同志当了总書記后，掌握了極大的权力，我不相信他能永远十分謹慎地使用这一权力。”1923年1月初，列寧在这封信的补充意見中又提到对領導者來說是不能令人容忍的斯大林的某些个人品質。列寧寫道：“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們中間，在我們共產党人的來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書記的职位上則是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議同志們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調开，并另外指定一个人担任总書記，这个人在各方面同斯大林一样，只是有一点强过他，就是更耐心，更忠順，更和藹，更关心同志，少任性等等。”

在列寧逝世后不久召开的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列寧的这些信件在代表团中間宣讀过。对这些文件討論的結果，大家認為最好讓斯大林繼續任总書記，但是要他考慮列寧的批評，并且从中得出一切必要的結論。

斯大林留任中央委员会总書記后，在列寧逝世后的初期还重視列寧的批評意見。但是后來，斯大林太过分地高估了自己的功績，相信自己不会犯錯誤。在和階級敌人及其走狗進行嚴酷斗争的条件下，在后來反抗德國法西斯强盜的战争的条件下，党内民主和苏維埃民主受到某些限制是不可避免的，可是斯大林开始把这些限制变成党内生活和國家生活的准則，粗暴地踐踏了列寧的領導原則。党的中央全体會議和代表大会不定期召开，以后甚至多年內完全不召开。斯大林实际上置身于批評之外。

斯大林关于苏联愈向社会主义前進、階級斗争就愈尖銳的錯誤公式，給社会主义建設事業，給党内和國家內的民主的开展造成了很大的危害。这个公式只是在过渡时期的一定階段，当解决“誰战胜誰”的問題的时候，当進行着爭取建成社会主义基礎的頑强的階級斗争的时候才是正确的；然而在1937年，当社会主义已經在我國取得勝利，当剝削階級及其經濟基礎已經被消滅的时候，这个公式竟被提到首位。在實踐中，这个錯誤的理論公式，成了粗暴地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和大規模進行鎮压的論据。

正是在那样的情况下，形成了例如國家保安机关的特殊地位，这些机关受到極大的信任，因为它们們在保衛革命的成果方面对人民和國家有了無容置疑的功績。在很長的时期內，國家保安机关沒有辜負这种信任，它們的特殊地位也沒有引起什么危險。然而，当党和政府对这些机关的監督逐漸为斯大林的个人監督所代替，通常的司法准則常常被他个人的决定所代替之后，事情就發生了变化。在國際帝國主义的代理人貝利亞的罪惡匪

帮窃取了國家保安机关的領導地位之后，情况就更加复雜了。苏維埃法制遭到了嚴重的破坏，發生了大規模的鎮压。由于敌人的陰謀活动，許多正直的共產黨員和非党的苏联人遭到誣告，無辜受难。

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在斯大林逝世后执行的整个政策清楚地証明，在党中央委员会內有着已經形成的列寧主义的領導核心，这个領導核心正确地了解了內政方面和外交方面已經成熟的要求。不能說，沒有反对过那些与个人崇拜有关的、阻碍社会主义向前發展的不良現象。而且在某些时期，譬如說，在战争时期，斯大林的独断独行曾經受到大大的限制，違法 and 專橫等等不良現象曾經大大地減弱。

大家知道，中央委员会的委員以及杰出的苏联將領正是在战争时期曾把后方和前方的某些部分的工作掌握到自己手里，独立地作出决定，并以自己在組織、政治、經濟和軍事方面的工作，同地方党組織和苏維埃机关一起保證了苏联人民在战争中的勝利。勝利以后，个人崇拜的不良影响又变得厉害起來了。

中央委员会的列寧主义核心在斯大林逝世后就立即着手同个人崇拜及其嚴重后果作坚决的斗争。

也許要問：为什么这些人不公开地反对斯大林，不解除他的領導职务呢？在当时已經形成的情况下，这样做是不可能的。当然，事实說明，斯大林对許多違法現象，尤其是在他生平的后期中所發生的違法現象，是負有責任的。但同时也不能忘記，斯大林在苏联人的心目中是一个始終保护苏联、反对敌人的陰謀、始終为社会主义事業奋斗的人。他在这一斗争中有时采用了不適當的方法，破坏了列寧主义原則和党内生活准則。斯大林的悲剧就在这里。然而，这一切也使反对当时發生的違法現象的斗争感到困难，因为，建設社会主义和巩固苏联的成就在个人崇拜的影响下都被归功于斯大林。

在这种情况下，对他的任何反对都会为人民所不理解，这里

問題完全不在於個人勇氣不夠。顯然，誰要是在這種情況下反對斯大林，他就不會得到人民的支持。而且，在那種情況下，這樣的行動會被認為是反對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行動，被認為是在資本主義包圍的環境下破壞黨和整個國家團結的極其危險的行動。同時，蘇聯勞動人民在自己的共產黨領導下所取得的成就，使每一個蘇聯人的心裡產生合情合理的自豪感，並且造成這樣一種氣氛；在巨大的成就的襯托下，個別錯誤和缺點看起來是次要的；而實際上，這些錯誤所造成的不良後果，很快地就被黨和蘇維埃社會的迅速成長起來的巨大的有生力量蓋過了。

還應當注意到：許多事實和斯大林的錯誤的行為，特別是破壞蘇維埃法制的行為，只是在最近時期，在斯大林逝世後，主要是在揭露了貝利亞匪幫和建立起黨對國家保安機關的監督以後才發覺的。

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得以產生和流行的主要條件和原因就是這樣。當然，上面所說的一切，只是對於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說明，而決不是為它們作辯護，這種個人崇拜及其後果已經受到我們黨的尖銳的公正的譴責。

三

毫無疑問，個人崇拜給共產黨的事業和蘇維埃社會造成了嚴重的損失。但是，如果從過去存在個人崇拜的事實中作出蘇聯的社會制度有了什麼改變的結論，或是從蘇維埃社會制度的本質中尋找這種崇拜的根源，那就是嚴重的錯誤。這兩種想法都是絕對不正確的。因為這是不符合事實的，是違反事實的。

儘管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給黨和人民造成了很大的禍害，但是它不能改變而且也沒有改變我們的社會制度的本質。任何個人崇拜都不能改變社會主義國家的本質，因為社會主義國家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工農聯盟和各民族的友誼，雖然這種崇拜對社會主義民主的開展，對千百萬人的創造性主動性的

發揮造成了嚴重的損失。

認為個別人物，包括像斯大林這樣的大人物在內，能夠改變我國的社會政治制度，那就是陷入完全違反事實、違反馬克思主義、違反真理的境地，陷入唯心主義的境地。那就是認為個別人物有非凡的、超人的力量，能夠改變社會制度，甚至能夠改變千百万勞動群眾起決定作用的社會制度。

大家知道，決定社會政治制度的本質的是：具有什麼樣的生產方式，生產資料屬於社會中的什麼人，以及政權掌握在什麼階級的手里。全世界都知道，在我國，由於十月革命和社會主義的勝利，確立了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政權掌握在工人階級和農民手里差不多已經有四十年。因此，蘇維埃社會制度一年比一年鞏固，它的生產力不斷發展。這個事實，甚至連對我們心懷惡意的人也是不能不承認的。

大家知道，由於個人崇拜的後果，在領導黨和蘇維埃國家的各種工作部門方面；在蘇維埃國家的內政和外交政策方面，都有一些嚴重的錯誤。例如，可以指出，斯大林在領導農業上、在組織國家反擊法西斯侵略者的準備工作上犯了嚴重錯誤，他的粗暴專橫行為造成了在戰後時期同南斯拉夫的衝突。這些錯誤妨礙了蘇維埃國家生活的個別方面的發展，特別是在斯大林的晚年妨礙了蘇維埃社會的發展，但是，不用說，這些錯誤並沒有使蘇維埃社會離開向共產主義發展的正确道路。

我們的敵人硬說，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之所以產生，不是由於已經成為過去的一定歷史條件，而是由於蘇維埃制度本身，是由於（在他們看來）這一制度的不民主，等等。蘇維埃國家發展的全部歷史駁斥了這種誹謗。蘇維埃即國家政權的新的民主形式，是在為自由而奮鬥的廣大人民群眾的革命創造的基礎上產生的。蘇維埃曾經是並且現在仍然是真正的人民政權機關。正是蘇維埃制度使得人民能夠發揮巨大的創造力。蘇維埃制度發動了人民群眾的無窮無盡的力量，吸引千千万萬的人來自覺地

管理國家和積極地創造性地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在短短的歷史時期內，蘇維埃國家經受住了最艱苦的考驗，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炮火中的考驗。

當我們國家內消滅了最后的剝削階級的時候，當社會主義在整個國民經濟中成為統治的制度的時候，當我國的國際地位有了根本的改變的時候，蘇維埃民主的範圍不可估量地擴大了，而且還在繼續擴大。蘇維埃民主和任何資產階級民主不同，它不僅宣布，而且從物質上保證全體社會成員有工作、受教育、休息、參加國家事務的權利，有言論、出版、信仰的自由，有自由發展個人才能的實際機會，能享受一切其他的民主權利和自由。民主的實質不在於形式上的標志，而在於政權是否為大多數人民羣眾的意志和根本利益、為勞動人民的利益服務，是否在實際上反映他們的意志和利益。蘇維埃國家的整個對內和對外政策說明，我們的制度是真正民主的、真正人民的制度。蘇維埃國家的最高目標和經常關懷的事情，是全力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保障本國人民的和平生活。

黨和政府所採取的擴大加盟共和國的職權，嚴格遵守法制，改變計劃制度以發揮地方積極性，加強地方蘇維埃的活動，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等方面的措施，都是蘇維埃民主進一步發展的證明。

儘管存在着個人崇拜，但是在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羣眾中由於我國制度而產生的旺盛的主動精神，克服了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上的一切障礙，創造了自己的具有歷史意義的偉大事業。這就是蘇維埃社會主義制度的民主的最高表現。社會主義在我國的輝煌勝利並不是自行到來的。這種勝利的取得，是由於黨和它的地方組織進行了巨大的組織工作和教育工作，是由於黨經常以忠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精神，忠於共產主義事業的精神教育自己的幹部和全體共產黨員。蘇維埃社會的力量就在於羣眾的覺悟。它的歷史命運在過去和現在都是由我們英勇的工人

階級，光榮的集體農莊莊員和人民的知識分子的創造性勞動來決定的。

我們的黨由於消滅個人崇拜的後果，恢復黨的生活的布爾什維克的準則，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從而進一步加強了同廣大群眾的聯繫，把他們更加緊密地團結在偉大的列寧的旗幟下。

黨勇敢地公開地自動提出了關於消除個人崇拜、關於斯大林所犯的不可容忍的錯誤的問題，這一事實令人信服地證明：黨是在堅決保護列寧主義，維護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事業，維護社會主義法制和人民的利益，保障蘇聯公民的權利。這是蘇維埃社會主義制度的力量和生命力的最好的明證。這同時也說明了對徹底消除個人崇拜的後果和今後不再犯類似錯誤的決心。

我們黨對於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指責，得到了各兄弟共產黨和工人黨的贊同和廣泛的反應。各國共產黨人都指出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對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工人運動有着巨大的意義，都把反對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鬥爭看作是為維護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的純潔性、為創造性地解決國際工人運動中的當前問題、為確立和進一步發展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原則而進行的鬥爭。

許多兄弟共產黨的聲明都擁護和支持我們黨所採取的對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措施。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機關報“人民日報”闡述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政治局會議從討論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決議中所得出的結論，在“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這篇編輯部文章中寫道：“蘇聯共產黨遵循列寧的遺教，現在正在認真地對待斯大林在領導社會主義建設中所犯的某些性質嚴重的錯誤及其所遺留的後果。由於其後果的嚴重性，所以蘇聯共產黨有必要在肯定斯大林的偉大功績的同時，又尖銳地揭露斯大林所犯的錯誤的實質，號召全黨以此為戒，堅決地消除這種錯誤所造成的不良後果。我們中國共產黨人深信，經過蘇聯共產黨二十次代表大會這一次尖銳的批判之

后，过去被某些錯誤政策所嚴重地压抑了的一切積極因素，必將普遍地活躍起來，苏联共產党和苏联人民將比較过去更好地團結一致，为了建設一个人类从來沒有看見过的偉大的共產主义社会和爭取全世界的持久和平而奋斗。”

法國共產党政治局声明說：“苏联共產党領導人的功績，在于他們采取措施來糾正同个人崇拜有关的錯誤和缺点，这証明列寧的偉大的党的力量和團結，証明它在苏联人民中所享有的信任，也証明它在國際工人运动中的威信。”美國共產党全國委员会总書記尤金·丹尼斯同志在一篇大家知道的文章中指出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巨大意义，他說：“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加强了世界和平和社会進步。它标志着社会主义發展和为和平共处而斗争的新階段。为和平共处的斗争是从列寧在世的时候起就开始的，这一斗争以后一直在繼續着，并且越來越有作用和成效。”

同时也應該指出，在討論个人崇拜問題的时候，对產生个人崇拜的原因和对这种崇拜給我國社会制度造成的后果所作的解釋，并非都是正确的。例如，陶里亞蒂同志在对“新議論”雜誌的問題所作的一篇詳尽的、引人注意的答复中，除作出了許多極重要的、正确的結論之外，同时还含有不正确的論点。例如，不能同意陶里亞蒂同志关于这样一个問題的提法：苏維埃社会是否已經走向“某种退化形式”呢？提出这一問題是沒有什么根据的。這個問題的提出尤其令人莫解的是，陶里亞蒂同志在自己的答复的另一处十分正确地說：“必須作出結論，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質並沒有喪失，因为以前的任何一个成果，首先是組成苏維埃社会的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群众对这一制度的支持，都沒有喪失。这种支持本身就証明，無論如何，这个社会保持了它的基本民主性質。”

真的，要是沒有廣大人民群众支持苏維埃政权，支持共產党的政策，我們的國家就不可能在空前短的时期內建立起強大的

社会主义工业，实现农业集体化，它就不可能在决定全人类命运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胜利。由于彻底粉碎了希特勒主义、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得到了广泛的发展，意大利、法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壮大了，并且成了群众性的政党，在欧洲和亚洲的一些国家里建立起了人民民主制度，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产生并得到了巩固，使帝国主义殖民体系走向崩溃的民族解放运动取得了空前的胜利。

四

共产党员和全体苏联人民一致拥护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指责个人崇拜的决议，认为这些决议是我们党的力量增长的证明，是党的列宁主义原则性、党的统一和团结的证明。列宁说：“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强大得能够公开进行自我批评，毫不含糊地把自己的错误和弱点叫做错误和弱点”。（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一五〇页）我们党遵循着列宁的这个原则，今后仍将勇敢揭露、公开批评和坚决消除自己工作中的错误和过失。

苏共中央认为，到现在为止党所进行的消除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工作已经有了良好的结果。

苏共中央委员会根据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向所有党组织发出下列号召：

在我们全部工作中始终如一地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中关于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人类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改造社会、争取共产主义胜利的革命斗争中的决定性作用这样一些最重要的原理；

不屈不挠地继续贯彻党中央委员会近几年来进行的工作，即各级党组织自上而下地严格遵守列宁主义的党的领导原则，首先是集体领导这个最高原则，遵守我们党章所规定的党的生活的准则，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完全恢复苏联宪法中所体现的苏维埃社会主义民主的原

則，徹底消除破壞革命的社会主义法制的現象；

動員我們的干部、全体共產黨員和最廣大的劳动人民群眾為實現第六个五年計劃的任務而奮鬥，為此盡力發揮群眾——歷史的真正創造者的創造性主動性和力量。

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指出，我們这个时代的一个極重要的特点是，社会主义变成了世界体系。發展和确立社会主义的最困难的时期已經过去了。我們的社会主义國家不再是資本主义國家汪洋大海中的孤島了。現在，全人类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建設着新生活。社会主义思想正在掌握資本主义國家中千千万万人。社会主义思想对于正在反对各种殖民主义的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人民的影響是巨大的。

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決議，被一切擁護和平和社会主义的人、一切民主和進步人士看成是鼓舞人們為鞏固世界和平、為工人階級的利益、為社会主义事業的勝利而鬥爭的綱領。

在目前的条件下，在各國共產黨和整个國際工人運動面前开辟了廣闊的令人鼓舞的前景——同一切和平力量一道努力防止新的世界大戰，約制壟斷資本，保障持久和平和各國人民的安全，停止擴充軍備，使劳动人民擺脫因擴充軍備而帶來的沉重的稅收負擔，捍衛保障劳动人民為自己的美好生活和光輝未來而奮鬥的民主權利和自由。这正是世界各國千百万普通人切身关心的事情。苏联、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及其他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國家的和平政策和日新月异的成就，在極大程度上促進這些問題的順利解決。

在新的歷史情況下，共產國際和共產黨情報局這樣的工人階級國際組織停止了自己的工作。但是，這決不是說，站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立場上的革命的兄弟政黨的國際團結和接觸的必要性已經失去意義。現在，当社会主义力量 and 社会主义思想在全世界的影響有了無限增長的時候，当不同國家沿着不同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時候，工人階級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當然應該在反

对新战争威胁的斗争中，在反对那些力图镇压所有革命运动和进步运动的垄断资本的反人民势力的斗争中，保持并加强自己的思想统一和国际主义的兄弟团结。把各国共产党团结在一起的，是把工人阶级从资本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这一伟大目标；把各国共产党结成一体的，是对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的忠诚，对于人民群众利益的绝对忠诚。

在现时情况下，各国共产党的工作都从每一个国家的民族特点和条件出发，最充分地反映自己人民的民族利益。而且，它们意识到为工人阶级利益、为和平和自己国家的民族独立而进行的斗争，同时就是整个国际无产阶级的事业，因此它们团结起来，加强彼此之间的联系和合作。现在，各国工人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思想团结和兄弟般的团结尤其是必要的，因为垄断资本正在建立诸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和巴格达条约这样一些国际侵略性的联盟和集团，来反对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反对民族解放运动，反对工人阶级以及劳动人民的切身利益。

苏联过去和现在为缓和國際緊張局势做了许多工作，现在大家也都承认这一点，但是，美国垄断资本却继续拨出大笔款项来加紧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进行破坏活动。大家知道，当“冷战”正激烈的时候，美国国会正式拨出一亿美元（非正式拨出的经费除外），在人民民主国家和苏联进行破坏活动。现在，当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尽一切努力来缓和國際緊張局势的时候，主张“冷战”的人却力图使遭到全世界人民谴责的“冷战”活动加紧起来。美国参议院关于补充拨款二千五百万美元以从事破坏活动的决议，就说明了这一点，这种破坏活动被厚颜无耻地称为对“铁幕”后面的“自由的鼓励”。

我们应当冷静地估计这个事实，并且从中得出相应的结论。譬如，反人民的波兹南骚动的经费显然就是从这里来的。但是，领取大洋彼岸的经费的挑衅分子和破坏分子只逞了几小时的威

風。波茲南劳动人民对敌人的襲击和挑衅作了反击。卑鄙的“斗篷和短劍”騎士的計劃失敗了，他們对波蘭人民政权的可耻的挑衅失敗了。今后在各人民民主國家進行的破坏活动还会像这样地遭到失敗，不管这种破坏活动从美國壟断資本那里得到多么慷慨拿出的經費。可以說，这些錢是白花的。

这些都証明，对于力圖潛入社会主义國家來危害和破坏劳动人民成就的帝國主义間諜的新陰謀，絕不能疏忽大意。

帝國主义反动势力力圖使劳动人民离开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的正确道路，力圖向他們灌輸毒素，使他們不相信和平和社会主义事業的勝利。虽然資本主义壟断組織思想家玩弄各种陰謀，以久經考驗的共產主义先鋒隊为領導的工人階級在沿着自己的道路前進，这条道路已經引導到了社会主义的歷史性成就，并且还要引導到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新勝利。可以相信，各國共產党和工人党將更高地举起光荣的馬克思主义的無產階級國際主义的旗帜。

苏联人民理所当然地引为自豪的是，我們的祖國第一个鋪設了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現在，当社会主义已經成为世界体系，各个社会主义國家之間建立了兄弟合作和互助的时候，發揚社会主义民主，進一步加强共產主义的物質生產基礎，不断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全面發展新型的人——共產主义社会建設者的个性，就有了良好的新条件。讓資產階級的思想家去編造共產主义“危机”、共產党隊伍“混乱”的神話吧。我們听慣了敌人的这类咒語。他們的預言最后总是化成泡影。这些倒霉的預言者出現了，又消失了，而共產主义运动，不朽的、生气勃勃的馬克思列寧主义思想却不断取得勝利。今后也仍將是这样。我們的敌人的任何惡毒的誹謗攻击，都不能終止人类走向共產主义的不可遏制的歷史發展進程。

苏联共產党中央委員會

1956年6月30日

意大利共產黨總書記陶里亞蒂：

敵人的存在

(原載1956年7月3日意大利“團結報”)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現在已經發生的轉變是這樣深刻和廣泛，以至目前很難估計它的全部意義。運動現在的趨向是社會主義、和平和民主的趨向。許多國家組成的一個體系在參加這個運動。執政幾十年的、為改造社會的經濟和政治結構而努力的、已經取得以前誰也不敢認為可能的那種成果的各個政黨在發展這個運動。在資本主義統治的各國中，那些在工人階級和人民當中深深扎根的在野黨派在自己的活動中對這個事業也作出了貢獻。這是一種多種形式的運動。這個運動不斷遇到新舊各種問題，這些問題在這個一往直前、確信不移的運動所創造的條件下獲得解決。

這個運動有一個特點，那就是，現在存在於世界上的不再是被種種敵人包圍和攻擊的僅僅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在二十年中曾經是這樣的國家），而是存在着社會主義國家體系。因此，在這些國家執政的工人階級和政黨從事政治和經濟活動就獲得了新的保證，看到了更廣闊的發展遠景，在執行綱領和發展運動的時候也就更加自由、更加大膽了。

我想，資本主義領導階級現在應該是已經相信：要是希望在已經建成社會主義社會的地方、或者在正在建設社會主義的地方恢復舊經濟制度 and 社會制度，那純粹是空想。至少那些還保持着一些現實感的人，是應該已經明白了的。今天在社會主義世界發生的一切，應該使他們更加明白。共產主義運動中正在

發生的轉變，事實上是朝向加強各個社會主義社會的方向，朝向更迅速、更具信心地建設這些社會的方向，朝向人民群眾和領導人之間更有效地保持聯繫的方向。這個運動向相反的方向走，是不可能的；而世界各地我們的隊伍中進行的、伴隨着而且有助於我們的向前發展的一切討論，向着違背我們運動的偉大指導原則的方向走也同樣是不可能的。這一點，敵人是不同意，也絕不會理解的。然而，敵人是存在的，他們是有力量的、不斷活動的、無情的。在我們陣營之外，他們仍然是強大的；就是在我們陣營之內，也不是沒有他們的勢力和據點的。這是不能否認的。不久以前的波茲南事件提醒了我們，十分有力地提醒了我們。昨天的和今天的法西斯分子的聲音以動人的方式同社會民主黨黨員副總理的聲音融成一片，還不相信的人只需听听這種混亂的喧囂就夠了。

有一種論調說：隨着社會主義社會的進展和勝利，它的敵人的數目也增加了；我們批判了、駁斥了這種論調，不僅因為它是錯誤的，而且因為它是偏差行動的根源。

實際情況相反。實際情況是：社會主義的勝利把越來越大的支持、越來越大的同情爭取到社會主義的一邊，社會主義越來越有效。看看現代世界，你就可以相信這一點。但是，敵人仍然存在，他們沒有讓步，他們還抱着種種荒謬的希望。很明顯（我認為甚至不值得一提），這些敵人絕不是勞動人民，絕不是要求人們更為注意解決他們的實際生存問題的勞動人民。要說是正在建設社會主義的國家中不存在阻礙圓滿解決這些問題的困難，這是不可能的。這些困難今天是不可能不存在的，因為各國人民十年來承受着冷戰重壓，遭受着新武裝衝突的相當實在的威脅，今天在世界上大家都明白：為了阻止社會主義前進，敵人用了怎樣大的力量。敵人是這樣的一些人：在我們進行着以較少犧牲來克服現存困難的過程中，他們進行挑釁，使用暴力，煽起反對工人、農民的社會主義政權的武裝鬥爭。在再也沒有

剝削他人勞動的資本家的社會里，勞動、勞動組織和勞動報酬的問題不是依靠步槍和機關槍來提出和解決的。但是，既然美國國家預算中每年要用一億二千五百萬美元來在不再是資本主義的國家中製造暴力事件和挑釁，那麼能夠迫使多少步槍和機關槍發射呢？

因此，敵人是存在的。敵人極其彰明昭著地存在于波茲南。但是，在其他地方也存在，因為他們要試圖使我們脫離正途，散播混亂和失敗情緒，歪曲真相，用盡辦法來阻撓社會主義進展，阻止共產黨人成為爭取使人類擺脫任何奴役枷鎖的偉大運動的主要原動力。必須盡一切努力來使我們也存在，使工人階級的有覺悟的、有組織的先鋒隊也存在，從而抗击敵人，孤立敵人——今天比其他任何時候更容易這樣做——和擊敗敵人。

我們不了解我們波蘭同志遇到的、為了實現他們面前的偉大任務而每天必須對付的具體困難。我們知道他們已經取得成就，那就是，他們已經改變了波蘭舊日反動社會的面貌，他們建立了一個新的年輕的民主的和社會主義的波蘭。因此，我們的判斷必須認真而審慎。在工人群眾中間有一個政治先鋒隊，這個組織的活動以及它同工人和人民的經常聯繫——在任何情況下，對我們共產黨人來說，這些都是使得波茲南事件這類令人痛心的事件不再發生的主要的決定的條件。我們知道，我們的波蘭同志為了實現這些條件，過去和現在是用怎樣的精力、怎樣的忘我精神和怎樣的智慧在工作。我們知道，他們今天在怎樣鬥爭，爭取給予他們所領導的社會以新的民主的推動力量。我們只能祝他們的努力獲得成功。

意大利共產黨總書記陶里亞蒂：
关于苏联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決議的聲明

(原載1956年7月4日意大利“團結報”)

陶里亞蒂同志在接見“國家晚報”記者的時候，就苏联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決議問題答复如下：

我還沒有讀到苏联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关于个人崇拜的原因和后果的決議的全文。就我所知道的來說，我覺得，这个文件对于澄清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对斯大林活动提出批判以后在國際工人和共產主義运动中產生的疑問，提供了極其重要的貢獻。至于我在那篇大家都知道的答記者問中采取的立場，我覺得目前最好是仔細閱讀我寫了些什么。苏联同志們在建設社会主义社会中遵循的路綫是正确的，对我來說，这一点是不用爭論的，而且我公开說过这一点。但是，就在这种認識的範圍內，也有对于斯大林領導下所犯錯誤、法制遭到破坏、党的民主和苏維埃民主受到限制等等对苏联經濟和政治的整个發展具有的意义和發生的影响作出不同判断的余地。我要再說一遍，这种判断的不同是可能的，而且在这方面的坦率討論只能对我们运动的發展有好处，因为这种討論是同比較高度的成熟、互相了解和信任相適應的。这尤其是因为这种判断上的不同，对于我们党的領導機構說來，絲毫不会損害、反而更会肯定对苏联共產黨領導人为了肅清对斯大林个人崇拜在苏联國內以及國際工人运动中的后果而進行的工作的無保留的拥护。

美國共產黨全國委員會總書記丹尼斯：

評蘇聯共產黨的決議

(原載1956年7月4日美國“工人日報”)

共產黨總書記尤金·丹尼斯昨天就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最近的決議發表的意見如下：

蘇聯共產黨的決議是世界馬克思主義者的友好意見交換中的最可喜的發展。它正確地使人們注意到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深刻意義，這次代表大會作出了為新的社會主義進展開辟道路的歷史性決議並且得出了關於戰爭並非不可避免和民主國家通過和平途徑走向社會主義的可能性的影響深遠的結論。

決議正確地估計了反動勢力想用關於重新估計斯大林的種種猜測來埋葬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巨大成就的奸險目的。這是符合我們的估計的，我們估計到這裡和其他地方的反動勢力要企圖歪曲和利用赫魯曉夫關於斯大林的特別報告來破壞國際工人階級運動的團結，這些“冷戰”勢力是不關心使和平共處成為固定的國策的；他們企圖使世界緊張局勢繼續下去，並且保持自殺性的軍備競賽。他們徒然地想挫敗反映在萬隆和日內瓦會議上並且仍在繼續增長的各國人民爭取世界和平的意志。

在我看來，蘇聯共產黨的這個決議大有助於解釋（但是顯然不是辯解）大家所知的個人崇拜之風的成長和在斯大林領導的後期所發生的對社會主義法制和原則的不可饒恕的違反。這個問題的實質不久即將由我們全國委員會討論，全國委員會到那時將集體地表示它的意見。

捷克斯洛伐克“紅色权利报”社論： 意义重大的文件

(1956年7月4日)

昨天，本报刊登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決議。这个党的文件不僅对于苏联共产党、对于苏維埃社会而且对于整个國際工人运动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这个文件也是对我們党的宝贵指示，我們党和以往一样把年長的、更有經驗的战友苏联共产党看作是導師。我們过去学习它，將來还将学习它在执行列寧的学說方面的原則性态度、执行党内生活的列寧主义原則的一貫精神以及对待經驗的創造性而不机械看待的态度。

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到現在这段时期是很短的。但是在这段时期里，在全世界以及我國都反映出，苏联共产党所通过的決議有巨大的生命力，它們加强了社会主义、民主和平的地位，并且在劳动人民的隊伍里引起了空前未有的革命性的轉变和主动性。

很明顯，在另外一方面，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所宣布的为巩固持久和平、社会主义和工人階級团结而斗争的偉大綱領，已經在反动的政治集团中，特别是美國的反动集团中引起了極大的不安。这种不安最近已經發展成对苏联、对各人民民主國家、对社会主义和共產主义的偉大和光明的理想大肆誣蔑的运动。

事实表明，各國共产党越是不屈不撓地和坚决地执行这个綱領，社会主义的敌人的憤怒和仇恨就越大。有关对斯大林的

个人崇拜以及他晚年时的嚴重錯誤的批評的某些事实，成了他們進行肆無忌憚的攻击的借口。从美國的帝國主义集团和美國報紙开始一直到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領袖范范尼之流的政客为止，他們都在發出所謂共產主义破產、各國共產党發生混乱以及社会主义体系分裂的叫囂。他們对社会主义明目張胆地進行破坏的目的在于破坏对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國家的信任，并且在國際工人运动的隊伍中制造混乱，同时在全世界面前掩藏他們的恐懼。但是，这并不能把任何人弄糊塗。

大家都知道，在我們討論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結論和教訓的过程中，在我們的國家里，一些基本上正直的人提出了一些問題，他們問：这种大胆的、公开的批評和自我批評不会削弱社会主义的地位嗎？

这种看法不管考慮得多么周到，并不是从原則性观点出發的。有必要公开地和大胆地談到个人崇拜的嚴重后果，以便各國共產党共同努力來尽速克服这种后果。当然，这个痛苦的事实在开头时引起了十分痛苦的情緒，它甚至給个别國家的共產党帶來了一些困难。但是，从工人階級的基本利益和目标的观点看來，所有这一切消極的現象同今天已經出現的和在今后几年將要更多地出現的偉大的積極的事实比較，就微不足道了。

苏联共產党对个人崇拜問題所采取的一貫的态度再一次証明它忠于馬克思列寧主义思想，証明了它对苏联人民和整个國際工人运动的有原則性的負責态度。这是个范例：以自己的錯誤教育工人階級群众和共產党人，要他們决不可允許过去的年代重演。

正如苏联共產党的決議在考察這個問題的时候所說的，有必要既考慮到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設所处的具体的客观歷史条件，也考慮到由于斯大林的个人品質而產生的某些主觀因素。

怀恨苏联和社会主义的文人記者竭力想歪曲這些問題。他們費尽筆墨紙張企圖証明个人崇拜的根源并不是在于这些客观

歷史条件和主觀因素，而在于蘇維埃制度本身，在于它的不民主的性質等等。

正如人們不能用髒手來掩蓋太陽一樣，人們不能以任何誣蔑來證明蘇維埃制度是不民主的。反共戰士們关于蘇聯不民主的謊言（他們費了極大力氣才保持住這種謊言），是不能使他們得到任何名聲的。畢竟，不是一個月或者一年，而是整整的幾十年都証明了保證人類的真正自由和真正民主的不是壟斷資本主義，而是社會主義。或者，有誰能說，易北河以西、北京以東的國家可以保證它們的公民的生活水準的不斷提高，保證他們有自由發展的真正可能性，毫無例外地都有工作的權利，有受教育和休息的權利，并且使他們越來越多地直接參加國家管理嗎？

只有蘇維埃制度和人民民主制度才推動了成千百萬的勞動人民群眾，喚起了他們对于國家管理問題的關心，使他們參加了新社會的建設工作。這種社會主義制度所產生的巨大的主動性即使在個人崇拜流行的情況下也是存在的，而且創造了偉大的歷史功績，雖然，很自然，它不能夠充分地、百分之百地表現和發展。這個真理由蘇聯的發展和我國十一年以上的社會主義建設得到了証實。蘇維埃制度和我們的社會制度的民主性在這當中得到了集中的表現。

共產黨人和全體蘇聯人民都贊同第二十次代表大會譴責個人崇拜的決議，并且採取切實的措施貫徹黨的生活的列寧主義原則，來進一步發展社會主義民主。

這就是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要求所有黨的組織完成的任務的意義。

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和其他兄弟黨一樣同意和支持蘇聯共產黨反對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措施。它已經從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決議中為它自己今後的工作作出了切實的結論。像廣泛的黨內討論和全國會議的方針所証明的那樣，這種結論的影響本身正在開始具體地顯露出來。必須沿着已經走上的道路始終如

一地前進，並且在我們生活的各方面實行列寧主義原則時不要鬆勁。

在目前情況下，當社會主義已經成為世界體系的時候，各國共產黨和整個國際工人運動面前展開了廣闊的前景。根據本國的特點和條件進行活動並且完全體現本國的利益的各國共產黨，都充分認識到在與共同敵人進行鬥爭中有必要經常加強國際團結的聯繫。由於資本主義國家各種侵略集團的存在和有人組織反對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的顛復活動，這種團結和對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原則的忠誠就更為必要了。

蘇聯過去和現在都一直在採取緩和國際緊張局勢的具體的和有遠見的措施。另一方面，美國壟斷資本某些人士正在火上加油希望使冷戰的污水變得更熱一些。我們記得美國國會為了在社會主義國家進行顛復活動而撥出的一億美元撥款和另一筆兩千五百萬美元救濟形式的撥款，按照美國參議員們的無恥的說法，這些錢是用于“鼓勵鐵幕後的自由”的。

在波茲南發動的反人民行動像它所表明的那樣是很早以前就詳盡地計劃好了的，這次事件教育我們要消除粗心大意和一切自滿情緒。只要這些毛病存在一天，壟斷資本家和某些政客就不會讓我們有任何過多的自由主義。

然而，披斗蓬帶匕首的黑衣騎士們的計劃以及資產階級分子談論的共產主義“危機”和“破產”的神話必將同歸於盡。類似的談話是既不新鮮又不古怪的。基佐、梅特涅和俄國沙皇在他們的時代都作過這種預言。可是他們今天哪里去了？他們已經消失在歷史舞台地板門下去了，可是共產主義思想卻取得了和正在取得勝利。追隨他們的足跡並且談論着星相家的“共產主義末日”的預言的人們今天有機會活着看到這個末日。歷史發展的邏輯清楚地預見到，那些今天囔着誣蔑社會主義的人們，明天就將埋葬他們自己。勝利的機車正沿着正確的軌道前進。橫在它的道路上的任何障礙都不能阻止這一向共產主義的進軍。

匈牙利“自由人民报”社論： 國際工人运动的重要文件

(1956年7月4日)

不論是考察共產黨人，或是社会主义進步和平的其他朋友，也不不論是考察敵視这一切的集团，我們都可以感到：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后的四個月內，党代表大会所作出的原則性的結論，所通过的并且正在执行着的实际計劃，曾經是而且現在也仍然是全世界注意力的中心。党代表大会引起健康的建設性的討論。在这些討論中，正像討論应有的邏輯一样，也產生了不正确的、錯誤的观点，这也是必然的。敌人对党代表大会令人振奋的精神進行了攻击。党代表大会后的四個月內，很多未加澄清的爭論問題，很多沒有被批駁的敌对的論点都出現了。因此，我們有一切理由高兴地、滿意地、贊許地來欢迎苏共中央6月30日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決議。这个決議總結了四個月來全世界对于重要問題的反應的經驗，对迫切重要的問題給予了答复，揭露了敌人的陰謀，糾正了一系列的錯誤。

大家都知道，苏共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对有关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对个人崇拜的嚴重后果，進行了深刻的嚴格的自我批評。以后在一些資產階級集团，首先是在最反动最極端的报刊和电台，对这一問題發出了令人刺耳的叫囂。但是恐怕很多人都沒有注意到苏共中央決議以極大的說服力指出的一点：即像其他很多情况一样，这一次他們抓轟動輿論的事物，是經過周密考慮的政治陰謀的一部分。这些人想用个人崇拜、用誇大由个人崇拜造成的錯誤、用不断的宣傳这些錯誤的办法，分散人們对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最重要的、極為群众拥护的教訓的注

意力。這就可以說明，他們為什麼不注意或者很少注意那些更驚動人的問題，諸如黨代表大會關於社會制度不同的國家和平共處、避免戰爭的可能性、過渡到社會主義可以有不同形式等問題所作的論斷。

敵視進步的人還妄想，蘇共在自我批評中所揭露的事實，在共產黨人中所引起的痛苦和驚訝，會導致國際工人運動團結的渙散。他們力圖促進這一分裂過程，但是他們嚴重的失算了。共產黨和工人黨的國際團結的力量證明是不可摧毀的。

蘇聯共產黨的決議滿意地認定，共產黨和工人黨是贊成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的言論的，但是決議同時也提醒人們注意這樣的事實：即曾經有、而且現在也還有一些在個人崇拜的後果及其影響的問題上的錯誤看法，和不正確的分析。蘇共中央在決議中和一些人所進行的對於我們說來也是很有益處的論爭，包含着具有重大意義的原則性論點。這些人認為個人崇拜所造成的錯誤，在蘇維埃社會主義社會制度中，引起了嚴重的歪曲現象，或者認為應該在蘇維埃社會制度中尋找個人崇拜的根源。

對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給黨和蘇聯人帶來了很多損失，但是從這裡是否可以得出結論說一個人就可以改變蘇維埃社會的社會主義性質、生產資料的社會所有制，將近四十年的工農政權蘇維埃的社會主義民主呢？這種結論只有根據帶有相反的征象的個人崇拜過分誇大斯大林的歷史作用，低估蘇聯人民創造歷史的活動的情況下，才能得出。至於說是否蘇維埃制度是個人崇拜的誕生地，對這種懷疑，蘇維埃的歷史經驗是會給予充分的駁斥的。從人民革命主動性中產生的蘇維埃，其本質和生命原素就是最廣泛勞動群眾積極參加國家事務。

從上述一切中，無論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或是6月30日決議中，都可以得出結論來：個人崇拜是同社會主義制度的性質不相容的，在向社會主義邁進的道路上，個人崇拜成為蘇維埃民主發展的障礙了。

正因为如此，苏共才冒了預見到的某种初期反面作用的危險，向个人崇拜展开了勇敢公开的原則斗争。

我們这里，还有别的地方，曾經提过或者現在仍在提出这样的問題：在苏联，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这种与社会主义不相容的現象是如何形成的？如何發展到这种程度的？我們之所以更加欢迎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新決議，正是因为对这个使我們不安的問題，給了一个穩定人心的、不容曲解的明确答复。決議詳細地分析了当时的歷史环境——在敌人的包圍中、單独解决了巨大任务的苏維埃社会主义國家空前的困难、在前人未走过的道路上向前迈進的巨大困难、年青的社会主义國家不断受到的國外的威脅和內部斗争，——这些就使得在一定时期內强有力的集权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民主成为必要了。所有这些都为个人崇拜的形成提供了可能性。我們應該看得很清楚了（主要根据現在發表的文件，而首先根据列寧的遺囑），斯大林的个人缺点是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促進了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而复雜的國際、國內形势又在多么大的程度上阻碍了及时揭露这些錯誤。

对这些錯誤，進行公开的正确科学的分析保證了类似現象不再重演，这一点也是很清楚的。社会主义在最近十年中，已經改变了國際形势，社会主义已經变为世界体系，正在向这个方向發生着影响。从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來，批評与自我批評的大力开展，建設性的理論爭論，所有社会主义國家的社会主义民主的加强与發展，都会促進这一点。可以肯定苏共中央委员会的这一个決議在苏联是会起很好的影响的。但其重要意义都远远超出苏联的範圍。这个決議变成了國際工人运动的極为重要的文献，它將加强工人运动的团结，維護原則的純潔性并且增强馬克思列寧主义原則的坚定性，也使我們匈牙利的共產党人增强了。讓我們更加全力以赴地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所指出的道路上向前迈進，更加加强我們行列的团结。在解决当前和未來的巨大任务中，讓我們更加相信劳动人民。

美國共產黨全國委員會主席福斯特：

成就和錯誤

(原載1956年7月5日美國“工人日報”)

若干星期以來，報界所進行的討論，基本上是正常而健康的。特別是其中所具有的強烈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性質，是極其有益的。但是，其中也包含一種不那樣好的消極成分。這就是這樣一種傾向：不顧國內和國外所取得的基本的成就，仿佛這些成就不存在或者沒有重大意義似的。

有些人好像是从這樣一種理論出發：我們越是多承認“錯誤”，我們就越能同群眾站在一起。他們所承認的“錯誤”有許多也許從來沒有發生過，這個事實似乎並不妨礙他們這樣做法。

甚至有人採取了一種錯誤態度，認為提到共產黨的成就就是要掩飾錯誤或替錯誤辯護。這種傾向是不正確的，如果不加以糾正，便會嚴重地損害共產黨和社會主義事業。群眾對這種過分的自我批評——等於是自我鞭打——的基本反應不是欽佩黨的隨便承認錯誤，而是說：我們要一個只會犯錯誤的政黨干什麼呢？必須把黨的成就和錯誤一起提出來，否則便是向群眾提供了根本不真實的圖畫。

以對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問題為例。黨員和其他工人對赫魯曉夫演說中所透露的一些事情表示驚愕和憤慨，這是完全正常和自然的。我們不應該採取任何行動阻止這樣做，相反，應該鼓勵這樣做。但是同時，我們必須把他們的憤慨引入積極的途徑，說明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不幸的事情，必須採取什麼措施來防止這種事情再度發生。

在这一总的方面，我們必須做的主要事情之一是：決不要忘記蘇聯、人民中國和人民民主國家在走向世界社會主義的道路上的決定性進展。我們還絕不能忽略這個事實：就是這些力量就在幾年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擊敗了希特勒法西斯主義而使世界免于受到空前的奴役。

關於對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討論，如果不把積極的方面——社會主義的許多巨大勝利——和消極的方面——斯大林的殘暴的過火行為——一起考慮進去，即使說不是真正有害，也是價值有限的，特別是在這一類文章是共產黨人所寫的時候。

小心這個字眼對美國共產黨在冷戰期間的工作——現在也在進行討論——也是同樣適用的。

在讀到至今所公布的信件和文章的時候，人們會得到這樣一種印象：覺得共產黨在這個期間所做的工作差不多只是接一連二地犯錯誤。

人們決不會想到在這些年份中，共產黨光榮地和正確地站在反對隱約出現的法西斯主義和戰爭的危險的戰士的前列；這是人民在使世界免遭原子戰爭蹂躪方面所以能夠獲得巨大和平勝利的部分原因。人們也不會想到共產黨在這樣做的時候受到了政府最嚴重的迫害。

因此，為了要改變改變，讓我們也要提一提共產黨所進行的許多激烈的法庭鬥爭，也要提一提我們英勇的領導者——丹尼斯、弗林、戴維斯、蓋茨、湯普遜、甘內特和其他許多人，這些領導者為了保衛人民最基本的權利和利益而長期坐監牢。

當然，黨在這個時期中也犯了一些錯誤，其中有許多都是嚴重的左傾宗派主義錯誤。但是哪個工人組織在這個時期沒有犯過嚴重錯誤呢？我願意說，共產黨的記錄同其他組織的記錄比起來還是好的。我們一定要承認和解釋我們的錯誤。列寧規定，這是考驗我們是否算得上一個真正的共產黨的衡量標準。但是，讓我們執行這種必要的任務的時候不要顯得似乎我們對

自己的錯誤感到得意，認為錯誤越多越好一樣。我們必須記住，共產黨和其他各個工人組織一樣，是靠了它的成就而成長起來的，共產黨的成就以及共產黨的錯誤，都必須讓群眾知道。

這個國家和其他地方的資產階級對於在斯大林事件方面必需進行的不幸的揭露幸災樂禍。世界各地的反動力量正設法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說成是一團錯誤、暴行和政治愚行。他們甚至愚蠢地希望這個運動陷於腐化和崩潰。因此，我們絕不能中人家的計，對我們自己的運動採取否定的態度。

在我們寫的文章中，我們絕不能忘掉基本歷史：偉大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在千阻萬難（其中對斯大林的崇拜只是最近的一個困難）面前，成功地領導人類走向新的和更高的社會主義秩序。

讓我們也記住，美國共產黨在這個偉大的建設性的世界運動中是一個毫無愧色的政黨。

法國共產党中央委員會聲明

(原載1956年7月7日法國“人道報”)

法國共產党中央委員會听取了訪問莫斯科的我們黨的代表團的報告，這次訪問的目的是同蘇聯共產黨代表討論有關兩黨和整個國際工人運動的問題。

法國共產党中央委員會贊同代表團的活動，並且對這次會談表示滿意。在會談過程中，兩黨對於第二十次代表大會所提出的一切問題的看法，特別是對於必須盡一切努力实现工人階級在爭取和平、民主和社會主義的鬥爭中的行動一致的看法表明是完全一致的。

中央委員會熱烈贊同蘇聯共產党中央委員會的決議，這個決議表明，在蘇聯是怎樣克服對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這個決議正確地提醒大家注意，第二十次黨代表大會所提出的那些極重要的問題應當特別引起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注意，這些問題為在和平、社會主義、工人階級的團結方面取得新的成就开辟了道路。

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指出了蘇聯在經濟、政治和文化上所取得的新的輝煌成就，以建設共產主義的宏偉計劃武裝了蘇聯人民；指出了蘇聯奉行的旨在鞏固和平的大胆的、始終如一的外交政策受到各國廣大人民羣眾越來越大的支持；揭示了現代防止戰爭的可能性和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新途徑的可能性；這樣，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就大大促進了國際局勢的和緩，並且有助於加強一切為和平和民主而奮鬥的力量的一致行動，有助於鞏固全世界社會主義陣營的地位。

決議追述了蘇聯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客觀的和具體的歷史

条件以及斯大林的一些个人特点，并且对斯大林个人崇拜得以滋長的整个情况作了深刻的和完全令人滿意的分析。这一決議十分正确地指出，个人崇拜給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党的事業帶來了一定的損失，但是，如果从苏維埃社会制度的本質中去找產生个人崇拜的根源，那就錯誤了。

在苏联，生產資料和政权掌握在同劳动農民結成联盟的工人階級的手里，所以，苏联的社会和政治制度不同于資產階級的民主，它是真正民主的和人民的制度，因为它真正反映出人民的意志和根本利益，反映出劳动人民的利益。同个人崇拜有关的錯誤束縛了（尤其是在斯大林的晚年）社会主义制度的發展，不过沒有使这一制度离开通往共產主义的道路。

苏联共产党領導者們的偉大功績在于，他們根据馬克思列寧主义的原則，着手糾正同个人崇拜有关的錯誤，恢复党内生活的列寧主义准則，發展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加强同群众的联系，使群众更加緊密地团結在列寧旗帜之下，这一切更加提高了苏联共产党在苏联各族人民中所獲得的信任和在国际工人运动中所享有的威望。

苏共中央的決議特別有力地指出在新的歷史条件下国际团結的重要意义。社会主义力量和社会主义思想对世界的影响固然已經大大提高，工人階級的馬克思主义政党却当然还是應該在反对新战争的威脅、反对資本以及爭取民主自由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加强思想上的一致并且保持和加强国际团結。

工人階級政党在自己的活动中是估計到各个國家的民族特点和条件的，它們充分反映本國人民的利益。同时，他們認識到：爭取工人階級的利益，保衛和平和爭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也是整个国际無產階級的事業，因而他們应当忠于科学的馬克思列寧主义思想，忠于無產階級国际主义的精神而在行动中团結一致。

鑒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員會的決議是一个对全世界工人运

动有着無比重要意义的文件，中央委员会号召全体党员認真地研究和广泛地宣傳这个文件。

这种研究对于筹备法國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和使这次代表大会獲得成功將是重大的貢獻。忠于馬克思列寧主义原則的法國共产党，將尽一切努力來实现工人階級的一致行动，因为工人階級的一致行动是为爭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而進行勝利斗争的極其重要的因素。

1956年7月6日

羅馬尼亞“火花報”社論： 在列寧主義原則性的旗幟下

(1956年7月6日)

共產黨和工人黨、全世界的勞動群眾以及一切為進步而鬥爭的人們以極大的興趣歡迎蘇共中央最近關於克服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決議。我們的黨、黨員和我國的勞動人民認為這個決議是一個具有重大政治和理論意義的文件。

這個決議就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對蘇聯人民、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工人運動以及國際關係所產生的影響作了深刻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分析。這個決議就有關克服個人崇拜的一些重要問題作了明確的答復，它照亮了為徹底肅清個人崇拜所造成的後果的鬥爭道路。這個文件在對事實進行科學分析時具有與二十次代表大會的文件相同的大膽的創造性的精神。因此，最近的這個決議對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工人運動在思想上的鞏固是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貢獻。同時，它有力地打擊了那些妄想群眾中引起混亂和迷失方向的反動企圖。羅馬尼亞工人黨黨員在黨的公開的會議上以極大的興趣閱讀了這個對共產黨黨員和全體勞動人民的革命教育、對他們在政治和思想上的提高具有巨大重要意義的文件。

具有歷史意義的二十次代表大會的決議在全世界獲得了巨大的反應，並獲得了蘇聯人民、蘇共全黨、人民民主國家的共產黨和工人黨、這些國家的人民以及全世界千百萬勞動人民的完全擁護。在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召開以來短短幾個月的時間內，可以明顯地看到，黨代表大會的決議對整個國際事態的發展起

着日益增長的、深刻的影響。目前，即使那些習慣于歪曲共產黨的任何一個文件以進行“宣傳”的最最反動的集團也不得不考慮到這些歷史性文件的存在和這些文件對千百萬人民群眾所產生的影響。

二十次代表大會召開以來的一段時期是蘇聯人民在實現第六個五年計劃和實現黨代會所擬定的和平建設的偉大綱領的鬥爭中獲得了巨大成就的時期。在同一時期，二十次代表大會所提出的、具有重大理論和實際意義的新論點已深入到廣大群眾的思想中，並推動他們為和平和社會主義而鬥爭。渴望和平的人民熱誠地接受了不同的社會和經濟制度國家之間和平共處和現時代防止戰爭的可能性的思想。他們相信，他們能夠制止侵略的挑釁者和保衛人類免受新戰爭的災害。任何一個政府也不能忽視日益眾多的群眾贊成以和平協商的辦法來解決各種爭端的決心，他們對國際舞台施加空前未有的壓力以反對侵略集團的陰謀。軍國主義集團的“冷戰”政策和軍備競賽的政策正遭受到嚴重的危機。愛好和平國家的陣綫正在擴大着；民族解放運動正以不可阻擋之勢在高漲着。

世界各國的共產黨和工人黨正從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關於從資本主義進入社會主義的不同形式的論點中得出最重要的結論，它們正注意根據自己所處的經濟、社會和政治條件，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保衛和平的堅定不移的先鋒戰士，正在為了所有工人階級政党和團體、所有擁護和平和國際合作的力量的一致而進行着有效的活動。

不難理解，二十次代表大會後，和平和社會主義力量的高漲是不會得到帝國主義反動集團的歡迎的。各國人民堅決要求縮減軍費開支、侵略集團內部明顯的瓦解傾向、社會主義陣營各國與其他國家合作關係的日益加強等事實也不可能使得那些利用加強軍備的政策和“冷戰”的戰略而榨取了巨額利潤的資本主義壟斷巨頭們滿意。不久蘇聯將在按人口計算的生產水平方面趕

上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的遠景——社會主義最凶惡的誹謗者也不敢否認的真實遠景，使得那些害怕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進行和平經濟競賽的帝國主義集團深深不安和憤怒。

正是由於敵人內部的驚慌失措和分崩離析，所以帝國主義反動集團和為他們服務的思想家們求援於卑鄙的分裂活動；企圖利用二十次代表大會對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批評，作為他們廣泛進行污蔑性的反蘇、反社會主義宣傳的理由。他們想利用這種枉費心機的叫囂來反對日益增長的和平力量，反對二十次代表大會所激起的、擁護社會主義思想的浪潮和社會主義思想的吸引力。他們企圖在勞動人民中製造混亂和轉移工人階級及各國黨對二十次代表大會所提出的重要問題的注意。

帝國主義集團和為他們服務的論客企圖借此為不斷掠奪勞動人民勞動成果的資本主義的野蠻性披上一層煙幕，企圖使人們忘掉資本主義社會對人類尊嚴的玩弄和破壞，帝國主義戰爭所引起的千百萬人民的群眾性的屠殺和可恥的殖民制度下的丑惡行為。這種企圖是為了替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國家制度辯護，為了縮小社會主義民主在世界勞動人民心目中的巨大威信和降低社會主義對人民的吸引力。

然而生活本身就粉碎了這種企圖。

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為全人類开辟了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創立了工人階級與農民聯盟的政權。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標志著一種嶄新民主的建立，一種高級的國家制度，比任何先進的資產階級民主更為高級的國家制度的建立。在革命的火焰中，勞動人民建立了蘇維埃作為他們自己的政權機關——無條件為人民的利益而服務的人民政權。社會主義國家制度的民主性質証實了它的力量和無比的優越性，因為這個制度的基礎是：勞動人民對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和勞動群眾擺脫了剝削；這個制度不僅正式宣布了，並且從物質上保證了最廣泛的權利和民主自由，吸引廣大的群眾參加國家的領導和對自己命運的決

定。

由此產生了千百万苏維埃人民高度的政治積極性，激起了人民中潛在的巨大的建設性力量。這就是資產階級思想家所謂的“俄羅斯奇跡”的源泉。蘇聯人民曾勝利地完成了這樣一些奇跡，通過偉大的建設事業，古老的俄羅斯在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短時期內變成了一個偉大的工業強國；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戰勝了希特勒德國；在幾年以內恢復了巨大的戰爭創傷。

當然，在四分之一的世紀內，當蘇維埃國家還是唯一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時候，蘇維埃國家和蘇維埃社會主義民主的發展道路不可能是平坦而沒有波折的。蘇維埃國家不是在一個晚上和在沒有風暴的溫室里成長起來的，而是在敵對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汪洋大海中成長起來的，它像一個被全世界反動力量圍困中的堡壘。

在這整個時期中，帝國主義反動勢力不停地陰謀反對工農國家，組織武裝干涉，不斷地向蘇聯派遣間諜和破壞分子，組織各種反蘇聯盟、“軸心”和公約，最後則公開組織了希特勒的侵略。我國的勞動人民——蘇聯的鄰居，清楚地知道，並且不會忘記，剝削階級時時刻刻在培植對蘇維埃國家的仇恨，竭力把羅馬尼亞變為“反蘇的利劍”而洋洋自得，準備反蘇侵略活動，從而嚴重地損害了羅馬尼亞人民的切身利益。

由於長時期進行着的殘酷的階級鬥爭，使得蘇維埃國家生活中的這段特別艱難的時期更加複雜化了。在這個時期，黨內還必需進行反對列寧主義的敵人——托洛茨基分子、右傾機會主義者和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的鬥爭。所有這些和在建設中的巨大努力交織在一起。在這種形勢下，不可避免地需要有不屈的紀律、高度的警惕性和極其嚴格的集中領導，這樣就不能不採取一些暫時性的限制民主的措施。蘇聯人民為了鞏固國家的利益，自覺地接受了這些措施。

這些客觀的、具體的歷史情況加上早被列寧批評過的斯大

林个人的一些缺点，就使得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發展成为可能。斯大林把对党和國家内部民主的一些暂时性的限制提高到党和國家内部生活的准则。当國家公安机关逐渐脱离党和政府的監督和当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貝利亞的罪惡匪帮窃取了这些机关的領導地位以后，形势就更加惡化了，其結果就是苏維埃法制遭到嚴重的破坏和發生了大規模的鎮压。苏共中央的決議令人信服地指出了：在当时的条件下，即一切建設社会主义的成就都归功于斯大林，想解除斯大林領導职务的任何意圖都不会被群众所理解，都不会得到人民的支持。而且，在那种情况下，这样的行动会被認為是反对社会主义建設事業的行动。被認為是在資本主义包圍的环境下破坏党和國家團結的危險的行动。

不难理解，社会主义民主的削弱絲毫不能改变这种民主的本質。一个人不管他有多么大的功績或有多么大的缺点，都不能改变一个社会制度的性質。何况，所有这些已成为苏維埃歷史上的陈迹了。任何煽惑性的謊言也掩盖不了这样的事实：苏联共产党在其中央委员会的領導下，作出了列寧主义原則性的、对人民利益無限关怀的榜样；它在三年多的時間内，以列寧主义者所具有的坚持不懈的精神和鎮定周密的态度進行了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斗争，發揚了來自下面的建設性的批評，鍛煉和教育群众深刻理解自己的切身利益。

苏共中央为徹底肅清个人崇拜的后果所采取的措施为今后不再發生同样現象、为今后党和國家在廣泛發揚党内民主和苏維埃民主的基礎上進行集体領導提供了可靠的保証。

苏共中央的決議極其明确地闡明了与个人崇拜有关的一切問題，并正确地指出了其他國家的一些朋友对某些問題的錯誤解釋。無庸置疑，各國共产党和工人党根据馬克思列寧主义的学說、根据对產生个人崇拜的具体条件的了解和对苏联共产党为徹底肅清这种違反苏維埃社会本質的現象所采取的措施的了解，將懂得如何闡明和消除与这些問題有关的混乱現象。

对个人崇拜的公开批評是苏联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整个国际工人运动的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贡献。它又一次証实了苏联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苏维埃制度的力量，以及在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之間在相互最大信任的基础上所具有的不可摧毁的联系。难道任何一个资产阶级政党能采取同样的态度嗎？这些政党的领导人为了进行誹謗正热衷于挑撥、誇大和利用一些不良的现象。而这些不良现象正是苏联共产党为了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發展中取得更大的成就而曾經进行过批評的。

苏维埃国家發展的整个历史表明苏维埃国家力量的源泉在于群众的觉悟。苏联共产党正在不断地提高群众的觉悟，發揮他們的积极性和創造性，發揚他們独立思考和独立行动的能力。

由于公开地批評了个人崇拜，共产党更加巩固了，与人民的联系更加密切了，人民把党看作它的基本利益的忠誠衛护者并給党以無限的支持。在这一考驗中，党——作为苏联人民的久經鍛煉的先鋒隊——的威信加强了，党中央委员会，它的正确地、有原則地、勇敢地指出了方向的列寧主义的領導核心享有的巨大威信增長了。

在目前的歷史条件下，当社会主义已成为一个世界体系的时候，在所有的共产党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前面，展开了廣闊的令人兴奋的远景——达到这些远景的主要条件是它們之間的思想一致和它們之間的解放工人階級的偉大目标的一致性，以对馬克思列寧主义的忠誠，以無產階級國際主义思想为基础的兄弟团結。

歷史經驗說明敌視無產階級团結的人們會不止一次地企圖利用他們認為最适当的时机來破坏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团結，共产党和工人党及时地發覺了这些陰謀，并从粉碎这些陰謀的过程中得出了有切身重要性的，永久有效而現实的教訓。

由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決議而懂得歷史發展道路和前

途的共產黨和工人黨，在他們的工作中是以民族特点和每個國家的具体条件为出發点的，它們努力使自己能更完全代表它們的人民的民族利益，同时因結着它們的隊伍并加強着他們之間的不可分裂的联系和兄弟般合作。生活表明在國際工人运动內部，產生着一個新的力量的巨大高潮。只有那些不能認識现实并習慣于把现实和他們自己的夢幻混淆起來的人才能把這一將導致共產黨和工人黨的政治和組織力量的巨大巩固的創造性过程看作是……“共產主義的危机”。

当然，也可能有些動搖分子、脆弱分子、缺乏政治遠見和革命原則性的人，他們在因公开批評个人崇拜而產生的一些困难面前發問了：“为什么需要这个呢？”或者迷失了共產主義事業的不可阻擋的前進的远景。然而对于任何能以馬克思主義判断事物的人來說，这一分析对整个國際工人运动为爭取社会主义勝利而進行的斗争將帶來何等巨大的力量源泉，是顯而易見的。十分明顯，从工人階級的基本利益，从工人运动的最終目的來看，結果將是一個偉大而有益的總結。

羅馬尼亞工人黨从它本身的經驗中，認識到了苏联共產黨代表大会激起和鼓舞起的革命力量和創造性積極性的高潮是多么強大。在我們黨內，曾自上到下地就苏联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決議和參加代表大会的羅馬尼亞工人黨代表团的報告進行了廣泛的討論。这一討論表明了全体黨員毫不動搖和毫無保留地完全支持苏联共產黨代表大会的歷史性決議，表明了他們要从这些決議中得出实际教訓的意志。这种討論不僅反映了業已提高了的黨員的政治水平，同时也是有力地發揮他們的政治積極性的机会。

在黨的州委員會、市委員会和縣委員會的積極分子會議上，在至今为止大部分黨組織舉行的會議上，數以萬計的黨員在討論時發了言。在这些討論中——我黨黨內民主發揚的證明——討論到了黨的工作的一切方面，進行了建設性的批評，作出了許

多有关改进党的生活、经济和文化建设、思想工作的建议。已经可以看到党员对党的政策，对国际生活等问题的强烈兴趣，对巩固党、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对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问题的责任心。这一讨论的良好结果，现在已经可以在党组织的工作的得到改进，在不仅是在城市而且也在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成就，在为完成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所提出的任务而进行的斗争中觉察出来。党的组织有义务切实遵行这一讨论所得出的经验和结论，注意所提出的宝贵的建议和批评，毫不迟疑地采取一切措施以改进党员们所批评过的缺点，使这一讨论的成果不致于事无补而是增长和千百倍地发展。

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同意了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三月全会就个人崇拜在我国的影响所作的分析以及党和政府在最近几年中为克服个人崇拜的后果而采取的措施。

在党的领导下，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由于他们的劳动和英勇奋斗，我国已从几世纪来的经济落后状态中摆脱出来，今天它正迅速地在进步的道路上迈进。在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是为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所有劳动者建立幸福的一切斗争的坚实而不可动摇和唯一可能的基础。这一道路不是一条轻易而平坦的道路，但是是一条可靠的道路，它无疑地将导致一切障碍和困难的克服，导致人民的富裕生活——党的最高目标——的建立。

党教导我们，我们愈多地鼓励群众的积极性，愈鼓励他们积极参加解决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我们前进的步伐也会更加迅速。正因为如此，党的组织的职责就是：集中一切力量以严格地贯彻党内生活的列宁主义准则，首先是一切党的机关和组织中的集体领导的原则，鼓励自我批评和建设性创造性的批评，加强党的作用——作为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发掘新的建设性力量的热潮的保证。在这一方面，严格遵守人民法制，进一步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具有极大的意义。

在这一基础上，群众对人民民主制度——我國工人階級、劳动農民和知識分子的歷史性成果——的信任在加强着。

帝國主义分子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建設着社会主义的各國人民的偉大勝利是我們时代不可爭辯的歷史现实。帝國主义反动派，搖晃着業已破產的“冷战”的方法，他們想像似乎他們能改变進步的規律而撥付着数百万美元以支持如为人民波蘭的劳动人民所坚决肅清的波茲南的挑畔行为和分裂行动，然而这一切都是枉費心机的。羅馬尼亞人民，根据他們的切身經驗，很清楚地知道帝國主义及其代理人由于憎恨社会主义國家而能做出些什么罪惡行为來。我們沒有忘記帝國主义反动集团支持下的地主資產階級反动派借以使劳动者在馬拉克薩(工厂名，現为拉科西工厂——譯者)和1945年2月在王宮廣場上或1945年11月8日的法西斯挑畔时浴血的無耻行徑，我們沒有忘記進行土地改革时農民們在田野上所流的血。因此我國人民很清楚地知道是誰站在反对社会主义國家的运动的后面，是誰站在波茲南挑畔活动的后面；从前的剝削者、曾使工人过着奴隸生活的从前的老板們、压榨过農民的从前的地主、掠夺过人民財富的大壟断資本家，所有这些用無可奈何的憤恨心情看到在今天即便是使过去复活的幻想都已破滅的敌人。

所有这些再一次証实，只要剝削階級还存在，資本主义还存在，階級斗争还繼續是一个客观規律。不管那些为勝利冲昏了头腦的、馬虎疏忽的和沉醉于粉紅色夢幻的人們，这个規律在起着作用。那些人忘記了敌人还存在着、忘記了敌人还在策划凶惡的陰謀，而只要有可能，敌人就会毫不猶豫地使用暴力和罪惡行为以阻止我們前進，阻撓我們为使國家更富有，人民的生活更富裕而作的努力。

关于这一点，必須指出在反对斯大林的关于愈向社会主义前進，階級斗争也進一步尖銳化的錯誤論点时，不能得出下述結論，即在一定情況下，階級斗争不会具有若干尖銳的形式——特

別是在社会主义尙未徹底建成，帝國主义反動集團尙在竭力加緊“冷戰”活動和其他侵略行為的條件下。由此，黨的組織、工會、勞動青年聯盟必須對勞動者進行不松懈的警惕性的教育工作，反對對帝國主义代理人的陰謀採取漠不關心態度的現象。黨着重指出共產黨員的任務是把對群眾特別是青年進行共產主义教育的工作提高到一个更高的水平，毫不猶豫地擊破任何削弱我們為反對資產階級思想和道德的影響而進行的鬥爭的傾向，任何對有害於我國人民向社会主义前進的異己思想的自由主义的態度。

我們的力量，工人階級、勞動農民、知識分子的力量，人民民主制度的力量是巨大的並與人民在建設新的生活的工作中獲得的成果同時不斷地增長着。為了這些成果，較任何時候都更緊密地團結在黨和政府周圍的羅馬尼亞人民決意為社会主义建設事業，決意為巩固曾付出如許犧牲而爭得的人民民主制度作一切努力。它決意不斷地加強與蘇聯、與社会主义陣營的一切國家、與所有愛好和平的國家和人民的友誼。

* * *

在我們的時代，社会主义思想對世界上一切國家具有着強烈的吸引力。在不朽的，在業已獲得解放的三分之一的人類的上空飄揚的馬克思列寧主义的旗幟下，廣大的勞動者群眾團結成爲一個為和平與社会主义而鬥爭的強大力量。任何人、任何東西都不能阻止他們向社会主义和共產主义前進的不可抗拒的步伐。

保加利亞“工人事業報”社論：
**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旗幟下
走向新的勝利**

(1956年7月6日)

几天以前公布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決議，引起了世界各國巨大的兴趣。它現在仍然繼續是世界公众的注意中心。对于決議中所提出的問題的大量反应和活躍的評論，就証明了这一点。

对苏共中央这一決議——这是一个具有重大政治和理論意义的文件——發生巨大兴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決議中清楚地表现出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歷史性決議在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当中、在兄弟共产党和工人党当中、在社会主义陣营國家当中、在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人民当中所引起的强大的高漲，它回答了極其重要的問題，揭穿了敌人的詭計，清楚地闡明了实际事实。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創造性开展的新階段，代表大会对当前的苏联國內外形勢作了一个深刻的分析，用建設共產主義的宏偉計劃武裝了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并且为工人階級一切党派的統一行动、为制止新战争的危險、为保衛劳动人民的利益开辟了新的远景。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剛剛結束不久，就是这样一个短短的时期，也足以說明代表大会的歷史性決議的偉大生命力。这些決議对國際局勢給了特別有益的影响，促進了國際緊張局勢的緩和，加强了一切爭取和平民主力量的一致行动，促進了世界

社会主义体系的進一步巩固。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得到各國劳动人民的一致拥护和热烈欢迎，但是在工人階級的敌人陣营当中却引起了狂怒和驚慌。美國和某些資本主义國家的反动集团，企圖减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決議的吸引力和轉移劳动人民对決議的注意力。最近在資產階級报刊上展开的廣泛的侮辱性的反苏运动，就是追求这样目的的。資產階級御用文人企圖利用与譴責对斯大林个人崇拜有关的某些事实來進行这项活动。資產階級的理論家們使用了各式各样的詭計，以至最粗暴地歪曲事实，企圖以此动摇苏联和社会主义陣营劳动人民的团结和信心，掩盖馬克思列寧主义偉大思想的光芒，在國際共產主义和工人运动的行列中制造混乱。

但是，事实表明，帝國主义陣营的先生們的算盤是打錯了，正像我國人民諺語中所說：这笔賬是酒店老板不承認的。所以它注定要完全失敗。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所進行的对个人崇拜的勇敢的批評，完全不是軟弱的表現。相反地它清楚地証明了苏共和苏联人民的力量和团结一致，証明了苏維埃社会制度的不可动摇性，証明了沿着在馬克思列寧主义偉大学說照耀下的道路前進的坚定的决心。

可以公正地問一問帝國主义的贊揚者們：在什么地方、在哪个資本主义國家，执政党能够这样尖銳、这样坦率地提出类似的問題和采取类似的步驟？用不着証明，資本主义國家中任何一个执政党都不可能作出这一点來。而苏联共產党却說出了关于对斯大林个人崇拜問題的全部真实情况，尽管这种真实情况是多么痛苦。

沒有任何疑問，各國劳动人民、全世界正直的人們將在苏共中央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決議中找到發生和散布非馬克思列寧主义現象的原因的深刻的解釋。这个文件非常清晰地、全面地分析了散布个人崇拜的客观条件和斯大林个人品質

有关的主观因素。

苏共中央的決議是受到苏联共產党、全体苏联人民和全世界共產党和工人党的拥护的。苏联人民——共產黨員和非党人士、妇女和青年們——表現了对苏共和苏联政府不可动摇的信心，表現了坚毅忘我的精神，表現了为巩固苏維埃社会主义制度和为提前完成第六个五年計劃的任务而斗争的坚决态度。各兄弟共產党和工人党把反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斗争，看作是为馬克思列寧主义的原則的純潔性所作的斗争，看作是以創造性的态度解决國際工人运动当前問題的斗争，看作是确立和更進一步發展無產階級國際主义原則的斗争。公布的決議对巩固工人階級國際主义的兄弟般团结、对分清社会主义和和平的敌人和朋友是很重要的贡献。決議教導我們要警惕那些暗藏的帝国主义間諜和反人民的力量。他們正如在波茲南一样企圖以卑鄙的挑畔行动來破坏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秩序。

某些資產階級報紙对于公布这一決議發出了瘋狂的叫囂。它們的暴怒和企圖歪曲这一決議的內容和意义的詭計、某些反动集团中的驚慌失措——这都說明了这个文件是多么及时和重要，这个文件的國際意义是多么巨大。“人道报”說：“这的确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文件，这样的文件在國際工人运动史上是少有的，虽然，毫無疑問，我們正是生活在歷史上一个偉大的时期。現在已經对这个时期進行了深刻的馬克思列寧主义的分析。那些誹謗苏联和我們的党的人，对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進行捏造并且对它乱加猛烈抨击的人，只能混水摸魚，而現在水已經澄清了。”

我國人民一致拥护苏共中央的決議。根据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決議的精神，保共中央在四月全会上作出了對我們党和國家很重要的結論。全会确切地对全体黨員和全体劳动人民指出了个人崇拜的原因和本質，并且采取了一系列根除个人崇拜的重要措施。保共中央四月全会的決議表現了我們党的力量和

战斗力，証實了我們党所执行的政策的正确性。

現在，我國工人階級、劳动農民、全國人民都團結在党的旗幟下，在党中央委員會的領導下，正以更大的毅力為實現我國社会主义建設的巨大計劃、為提高人民福利而斗争。在他們面前有令人鼓舞的苏联人民的榜樣。苏联人民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決議的精神照耀下，正滿怀信心地走向共產主义。

苏联“真理报”社論：
**共產党是苏联人民的
鼓舞者和領導者**

(1956年7月6日)

在社会發展史上，有过不少政党在本國的生活中以及在确立和維護本階級的統治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但是歷史上沒有見過像偉大的列寧創建的苏联共產党这样的政党，苏联共產党做了許多事情來發展自己的國家和提高劳动人民的地位，它在整整五十年中对世界事态的進展有極其重大的影响。

近代史上决定世界發展道路的許多極其重大的事件是同我們党的名字密切联系着的。屬於这些事件的有：三次俄國革命（这三次革命終于導致受到全体劳动人民支持的俄國無產階級在1917年10月的勝利），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國家的建立，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建成，希特勒德國和軍國主义日本的潰敗，世界文明从法西斯分子的蹂躪之下得到拯救。由于侵略者被歼滅，人民民主制度在欧亞兩洲的一些國家中得以產生和巩固，使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得以形成。

我們党的整个政策和党的一切活动都反映出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我們的党在全世界劳动者中博得了深刻的热爱，在國際共產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中有崇高的威望。

苏联共產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是最近几年中一件大事，它在社会政治的發展中开辟了新的歷史时期。代表大会以正在勝利实现的共產主义建設的宏偉計劃武裝了苏联人民。同时，代表大会的決議为國際共產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为爭取防止新

战争、争取各国人民的自由和独立的一切进步力量开辟了新的远景。代表大会提出的原则性论点是具有伟大的前途的，这些论点是：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现代避免战争的可能性，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多种形式，工人阶级团结一致的必要性和取得团结一致的方法。

我们党的伟大胜利的秘诀何在呢？秘诀在于，我们的党随时随地坚定地忠实于永远生气蓬勃的和不断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党一直是现代最先进思想的旗手，它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是革命行动的政党，它致力于按照正确的新原则改革社会。

共产党的力量在于它的列宁主义的集体领导的英明性，在于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在我们的国家里，人民和我们的党是分不开的。苏共中央“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中说：“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苏联人民在执行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在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各方面取得了新的卓越成就。苏联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并且在为完成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所提出的任务的斗争中表现了高度的创造性积极性。”

伟大的列宁创立了我们的党，它是工人阶级和一切劳动者在为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和建设共产主义的斗争中的鼓舞力量和指导力量。列宁在制订在沙皇俄国的条件下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计划的时候写道：“我们面临着一个十分顽强的敌人堡垒，这个堡垒向我们射出密集的炮弹和子弹，使优秀的战士遭受牺牲。我们应该拿下这个堡垒，只要我们把正在觉醒的无产阶级的一切力量同俄国革命分子的一切力量联合到将为俄国一切有活力和正直的人士所倾心的一个政党中，我们就会拿下这个堡垒。”

列寧的不朽功績在於，他不顧難以相信的困難，建立了這樣的政黨。這是新型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是戰鬥的和革命的政黨，是吸收工人階級中、人民中最優秀的和最有活力的力量的政黨。在它遭受重大的歷史考驗中，它從為勞動人民的事業而鬥爭的一小隊忠誠的戰士成長為強大的蘇聯共產黨——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力量。

我們的黨成為執政黨已經快要四十年了。在這段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時期中，在管理國家方面，在國家的經濟和文化進行社會主義改革方面，在保衛革命的成果方面，在鞏固和發展勞動人民國際主義團結的原則方面，黨每一天都在進行積極的活動。黨經過巨大努力和創造性的探索，積累了在國家、經濟和文化建設各方面的領導活動的經驗，世界各國為共產主義而奮鬥的戰士現在和將來都從這一經驗寶庫中尋求啓示。

蘇共中央“關於克服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決議中指出，我們的黨曾經在極端複雜的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在二十五年多的時期中，黨所領導的蘇維埃國家曾經是在資本主義的包圍下為人類鋪設通向社會主義道路的唯一國家。新戰爭威脅的迫近曾經迫使它全力加速建設和加強我們國家的威力，全力加強防禦，全力同資本主義包圍的陰謀作鬥爭。

由於國內長時期是在進行殘酷的階級鬥爭，解決着“誰戰勝誰”的問題，情勢更形嚴重。列寧逝世後，托洛茨基分子、右傾機會主義者、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大肆活動，他們採取了拋棄列寧提出的關於社會主義可以在一個國家中取得勝利的理論，這實際上就會導致資本主義在蘇聯的復辟。黨不得不在解決經濟和文化建設的十分重要的任務的同時，對這些反對列寧主義的敵人進行無情的鬥爭。

實現列寧提出的在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的計劃要求極迅速地建立起頭等的社會主義工業，對農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實行文化革命。共產黨執行了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農業集體化和實

行文化革命的方針。結果，我們國家在極短的歷史時期內，在沒有任何外來的經濟援助的情況下克服了歷來的落后狀況，改造了自己的經濟和文化，基本上建成了社會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的建成使蘇聯人民在衛國戰爭中具有不可被戰勝的力量，使得有可能取得全世界歷史意義的勝利。

我們黨從建設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經驗中，証實了科學共產主義奠基人下列理論的正確性，這一理論說，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段從前者轉變到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這個時期的政治統治應該屬於工人階級。我們黨的歷史經驗同時也証明，領導掌握政權的工人階級的應該是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武裝起來的、有着自覺的紀律的黨，它的力量在於自己隊伍的和領導核心的團結一致，它得到工人階級中和全體人民中一切正直的和有忘我精神的力量支持。

社會主義的敵人不止一次地指責我們黨，由於在我國建立了工人階級的政治統治，就似乎使民主的基礎受到破壞。而實際上，正是工人階級的政治統治才是保障全體勞動人民不受資本壓迫，不受資產階級的暴力，不遭受帝國主義戰爭，不遭受階級的和民族的奴役的唯一辦法，正是工人階級的政治統治保障了真正的民主政治。蘇聯的歷史經驗令人信服地証明了這一點。蘇維埃制度發動了人民群眾中取之不竭的力量，吸引了千千萬萬人來自覺地管理國家，來建設社會主義社會。

在我國人民過去所處的那個複雜的國際和國內局勢中，在一定的階段，需要有鐵的紀律，需要不懈地提高警惕性，需要有極其嚴格的集中領導。正如蘇共中央“關於克服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決議中所指出的，這不能不對一些民主形式的發展起不好的影響。在同整個帝國主義世界進行殘酷鬥爭的過程中，我國不得不对民主作一些限制，從我國人民在帝國主義包圍形勢下為社會主義奮鬥的邏輯上來說，這是正確的。但是，這些限制還在當時就已被黨和人民看成是暫時的，是應當隨着蘇維埃

國家的巩固以及全世界民主和社会主义力量的發展而予以取消的。

尽管由于复杂的局势而对一些民主形式有一定的限制，但是苏维埃制度从它存在的第一天起就是一种比任何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更高的民主形式。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苏维埃制度下，政权是为大多数居民服务，资本主义国家则不然。

共产党坚决贯彻列宁的民族政策，它是苏联各族人民友谊的鼓舞者和组织者。

正是苏联第一个不是在形式上，而是事实上保证了民族平等，毫无例外地保障了全体社会成员有工作、受教育、休息、参加国家事务的权利，有言论、出版、信仰的自由，有自由发展个人才能的实际机会，能享受其他一切民主权利和自由。

最近几年来党采取了新措施来发展我国社会生活的民主基础。这些措施中包括扩大加盟共和国的职权，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改变计划制度以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加强地方苏维埃的活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任务在于，今后要十分坚决地发展苏维埃社会主义民主，吸引越来越广泛的劳动人民阶层来积极参加管理国家的工作。

二

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获得的一切成就应当归功于共产党的领导。

有时有人问：为什么苏联只有一个政党？因为，许多党派的存在是拥有利益不一致的各种阶级的社会所特有的现象。这首先是拥有敌对阶级的资产阶级社会所特有的现象。

在革命以前，俄国有许多政党。有资本家的政党，有地主的政党，有自称为社会革命党的富农政党和其他政党。但是，也有工人阶级的政党——伟大的列宁创立的共产党。这个党能够发动劳动人民起来反对资本家和地主、反对沙皇制度。在共产党

的領導下，完成了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共產黨在事實上和在生活經驗中證明，代表工人階級和保護工人階級的利益的正是它，而不是任何其他的黨。小資產階級政黨——社會革命黨人、孟什維克分子和無政府主義者等——破產了，在群眾面前暴露了自己是資產階級的幫手。

因此，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在十月革命中獲得勝利的俄國勞動人民相信共產黨是管理國家的舵手。共產黨在為社会主义建設而鬥爭的道路上引導蘇聯人民一步步前進，蘇聯人民對共產黨的信任和熱愛也隨着一年一年地越來越增加和鞏固了。

目前，由於社会主义的勝利，在蘇聯建成了一個和諧的新社會，在這裡沒有敵對階級、沒有利益不一致的社會集團。因此，在蘇維埃社會中，除共產黨以外，其他政黨沒有產生和存在的社會基礎。

外國有人對在蘇聯人為地建立受外國資本資助並且為他們的利益服務的非共產主義黨派感到興趣。但是，蘇聯人不需要這種黨派，蘇聯人們不強使任何人接受自己的社會制度，但是也不打算接受別人的制度。

當然，這並不是說，在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其他國家中，在一定的歷史情況下，不能吸收其他的勞動人民政黨參加管理國家，只要保證最徹底地反映工人階級利益的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領導作用。

至於我們國家，共產黨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唯一的心靈的掌握者、思想和願望的表達者、以及人民在爭取共產主義的整個鬥爭中的領導者和組織者。共產黨是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武裝起來的，它的力量在於自己的團結一致和紀律性，它無與倫比地善於組織千百萬群眾和在複雜的情況下正確地領導他們，它從蘇維埃政權成立的最初時日起，就滿懷信心地引導我們國家和社會生活走向共產主義。

列寧在1920年8月在第九次黨代表大會的講話中說：

“只是因为党曾时刻戒备，因为党有極嚴格的紀律，因为党的威信把一切机关及部門都統一了起來，而數十，數百，數千以至千百萬人都一致遵循中央發出的口號行動，只是因为忍受了空前未有的犧牲，只是因为有一切，才造成了現有的這種奇跡。只是因为有一切，才不管協約國帝國主義者和全世界帝國主義者舉行二次，三次以至於四次的進攻，而我們終能獲得了勝利。”

每當祖國處在危險的時候，每當需要犧牲和忍受匱乏的時候，每當國家面臨着新的復雜任務的時候，共產黨員首先沖向前、沖向困難、帶動廣大群眾，不斷取得勝利。凡是要解決革命命運、社會主義命運和共產主義建設命運的地方，共產黨員就必然在這些地方。

在國內戰爭和外國干涉的年代里就是這樣，當時我們黨的許許多多兒女在同敵人的鬥爭中拋棄了頭顱，然而沒有交出革命的成果。在恢復時期中也是這樣，在那時新經濟政策的復雜條件下，共產黨員站在同階級敵人進行殘酷鬥爭的前哨。在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的年代中也是這樣，那時共產黨員一大批一大批地走上了最大的建築工地，粉碎了階級敵人的猖狂和殘酷的反對，保證完成了黨的任務。在偉大的衛國戰爭年代中的情況也是這樣，那時黨把最優秀的力量放在前綫和後方決定性的地段上。

我們黨的領導作用在最近幾年更加有力地表現出來了，根據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倡議，開始實現了關於經濟的新發展、消除許多國民經濟部門、首先是農業部門的落後現象以及加強文化建設速度的重大措施。

根據黨的指示，地方黨機關和基層黨組織堅決扭轉了方向，面對着經濟建設的具體任務，開始更深入地研究經濟和生產技術，更積極地考查企業、集體農莊、機器拖拉機站和國營農場的情況。

數以萬計的共產黨員自願前往機器拖拉機站、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工作，他們以自己不倦的組織活動在農業的高漲中起了特別重要的作用，這種農業高漲是在最近時期開始的，並且在繼續不斷地發展中。蘇聯人民永遠不會忘記我們青年的愛國功績，我們千千萬萬的青年在黨的號召下前往東部地區開墾新地，走上第六個五年計劃中的建設崗位。

提高黨和它的所有地方組織的領導活動的水平，是在爭取進一步鞏固蘇維埃社會主義國家、爭取工業和農業的發展和爭取勞動人民的物質福利和文化高漲的鬥爭中獲得新的成就的一條可靠的道路。我們黨勇敢地沿着這條道路前進，因為它把蘇聯人民中最先進、最有覺悟和最有組織的一部分團結到自己的隊伍中，因為它同廣大的勞動群眾有着不可分割的聯繫。

三

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決議和蘇共中央委員會 1956 年 6 月 30 日發表的“關於克服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決議，對進一步鞏固黨和提高黨的領導活動水平有着特別重要的意義。

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指出，中央委員會反對個人崇拜是完全正確和及時的，因為個人崇拜的流行縮小了黨和人民群眾的作用，降低了黨內集體領導的作用，並且常常使工作中產生嚴重缺點，使社會主義的法制遭到粗暴的破壞。

徹底忠實於列寧主義的我們的黨坦率而堅定地反對了個人崇拜及其有害的後果。早在 1917 年 10 月革命前夕，列寧就曾經說過，勞動人民相信布爾什維克黨，把黨看成是我們時代的智慧、榮譽和良心。共產黨不害怕向人民講述真相，即使這是多么痛苦的也好。黨用不着掩飾缺點，因為它的總路線是正確的，共產主義建設事業正在往前推進和不斷取得勝利，而同這些缺點進行鬥爭的群眾越多，缺點也就越來越減少。

蘇共中央在“關於克服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決議中指出，

在黨組織和勞動人民的一般集會上對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討論，是在黨員和非黨群眾非常積極地參加下進行的，蘇共中央的路綫在黨和人民中得到了充分的擁護和支持。

對約·維·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危險現象之一是，黨內和國家生活的列寧準則遭到了破壞，黨內的集體領導原則遭到了蹂躪。在約·維·斯大林生活的最後時期，對他的个人崇拜在某種程度上束縛了黨的內在力量，阻礙了黨內民主的發展。好多年沒有召開黨的定期的代表大會，好多年沒有召開蘇共中央委員會的全體會議。在這種條件下，對黨的建設的缺點提出批評的機會就受到了限制，為專斷、發號施令以及採取並不都是正確的个人決定等等打開了廣闊的場所。個人崇拜給黨組織的思想工作帶來了巨大的損害。它使關於个人在歷史上的作用的非馬克思主義觀點，使在宣傳工作上的學究習氣和教條主義得到了某種流行。

在蘇共中央委員會倡議下展開了反對個人崇拜、爭取恢復黨內生活的列寧準則、首先恢復集體領導原則的鬥爭。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已經開始按照蘇共黨章的規定經常召開了，在規定的時期內召開了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上、在黨代表大會上討論了黨、國家和經濟建設方面的根本問題，批判地估計了前一時期的工作結果，定出了刻不容緩的任務以及國家和黨的發展遠景。黨的思想工作提高到了新的更高的水平，黨的思想工作的首要任務就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生動的現實生活中各種事實進行創造性的研究，把宣傳同共產主義建設的實際工作緊密地聯繫起來。

在中央委員會的領導下，在地方黨組織內也展開了爭取恢復黨內生活的列寧準則的鬥爭。在地方黨組織中也開始比較經常地召開黨代表會議和各種集會，廣泛地討論黨內生活和經濟工作中的迫切問題，嚴厲批評地方黨機構活動中的缺點和錯誤。其結果是，我們黨員群眾的積極性有了新的高漲。

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最重要的特點在於它充滿了不可戰勝的生命力，不會向官僚主義化和退化現象讓步。儘管對約·維·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給黨帶來了巨大損害，弗·伊·列寧所締造的政黨，依靠它的地方組織，任何時候也沒有中斷它的創造性生活。黨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說中，從同人民的聯繫中為它的偉大成就汲取了力量。

正如蘇共中央決議指出，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和中央委員會在斯大林去世以後的全部活動鮮明地證明，在黨中央委員會內部存在着已經形成的列寧主義的領導核心，他們正確地了解到內外政策方面已經成熟的各种需要。不能說，同个人崇拜相聯繫並且阻礙了社會主義向前發展的那些反面現象沒有遭到過反對。不僅如此，而且還有過某些時期，例如在戰爭年代中，斯大林的个人專斷的行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大大地削弱了不顧法制、獨斷獨行等等的不良後果。在斯大林剛一去世後，中央委員會的列寧主義核心就開始走上了同个人崇拜及其嚴重後果進行堅決鬥爭的道路。

事實說明，反對个人崇拜、爭取發展黨和蘇維埃的民主的鬥爭已經激發了人民大眾——歷史的真正創造者——的創造性積極性的空前高漲。蘇聯人民感覺到自己是國家的主人，要對國家的現在和未來負責。因此就產生出要儘可能迅速地消除我們現存的缺點，儘可能充分地利用我們的可能性以完成經濟建設任務的願望。

黨教育自己的幹部和全體共產黨員今後仍要以全力發揚和支持勞動人民的創造主動精神，對缺點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傾聽群眾的呼聲，教育群眾並且向群眾學習。堅持不渝地遵守集體領導原則以及黨和蘇維埃的民主原則，就是解決這種任務所必需的手段。但是在堅決實行這些原則的同時，還應當同一切否定領導者在國家、黨和經濟建設中的作用的小資產階級的無政府主義企圖堅決進行鬥爭。弗·伊·列寧早在蘇維埃國家建立

的头几个月內就寫道，“应该学会將劳动群众举行群众大会的这种汹涌澎湃有如春潮泛濫一切堤障的民主精神，与在工作時間內实行铁的紀律，及在工作中絕對服从苏維埃領導者一个人意志的精神联成一气。”（“列寧文选”兩卷集第二卷第四〇一頁）。

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对我党的新勝利、对整个共產主义运动將具有重大意义。

苏联共產党忠实于國際主义团結以及劳动人民在他們爭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斗争中的國際团結的原則。在现代条件下，劳动人民的馬克思主义政党認為有必要擴大彼此之間的接触，捍衛和巩固他們在同反人民的帝國主义力量進行斗争中的思想上的一致和兄弟的团結。苏共中央決議說，“可以相信，各國共產党和工人党將更高地举起光荣的馬克思主义的無產階級國際主义的旗帜。”

國際資產階級利用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展开的批判，發动了一个反对我們党的誹謗运动，企圖用这种方法在各國共產主义和工人运动隊伍中制造驚慌和混乱。同时誹謗运动的組織者們企圖掩盖这样一个事实：这里所談到的只是我國生活中已經过去的一个階段。

枉費心机的掙扎！兄弟的共產党和工人党識破了社会主义的敌人的陰謀，并且正在給予他們应有的反击。

不管帝國主义資產階級多么瘋狂，不管他們對我們共產党怎样誹謗，他們都不能对其他國家的兄弟党、对全世界劳动人民掩盖这样一个确定不移的事实：我們党的創造力正在蓬勃高漲中。对个人崇拜進行的斗争証明的不是我們党的軟弱，而是我們党的巨大威力，克服个人崇拜的后果，將保證党得到進一步的巩固，并且保證黨員群众創造主动精神得到提高。而这是共產主义在我國取得新的世界歷史性勝利的可靠保證，是对進一步巩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世界共產主义及其他進步力量增長的重大貢獻。

德國統一社會黨 中央委員會政治局聲明

(原載1956年7月8日柏林“新德意志報”)

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一直在德國各階層人民中間有着深刻的反響。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歷史意義在於它向全人類指出了不同社會制度各國之間的和平共處和在當前時代阻止戰爭的光明前景。第二十次黨代表大會表現出向共產主義邁進的蘇聯力量的增長、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加強和社會主義思想在資本主義國家、在殖民地和附屬國的影響的加強。由此而產生了新的可能性和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各種不同的形式。這為各工人政黨的 cooper 創造了有利的條件。事情越來越明顯：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之間、和平力量同戰爭力量之間的新的力量對比，對於進一步加強社會主義陣營、對於緩和局勢和保證和平政策的順利執行從而對於德國人民目前和將來的情况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關於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對於斯大林的錯誤，特別是對於個人崇拜問題所進行的批評，在我們黨內和群眾中間也進行了討論。他們討論了如何才能迅速地克服個人崇拜的一切有害的後果，如何才能完全保證民主法治以及必須有效地為遵守列寧關於黨內生活的原則而進行鬥爭。對於一切正直的社會主義者來說，關於斯大林錯誤的公布是一次沉重而痛苦的震驚。關於這些錯誤的事實已經向（德國統一社會黨）第三次代表會議的代表和黨的積極分子作了傳達；在黨的支部大會上，也作了關於這些錯誤的報告，並且進行了討論。在這些討論當中，蘇共第二十

次代表大会和德國統一社会党第三次代表會議的決議獲得了完全的贊同，并且討論了如何有效地執行這些決議。可是，在第三次黨代表會議上，還不能夠就由於新形勢和批評個人崇拜而產生的一切問題進行詳細的討論。

德國統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歡迎蘇共中央委員會1956年6月30日關於克服個人崇拜及其後果而作的決議。政治局建議全體黨員和各級黨組織詳細研究這個意義重大的決議，向勞動人民傳達這個決議，並且為改善我黨的政治、經濟和思想工作而做出結論。

各級黨組織必須根據蘇共中央的決議更深刻地學習和了解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人民群眾、黨和個別卓越人物在歷史中的作用的理論，學習和了解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勝利以及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蘇聯人民的歷史功績。這樣的學習將使各級黨組織能夠更有力地为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的純潔性、為實現黨的決議而進行鬥爭，並且能夠更有效地打擊敵人對黨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挑釁。擺在我們黨面前的任務是：考慮到世界力量對比的变化，同德國人民所有進步力量一起，勇敢地實現保衛和平、完成第二個五年計劃、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加強工農政權和以民主的方式恢復德國統一的偉大任務。因此，我們必須用自我批評的精神來批判我們目前各方面的工作，堅決揭露和克服一切阻礙和錯誤，並且對各項問題求得新的解決方案。我們必須從批判個人崇拜、批判對人民群眾的作用估計不足和破壞民主法治以及批判教條主義中吸取教訓。但是，我們不能因此主要地就向後看，而是應該向前看和向前邁進。我們的工作是關係到將來的，因此，就必須面向着將來。

最近幾個月的國際動態証實：社會主義陣營將日益強大。進一步緩和國際緊張局勢和實際保障和平的前景將日益開展。

以美國帝國主義統治階層為首的反動力量自然對這種新形勢感到了最大的不安。他們正在尋找阻撓國際緊張局勢緩和並且使冷戰政策繼續下去的手段和途徑。他們力圖侮蔑社會主義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借以窒息人民大眾追求社會進步、和平和民族獨立的願望。

這些反動力量體現着一種社會制度，這種社會制度給予擁有千百億資產的少數資本家以對勞動人民進行無恥剝削的無限權利。資本主義的歷史標志着對世界人民爭取自由的努力進行血腥迫害，標志着危機和戰爭、社會動亂和衝突。因此，這一制度在今天已經愈來愈遭到絕大多數人類的譴責。

阿登納集團同他們所操縱的報紙和無線電台特別熱心地力圖利用統一社會黨第三次代表會議所決定的黨的政策和鑷除黨和國家機構工作中的缺點和弱點的措施，來對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進行誹謗。

但是，事實表明，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和統一社會黨第三次代表會議以後展開的自由討論更加促進了我們黨的內部團結和思想上的成熟，从而使工農國家進一步鞏固了。事實證明，第三次代表會議關於第二個五年計劃的指示和關於廣泛發展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國內民主的措施的決議獲得了勞動人民的贊同，並且加強了他們的創造性活動。這些決議也獲得了西德勞動人民的贊同。

波恩政治家通過他們的誹謗企圖把人們的視線集中在過去的問題上，從而轉移德國人民對於西德目前形勢的注意。在目前，西德軍國主義正在通過實施普遍兵役制而加強他們的力量，並且正在準備新的侵略冒險。波恩政治家企圖使人們不注意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工農政權的進一步鞏固。我們的工農政權由於堅持緩和緊張局勢和保障和平的政策，已經產生了日益巨大的影響。爭取德國統一、反對重新軍國主義化和新法西斯主義的鬥爭，要求在兩個德國和它們的代表之間進行談判和達成諒解，

这种認識已經廣泛地傳播到了西德資產階級政黨中間。毫無疑問，在德國重新統一的時候，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勞動人民的成就將不容許受到侵害。德國統一的敵人在他們的挑撥宣傳中是把矛頭指向德國最強大的黨——德國統一社會黨的。因為他們知道，我們的黨是全德國進步和民主發展的推動力。因為他們要盡一切力量阻止全德工人組織之間的諒解和合作。他們盼望德國工人階級的分裂繼續下去。

在敵人的宣傳中曾經認為斯大林錯誤的根本根源是在於蘇維埃制度、在於蘇維埃制度的社會和國家秩序和在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說。使人遺憾的是，有少數進步思想的代表竟也受到了這種說法的影響。

波恩帝國主義者和軍國主義者的統治使得大壟斷資本在千百萬勞動人民受剝削的條件下獲得巨大的利潤，並且使得像格洛布克和布勞提加姆一類的法西斯分子、像曼陀菲爾和豪辛格一類的希特勒將軍重新佔據了國家的領導職位，而擁護和平、統一和諒解的人士卻被投進監牢中。這些帝國主義和軍國主義分子沒有絲毫權利對蘇維埃民主進行批評。必須明白地指出，侵略成性的德國帝國主義和軍國主義分子也助長了斯大林的錯誤的發展。正是他們在美、英、法三國伙伴的縱容和積極支持之下把德國法西斯主義擱上了台，並且利用它作為反蘇的先鋒隊。這樣，他們就從 1933 年起造成了一種對蘇聯經常威脅和進行破壞工作的氣氛。不要忘記，斯大林在違反法制方面所犯的重大而不可原諒的錯誤就是在這種德國法西斯主義對蘇聯實行侵略政策的條件下發生的。

但是這些錯誤的根源不在蘇維埃的制度中。蘇共中央委員會的決議正確地指出：

“正是蘇維埃制度造成了發展人民巨大創造能力的可能性，它發動了儲藏在人民群眾中的無窮盡的創造力量，並且推動着千百萬人民在國家有意識的領導下積極而創造性地參加社會主

义建設工作。在歷史上短短的时期中，苏維埃國家作为經過最嚴重考驗的勝利者而出現。它經受住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的考驗。同任何資產階級的民主不同，苏維埃民主不僅毫無例外地对社会中的所有成員宣告了劳动、教育、休息和参加國家事务的权利，宣告了言論、新聞、信仰自由和提供了自由發展个人能力的实际可能性以及給予了所有其他的民主权利和自由，而且还在物質上作出保障。民主的本質不是在于形式上的規定，而是在于政治权力是否真正反映多数人民的意志和基本利益，是否真正反映劳动人民的利益，并且为他們服务。苏联的全部國內和外交政策証明，我們的制度是真正民主的、真正人民的制度。苏維埃國家的最高目标和經常的关怀是全面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且保証苏联人民的和平生存。”

如果有人提出这样的問題：有哪些保証使得斯大林的錯誤不会再發生？那么，就必须指出，苏联共产党已經自己勇敢而公开地提出了消除个人崇拜和斯大林所犯的不能容忍的錯誤的問題。这就是苏共具有完全克服个人崇拜的后果和將來不再重犯这一类錯誤的决心的最好証明。同时，这也是苏共忠于馬克思列寧主义以及苏維埃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和有生命力的最好証明。

敌人的宣傳自然是要动摇德國社会主义者和進步力量对苏联的友誼。但是，我們过去沒有而且將來也不会忘記，苏联曾經把德國人民从德國法西斯帝國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來。我們同样不会忘記，苏联共产党过去是現在还是國際革命工人运动走上社会主义和共產主义道路的先鋒。因此，我們仍然和过去一样，最坚决地拥护德國人民和苏联人民友好，拥护德國工人运动和苏联共产党的兄弟团結。

二

在德國統一社会党第三次代表會議以后，德意志民主共和

國政府採取了許多有助於緩和德國內部局勢和增進諒解的措施。這就是採取進一步發揚民主和改善勞動人民生活狀況的措施。這樣就有將近兩萬個因為犯了刑事案或其他反對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罪行而被法院判決了的人現在得到了釋放或緩刑，對於刑法法典已經進行了一種逐步的改革，進一步改善國家執行機關的工作將保證民主法治的嚴格遵守，在德國內部旅行交通方面已經有很多放寬，部長會議關於確定國家人民軍為九方人和以志願方式補充軍隊人員的決議，以及德國統一社會黨中央委員會寫信給德國社會民主黨中央委員會建議共同商討關於裁減軍隊和阻止實行普遍兵役制的問題，這些都是對緩和緊張局勢的重要貢獻。

黨和政府將繼續執行緩和德國內部的緊張局勢和使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生活進一步民主化的政策。

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生活進一步民主化的主要問題現在是，而且將來也是，人民群眾通過合作和主動性來支持這一過程，從而有助於克服官僚主義的障礙，保證民主法紀和使選出的人民代表充分行使他們的職權。

在德國歷史上第一次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產生了一個真正的人民政權，這也就是一個真正民主法治的基礎。如果在實行民主法治的時候發生了過火行為和錯誤的話，那麼，這是由於冷戰的形勢、由於鎮壓西方特務機關不斷的罪惡破壞陰謀的必要性，並由於社會主義的立法本身必須要逐步發展的情況。民主法紀的保證還要求陪審員的合作和重視勞動人民的批評。由於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人民民主制度的建立，已經創造了先決條件，使所有勞動人民能夠對民主法紀的發展提供廣泛的民主合作。

但是，這一正確的、為勞動人民所擁護的政策的要求社會上所有進步力量提高警惕性。波茲南事件是反動地下組織的挑釁分子在外國特務（其中包括西柏林和西德的特務）支持下發動的。流血的騷動事件證明了，和平的敵人不惜採取一切手段

來破壞國際局勢的緩和和社会主义陣營各國生活的進一步民主化，破壞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所指出的以和平方式走向社会主义的可能性。

因此，為了進一步勝利地實行民主化和執行緩和德國內部局勢的政策，要求我們工農國家所有機關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全體勞動人民對帝國主義分子和軍國主義者的挑釁提高警惕性，對人民的自由並不意味着對那些破壞和平和破壞人民創造性勞動的分子的自由。

三

如果有人提出這樣的問題：克服個人崇拜和它的後果和勝利執行統一社會黨第三次代表會議的決議有哪些保證？那麼，我們就可以這樣答復：這種保證就在於徹底遵守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人民群众的創造性作用和黨的作用的學說，在於所有黨的機構和黨組織嚴格維護列寧關於黨的生活的準則。

首先是黨有必要在目前展開的爭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鬥爭的條件下，照顧到所有德國形勢的特點，創造性地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學說。因此，就必須要對教條主義的各種表現形式並對資產階級思想對黨員和所有勞動人民產生的每一種影響進行堅決的鬥爭。

我們黨的全部工作是在馬克思列寧主義革命學說的指導之下進行的。但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是一種創造性的學說，它要求在新的形勢下黨的集體應該照顧到具體的歷史條件，擬定有關今後政策的問題。

在敵人的宣傳中出現了這樣的說法：馬克思列寧主義是不正確的，因為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中提出了關於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和平共處，關於在現階段中阻止戰爭的可能性和關於從資本主義到社会主义過渡形式的多樣性這些新觀點。而這些新的觀點是世界上的新的力量對比關係所形成的。

一个已經在地球上三分之一的地方獲得勝利的学說，一个在全世界獲得越來越多的新的信仰者的学說会不正确嗎？馬克思列寧主义的强大和生命力正是在于：它反对教条主义的僵化，并且时时照顧到新的歷史經驗和要求。

統一社会党第三次代表會議提出了許多問題。這些問題必須徹底地在理論上解釋清楚，因為它們都有很大的实际意义。這些問題就是关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建設社会主义的特点、工人階級的作用和它的联盟政策、爭取小資產階層拥护社会主义的政策、在農業中社会主义建設的特点。這些問題就是关于我們人民民主制度的本質和作用、关于民主的廣泛發展、关于社会主义的道德改善、同西德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的关系等。我們的經濟学家、哲学家、歷史学家、法律学家、教育家和其他科学工作者面臨着这样多的新問題：关于社会主义經濟法則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作用和資本主义經濟法則在西德的作用、关于新的社会关系、关于对德國人民和德國工人运动的歷史作出有事实根据的正确評價、关于社会主义的立法、社会主义的教育等等。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和統一社会党第三次代表會議以后的新形势中，已經出現了許多新問題。這些問題正在等待以馬克思列寧主义的理論和方法來加以解决。

到目前为止，討論还没有完全展开的原因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对科学—理論工作所造成的影响。但是，这种弊端只有通过公开的意見交換和科学論战才能克服。党的科学—理論工作人員和宣傳工作人員應該毫不迟疑地过渡到采取这样的做法：在討論会和會議中以及在科学雜誌上，應該对于在我們的發展中的新問題或重新評價我們的歷史——包括党史在內，說明自己的立場。在爭論中，自然應該采取公开而友好的态度。在这里也一定会出現錯誤的見解。但是，真理只能在科学論战中產生。

克服教条主义和創造性地应用和丰富馬克思列寧主义是一

項要求我們作出巨大努力的任务，这个任务不是在几个星期之內就能解决的。向教条主义進行斗争首先意味着保証理論和实践的一致，完全照顧活的现实，并且把建設社会主义的学說应用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条件上。

这种馬克思主义研究工作的創造性的發展同时对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形成有最大的实际意义，因为没有对人的社会主义教育，沒有社会主义觉悟和社会主义态度，就不能达到完善的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不僅是要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它不僅力圖經常改善劳动人民的物質和文化条件，而且它还要求有觉悟的人。这些人將掌握科学和文化的成就，并且具有人道主义的精神、毫無保留地忠于人民的精神和無產階級國際主义的精神。

我們必須肯定，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教育和黨員的馬克思列寧主义教育落后的这种現象，是既由于过去理論工作的薄弱，又由于还在党的宣傳工作中占統治地位的教条主义作風所造成的。因此，担任科学工作和宣傳工作的黨員必須公开討論怎样才能克服教条主义和發展一种生动的、創造性的理論工作气氛的問題。

我們的党在所有各个領域中的理論和实践上都是站在馬克思列寧主义的立場上的。各学校和高等学校的任务就是在社会主义的精神下教育学生。但是，这不是意味着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文化生活中不能有其他各种見解。恰恰相反，見解的多样性將有助于我們的科学和藝術的發展。前提是：到处必須有創造性的工作和自由討論的气氛。

自然，問題是在于發展一种進步的科学和一种同生活相联系的、充滿進步思想的藝術。我們所致力科学与藝術自由討論的气氛自然不是意味着宣揚战争思想的自由，不是意味着宣揚毀滅人类和退化思想的自由。后一类思想今天又在西德結出了它的有毒素的果实。

四

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人民群眾作為歷史的真正創造者的作用和工人階級革命政黨作為思想上一致的鬥爭聯盟的作用的學說，對於克服癱瘓人民群眾和黨的積極性的有害的個人崇拜具有重大的意義。在我們這裡也必須徹底消除個人崇拜和它的一切後果。這絕不是僅僅指對於約·維·斯大林的崇拜。個人崇拜以各種形式表現在黨、國家機關、經濟和民主群眾組織的工作中。例如，黨和國家的領導幹部把自己置於鄉、縣和專區選舉出來的機構之上，並且經常決定原來屬於這些機構所管範圍的問題。一切問題等待某些人來解決，而實際上這些問題只能通過負責的集體工作解決。把社會主義建設中出於勞動人民集體功績的成就看成單單是個別人的成績、對於在勞動人民鬥爭中建立功勳的活人作過度的敬仰，這些都可以看成為個人崇拜。

根據本身經驗，德國統一社會黨中央委員會早在 1953 年就開始採取反對個人崇拜的措施。例如，規定不許繼續以活人的名字來命名企業機構和街道等。但這些措施並不是說明一切個人崇拜的形式和後果就已經消滅。例如，在黨史和德國工人運動史上，經常還是低估下層黨和工會組織的作用，並且對它們的作用幾乎是根本不加評價。因此，必須在黨組織中討論黨應該如何有效地繼續進行克服個人崇拜和它的後果的鬥爭。

使黨得以生氣勃勃地發展的基本保證之一，就是保障領導的集體性和保證黨與群眾經常的密切聯繫。集體性並不限於共同的討論和會議，而是要求進行同志般的創造性合作，來共同解決從社會主義建設中產生的問題。

黨的領導必須是集體工作的組織。集體性不僅要求一切領導成員積極參加工作，而且還要求吸引最廣大的黨員群眾來完成任務。重要的是，領導要發揮最高度的主動性和責任感，並且給予黨小組、支部和各級黨組織以具體的指導。在蘇共第二十

次代表大会和統一社会党第三次代表會議上为了遵守列寧关于党的生活准則而進行的斗争，有助于進一步巩固党并且使党能够克服一切困难。

党的政策的执行，無論在上級組織和下級組織內，都有賴于黨員的政治思想覺悟、積極性和对党的忠誠。因此，重要的前提是，黨員們不是在党的背后，而是在党内討論他們的意見。每个同志必須有可能在他的党組織內公开提出他的意見和观点。

在党組織內不許限制黨員自由發表意見，不許任何干涉和命令，因为它們癱瘓黨員的積極性，它們不是創造一种坦率和團結的气氛而是創造一种謹小慎微和漠不关心的气氛。这当然不是說可以容忍敌人所操縱的对于党或对于党的討論的污蔑。党为自己訂了党章。党章明确地說明了黨員的权利和义务。它是建立在德國和國際工人階級运动数十年經驗的基礎上的。遵守这个党章对于每个黨員說來，現在是而且永远是法律。此外，还要維護民主集中制的原則，这个原則說明，上級党机构的一切決議对下級組織是有約束性的。每个黨員有責任積極地为执行党的決議而斗争。

現在的問題在于还要更好地开展党的精神生活。以往那种在黨員大会上經常不把決議和党組織的实际任务联系起來，不把黨員的模糊看法加以澄清就对党的決議表示态度的情况是不健康的。坦率和同志般的討論对于教育黨員是最重要的。不能說这一精神今天已經存在于一切党組織中了。

党也必須認真考慮如何能改進發展干部的工作和改進关心一切黨員和候補黨員的工作。目前在我們这里还有許多对人漠不关心和不公正的情况。这必須迅速加以改变。

为了改变党的这种情况，应当充分發揚列寧关于党的生活的准則，有必要在全党内，从基層組織直到中央委员会，开展批評。即使有的同志表示不正确的观点也应该重視他們的批評，并且从中作出結論。

必須公開說，黨目前向勞動人民解釋社會主義建設中某些困難和矛盾的因素和原因是不夠的。

我們的鼓動和宣傳往往使人感到似乎在西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中毫無困難，一切都很順利。然而，這在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期中，根本不是那麼回事。還常常有這樣情況，當把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和西德作對比的時候用簡單的黑白畫的方法，這也是有害的。我們公開向勞動人民說明，在科學技術的許多方面，有必要趕上西德，應該通過提高勞動生產率來不斷改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勞動人民物質和文化生活的條件。但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人民民主制度和社會主義經濟使勞動人民能夠有工作、安全、自由並且能夠經常改善他們的生活條件，而西德的資本主義制度卻沒有穩固的基礎，它正在走向重大的經濟和社會的動亂。

一切黨組織在努力完成第三次黨代表會議所提出的任務的時候必須經常緊密地聯繫工人階級和一切勞動人民，並且發揮群眾——歷史的真正創造者——的創造性和力量。

五

目前在各國共產黨內正在進行着關於創造性地運用和進一步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最生動和有益的討論。在討論中，每個黨都從它的民族特點和各國的條件出發。所有有關各國討論的情況都將在黨的科學理論雜誌上予以報道。像在一切討論中一樣，在各國共產黨的這些討論中也出現了各種各樣的意見，有正確的，也有錯誤的。我們不需要對所有這些意見都表示態度，因為我們很難時時刻刻把某一特定國家的或另一個黨的所有一切特點都注意到。但是，無疑地我們能夠，而且必須從這些馬克思主義問題的生動討論中吸取有益於我們工作的東西。

如果敵人宣傳機關竟相信這樣的神話，以為從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以後各國共產黨所進行的生動的討論是意味着“國

际共產主义的危机”的話，我們也乐于讓他們这样自己騙自己。但是敌人的宣傳已經不能再否認馬克思列寧主义是一个有國際影响的力量。所有的共產党由于他們具有共同的理論和世界觀而團結在一起。地球上已經有数以億計的人民信仰了这种世界觀。所有的共產党由于他們都站在馬克思列寧主义的立場上，由于他們都为了使工人階級从資本主义桎梏下獲得解放这一偉大目标共同奋斗而團結在一起了。苏共中央的決議正确地說：

“在現時情況下，各國共產党的工作都从每一个國家的民族特点和条件出發，最充分地反映自己人民的民族利益。而且它們意識到为工人階級利益、为和平和自己國家的民族独立而進行的斗争，同时就是整个國際無產階級的事業，因此它們團結起來，加强彼此之間的联系和合作。”

只有共產党之間才能有这种基本观点的一致和無產階級國際主义精神的團結。

只有在工人階級革命的和馬克思主义的政党的領導下，才有可能摧毀資本主义和建成社会主义。这是根据歷史經驗所得出的，并且为各國共產党所掌握的馬克思列寧主义的一种基本观点。但是，与此同时，也要求各國共產党为了共同的目标，同其他工人政党以及同具有反对帝國主义的和民主性質的党派实行合作。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所有的民主党派是結成联盟的，并且在民主德國全國陣綫中共同工作。

但是，德國統一社会党應該是我們工農國家的領導力量，它是唯一的以先進的科学理論——馬克思列寧主义为指導思想的政党。作为工人階級政党，德國統一社会党的領導作用是由于工人階級在社会中的作用和重要性而產生的。

我們还有很大的經濟困难需要克服。生活的民主化必須要繼續下去。在科学和藝術方面應該發揚一种創造性的气氛。如果我們勇敢地向前看，并且永不迷失我們的目標的話，我們就能够完成这些任务。

越南“人民报”社論：
**欢迎苏联共產党中央委员会关于
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決議**

(1956年7月10日)

苏联共產党中央委员会 6 月 30 日关于反对个人崇拜的決議，是一个在政治上和理論上都非常重要的文件，它進一步地闡明了苏联共產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具有歷史意义的決議。这个決議是对世界上反动帝國主义者正在利用苏联共產党就个人崇拜問題所做的自我批評來誣蔑苏联、誣蔑共產主义和各國共產党，妄圖在世界工人階級隊伍中制造混乱和分裂的陰謀的一个迎头痛击。

从苏联共產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文件，我們可以看出：苏联共產党在反对个人崇拜方面所做的努力，主要是为恢复和尊重关于党的生活中的集体領導原則，發揮正在为勝利建設共產主义而奋斗的人民群众的作用和積極性。

共產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敌人企圖把苏联的自我批評和反对个人崇拜描画成为爭夺地位的事情。他們不能够理解和不願意理解的是，苏联共產党中央反对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从关于人民群众和个人在歷史上的作用的馬克思列寧主义的歷史唯物主义学說出發的，同时也是从苏联人民和共產主义的最高利益出發的。他們不能理解的是，只有工人階級的党，奉行馬克思列寧主义的党，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相信人民群众的党，一个力量充沛和掌握未來的党，才能够对自己的錯誤和缺点進行这样勇敢和坚决的自我批評。

这个決議分析了使个人崇拜習气、具体是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產生和發展的歷史条件和环境,这些条件和环境是:在十月革命勝利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这个歷史时期中,第一个社会主义國家遭遇到了許多困难和危險;苏联人民在苏联共產党的領導下,進行了英勇的奋斗,克服了这些困难,取得了偉大的勝利。在列寧逝世后,斯大林有了很大的功績,但是謳歌使斯大林陶醉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就逐漸地形成和發展。斯大林就在这样的条件下犯了許多嚴重的錯誤。

上述的对產生个人崇拜的錯誤和缺点的原因和环境的辯証的分析,給我們这样一个教訓:革命者永远不能被成績和勝利所陶醉。“勝不驕,敗不餒”,这是我們的座右銘,因为只有这样我們才能避免自滿自足和脫离群众,時刻地保持着共產主义者的謙遜的高尚品質。这个教訓,对于我國环境更为重要。

个人崇拜現象必然是在一定的歷史条件下產生的,它当然不是苏維埃制度本質的反映,这一点在決議的第三部分有了很明确的分析。所謂个人崇拜的現象是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独裁”“独断”的本質所產生的說法是毫無根据的。尽管个人崇拜習气造成了許多嚴重的危害,但是苏联的苏維埃制度和我國以及其他兄弟國家的人民民主制度,过去是、現在仍然是最民主、最進步的國家制度。这就說明了这些制度得到人民的支持而且从过去到現在在建設祖國和保衛和平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苏联共產党勇敢地 and 公开地提出根除个人崇拜、加强集体領導原則、尊重苏維埃國家的法律制度、提高人民的作用这件事情的本身,又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强有力的憑証。因此,看到苏联共產党对个人崇拜問題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我們更相信苏联,更相信我們的制度和事業。

在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員會第九次擴大會議以后,經過廣泛的宣傳、傳達,我們党的干部和黨員以及人民都对苏联共產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決議表示热烈欢迎和拥护。代表大会关于向

社会主义过渡的不同形式、关于保衛和平的可能性的分析，為我們的祖國的和平統一而斗争的路綫提供了理論根据，并且提高了我們对民族的光明前途的信心。苏联共产党对个人崇拜問題所進行的勇敢的批評和自我批評以及我党中央第九次會議所做的批評和自我批評在党的干部和黨員中引起了積極性和大胆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的精神，幫助我們看到在領導工作中、在执行政策方面以及干部的思想作風上的許多缺点和錯誤。

在这一个基礎上，我們更加欢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員會就个人崇拜問題所做出的決議，我們特別欢迎和學習滲透在決議中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的精神。我們要學習运用这一精神，繼續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檢查和克服关于集体領導和个人崇拜方面的缺点和錯誤，以便改進党和國家的工作。

波蘭“人民論壇報”社論： 極端重要的文件

(1956年7月11日)

苏联共產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決議不僅在社会主义陣营、而且在整個國際工人階級运动和所有我們的兄弟党内都引起了廣泛的反应。因为它关联到一些根本問題——社会主义制度的實質，和它的反对与崇拜斯大林有关的偏差的勝利斗争。

这一重要文件标志着苏联共產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苏联生活中以及在整個國際工人階級运动的活动中所引起的自我批評和改進工作的進一步的开展。这是苏联对目前正在所有共產党和工人党内進行的友好的討論的另一个貢獻。这就是为什么他們怀着感謝的心情來欢迎它的原因。

陶里亞蒂同志說：“我覺得，这个文件对于澄清苏联共產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提出对斯大林活动的批判以后在國際工人階級和共產主义运动中產生的疑問，提供了極其重要的貢獻。”

社会主义的敌人圍繞着这次討論發動了一次猛烈的宣傳运动。这次运动的主要目的是企圖“証明”斯大林时期的偏差——为了消除它們，苏联共產党已經進行了三年有效的工作——据說是从苏維埃制度本身產生的，以粉飾病入膏肓的資本主义制度。但是，如果确是这样的話，怎样解釋苏联共產党的領袖們自己本着共產党人的勇敢精神公开了这些偏差情况并且宣布對它們進行無情的斗争这一事实呢？來自大西洋彼岸的这种污蔑运动的煽動者們很小心地避免回答這個問題。因为苏联共產党在

事实和言論中對這個問題的答复清楚表明，斯大林時期的偏差不僅不是從社會主義制度產生的，而且是對這個制度的實質是有害的和格格不入的一種壞的發展。

正如“真理報”所正確指出的，“在個人崇拜問題上的勇敢的和無情的自我批評是我們黨的生命力和力量、蘇維埃社會主義制度的生命力和力量的新的、令人信服的表现。”

當然，蘇共中央委員會知道，公開承認錯誤將造成某些消極的後果，很容易地為共產主義的敵人利用。但是，這些困難是暫時性質的，是完全不能同符合於工人階級最切身的利益的巨大的積極結果相比的。因為，對有關崇拜斯大林的一切消極表現進行勇敢的和不妥協的揭露難道不是創造了防止將來重犯這些嚴重的偏差的可能性的最可靠的保證嗎？因為，這種揭露難道不是為建立在群眾積極地、創造性地參加管理他們自己的國家的基礎上的黨內民主的發展、集體領導和蘇維埃民主的全面發展創造了鞏固的基礎嗎？

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決議對於有着這樣嚴重後果的對斯大林的崇拜如何能夠在蘇維埃社會主義制度的條件下產生和流行的原因作了比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文件更客觀的解答。蘇聯同志們不僅這樣分析了有關斯大林個人品質的主觀因素，而最重要的是分析了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歷史環境。

蘇聯——被敵人包圍的堡壘——的異常困難和複雜的國際和國內形勢要求有鐵的紀律和領導的集中，這對社會主義民主的發展產生了消極的影響。但是決議強調指出，在那時，黨和國家就已經認為這種限制是暫時的限制。蘇共中央委員會的決議特別強調指出斯大林關於隨着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進展階級鬥爭日益尖銳化的錯誤理論對社會主義建設和對黨內民主和蘇維埃國家的民主的發展所造成的危害。這個文件說，這個理論只有在過渡時期的一定階段才是正確的，而實際上，在社會主義勝利所創造的環境里，這種理論成為了大規模鎮壓和極粗暴地破

坏社会主义法制的根据。

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決議說明了使得中央委员会的列寧主义核心很难挺身而出反对斯大林和对那时的不法行为展开斗争的情况。当时尽管斯大林犯了錯誤，全國却正在努力推進社会主义建設，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反对斯大林的步驟是不会得到全國的支持的。当时在全國人的心目中，社会主义建設的成功是同斯大林的名字緊緊結合在一起的；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反对斯大林的步驟都会被認為是反对社会主义事業本身的步驟，是在資本主义包圍的情况下極端危險地破坏党和全國的團結的步驟。斯大林逝世以后，中央委员会的列寧主义核心馬上对个人崇拜和它的嚴重后果展开了坚决的斗争。

这项決議的第二部分結束的时候說：“顯然，所有这一切只是对于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說明，而决不是为它們作辯护，这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已經受到我們党的尖銳的公正的譴責。”

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決議，断然駁斥了認為由于个人崇拜和同它有关的偏差，苏維埃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質已經改变了的說法。苏維埃社会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会所有制、工農联盟和國際友好。

个人崇拜和違反法制大大損害了社会主义的民主的發展，并且阻碍了群众的創造性的積極性。斯大林把他自己置于一切批評之上；对斯大林的崇拜造成了嚴重的錯誤，農業管理和把國家准备起來应付法西斯的侵略的工作被忽視了；对斯大林的崇拜引起了粗暴的蛮橫行动，从而造成了同南斯拉夫的不和。虽然所有这些錯誤为國家造成了重大的損害，并且妨碍了苏維埃社会的活力的發展，然而这些錯誤并未能够使这个國家离开朝着共產主义前進的基本發展道路。

我們从公报和报纸消息，从自苏联回來的人們所談的情况中得知，在最近几年中苏联一直在進行趋向生活的民主化、社会

主义法制的巩固和劳动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的巨大变革，这些变革都是党和政府坚持不懈地、一步一步地、按照言行一致、理論結合实际的原則進行的。

从苏維埃民主的發展、党和政府为了擴大加盟共和國的权利和权力、为了保証嚴格遵守法制、为了鼓励地方的主动性、为了發揮地方苏維埃的積極性以及鼓励批評和自我批評而采取的步骤中可以看出这一点。

本來是否可能通过行政上的方法在兩年左右期間开垦三千三百万公頃的生荒地呢？像“真理报”着重指出的那样，只有依靠人民群众的觉悟、充分的主动性和英雄的劳动才可能完成这个巨大的任务。

苏联共產党中央委員會的決議引述了兄弟共產党和工人党以及它們的領袖个人关于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声明。值得指出的是，在估价陶里亞蒂同志的談話（“人民論壇报”也刊載了这篇談話的摘要）的时候的爭辯語調。

就这种爭辯來說，值得強調的是兩方面都表現了同志般的共產党人之間最友好地交換意見的态度，这种交換意見不僅沒有削弱，反而加強了無產階級國際主义和國際工人階級运动的深厚的、有機的团結。

苏联共產党中央委員會的決議的最后部分呼吁党的各級機構堅定地執行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思想、組織和經濟方面的指示。決議指出，在社会主义轉变为世界体系的情况下，在國際工人階級运动的面前开辟了一幅在爭取和平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取得勝利的令人鼓舞的新景象。不同國家走向社会主义的不同的道路正在形成，但是同时我們运动的國際間的兄弟般的友誼和团結一致具有特別的意义。

決議說：“在現時情況下，各國共產党的工作都从每一个國家的民族特点和条件出發，最充分地反映自己人民的民族利益。而且，它們意識到为工人階級利益、为和平和自己國家的民族独

立而進行的斗争，同时就是整个國際無產階級的事業，因此它們團結起來，加強彼此之間的联系和合作。”

我們以这种在为共同的目的而進行的斗争中的團結一致來对付冷战鼓吹者們的陰謀，冷战鼓吹者們正在拚命地企圖在社会主义國家中造成破坏。

苏联共產党中央委員會的這項新文件，無疑地將对从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馬克思列寧主义思想取得力量的討論和实际活动，具有極大的重要意义。我們从7月8日的“真理报”所轉載的文章，“苏維埃，真正的人民制度，是持久的和牢不可破的”，是对于這項決議的一篇極其重要的評論。每个黨員都應該仔細地研究苏联共產党中央委員會的這項決議。我們的党和工人階級同整个國際工人階級运动一起將尽力从這項文件中得出一切同我們为發揚人民民主和爭取社会主义勝利的斗争任务相符合的結論。

印度共產党中央委員會決議

(关于苏联國內所進行的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

印度共產党中央委員會討論了由于美國國務院公布了据說是赫魯曉夫同志在苏联共產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特別會議上所作的报告的全文的那一份文件以后所產生的局势。中央委員會也研究了苏联共產党中央委員會在6月30日所通过的決議。

这份报告中所提到的事实，使共產党人和全世界億万進步人民感到大吃一惊。这些事实表明，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設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在約·維·斯大林同志一生的后一时期，也發生了由于过分和專断的行动以及違反党内生活准則的行为而歪曲苏維埃民主、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事件。

印度共產党中央委員會認為，鑒于所犯的錯誤的嚴重性，鑒于这些錯誤所造成的損失，有必要采取坚决的措施來糾正这种錯誤并且消除所造成的損害。有必要進行坚决的斗争來反对个人崇拜，个人崇拜是違背馬克思列寧主义的精神的，个人崇拜的發展在造成發生这种錯誤的条件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个人崇拜縮小了群众和党的作用，妨碍他們的主动性。苏联共產党領導機構担負起这种任务，因此对社会主义事業提出了重大的貢獻。

苏联共產党中央委員會的決議，分析了造成对斯大林崇拜的發展的歷史条件和社会条件。由于敌对的資本主义包圍、法西斯主义兴起和苏联遭受進攻威脅这样一种歷史情况，就必須有铁的紀律、集中領導并且对民主加以一些正当的限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同志的某些消極的特点就开始發展起來，逐

漸導致個人崇拜和喪失集體領導，引起了有害的後果。

顯然，對於歪曲蘇維埃民主和破壞黨內準則，主要應該由斯大林同志負責。同樣無可爭辯的是，在他的一生的後一時期，個人崇拜發展到了非常嚴重的地步。印度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一方面充分認識到斯大林的領導方法中所發生的消極的特點和嚴重的缺點，另一方面也認為，片面地估計他在他的一生後二十年期間也就是蘇聯國內和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取得重大發展的期間內所起的作用，會在群眾中引起迷惑，並且會被共產主義的敵人利用來使他們陷入混亂。因此，中央委員會認為，為了對個人崇拜進行勝利的鬥爭並且有效地清除目前的混亂，必須客觀地全面估計斯大林同志的一生和工作、斯大林同志的偉大的成就和嚴重的缺點。

中央委員會認為，對於曾經是斯大林同志生前一種顯著現象的過分歌頌他的個人和作用一點，必須提供充分的解釋。對於導致專斷行動和過分行爲的原因，也有必要進行更加充分的分析。只有這樣，才能夠正確地估計個人崇拜的發展。把一切缺點和專斷作風都歸於個人的缺點，是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歷史客觀性的標準的。

帝國主義者和勞動人民的其他敵人抓住赫魯曉夫同志的報告中所揭露的事情來指責蘇聯和破壞人民對社會主義制度的信任。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6月30日通過的決議正確地揭露了這些敵人的陰謀詭計，並且着重指出了忠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科學思想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事業的必要。

工人階級的敵人千方百計地想說明已經發生的違反蘇維埃民主的事情和過分行爲是蘇維埃制度所固有的。許多正直和進步的分子都有受到這種宣傳的影響的嚴重危險。印度共產黨認為必須揭露這種宣傳和擊敗這種宣傳。

俄國無產階級革命勝利以來，到現在還不滿四十年。在這一時期中，蘇聯從落後的國家變成了世界上最先進的國家之一，

从沙皇專制的國家变成了社会主义勝利的國家。在这一时期中，三分之一的人类擺脫了資本主义的枷鎖，社会主义已經成了一种世界体系。資本主义世界正处在不断加深的危机之中，使億万人民处于悲惨失業和文化落后的境地；与此同时，社会主义世界在一切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進展。社会主义世界所樹立的榜样和它所采取的積極措施深深地影响了整个人类歷史的進程。如果說今天防止战争和在一些國家里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已在形成，如果說在前殖民地世界的國家面前已經有了進行独立的經濟發展的新机会，那末造成这一切的决定性因素就是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國家不断增長的經濟力量、政治力量、道义力量和它們所采取的政策。我們可以毫不誇大地說：人类历史上从來沒有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在这样廣大的地区內取得这样多的成就。

顯而易見，在这些違法現象和歪曲現象構成其固有本質的那种制度下，是不可能在前所未聞的規模上發動億万人民的創造力量和完成这种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的。

印度共產党中央委員會确信：誹謗社会主义的和誣蔑苏联的人們虽然可能散布某种暫时的混乱思想，但是他們是不可能阻撓社会主义思想在我們國家里愈來愈得人心的，他們也是不可能削弱印苏友誼的联系的。

苏联共產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过去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基礎上，在無坚不摧的馬克思列寧主义思想的指導下，规划了進一步發展的道路。代表大会的決議和根据这些決議所采取的措施已經对整个世界發生有力的影响，并且大大加强了爭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运动。

在苏联發生錯誤和过分行爲并不是由于馬克思列寧主义原則或者苏維埃制度造成的，而是由于在實踐中在几个方面產生了違反这种原則和制度的偏向。这些偏向是在極困难时期進行的社会主义建設獲得巨大的勝利的背景下產生的。毫無疑問，

由于正在采取措施來同在这个时期出現的缺点作斗争和消滅这些缺点，由于已經根据对过去的發展所作的詳細分析采取了進一步的措施，苏联社会將在各方面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并且能保證社会主义民主繼續得到擴大。

只有社会主义的敌人才宣傳說，社会主义是以嚴格控制思想为基础的，是否定那种構成个人的主动性的源泉的精神自由的。社会主义社会是能保證个人有充分的思想自由和自由权利的，因为它廢除了人剝削人的制度，創造了使这种个人自由能够經常得到發展的条件。經濟生活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使得更有可能擴大个人自由的范围和提供防止个人自由遭到侵犯的有效保證。

印度共產党中央委员会認為必須着重說明，为了社会主义的發展，必須坚持社会主义民主的原則，并且不断加以發展。印度共產党中央委员会十分重視保證并且發展在社会主义下的个人自由和自由权利。中央委员会深信，世界共產主义运动將从苏联的經驗中得到好处，并且將采取有效的措施來在各方面維護和擴大民主。

但是当社会主义已經成为我們这个时代的全体進步人类的共同目标的时候，各个國家將按照它自己的方式达到这个目标。印度共產党坚决遵守馬克思列寧主义的原則，設法根据我們自己國家的民族傳統和具体特点來实现它的社会主义目标。

对馬克思列寧主义原則的忠誠，社会主义的共同目标和爭取和平、民主和保衛民族自由的斗争今天構成了無產階級國際主义和各國共產党和工人党之間的兄弟合作的基礎。这种合作是以交流和匯集共同的經驗、自由地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和各國的党保持独立为基础的，这种合作对于社会主义运动是必不可少的。印度共產党將尽一切力量促進和加强这种無產階級國際主义的共同联系。

1956年7月12日